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碩士論文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Mainland China Studies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生成式人工智慧使用行為之研究：
以立法委員助理為例

A Study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Legislative Assistants



指導教授：姚蘊慧教授
Advisor: Professor Yun-Hui Yao

研究生：蔣濤
Graduate Student: Tao Chiang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October 2025

中國文化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行為之研究： 以立法委員助理為例

研究生：蔣濤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李允哲
姚溫慧
王佳煌

指導教授：姚溫慧

所長：李允哲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致謝辭

謝師長之教，謝親友之助，謝風雨之鍊；

感佩難言，來日方長。

2024年11月16日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慧（AIGC）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台灣公共治理領域帶來全新可能。在技術不斷進步與社會數位化需求增長的背景下，AIGC 技術如何被接受與應用，成為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即便面臨科技壓力與倫理挑戰，AIGC 在提升政策效率、促進數據透明度及減少人力負擔方面，展現了高度潛力。

本研究旨在探討立法院從業人員（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接受程度，以及影響其使用行為的因素，特別是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科技壓力（Technostress）及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等方面。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與質性深度訪談相結合的方法，針對立法院從業人員（立法委員及其助理）進行調查。透過基於技術接受模型（TAM）與科技壓力理論的問卷調查，回收有效樣本數為 212 份；隨後從受測者中選取 6 位進行深度訪談，進一步分析 AIGC 技術在立法院的實際應用情境及挑戰。

研究結果顯示，感知有用性是促進 AIGC 技術接受的核心驅動力，使用者普遍認為該技術能顯著提升政策分析與數據分析的效率。然而，感知易用性及操作界面設計對使用意圖產生關鍵影響；過於複雜的操作或學習成本過高，可能導致使用者抗拒。同時，科技壓力如技術更新過快與數據過載對使用行為形成負向影響，但適當的支持與培訓可緩解此問題。此外，社會影響，尤其是來自上級的支持與同儕的示範作用，亦對技術的推廣產生顯著促進效果。

總結來說，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在台灣公共治理中的應用展現出良好的發展潛力，但其推廣過程中需平衡技術效益與使用者心理負擔。本研究為理解 AIGC 技術接受行為提供了理論與實務支持，亦為未來政策設計與技術改進提供參考。

關鍵詞：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接受模型、科技壓力、公共治理、立法院、AI

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presents new possibilities for public governance in Taiwan. Amid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rowing demand for digital services, questions of how AIGC is accepted and used have become salient. Despite technostress and ethical concerns, AIGC shows strong potential to improve policy efficiency, enhance data transparency, and reduce workloa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ceptance of AIGC among personnel of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legislators and their aides) and identifies determinants of usage, focusing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PU),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 technostress, and social influence.

Adopting a mixed-methods design, we combined a survey grounded i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and technostress theory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We collected 212 valid survey responses and conducted six follow-up interviews to probe actu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challenges within the legislatur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U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AIGC acceptance; respondents reported notable gains in policy and data analysis efficiency. PEOU and interface design significantly shape behavioral intention, as complex workflows and high learning costs discourage adoption. Technostress—stemming from rapid updates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negatively affects usage but can be mitigated through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training. Social influence, particularly supervisory endorsement and peer modeling, further facilitates diffusion.

Overall, AIGC adoption in Taiwan's public governance is promising but requires balancing performance gains against users'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burden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AIGC acceptance and offers actionabl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design, capacity building, and tool refinement.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echnostress; social influence; public governance; Legislative Yuan; Taiwan; AI.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	5
第三節 預計研究貢獻	9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5
第貳章 文獻與理論研究	20
第一節 生成式人工智慧（AIGC）的發展歷程與應用領域	20
第二節 技術接受理論	23
第三節 科技壓力理論	30
第四節 其他相關理論	3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38
第一節 研究方法	38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	48
第三節 研究工具	55
第四節 研究程式	60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68
第六節 研究限制	76
第肆章 研究發現	84
第一節 量化分析結果	84
第二節 質性分析結果	168
第三節 量化與質性資料的整合	188
第四節 研究發現的討論	196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204
第一節 研究結論	204
第二節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構建與意涵	207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210
參考文獻	213
附錄一：立法院從業人員 AIGC 觀點分析問卷	218
附錄二：訪談大綱	223
附錄三：研究同意書	225

表目錄

表：3-1-4-1 假設與變量設置（基於整合模型）	47
表：4-1-1-1 各構面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95
表：4-1-3-1 中英文題目及標籤對照表.....	141



圖 目 錄

圖：3-1-2-1 研究流程圖.....	41
圖：3-1-4-1 整合模型相關性分析圖.....	48
圖：3-4-2-1 數據整理代碼圖.....	63
圖：3-4-2-2 顯著檢定代碼圖.....	64
圖：3-4-2-3 檢定可視化代碼圖.....	65
圖：4-1-1-1 性別分佈圖.....	84
圖：4-1-1-2 年齡分佈圖.....	85
圖：4-1-1-3 學歷背景分佈圖.....	85
圖：4-1-1-4 黨籍分佈圖.....	86
圖：4-1-1-5 工作年資分佈圖.....	86
圖：4-1-1-6 學群分佈圖.....	87
圖：4-1-1-7 對AI工具的瞭解度.....	88
圖：4-1-1-8 使用AI工具的原因.....	88
圖：4-1-1-9 使用中遇到的困難.....	89
圖：4-1-1-10 AI工具的使用頻率.....	90
圖：4-1-1-11 AI工具每次使用時長.....	90
圖：4-1-1-12 AI工具每月軟體花費.....	91
圖：4-1-1-13 是否願意購買AI硬體.....	91
圖：4-1-1-14 常用AI工具.....	92
圖：4-1-1-15 參與AI課程訓練的時間.....	92

圖：4-1-1-16 AI課程的花費.....	93
圖：4-1-1-17 AI工具在立法院工作的應用	94
圖：4-1-1-18 我覺得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能幫我有效地解決問題.....	97
圖：4-1-1-19 我覺得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98
圖：4-1-1-20 我覺得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是容易學習的.....	99
圖：4-1-1-21 我覺得學習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需要投入大量時間.....	100
圖：4-1-1-22 我覺得學習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需要專業知識.....	101
圖：4-1-1-23 其他立委辦公室已使用會提高我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意願	102
圖：4-1-1-24 我的上級鼓勵我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103
圖：4-1-1-25 我願意持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104
圖：4-1-1-26 我願意精進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的能力.....	105
圖：4-1-1-27 我願意參加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的培訓課程.....	106
圖：4-1-1-28 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來解決.....	107
圖：4-1-1-29 未來我會優先選擇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來解決問題.....	108
圖：4-1-1-30 我會推薦他人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109
圖：4-1-1-31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更新發展太快，讓我備感壓力.....	110
圖：4-1-1-32 我覺得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的操作界面複雜，讓我感到壓力....	111
圖：4-1-1-33 我常需用私人時間學習新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知識.....	112
圖：4-1-1-34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的發展可能會威脅到我未來的工作.....	113
圖：4-1-1-35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114
圖：4-1-1-36 同儕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115

圖：4-1-1-37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	116
圖：4-1-1-38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	117
圖：4-1-1-39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感到疏離.....	118
圖：4-1-1-40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個資外洩.....	119
圖：4-1-1-41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工作秘密外洩.....	120
圖：4-1-1-42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可能有智慧財產權遭到侵害的問題.....	121
圖：4-1-1-43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所產生的內容有誤導使用者之虞.....	122
圖：4-1-1-44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可能包含虛假資訊，左右輿論的方向.....	123
圖：4-1-2-1 性別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125
圖：4-1-2-2 性別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126
圖：4-1-2-3 出生年次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128
圖：4-1-2-4 出生年次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128
圖：4-1-2-5 工作年資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130
圖：4-1-2-6 工作年資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131
圖：4-1-2-7 最高學曆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133
圖：4-1-2-8 最高學曆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134
圖：4-1-2-9 黨籍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136
圖：4-1-2-10 黨籍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137
圖：4-1-2-11 最高學曆學群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139
圖：4-1-2-12 最高學曆學群與生成式 AI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140
圖：4-1-3-1 性別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143

圖：4-1-3-2 性別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	144
圖：4-1-3-3 出生年次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146
圖：4-1-3-4 出生年次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F值）.....	147
圖：4-1-3-5 出生年次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值）.....	147
圖：4-1-3-6 工作年資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150
圖：4-1-3-7 工作年資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F值）.....	151
圖：4-1-3-8 工作年資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值）.....	151
圖：4-1-3-9 最高學曆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154
圖：4-1-3-10 最高學曆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F值）.....	154
圖：4-1-3-11 最高學曆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值）.....	155
圖：4-1-3-12 黨籍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157
圖：4-1-3-13 黨籍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F值）.....	158
圖：4-1-3-14 黨籍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值）.....	158
圖：4-1-3-15 最高學曆所屬學群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161
圖：4-1-3-16 最高學曆所屬學群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F值）.....	161
圖：4-1-3-17 最高學曆所屬學群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值）.....	16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時代背景

在全球科技快速發展的脈絡下，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已成為推動經濟與社會變遷的關鍵動能。其中，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憑藉其內容創作與多模態生成能力，正深刻重塑人類的工作樣態與生活方式。特別是在公共治理與政策制定領域，AIGC 以其高效、創造與精準等特質，展現出廣泛且深遠的應用潛力。

一、生成式人工智慧（AIGC）的技術演進與治理應用潛力

AIGC 是近年人工智慧領域發展最快且最具潛力的分支之一，其核心在於透過深度學習模型自動生成多類型內容，包括文本、圖像、音訊與多模態輸出。自 2014 年提出生成對抗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s）以來，相關技術持續突破，並於 2020 年代在生成式預訓練變壓器（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GPT）系列模型推動下加速商業化與普及。技術的成熟使 AIGC 在政策制定、資料分析與公共治理等領域展現出廣泛且深遠的應用潛力。

首先，在政策制定過程中，AIGC 大幅提升資料處理與內容生成效率。傳統政策撰擬與分析需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以處理繁複資料；相較之下，AIGC 可透過自然語言生成（NLG）快速產出政策建議草案與分析摘要。以 OpenAI 的 ChatGPT 為例，其語言生成模型能依輸入需求自動生成結構嚴謹、語義精確的文本，協助立法委員及其助理有效處理龐雜的政策文書與民意資料；其多語言能力亦有助於跨國的理解，促進國際合作與跨文化交流。

其次，在資料分析方面，AIGC 展現了卓越的洞察力與數據處理能力。傳統的資料分析依賴於人工編寫模型進行解讀，過程繁瑣且需要高深的技術背景，而

AIGC 技術能自動化分析數據並生成可操作的結論。例如，Stable Diffusion 作為生成圖像的工具，不僅在視覺化政策數據方面提供支持，還能根據描述生成具有高解析度的影像，用於模擬政策執行的場景與效果。在政策分析情境中，AIGC 能快速處理來自多來源的大數據，例如選民需求數據、政策影響評估數據，並結合數據視覺化技術將結果以易於理解的方式呈現給政策制定者。這種能力特別適用於臺灣公共治理環境，能在高度動態與數據密集的政策討論中提供即時的分析支持。

最後，在公共治理層面，AIGC 已成為提升行政效率與透明度的重要工具。公共治理涉及跨部門協作與民眾參與需求，而 AIGC 的應用能顯著降低溝通成本，並促進政策透明度。例如，在政策宣傳過程中，AIGC 技術可以生成針對不同選民需求的個性化內容，幫助立法委員及其助理與選民進行更有效的互動。此外，AIGC 的內容生成技術還能協助政府機構快速回應突發事件，如選舉期間即時根據新聞生成回應，有效提升立法委員與選民之間的信任感。

儘管 AIGC 的應用為政策制定、資料分析及公共治理帶來了顯著的技術優勢，其迅速普及也引發了一系列挑戰與反思。首先，生成內容的準確性與可信性是 AIGC 技術應用中的核心問題。由於 AIGC 的輸出依賴於訓練數據的質量與模型的設計，其生成結果可能存在偏差或不符合實際需求的情況。其次，技術的應用成本與知識門檻對於公共部門的使用者來說仍是一大挑戰，特別是在臺灣，部分機構對於生成式技術的接受度與熟悉程度有限。再次，AIGC 的廣泛應用還可能引發隱私與數據安全問題，例如政策制定者在使用技術時需處理包含敏感資訊的數據，如何保障這些數據的安全性是未來應用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整體而言，AIGC 的迅速發展為政策制定、資料分析及公共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工具與解決方案。它在提升效率、促進透明度與加強公眾參與方面展現了巨大潛力。然而，其技術應用的推廣仍需平衡創新與風險，特別是在數據隱私與技術接受度方面需要進一步努力。未來，AIGC 技術的應用前景將在持續的技術進步與政策支持中得以實現，成為臺灣數位化公共治理的重要推動力。

二、AIGC 技術於公共治理的機遇與挑戰

AIGC 的快速發展，為政策制定、資料分析與公共治理提供多元技術支援，成為政府與公共部門提升效率、促進創新的關鍵工具。然而，伴隨應用擴張，倫理與隱私等風險亦隨之浮現。以下從效率與創新、政策透明與公眾參與，以及潛在風險三方面進行探討。

(一) 提升效率與促進創新

AIGC 在效率與創新上的效益尤為顯著。於政策制定中，AIGC 憑藉 NLG 能力，可快速生成政策草案、報告摘要與民意分析結果，顯著縮短準備時程。例如，ChatGPT 等工具可依關鍵詞與資料需求，自動產出結構清晰、內容精確的政策建議，協助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快速回應政策需求，不僅提升流程效率，亦為政策討論提供更多實證支持。

此外，AIGC 技術在數據視覺化與圖像生成方面的應用，進一步促進了創新能力的提升。通過技術工具如 Stable Diffusion，政府機構可以快速生成政策實施效果的圖像模擬，幫助決策者以更加直觀的方式理解政策影響。例如，在城市規劃領域，AIGC 技術可生成多個規劃方案的可視化圖表，為決策者提供更多創新且可操作的選擇。

(二) 促進政策透明與公眾參與

AIGC 同時有助於強化政策透明與公眾參與。政策制定者可將複雜的資料分析結果轉化為易懂的視覺圖表與摘要報告，促進資訊公開與可近性。政府部門亦可運用 AIGC 將選民調查或政策執行數據生成直觀簡報，強化對政策效果的溝通，增進政府與民眾的互動。

此外，AIGC 透過個人化內容生成，降低公眾參與門檻。政策制定者可針對不同受眾快速生成差異化的政策解讀文本，協助不同背景的民眾理解政策內涵，從而激發更多回饋與建議。此種互動模式不僅拓展討論廣度，也有助於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制定過程。

(三) 倫理與隱私風險

雖然 AIGC 技術為效率與創新帶來了顯著的提升，但其應用過程中也伴隨著倫理與隱私風險。首先，生成內容的可信性與偏差問題成為技術應用的核心挑戰。AIGC 的輸出結果高度依賴於訓練數據的品質，而若訓練數據存在偏差或不足，可能導致生成內容帶有偏見甚至錯誤資訊。例如，若 AIGC 用於生成政策分析報告，而輸出內容基於過時或偏頗的數據，可能直接影響決策者的判斷，導致政策制定的偏差。

此外，數據安全與隱私問題亦是 AIGC 技術普及過程中的主要障礙。由於 AIGC 技術需處理大量涉及個人資訊的數據，其數據保護機制的缺失可能導致敏感資訊的洩露或濫用。例如，當政府利用 AIGC 技術分析選民行為時，若數據處理過程缺乏透明度或安全保障，將對公眾信任構成嚴重威脅，甚至引發法律與倫理爭議。

（四）科技壓力與技術接受度

AIGC 技術的應用對使用者的技術能力與接受度提出了更高要求，這對公共部門的推廣應用形成挑戰。技術的高複雜性與快速更新速度，可能使部分數位素養不足的工作者感到心理壓力，甚至影響其對技術的接受態度。例如，公共部門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在應用 AIGC 技術時，需額外投入時間學習其操作原理與應用場景，而這對時間與資源均有限的從業者而言無疑是一種挑戰。

（五）平衡機遇與挑戰的策略

在應用 AIGC 技術時，如何平衡其機遇與挑戰是政策制定者需面對的重要課題。一方面，政府應強化資料隱私保護與安全機制，確保技術應用的透明度與可問責性，以維繫公眾信任。另一方面，針對技術採用困難，可透過系統化培訓與專業支持降低學習門檻。同時，引入人工審核、紅隊測試與多源資料驗證等機制，亦可有效降低生成內容的偏差風險，確保應用的準確性與公平性。

綜上所述，AIGC 技術在提升效率與促進創新方面展現了巨大潛力，但其應用過程中的倫理與隱私風險問題亦不容忽視。未來的技術發展需在創新與風險之間尋求平衡，以實現技術應用的長遠價值。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壹、技術接受與科技壓力的挑戰

一、技術接受模型（TAM）的理論視角：AIGC 在公共部門的採納困境

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作為研究使用者對新技術接受行為的重要理論框架，自 1989 年由 Davis 提出以來，已廣泛應用於分析不同情境下的技術使用行為。其核心主張為，使用者對技術的接受主要取決於「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與「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兩者不僅形塑使用者的態度與行為意圖，亦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實際使用行為。在 AIGC 之應用脈絡中，PU 與 PEOU 對於公共治理情境的技術採用尤為關鍵。

（一）感知有用性（PU）：技術價值與工作需求的匹配度

感知有用性指使用者相信某項技術可提升其工作效率與績效之程度。在政策制定與公共治理中，AIGC 的 PU 主要體現在文本自動生成與資料分析報告產製等能力。例如，立法委員助理運用 AIGC 快速生成民意分析報告時，可顯著降低人工處理成本並提升成果品質。PU 的強弱往往受技術情境適配度與實際效能影響；例如，政策模擬與視覺化在公共規劃中的成功應用，有助於增進信任並提升 PU。然而，若技術無法滿足核心需求，或輸出成效不如預期，PU 可能隨之下降。

當 AIGC 於政策報告生成中產生偏差或錯誤時，將削弱使用者對技術的信任，進而降低接受度。故提升 PU 的關鍵，在於持續優化功能與效能，並透過高品質應用範例鞏固使用者信心。

（二）感知易用性（PEOU）：技術複雜度與使用者能力的匹配度

感知易用性指使用者相信學習與操作某項技術所需努力較低之感知。在 AIGC 的應用中，PEOU 與操作介面設計、功能整合程度及學習成本密切相關。當工具具備直觀介面與清晰指引時，使用者對技術之易用性感受提高，採用意圖

亦隨之上升。例如，若政策制定者能以簡明步驟產出政策草案或圖像化分析結果，其適應速度將大幅提升。反之，若技術過於複雜或學習曲線陡峭，易引發技術焦慮與抗拒心理。缺乏功能引導或使用說明，往往使初學者產生困惑，並降低接受度；對數位素養較低者而言，技術快速迭代亦會提高學習負擔，削弱 PEOU 的正向作用。因此，提升 PEOU 的要訣在於友善的操作設計、充分且持續的培訓與支援機制。

（三）感知有用性（PU）與感知易用性（PEOU）的交互作用

依 TAM 理論，PEOU 不僅直接影響採用意圖，亦會透過影響 PU 而間接作用於實際使用。例如，若 AIGC 工具操作簡單直覺（PEOU 高），使用者更容易體會到技術的價值與效能（PU 高）。反之，若使用門檻過高，即使效能卓越，仍可能因學習成本過高而選擇放棄使用。故在公共治理推廣 AIGC 時，須同步兼顧 PU 與 PEOU 的強化。

綜上所述，技術接受模型（TAM）中的 PU 與 PEOU 是影響使用者接受新技術的重要因素。在 AIGC 技術的應用背景下，PU 與 PEOU 的提升不僅能增強使用者的採用意圖，還能促進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廣泛應用。然而，為了最大化 PU 與 PEOU 的作用，需在技術設計與推廣過程中關注使用者需求，優化技術功能與學習支援，確保技術效能與使用體驗的雙重提升。

二、科技壓力的來源

科技壓力（Technostress）是現代科技應用背景下的一項重要挑戰。隨著 AIGC 的普及，使用者在學習與適應新技術時常感受到來自多方面的壓力。這些壓力可能源自技術的複雜性、學習負擔、數據過載以及操作不便等多個層面。以下分別探討 AIGC 技術應用中主要的科技壓力來源。

（一）技術複雜性與學習負擔

技術的複雜性是使用者感知科技壓力的首要來源之一。AIGC 技術的核心運作基於深度學習模型，如生成對抗網絡（GANs）和生成預訓練變壓器（GPT）。

雖然這些技術具有強大的內容生成能力，但其操作過程往往涉及多層次的功能設置與參數調整，對普通使用者來說存在一定的學習門檻。在政策制定場景中，若立法委員及其助理需要自行配置 AIGC 工具以生成高品質的政策報告，其技術複雜性可能導致使用者花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學習與測試。

此外，新技術的學習負擔也進一步加劇了使用者的科技壓力。對於數位素養較低的使用者而言，AIGC 技術的專業性和更新速度可能讓其感到難以適應。例如，當技術開發者頻繁更新生成模型的版本或功能時，使用者需持續投入時間重新學習，這種過程易產生挫敗感與倦怠感。為了降低這一層面的科技壓力，公共部門需加強技術支持與培訓，例如提供易於操作的工具介面和分步指南，幫助使用者快速掌握核心功能。

（二）數據過載對決策者的挑戰

隨著 AIGC 技術應用範圍的擴大，使用者接觸到的數據量呈指數級增長，這導致數據過載成為科技壓力的另一個主要來源。在政策制定過程中，AIGC 工具能快速生成大量的資料分析結果與多樣化的政策建議，雖然這提升了效率，但同時也增加了使用者篩選和判斷資訊的壓力。例如，一名法案助理在利用 AIGC 分析選民數據時，可能需要面對幾十個不同的圖表和報告，而每一項數據之間的邏輯關聯與優先級都需要進一步解讀和綜合。

數據過載的壓力還體現在技術應用的即時性需求上。AIGC 技術的快速生成特性往往要求使用者在短時間內處理並回應多個數據輸出，這對政策制定者的分析能力與時間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若缺乏有效的數據篩選工具或輔助決策機制，使用者可能因無法及時應對數據的高強度輸入而感到壓力甚至無助。因此，優化數據呈現方式、提供智能化的數據篩選與優先排序功能，對於減輕數據過載壓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操作不便對政策執行效率的影響

AIGC 技術的操作便利性是影響科技壓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當技術工具的設計未能充分考慮使用者需求時，其操作過程可能變得繁瑣且不直觀，進一步增加

使用者的心理負擔。例如，若 AIGC 工具要求使用者自行輸入多種參數或進行多步驟的設置，則初學者可能因操作過程過於複雜而產生抗拒心理。介面不友善或缺乏指引，亦會降低滿意度與採用意圖。

於公共治理實務中，操作不便更可能拖累效率。若立法助理在頻繁使用 AIGC 進行文本產出或資料分析時，屢遭錯誤或中斷，將造成進度延宕並增加工作壓力。因此，技術提供者需通過簡化操作流程、提升介面友好性以及優化用戶體驗，來減輕由操作不便帶來的科技壓力。

（四）社會期待與同儕競爭的外部壓力

在公共治理與政策制定領域，AIGC 技術的普及還帶來了來自外部環境的壓力。當技術被廣泛應用時，使用者可能感受到來自同事、上級或公眾的期待，認為自己必須熟練掌握這項技術才能維持競爭力。例如，一名立法委員助理可能因其他助理成功利用 AIGC 技術完成高效分析而感受到心理壓力，進而強化對技術學習的焦慮感。同時，社會對科技應用的高期待也進一步加劇了科技壓力。例如，選民可能要求立法委員能快速利用技術回應公共需求，這無形中增加了政策制定者的工作負擔。為減輕此類壓力，組織宜建立協作與支援機制，降低對個人熟練度的過度依賴，並強化團隊分工與資源共用。

綜上所述，科技壓力主要來自技術複雜性、資料過載、操作不便以及社會與同儕競爭等面向。於推廣 AIGC 應用時，如何有效緩解上述壓力，不僅關乎技術接受度，亦直接影響其於公共治理的落實成效。未來，通過提供技術支持、優化工具設計以及強化團隊合作，可望降低使用者的科技壓力，進一步推動 AIGC 技術的廣泛應用。

第三節 預計研究貢獻

壹、理論層面

本研究以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技術的應用為核心，結合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與科技壓力理論（Technostress Theory），探索技術接受與科技壓力在公共治理領域的相互作用。

一、豐富 TAM 理論在新興技術應用場景中的研究

技術接受模型（TAM）作為解釋技術採用行為的經典理論框架，已廣泛應用於多個技術領域。然而，針對 AIGC 這一新興技術的應用，相關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本研究通過引入 TAM 的核心變數感知有用性(PU)與感知易用性(PEOU)，探討這些變數如何影響使用者在公共治理場景中的技術接受行為，進一步擴展了 TAM 理論的適用範圍。

特別是，本研究聚焦於 AIGC 技術在政策制定與資料分析中的具體應用，深入分析使用者對技術效能與操作便利性的感知如何影響其接受意圖。通過實證檢驗 PU 與 PEOU 的作用機制，本研究為 TAM 理論在新技術應用場景中的適用性提供了新的實證支持，填補了現有文獻中的研究空白。

二、強化科技壓力理論的解釋力

科技壓力理論主要關注技術對使用者心理壓力的影響，其研究核心在於解釋技術學習、操作負擔及數據過載如何對技術接受行為產生負面影響。然而，目前針對 AIGC 技術的科技壓力研究仍然有限。本研究在 TAM 框架的基礎上，結合科技壓力理論，探討「技術複雜性」、「數據過載」與「操作不便」等因素對使用者心理壓力的具體影響，並分析這些壓力如何抑制使用者對技術的接受意圖。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探索科技壓力對 PU 與 PEOU 的間接影響。例如，若使用者因數據過載而感到不堪負荷，可能降低其對技術有用性的評估；若技術操作過於繁瑣，也可能削弱使用者對其易用性的認知。這些觀察將為科技壓力理論提供更豐富的解釋維度，並拓展其應用範圍。

三、整合 TAM 與科技壓力理論，構建綜合模型

現有研究中，TAM 與科技壓力理論多以獨立的方式進行探討，對兩者的結合研究尚不多見。本研究基於 AIGC 技術的應用特性，構建了一個整合 TAM 與科技壓力理論的研究模型，分析正向變數（PU、PEOU）與負向變數（科技壓力）在使用者技術接受行為中的聯合作用。

這一整合模型的構建，旨在同時解釋促進與抑制因素對技術接受行為的影響，並揭示其交互作用的內在邏輯。例如，本研究假設 PEOU 不僅能直接增強技術接受意圖，還能緩解部分科技壓力對使用者的負面影響。這一綜合性框架不僅豐富了技術接受與科技壓力的理論解釋力，還為未來研究提供了具有借鑑意義的分析視角。

四、探索 AIGC 技術特性對理論的適用性影響

AIGC 技術的特性與傳統技術存在顯著差異，如其高創造性、多模態輸出能力與高度依賴數據的特性。本研究在應用 TAM 與科技壓力理論時，特別關注 AIGC 技術的這些特性如何影響理論的適用性。例如，AIGC 技術的多模態能力是否會加強使用者對技術有用性的認知，其高度依賴數據是否會導致更顯著的數據過載壓力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論層面的貢獻主要體現在豐富 TAM 理論的應用場景、深化科技壓力理論的解釋力、構建綜合研究框架以及探索 AIGC 技術特性對理論適用性的影響。這些貢獻不僅有助於深化對 AIGC 技術的理論理解，也為未來新興技術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貳、實務層面

本研究除了理論層面的貢獻外，也著眼於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實務中的應用價值。針對政策制定、資料分析及公共服務等核心議題，本研究旨在提出具體建議與策略，協助公共部門更有效地應用 AIGC 技術，實現數位治理轉型。以下從三個方面探討研究的實務貢獻：

一、提升公共治理效率

AIGC 技術的應用可顯著提升公共部門的運作效率，尤其是在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傳統的政策研究與數據處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與時間，而 AIGC 技術的自動化能力可幫助公共機構快速完成繁瑣的資料處理工作。例如，透過 AIGC 技術，立法委員助理可以在短時間內生成選民意見調查報告、政策草案及多模態資料分析結果，從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於政策討論與決策過程中。

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提升效率的實務建議，如針對不同政策場景設計專屬的 AIGC 工具範本，讓政策制定者能快速生成符合需求的內容。此外，通過優化技術操作介面與減少不必要的操作步驟，幫助使用者降低學習成本，進一步提升政策制定與公共服務的效率。

二、促進政策透明與公眾參與

政策透明度與公眾參與是現代公共治理的重要目標，而 AIGC 技術的應用可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重要支撐。首先，AIGC 技術能將複雜的政策數據轉化為易於理解的可視化內容，例如圖表、簡報與多媒體資料，幫助公眾更清楚地瞭解政策目標與影響。這種直觀的呈現方式不僅提高了政策透明度，也拉近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距離。

此外，本研究探討了如何利用 AIGC 技術增強公眾參與的實務策略，例如針對不同受眾群體生成個性化的政策解讀文本，幫助各階層民眾理解政策內涵並提供建設性建議。同時，透過 AIGC 技術生成的互動性內容（如問答平臺或選民互

動工具），政策制定者能更有效地收集公眾意見，促進民意在政策中的反映。這些應用場景的具體設計與實現方式，將為公共部門的政策透明化與公眾參與帶來實質性改進。

三、降低技術應用門檻與科技壓力

雖然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潛力巨大，但其技術學習成本與科技壓力可能成為實務推廣中的重要障礙。本研究針對這一挑戰，提出了多項降低技術應用門檻的建議，包括為公共部門員工設計分層次的技術培訓計劃，幫助不同層級的使用者逐步掌握 AIGC 工具的核心功能。

此外，針對科技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本研究強調了技術支持與使用者經驗優化的重要性。例如，通過提供即時的技術支持與操作指引，幫助使用者在遇到困難時快速獲得解決方案；同時，針對數位素養較低的群體，可設計更友好的操作介面與自動化功能，減少使用者在操作過程中的心理負擔。這些措施將有效提升技術應用的普及率，並幫助公共部門員工更快適應技術轉型。

四、支持數位治理的全面推進

AIGC 技術的應用不僅限於提升政策制定的效率與透明度，更能為公共治理的數位化轉型提供全面支持。本研究提出了幾項針對數位治理的實務建議，如結合 AIGC 與大資料分析技術，構建智能化的政策模擬與評估系統，幫助決策者更精準地預測政策影響，降低政策失誤風險。此外，AIGC 技術還可被應用於公共服務的自動化流程中，例如生成智能回覆系統與數據可視化儀表板，幫助政府部門更高效地服務民眾。

通過這些實務層面的貢獻，本研究旨在為公共治理數位化提供可操作的應用框架，並為 AIGC 技術的推廣與應用提供實質性支持，從而幫助政府機構實現更高效、更透明且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目標。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實務層面的貢獻主要包括提升公共治理效率、促進政策

透明與公眾參與、降低技術應用門檻以及支持數位治理的全面推進。這些貢獻不僅有助於公共部門更好地應對現代治理挑戰，也為 AIGC 技術在實務場景中的應用提供了具體路徑。

參、策略層面

本研究在策略層面的貢獻，旨在提供公共治理領域中應用 AIGC 技術的具體推廣策略與政策建議。透過對技術應用瓶頸與實踐挑戰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一系列具體措施，協助政府機構與政策制定者更有效地整合 AIGC 技術，實現政策制定與公共治理的創新升級。以下針對三個關鍵策略層面進行深入探討：

一、推動技術應用的政策支持框架

AIGC 技術的成功應用需要政策層面的支持與推動。政府機構應在政策層面建立全面的技術應用支持框架，包括資金投入、法規制定與技術標準的建立。本研究建議，針對 AIGC 技術的推廣，應設立專門的資金計劃，用於支持公共部門採購相關技術工具及進行基礎設施升級。同時，應制定明確的法律與技術標準，規範技術使用過程中的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及倫理問題，確保技術應用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此外，政府可通過政策引導，鼓勵產學研合作，將 AIGC 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例如，支持與學術機構合作開展技術測試計劃，結合公共治理需求對 AIGC 工具進行優化與調試，從而提升技術在政策制定與公共服務中的適配性與應用價值。

二、建立多層次的技術培訓與推廣機制

技術的推廣需要建立全面的培訓與支持機制，幫助使用者快速掌握 AIGC 工具的核心功能。本研究建議，針對不同層級的公共部門工作者設計多層次的技術培訓計劃。例如，針對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可提供操作簡單的基礎培訓，幫助其

快速掌握政策報告生成、數據可視化等核心應用場景；針對技術部門的專業人員，可設計更進階的技術課程，幫助其熟悉 AIGC 技術的參數調整與應用優化。

此外，政府應設立技術推廣專責單位，為使用者提供即時技術支持與操作指引，確保 AIGC 工具的使用順暢。透過提供在線學習平臺、操作手冊及案例分享，政府可以降低技術的學習門檻，進一步提升使用者的接受度與應用意願。

三、推廣以使用者需求為中心的技術設計與應用

AIGC 技術的推廣應圍繞使用者需求進行，確保技術的實際應用價值。本研究建議，技術開發者在設計 AIGC 工具時，應充分考慮公共部門的工作需求與場景特點。例如，在政策制定中，AIGC 工具應提供直觀的操作介面與自動化的資料分析功能，幫助使用者快速生成政策建議與分析結果；在公共服務中，應優化生成式技術的內容質量，確保其產出的文本與圖像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此外，技術的推廣策略應注重使用者的回饋與參與。例如，通過設置反饋機制，定期收集使用者在實際應用中的問題與需求，並根據這些反饋對技術進行優化與改進。這種以需求為導向的技術推廣策略，不僅能提升技術的實用性，也能促進公共部門工作效率與治理能力的提升。

四、提升技術應用的社會接受度與公眾信任

在策略層面，提升社會接受度與公眾信任是 AIGC 技術推廣的重要目標。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透過透明化的技術應用流程與公眾教育活動，增強公眾對 AIGC 技術的理解與信任。例如，在政策推廣過程中，政府可通過公開生成式技術的應用案例與實際成效，向社會大眾展示技術的優勢與潛力。

此外，針對技術應用過程中的倫理與隱私問題，政府應設立監督與審核機制，確保技術應用符合社會期待與法律規範。例如，針對生成式技術生成的內容進行人工審核，避免虛假資訊或偏差數據影響公共決策。同時，通過設立技術應用的數據安全標準，保護個人隱私，進一步增強社會大眾對技術的信心。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策略層面的貢獻集中於推動技術應用的政策支持框架、建立技術培訓與推廣機制、推廣使用者需求為中心的技術設計，以及提升技術應用的社會接受度與信任度。這些策略不僅能促進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成功應用，還為其他新興技術的推廣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第四節 名詞解釋

壹、生成式人工智慧（AIGC）

生成式人工智慧（AIGC）是人工智慧（AI）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其核心能力在於透過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自動生成具有創造性與結構化的內容，包括文本、圖像、音頻、影片等多種形式。與傳統的人工智慧技術主要以分析與預測為主不同，AIGC 的關鍵特徵在於其創造性，能模擬人類的創造行為，生產出高度多樣化的內容，滿足不同場景的需求。

一、AIGC 的技術基礎

AIGC 的核心技術包括生成對抗網絡（GANs）與生成預訓練變壓器（GPT）。生成對抗網絡是一種基於對抗學習的深度學習框架，由生成器（Generator）和辨別器（Discriminator）兩個部分組成。生成器負責創造出接近真實數據的內容，而辨別器則用於判斷生成內容的真實性。透過兩者之間的反覆博奕，GANs 技術能夠生成高質量的圖像、聲音等內容。生成預訓練變壓器則是一種基於自注意力機制的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技術，能夠在大規模數據訓練的基礎上生成語義連貫的文本，應用於對話系統、政策文本撰寫及輿論分析等場景。

二、AIGC 的應用範圍

AIGC 技術的應用範圍十分廣泛，涵蓋政策制定、資料分析、公共治理、教

育、醫療、娛樂等多個領域。在政策制定中，AIGC 技術可以快速生成高質量的政策草案、報告摘要及資料分析結果，幫助決策者提升工作效率與準確性。在資料分析方面，AIGC 技術能夠結合多模態數據（文本、圖像、音訊等）進行深入挖掘，並通過生成可視化內容（如圖表與模擬場景）輔助決策。在教育與培訓中，生成式技術能為學生提供個性化學習內容，例如生成練習題目與解答步驟，提升學習效果。

舉例來說，OpenAI 開發的 ChatGPT 是 AIGC 技術在自然語言生成方面的典型應用，能夠針對不同需求生成對話文本、政策建議及技術檔。此外，Stable Diffusion 作為圖像生成工具，能根據描述生成高質量的圖像，用於政策模擬、公共宣傳與視覺化設計等場景。

三、AIGC 的特性

生成式 AI 在應用中展現出若干核心特性。首先是創造性（Creativity），指其能夠生成在訓練數據中從未出現過的全新內容組合，為政策模擬、方案設計等需要創新思維的任務提供支持。其次是自動化（Automation），指其能夠自動執行知識密集型的內容生產任務，如撰寫政策報告、彙整民意摘要等，從而優化公共部門的知識生產工作流程。最後是多模態性（Multi-modality），指其具備處理與生成跨越不同數據類型內容的能力，例如根據政策文本生成對應的視覺化圖表，或將數據分析結果轉化為綜合性報告。

四、AIGC 的挑戰

儘管 AIGC 技術具有強大的創造力與廣泛的應用潛力，其發展過程中仍面臨多重挑戰。首先，生成內容的真實性與準確性是技術應用的核心問題。例如，若技術生成的政策文本存在偏差或錯誤，可能對公共決策帶來負面影響。其次，數據隱私與倫理風險亦是生成式技術應用中的關鍵議題。AIGC 技術需要依賴大規模數據進行訓練，如何保護敏感數據的隱私，並避免生成偏見內容，是技術發展

的重要挑戰。此外，技術的高學習成本與操作複雜性，對使用者的接受度與普及應用形成了障礙。

五、AIGC 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價值

在公共治理領域，AIGC 技術展現出極大的應用價值。首先，該技術能幫助政府機構快速生成政策檔與資料分析結果，提升政策制定的效率與精確度。其次，透過生成的可視化內容，AIGC 技術能促進政策透明度與公眾參與，增強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此外，AIGC 技術在減少行政工作負擔與提升服務品質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視的潛力。

綜上所述，AIGC 是一項結合創造性與自動化的前沿技術，為公共治理、政策制定及多領域應用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然而，隨著技術的普及，其挑戰與風險亦需得到妥善應對，從而實現技術創新與公共利益的平衡。

貳、AIGC 工具的分類與代表

AIGC 技術涵蓋多個內容生成領域，包括文字、圖像、音樂、影片和數字人等。以下將對各類型工具進行分類，並列舉其代表性技術。

一、文字生成工具

文字生成工具利用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生成語義連貫的文本，應用於文章撰寫、政策建議和對話系統等場景。代表工具及其特點包括：

1.ChatGPT：由 OpenAI 開發，基於 GPT 系列模型，具備高效生成政策草案、回應公眾需求及多語言文本的能力。

2.Claude：由 Anthropic 開發，專注於高效文本撰寫和多語言支持，在跨文化政策溝通中表現優異。

二、圖像生成工具

圖像生成工具基於深度學習模型，根據用戶描述生成高質量圖像，應用於藝術創作、數據可視化和政策模擬等場景。代表工具及其特點包括：

- 1.Stable Diffusion：支持本地部署的圖像生成技術，適合處理隱私敏感數據和高度定制化的圖像需求，應用於政策場景模擬與公共設計。
- 2.DALL·E：由 OpenAI 開發，根據文字描述生成多樣化圖像，適用於政策傳播與設計創意。
- 3.MidJourney：以藝術創作見長，適合設計具有視覺吸引力的公共宣傳素材。

三、音樂生成工具

音樂生成工具通過學習大量音樂數據，生成多種風格的音樂作品，應用於背景音樂設計、商業宣傳和教育訓練等領域。代表工具是 Suno，其專注於生成個性化背景音樂，能快速創作適合多種商業場景的音樂片段，如教育配樂或影片背景音樂。



四、影片生成工具

影片生成工具基於 AIGC 技術，將用戶輸入的描述轉化為完整影片，用於教育培訓、內容行銷和政策宣傳等。代表工具及其特點包括：

- 1.Sora：由 OpenAI 開發的影片生成工具，能將文字描述轉化為高品質短影片，適用於教育視頻和公共內容宣傳。
- 2.Vidu：由生數科技聯合北京清華大學開發的中國首個純自研影片大模型，具備主體參照、文生影片、圖生影片等核心功能，只需輸入文字或上傳圖片，即可快速生成高品質影片。

五、數字人（Digital Human）生成工具

數字人生成工具模擬人類形象與行為，創建可互動的數字角色，應用於虛擬助理、教育場景和數字行銷等。代表工具是 Heygen，其專注於生成高品質、多

語言的數字人，適用於虛擬角色創建、數字行銷和教育訓練等。



第貳章 文獻與理論研究

第一節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發展歷程與應用領域

壹、AIGC 的發展歷程

AIGC 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最初的發展集中在早期的簡單機器學習模型上，如基於規則的聊天機器人¹ (DATAVERSITY, 2024)。隨著計算技術的進步和大數據的出現，AIGC 技術在近十年間實現了快速發展，成為當代人工智能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

AIGC 的現代發展歷史始於 2014 年，當時 Goodfellow 等人提出了生成對抗網絡 (GANs)，這是一種基於對抗性訓練的模型結構，透過生成器和辨別器之間的競爭學習來創建逼真的數據 (Goodfellow et al., 2014)。GANs 的推出為生成圖像和其他媒體內容提供了新的方式，使得人工智能能夠生成高質量且多樣化的輸出。

2017 年，變壓器 (Transformers) 架構的引入進一步推動了 AIGC 的發展。變壓器模型，特別是其自注意力機制，使得自然語言處理中的生成任務得到了顯著改進 (Vaswani et al., 2017)。基於變壓器的生成預訓練變壓器 (GPT) 模型，諸如 OpenAI 的 GPT-3 和 GPT-4，實現了在自然語言生成方面的突破，能夠自動創建與人類語言相仿的語意連貫的文本。

最近的技術進展中，AIGC 還拓展到了多模態生成領域，例如文本到圖像生成和影片合成。技術如 Stable Diffusion 在這一領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技術利用擴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s)，通過反向擴散過程生成高質量圖像，這為圖像生成提供了一種更高效的新途徑² (ResearchGate, 2024)。

¹ DATAVERSITY. (2024). A brief history of generative AI. DATA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ataversity.net/a-brief-history-of-generative-ai/>

² ResearchGate. (2024).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generative AI: From its origins to today and beyond. ResearchGat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79219460_A_Comprehensive_Review_of_Generative_AI_From_its_Origins_to_Today_and_Beyond.

整體而言，AIGC 的發展歷程伴隨著演算法的技術創新和計算資源的增強，從簡單的聊天機器人演進到如今能夠執行複雜創意任務的多樣化應用形式。這些技術的進步不僅促進了內容創造領域的繁榮，還對商業、醫療和公共政策等多個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在公共治理中，AIGC 技術正在逐步被探索用於提升政策制定效率、促進公眾參與以及改善政府透明度等方面³ (SpringerOpen, 2024)。

然而，伴隨著這些技術的擴展，AIGC 也面臨著數據隱私、倫理問題以及生成內容的準確性與誤導性等挑戰。技術的應用必須在創新與倫理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這要求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密切合作，以確保 AIGC 技術在惠及社會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減少潛在風險。

貳、AIGC 的主要應用領域

AIGC 自其技術成熟以來，逐漸滲透至多個行業，涵蓋商業、藝術、公共治理、教育以及醫療等領域，在這些領域中顯示出廣泛的應用潛力和影響。

一、AIGC 在各個領域的應用現狀

(一) 商業

在商業領域，生成式 AI 技術被廣泛應用於自動化內容創作、產品設計和客戶互動。例如，市場營銷部門利用 AIGC 技術生成廣告文案和圖像，從而提高創意效率並縮短生產週期。此外，AIGC 還可以幫助企業設計新產品和模擬市場反應，以提升產品開發過程的效率和準確性⁴ (ScienceDirect, 2024)。

(二) 藝術

生成式 AI 在藝術創作中提供了嶄新的可能性，它能夠協助藝術家生成複雜

³ SpringerOpen. (2024). Unveiling the evolution of generative AI (GAI):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the Evolution of AI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jesit.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3067-024-00145-1>

⁴ ScienceDirect. (2024).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24000468>

的視覺作品，創造出獨特且多樣化的藝術形式。AIGC 技術還被應用於藝術教育，幫助學生瞭解藝術創作的多重維度，並促進創意設計思維的發展⁵ (ResearchGate, 2024)。

（三）公共治理

在公共治理方面，AIGC 技術可以用於數據分析、政策模擬、語言處理和透明度增強等多個方面。通過自動生成政策報告和回應公眾查詢，政府機構可以提高運作效率，並加強與選民的互動。這些技術的應用不僅能夠提升政策的制定效率，還能促進更高的透明度和民眾參與⁶ (ACM, 2024)。

（四）教育

AIGC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主要體現在個性化學習和資源創建方面。生成式 AI 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水準自動創建習題和學習資料，從而提供量身定製的學習經驗。此外，AIGC 技術還能協助教師進行課程設計和教學材料的開發，減少重複性工作，提高教學質量 (MDPI, 2024)。

（五）醫療

生成式 AI 在醫療領域展示了其增強臨床診斷和患者管理的潛力。AIGC 技術能夠自動生成合成的醫學圖像，用於輔助疾病診斷，並提供精準的治療建議。此外，AIGC 還有助於開發新藥物，通過分析大量醫學數據以加快藥物發現的過程⁷ (NCBI, 2024)。

二、公共部門中的應用案例

在公共部門，AIGC 技術的應用已逐漸成形，尤其在地方政府推動智慧治理

⁵ ResearchGate. (2024). Analysing 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AI in arts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81145167_Analysing_the_Impact_of_Generative_AI_in_Arts_Education_A_Cross-Disciplinary_Perspective_of_Educators_and_Students_in_Higher_Education.

⁶ ACM. (2024).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erative AI risks in the public sector. ACM Digital Library. Retrieved from <https://dl.acm.org/doi/fullHtml/10.1145/3657054.3657125>

⁷ NCBI. (2024). Preliminary evidence of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in health care.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993141/>

的過程中。以臺灣為例，AIGC 已被引入政府政策的模擬和分析過程，用於提升行政效能和政策響應速度。通過 AIGC 技術，政府機構能夠更加快速地分析公眾意見和預測政策影響，從而使政策決策更加數據驅動。

此外，AIGC 在公共安全及緊急應變方面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自動生成的危機應對方案可以幫助決策者迅速制定有效的反應策略，從而提高社會的安全性和應變能力⁸ (Tandonline, 2024)。

然而，公共部門在應用 AIGC 技術時亦需審慎考量數據隱私、倫理及潛在的技術偏見等問題，確保技術應用的合規性和社會公信力。

第二節 技術接受理論

壹、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一、理論背景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由 Martin Fishbein 和 Icek Ajzen 於 1967 年提出，旨在解釋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TRA 主要用於預測個體基於其既有態度和行為意圖的行為。該理論認為，個體決定從事某一行為是基於其預期該行為將帶來的結果⁹ (Fishbein & Ajzen, 1975)。

二、主要構面

TRA 的核心構面包括態度（Attitude）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這兩個構面共同影響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進而影響實際行為（Actual Behavior）。

1. 態度（Attitude）：指個體對某一行為的正面或負面評價。態度由行為信念

⁸ Tandonline. (2024). 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AI (GenAI) on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ublic secto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494820.2023.2253861>

⁹ Fishbein, M., & Ajzen, I.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Addison-Wesley.

(Behavioral Beliefs) 和結果評價 (Outcome Evaluations) 構成。

2.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指個體感知到的來自重要他人的社會壓力，即他們是否認為自己應該從事某一行為。主觀規範由規範信念 (Normative Beliefs) 和動機遵從 (Motivation to Comply) 構成。

3.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 指個體計劃從事某一行為的意圖，是預測實際行為的最佳指標。

三、應用範圍

TRA 被廣泛應用於各種行為研究中，包括健康行為、消費行為、環保行為等。該理論在解釋和預測個體行為方面具有較高的有效性。

1.健康行為：TRA 被用於預測和解釋個體在健康行為上的選擇，如使用安全套、戒煙、運動等¹⁰ (Montano & Kasprzyk, 2015)。

2.消費行為：TRA 被用於研究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過程，幫助企業瞭解消費者的態度和行為意圖¹¹ (Baker, Morrison, & Carter, 1996)。

3.環保行為：TRA 被用於研究個體在環保行為上的選擇，如回收、節能等，幫助制定有效的環保政策¹² (Taylor et al., 2006)。

四、理論發展

TRA 在後續的研究中被進一步擴展和修正，形成了計劃行為理論 (Theory of

¹⁰ Montano, D. E., & Kasprzyk, D. (2015).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he integrated behavioral model. In Health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 95-124). Jossey-Bass.

¹¹ Baker, S. A., Morrison, D. M., & Carter, W. B. (1996). Using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to understand the decision to use condoms in an STD clinic population.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23(4), 478-490. <https://doi.org/10.1177/109019819602300411>

¹² Taylor, D., Bury, M., Campling, N., Carter, S., Garfied, S., Newbould, J., & Rennie, T. (2006). A review of the use of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HBM),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 and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 to study and predict health related behaviour chang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4114235_A_Review_of_the_use_of_the_Health_Belief_Model_HBM_the_Theory_of_Reasoned_Action_TRA_the_Theory_of_Planned_Behaviour_TPB_and_the_Trans-Theoretical_Model_TTM_to_study_and_predict_health_related_behavior.

Planned Behavior, TPB) 和理性行為方法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 RAA)。這些擴展理論引入了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等新構面，以提高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¹³ (Ajzen, 1985)。

貳、計劃行為理論 (TPB)

一、理論背景

計劃行為理論(TPB)由Icek Ajzen於1985年提出，是對理性行為理論(TRA)的擴展。TPB 旨在解釋和預測個體在面對行為選擇時的行為意圖和實際行為。該理論引入了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作為新的構面，以提高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¹⁴ (Ajzen, 1991)。

二、主要構面

TPB 的核核心構面包括態度 (Attitude)、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和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這三個構面共同影響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進而影響實際行為 (Actual Behavior)。

1. 態度 (Attitude)：指個體對某一行為的正面或負面評價。態度由行為信念 (Behavioral Beliefs) 和結果評價 (Outcome Evaluations) 構成。
2. 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指個體感知到的來自重要他人的社會壓力，即他們是否認為自己應該從事某一行為。主觀規範由規範信念 (Normative Beliefs) 和動機遵從 (Motivation to Comply) 構成。
3. 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指個體對於能否成功從事某一行為的自我效能感。知覺行為控制由控制信念 (Control Beliefs) 和知覺力量 (Perceived Power) 構成。

¹³ Ajzen, I. (1985).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Action control 1 (pp. 11-39).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https://doi.org/10.1007/978-3-642-69746-3_2

¹⁴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 179-211. [https://doi.org/10.1016/0749-5978\(91\)90020-T](https://doi.org/10.1016/0749-5978(91)90020-T)

三、應用範圍

TPB 被廣泛應用於各種行為研究中，包括健康行為、環保行為、消費行為等。該理論在解釋和預測個體行為方面具有較高的有效性。

1. 健康行為：TPB 被用於預測和解釋個體在健康行為上的選擇，如運動、飲食、戒煙等¹⁵ (Godin & Kok, 1996)。

2. 環保行為：TPB 被用於研究個體在環保行為上的選擇，如回收、節能等，幫助制定有效的環保政策¹⁶ (Kaiser, Hübner, & Bogner, 2005)。

3. 消費行為：TPB 被用於研究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過程，幫助企業瞭解消費者的態度和行為意圖¹⁷ (Armitage & Conner, 2001)。

四、理論發展

TPB 在後續的研究中被進一步擴展和修正，形成了多種變體和應用模型。例如，Ajzen (2011) 提出了綜合行為模型 (Integrated Behavioral Model, IBM)，將 TPB 與其他行為理論相結合，以提高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Montano & Kasprzyk, 2015)。

參、科技接受模型 (TAM)

一、TAM 的基本架構

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由 Fred D. Davis 於 1989 年提出，是一個解釋和預測使用者技術接受行為的理論框架。TAM 的基本架構包括兩個核心構面：感知有用性 (PU) 和感知易用性 (PEOU)。這兩個構面共同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意圖 (BI)，進而影響實際使用行為 (Actual Use, AU)。

¹⁵ Godin, G., & Kok, G. (1996).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review of its applications to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1(2), 87-98. <https://doi.org/10.4278/0890-1171-11.2.87>

¹⁶ Kaiser, F. G., Hübner, G., & Bogner, F. X. (2005). Contrast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with the value-belief-norm model in explaining conserva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5(10), 2150-2170.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2005.tb02213>

¹⁷ Armitage, C. J., & Conner, M. (2001).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A meta-analy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4), 471-499. <https://doi.org/10.1348/01446601164939>

二、TAM 的理論發展

TAM 源自於理性行為理論 (TRA)，並根據資訊系統的特性進行了簡化和專業化¹⁸ (Davis, 1989)。自 Davis 提出 TAM 以來，該模型經歷了多次擴展與應用。TAM2 和 TAM3 引入了社會影響、認知工具效能等因素與原始構面相結合，從而增強瞭解釋技術接受行為的能力¹⁹ (Venkatesh & Davis, 2000; Venkatesh & Bala, 2008)。

這些擴展模型不僅提高了 TAM 在不同情境中的適用性，還強調了外部變數及情境因素對技術接受的影響。

三、TAM 在不同領域中的應用與實證研究

TAM 因其簡單性和預測性，在各個領域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與驗證。例如：

1. 教育領域：TAM 被用來研究教師和學生對於線上學習平臺的接受度，表明 PU 和易用性能有效預測學習者的使用意圖²¹ (Teo, 2011)。
2. 醫療保健領域：TAM 幫助評估醫療從業人員對電子健康記錄 (EHR) 系統的接受程度。研究顯示，使用者對新技術的接受度不僅依賴於其有用性和易用性，還受到技術支持和培訓的影響²² (Holden & Karsh, 2010)。
3. 企業環境：TAM 被應用於企業環境中的各種資訊技術採用研究，包括辦公自動化系統、決策支持系統等，揭示了組織文化及管理支持對技術接受行為

¹⁸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13(3), 319-340. <https://doi.org/10.2307/249008>

¹⁹ Venkatesh, V., & Davis, F. D. (2000).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 Management Science, 46(2), 186-204. <https://doi.org/10.1287/mnsc.46.2.186.11926>

²⁰ Venkatesh, V., & Bala, H. (2008).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3 and a research agenda on interventions. Decision Sciences, 39(2), 273-315. <https://doi.org/10.1111/j.1540-5915.2008.00192.x>

²¹ Teo, T. (2011). Factors influencing teachers' intention to use technology: Model development and test. Computers & Education, 57(4), 2432-2440. <https://doi.org/10.1016/j.compedu.2011.06.008>

²² Holden, R. J., & Karsh, B.-T. (2010).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in health care. Journal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43(1), 159-172. <https://doi.org/10.1016/j.jbi.2009.07.002>

的重要性²³ (Venkatesh & Zhang, 2010)。

肆、科技接受模型的擴展

一、TAM2

TAM2 由 Venkatesh 和 Davis 於 2000 年提出，旨在擴展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型 (TAM)，引入更多影響技術接受的因素。TAM2 在原有感知有用性 (PU) 與感知易用性 (PEOU) 基礎上，增加了社會影響和認知工具效能等構面，以提高模型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Venkatesh & Davis, 2000)。

(一) 主要構面：

社會影響：包括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形象 (Image) 等，這些因素反映了個體在技術接受過程中受到的社會壓力和期望。

認知工具效能：包括工作相關性 (Job Relevance)、結果可見性 (Output Quality)、質量輸出 (Result Demonstrability) 等，這些因素反映了技術在工作中的實際應用效果。

(二) 應用範圍

TAM2 被廣泛應用於各種技術接受研究中，包括企業環境、教育領域和醫療保健等。例如：

- 1.企業環境：研究企業內部技術接受行為，揭示了組織文化及管理支持對技術接受行為的重要性 (Venkatesh & Davis, 2000)。
- 2.教育領域：研究學生對新技術的接受度，表明社會影響和認知工具效能對技術接受行為有顯著影響 (Teo, 2011)。
- 3.醫療保健：評估醫療從業人員對新技術的接受程度，顯示出技術支持和培訓的重要性 (Holden & Karsh, 2010)。

²³ 1. Venkatesh, V., & Zhang, X. (2010).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S. vs. China.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13(1), 5-27. <https://doi.org/10.1080/1097198X.2010.10856507>

二、TAM3

TAM3 由 Venkatesh 和 Bala 於 2008 年提出，進一步擴展了 TAM2，引入更多影響技術接受的因素。TAM3 在原有的構面基礎上，增加了感知享樂性（Perceived Enjoyment）和感知外部控制（Perceived External Control）等構面，以提高模型的解釋力和預測力（Venkatesh & Bala, 2008）。

（一）主要構面

感知享樂性（Perceived Enjoyment）：指使用技術過程中的愉悅感，這一構面反映了技術使用的內在動機。

感知外部控制（Perceived External Control）：指外部環境對技術使用的影響，包括技術支持、資源可得性等。

（二）應用範圍

TAM3 被廣泛應用於各種技術接受研究中，包括教育領域、醫療保健和公共治理等。例如：

1. 教育領域：研究教師和學生對於線上學習平臺的接受度，顯示出感知享樂性對技術接受行為的顯著影響²⁴ (Setiyani, Effendy, & Slamet, 2021)。
2. 醫療保健：研究醫療從業人員對新技術的接受度，顯示出感知外部控制對技術接受行為的重要性（Venkatesh & Bala, 2008）。
3. 公共治理：研究政府部門對新技術的接受行為，顯示出社會影響和認知工具效能對技術接受行為的顯著影響²⁵ (Putra & Samopa, 2018)。

²⁴ Setiyani, L., Effendy, F., & Slamet, A. A. (2021). Us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3 (TAM 3) at selected private technical high school: google drive storage in e-learning. Utamax: Journal of Ultimate Research and Trends in Education, 3(1), 1-10. <https://journal.unilak.ac.id/index.php/UTAMAX/article/view/6746>

²⁵ Putra, R. D., & Samopa, F. (2018).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eptance of Surabaya e-government service us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3: a case study of E-Lampid. Mathematics, Informatics,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ISEIC), 1-6. <https://www.atlantis-press.com/proceedings/miseic-18/25905023>

第三節 科技壓力理論

壹、科技壓力的定義與理論基礎

一、科技壓力的概念及其形成機制

科技壓力（Technostress）是指個人在適應和使用現代資訊技術過程中，所經歷的壓力和負面心理狀態。這一概念最早由心理學家 Craig Brod 於 1984 年提出，用來描述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變化和不斷引入新技術而對使用者造成的心靈負擔²⁶（Brod, 1984）。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數位化轉型的加速，科技壓力已成為現代工作環境中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科技壓力的形成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技術複雜性：面對不斷更新和愈發複雜的技術系統，使用者可能難以理解和掌握，這增加了心靈負擔。AIGC 技術的應用往往涉及新的操作介面和演算法理解，這對於缺乏相關技術背景的使用者來說，可能會感到困難和壓力

²⁷ (Maier, 2014)。

2.資訊過載：隨著 AIGC 技術能夠生成大量數據和資訊，用戶可能無法及時有效地處理這些資訊，造成精神上無法承受的壓力。資訊過載會導致使用者感到疲憊和無助，進而影響其工作效率和心理健康²⁸ (Tarafdar, Tu, & Ragu-Nathan, 2007)。

3.學習需求的增加：對於立法委員及其助理而言，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學習新系統和工具，這種持續的學習需求可能導致壓力增大。學習新技術的過程中，使用者可能會擔心自己無法跟上技術進步的步伐，從而產生焦慮感²⁹ (Shu, Tu, & Wang, 2011)。

²⁶ Brod, C. (1984). Technostress: The human cost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Addison-Wesley.

²⁷ Maier, C. (2014). Technostres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fis.uni-bamberg.de/entities/publication/1fd28281-0ea6-40e6-845c-cc7260002e1a/details>

²⁸ Tarafdar, M., Tu, Q., & Ragu-Nathan, B. S. (2007). The impact of technostress on role stres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4(1), 301-328. <https://doi.org/10.2753/MIS0742-1222240109>

²⁹ Shu, Q., Tu, Q., & Wang, K. (2011). The impact of computer self-efficacy and technology dependence on computer-related technostress: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7(10), 923-939. <https://doi.org/10.1080/10447318.2011.553322>.

4.持續連接的壓力：資訊技術的便捷性要求使用者隨時待命，無法脫離工作或技術環境，這可能導致心理上的壓力累積。持續連接的壓力會影響使用者的工作與生活平衡，進而影響其整體幸福感³⁰ (Brooks, Longstreet, & Califf, 2017)。

二、科技壓力理論中的核心變數及其解釋範疇

科技壓力理論中的核心變數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1.技術複雜性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技術複雜性是指使用者在學習和操作新技術時所感受到的困難程度。當技術系統過於複雜且難以理解時，使用者會感到壓力和挫敗感，這會影響其技術接受度和使用意願 (Maier, 2014)。
- 2.資訊過載(Information Overload)：資訊過載是指使用者在面對大量資訊時，無法有效處理和利用這些資訊所產生的壓力。資訊過載會導致使用者感到疲憊和無助，進而影響其工作效率和心理健康 (Taradar et al., 2007)。
- 3.學習需求 (Learning Demand)：學習需求是指使用者在適應新技術時，需要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當學習需求過高時，使用者可能會感到壓力和焦慮，這會影響其技術接受度和使用意願 (Shu et al., 2011)。
- 4.持續連接 (Continuous Connectivity)：持續連接是指使用者在工作和生活中，因為技術的便捷性而無法脫離技術環境所產生的壓力。持續連接會影響使用者的工作與生活平衡，進而影響其整體幸福感 (Brooks et al., 2017)。
- 5.技術支持 (Technological Support)：技術支持是指組織提供的技術培訓和支援。充足的技術支持可以幫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技術，降低因不熟悉而帶來的恐懼感和壓力 (Taradar et al., 2007)。
- 6.社會影響 (Social Influence)：社會影響是指來自同事、上級或選民等社會

555313

³⁰ Brooks, S., Longstreet, P., & Califf, C. (2017). Social media induced technostress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et addiction: A distraction-conflict theory perspective. AIS Transactions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9(2), 99-122. <https://doi.org/10.17705/1thci.00009>

群體的期望和壓力。這些影響會影響使用者的技術接受行為，進而影響其技術使用意願（Shu et al., 2011）。

科技壓力理論強調，這些核心變數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使用者在面對新技術時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意圖。理解這些變數及其相互關係，有助於制定有效的策略，降低科技壓力，提升技術接受度，促進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

貳、科技壓力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

一、科技壓力對政策決策者（如立法委員及助理）的影響

科技壓力對於公共治理中的政策決策者，如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具有顯著的影響。隨著數位化轉型的推進，這些決策者需要頻繁使用各種資訊技術來處理大量的數據和資訊，這導致了科技壓力的增加。研究表明，科技壓力會對政策決策者的工作效率和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³¹（Camarena & Fusi, 2022）。

首先，技術複雜性和資訊過載是科技壓力的主要來源。政策決策者需要快速掌握新技術並處理大量的政策數據，這增加了他們的工作負擔和心理壓力³²（Zainun, Johari, & Adnan, 2020）。此外，持續連接的壓力使得政策決策者無法脫離工作環境，進一步影響他們的工作與生活平衡（Brooks, Longstreet, & Califf, 2017）。

其次，科技壓力還會影響政策決策者的決策質量和創新能力。當決策者感受到過大的壓力時，他們可能會出現焦慮和疲憊，這會降低他們的決策能力和創新思維³³（Alexopoulos, Rizun, & Matheus, 2023）。因此，理解和管理科技壓力對於提升政策決策者的工作效能和心理健康至關重要。

³¹ Camarena, L., & Fusi, F. (2022). Always connected: Technology use increases technostress among public manager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2750740211050387>

³² Zainun, N. F. H., Johari, J., & Adnan, Z. (2020). Technostress and commitment to chang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900692.2019.1672180>

³³ Alexopoulos, C., Rizun, N., & Matheus, R. (2023). Gender differences and technostress vis-a-vis Open Government Data (OGD) adoption and usage. Available at SSR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580806

二、科技壓力在數位轉型中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科技壓力是公共治理面臨的一大挑戰。數位轉型要求政府機構和政策決策者快速適應新技術，這不僅增加了他們的工作負擔，還可能導致技術接受度的降低³⁴ (Saraswaty & Pusparini, 2023)。

為了應對科技壓力，政府機構可以採取以下策略：

1. 提供技術培訓和支持：充足的技術培訓和支持可以幫助政策決策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技術，降低因不熟悉而帶來的恐懼感和壓力 (Tarafdar, Tu, & Ragu-Nathan, 2007)。

2. 優化資訊管理：通過優化資訊的處理和傳遞機制，減少資訊過載的問題，提升資訊的有效性和使用效率 (Shu, Tu, & Wang, 2011)。

3. 推動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合理安排工作和閒暇時間，減緩持續連接所帶來的壓力，促進心理健康 (Brooks et al., 2017)。

4. 建立支持性工作環境：創造一個支持性和合作性的工作環境，減少社會壓力，提升政策決策者的技術接受度和工作滿意度 (Camarena & Fusi, 2022)。

強化內部溝通：通過有效的內部溝通，增強政策決策者對數位轉型的理解和支持，減少因變革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壓力 (Zainun et al., 2020)。重複

總之，科技壓力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需要綜合考慮技術、管理和心理等多方面因素。通過採取有效的應對策略，可以降低科技壓力，提升政策決策者的工作效能和心理健康，促進數位轉型的順利推進。

第四節 其他相關理論

³⁴ Saraswaty, A. R., & Pusparini, E. S. (2023). The influence of autonomy, competence, relatedness, and technostress on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broadcasting institutions in Indonesia. Jurnal Manajemen Pemerintahan. <https://ejournal.ipdn.ac.id/JTP/article/view/3106>

壹、社會認同理論在技術接受中的應用

一、技術應用與社會認同：來自同儕、上級及社會的壓力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由 Tajfel 和 Turner 於 1979 年提出，旨在解釋個體如何通過群體成員身份來定義自己，並如何受到群體規範和期望的影響³⁵ (Tajfel & Turner, 1979)。在技術接受的背景下，社會認同理論強調來自同儕、上級及社會的壓力如何影響個體的技術接受行為。

技術應用過程中，來自同儕、上級及社會的壓力會顯著影響個體的技術接受行為。研究表明，當個體感受到來自同事和上級的期望和壓力時，他們更有可能接受和使用新技術³⁶ (Lee, Lee, & Lee, 2006)。這種社會壓力可以通過多種形式表現出來，例如同儕的使用經驗分享、上級的技術推廣政策以及社會對技術應用的普遍認知等。

在公共部門中，這些社會壓力對立法委員及其助理的技術接受行為有著重要影響。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在工作中需要頻繁與同事和選民互動，這使得他們在技術接受過程中更容易受到社會壓力的影響³⁷ (Wu & Lin, 2016)。例如，當同事和選民普遍認為 AIGC 技術能夠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時，立法委員及其助理會感受到來自社會的壓力，從而更傾向於接受和使用這些技術。

二、在公共部門中，社會認同如何影響 AIGC 技術的採用

在公共部門中，社會認同對 AIGC 技術的採用具有重要影響。研究表明，當個體認同自己所屬群體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時，他們更有可能接受和使用群體

³⁵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Monterey, CA: Brooks/Cole.

³⁶ Lee, Y., Lee, J., & Lee, Z. (2006). Social influence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behavior: self-identity theory perspective. ACM SIGMIS Database: The DATABASE for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37(2-3), 60-75. <https://doi.org/10.1145/1161345.1161355>

³⁷ Wu, P. H., & Lin, C. P. (2016). Learning to foresee the effects of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and need for social approval on technology brand loyalty.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11, 1-12.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16.06.011>

推薦的技術³⁸ (Hillmer, 2009)。這種社會認同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影響技術接受行為，包括群體內部的互動、群體外部的社會期望以及個體對群體身份的認同等。

在公共治理中，立法委員及其助理的技術接受行為受到多方面的社會認同影響。首先，來自同事和上級的技術推廣政策和使用經驗分享，會促使他們更快地接受和使用 AIGC 技術³⁹ (Lee, Lee, & Lee, 2001)。其次，選民對技術應用的期望和需求，也會影響立法委員及其助理的技術接受行為。當選民普遍認為 AIGC 技術能夠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服務質量時，立法委員及其助理會感受到來自選民的壓力，從而更傾向於接受和使用這些技術⁴⁰ (Koletar, 2024)。

總之，社會認同在公共部門技術接受中的作用不可忽視。理解和管理這些社會壓力，有助於提升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效果，促進技術接受度和使用意願。

貳、創新擴散理論的發展與應用

一、創新擴散理論（DOI）的基本概念

創新擴散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DOI）由 Everett Rogers 於 1962 年提出，旨在解釋創新如何在社會系統中傳播和被採用。該理論的核心要素包括創新、溝通管道、時間和社會系統⁴¹ (Rogers, 2003)。創新擴散過程中的五個階段分別是：知曉、說服、決定、實施和確認 (Rogers, 2003)，其內涵是：

1. 知曉 (Knowledge)：個體首次瞭解創新及其功能。
2. 說服 (Persuasion)：個體形成對創新的態度。
3. 決定 (Decision)：個體選擇接受或拒絕創新。

³⁸ Hillmer, U. (2009). Technology acceptance in mechatronics: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Springer.

³⁹ Lee, Y., Lee, J., & Lee, Z. (2001). The effect of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ICIS 2001 Proceedings. Retrieved from <https://aisel.aisnet.org/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38&context=icis2001>

⁴⁰ Koletar, C. M. (2024). A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pproach to the Acceptance of Negative E valuation Results.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⁴¹ Rogers, E. M. (200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Free Press.

實施（Implementation）：個體開始使用創新。

確認（Confirmation）：個體在使用創新後尋求強化其決定的支持。

二、創新採用與政府部門中的技術擴散研究

在政府部門中，創新採用和技術擴散面臨著獨特的挑戰。公共部門的組織結構和文化往往較為保守，對新技術的接受度較低⁴² (De Vries, Tummers, & Bekkers, 2018)。然而，隨著數位化轉型的推進，政府機構越來越需要採用新技術來提升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

研究表明，創新擴散理論在公共部門中的應用可以幫助理解技術採用的過程和影響因素。例如，Minishi-Majanja 和 Kiplang'at (2005) 指出，創新擴散理論可以用來分析圖書館和資訊科學領域的技術採用情況，並提出了影響技術擴散的關鍵因素，包括技術特性、組織文化和政策支持等。⁴³

三、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擴散模式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擴散模式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首先，技術特性是影響擴散的重要因素。AIGC 技術的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可試驗性和可觀察性都會影響其在公共部門中的採用⁴⁴ (Dearing & Cox, 2018)。

其次，組織文化和政策支持也是影響技術擴散的重要因素。政府機構需要建立支持創新的組織文化，並提供充足的政策支持和資源，來促進 AIGC 技術的擴散⁴⁵ (Cua & Garrett, 2009)。

⁴² De Vries, H., Tummers, L., & Bekkers, V. (2018). The diffusion and adoption of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s: A meta-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Perspectives on Publ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1(3), 159-176. <https://doi.org/10.1093/ppmgov/gvx003>

⁴³ Minishi-Majanja, M. K., & Kiplang'at, J. (2005).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71(3), 211-224. <https://journals.co.za/doi/abs/10.10520/EJC61208>

⁴⁴ Dearing, J. W., & Cox, J. G. (2018).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Health Affairs*, 37(2), 183-190. <https://doi.org/10.1377/hlthaff.2017.1104>

⁴⁵ Cua, F. C., & Garrett, T. C. (2009).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model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pp. 268-282). IGI Global. <https://www.igi-global.com/chapter/diffusion-innovations-theory/35834>

最後，外部環境也會影響技術擴散的速度和範圍。社會對技術的接受度、法律法規的完善程度以及技術市場的成熟度都會影響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⁴⁶ (Thomas & Rogers, 1998)。

總之，理解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擴散模式，有助於制定有效的策略，促進技術在政府部門中的應用，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⁴⁶ Thomas, E., & Rogers, B. E. M. (1998).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and work-site AIDS program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3(1), 17-43. <https://doi.org/10.1080/108107398127481>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 AIGC 技術在臺灣公共治理中的應用，特別是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這項技術的接受程度及相關影響因素。為達成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方法，包括問卷調查和質性訪談，以全面瞭解研究對象的觀點和經驗。

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法，結合量化與質性方法，以全面探索 AIGC 工具在立法院立法委員及其助理中的應用情形。混合研究法的選擇旨在充分發揮量化與質性研究的優勢，提供更為全面的研究視角，並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一) 量化部分：

量化研究主要通過問卷調查進行，旨在分析使用者對 AIGC 工具的接受度及其壓力來源。問卷設計基於科技接受模型 (TAM) 和科技壓力理論，涵蓋感知有用性 (PU)、感知易用性 (PEOU)、資訊過載及學習壓力等構面。這些構面不僅能夠揭示使用者對 AIGC 技術的整體態度，還能夠深入瞭解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具體挑戰。問卷調查的對象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助理，樣本選取涵蓋不同性別、年齡、職位與技術背景的受訪者，以確保樣本的多樣性和代表性。數據收集將通過線上與紙本問卷相結合的形式進行，以提高問卷回收效率和數據的完整性。問卷的主要內容包括：

1. 目的：收集立法委員助理對 AIGC 技術的使用情況、感知有用性 (PU)、感知易用性 (PEOU)、社會影響、行為意願、科技壓力及道德疑慮等方面的數據。
2. 工具：設計結構化問卷，包含多項選擇題、評分題和開放性問題。
3. 樣本：立法委員助理，通過隨機抽樣和便利抽樣方法選取。
4. 施測方式：問卷將通過線上和紙本兩種方式進行發放，以提高回應率。

5. 數據分析：使用敘述性統計和交叉分析方法，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如性別、年齡、學歷、黨籍、工作年資、學群）對技術接受度的影響。

（二）質性部分：

質性研究則透過半結構式訪談進行，旨在深入瞭解受訪者的行為意圖及具體觀點。訪談問題設計聚焦於使用經驗、技術壓力及政策建議等方面，旨在挖掘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深層次看法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具體情境。訪談對象選擇具備 AIGC 工具使用經驗或熟悉此技術的代表性受訪者，包括 1 位立法委員與 5 位助理。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法，確保問題具彈性與開放性，並允許受訪者自由表達意見。訪談內容將全程錄音，並製作逐字稿以便後續分析，主要包括：

1. 目的：深入瞭解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看法、使用經驗、面臨的挑戰及對未來應用的期望。
2. 工具：設計半結構化訪談提綱，涵蓋對 AIGC 技術的看法、使用經驗和挑戰、對未來應用的期望等問題。
3. 訪談對象：從問卷調查的受訪者中選取具代表性的立法委員及其助理進行訪談。
4. 施測方式：訪談將通過面對面或線上方式進行，並錄音記錄以便後續分析。
5. 數據分析：使用主題分析和內容分析方法，提取訪談資料中的關鍵主題和觀點，並與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對比和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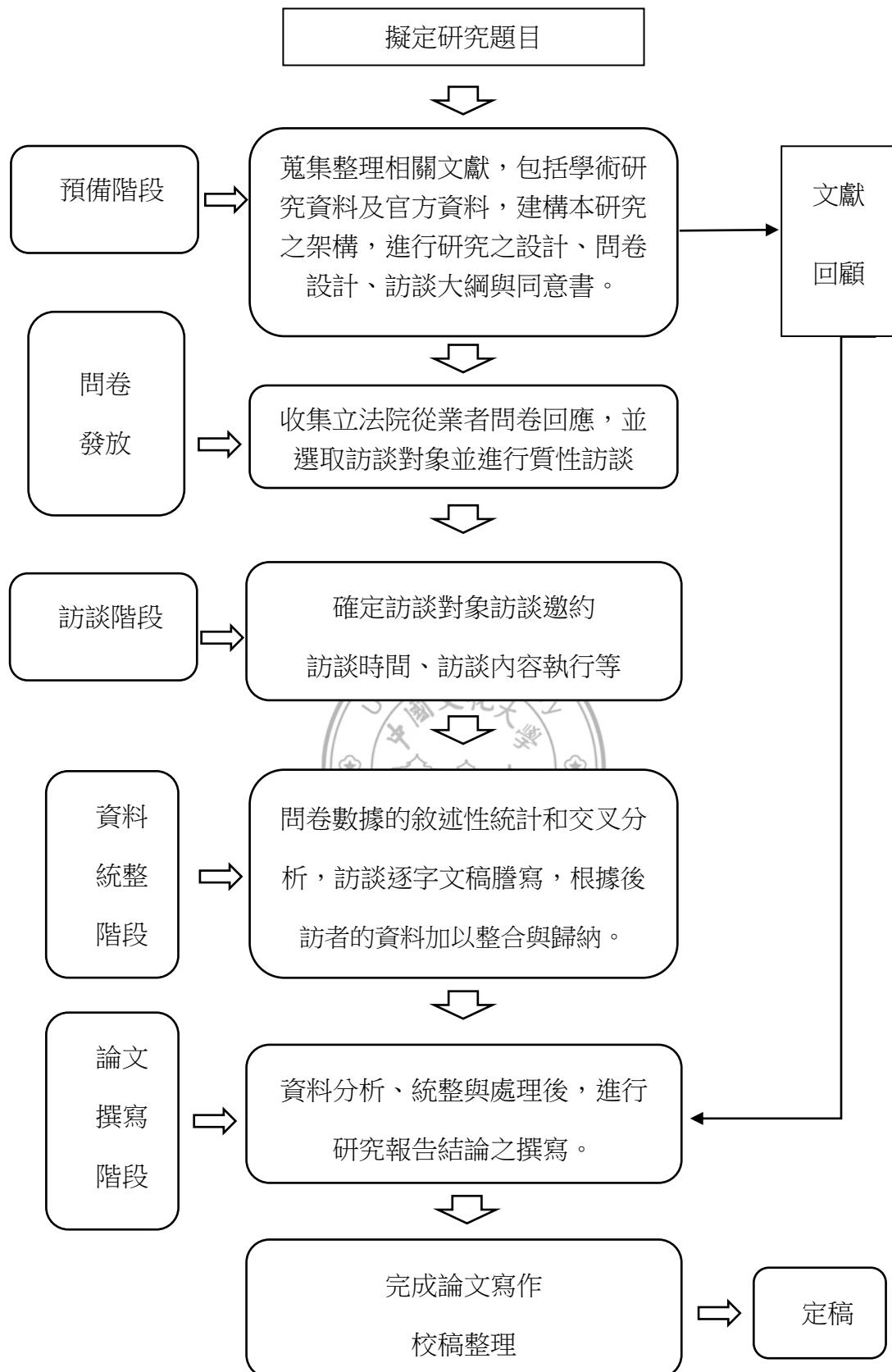
通過結合量化與質性方法，本研究期望能夠全面呈現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現狀，並為未來政策制定提供實證支持。量化數據的分析將揭示使用者 AIGC 技術的整體態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而質性資料的收集則將補充量化數據，提供更為豐富的背景資訊和個人見解。這種綜合的研究方法不僅能夠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還能夠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體的建議，促進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

貳、研究流程

在確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後，本研究開始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與閱讀分析，將焦點集中在 AIGC 技術在臺灣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接著，將文獻素材的探討角度進行分類，以進一步聚焦問題意識，確立研究範圍，並設計訪談大綱。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立意取樣對象進行訪談。最後，將訪談結果進行整理、歸納與分析，並在研究結尾歸納出研究結論，向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





圖：3-1-2-1 研究流程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和質性訪談相結合的方法，旨在全面瞭解立法委員及其

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接受情況及其影響因素，為推動臺灣公共治理的數位轉型提供實質性建議。

三、研究假設

一、假設一：感知有用性（PU）與技術接受度

感知有用性（PU）是科技接受模型（TAM）中的一個核心構面，指的是使用者認為使用某一技術能夠提升其工作表現的主觀評價。在本研究中，PU 被定義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在其工作中所能帶來的效益的認知。

根據 TAM 模型，PU 對技術接受度具有顯著的影響。當使用者認為某一技術能夠有效提升其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時，他們更有可能接受並使用該技術。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H1）：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 PU 越高，他們的技術接受度越高。

為了檢驗這一假設，本研究將通過問卷調查收集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 PU 和技術接受度的數據。問卷中的相關題項將包括：

（一）感知有用性（PU）

- 1.我覺得使用 AIGC 工具能幫我有效地解決問題。
- 2.我覺得使用 AIGC 工具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 3.我認為使用 AIGC 工具能讓我跟上科技潮流。

（二）技術接受度

- 1.我願意持續使用 AIGC 工具。
- 2.我願意精進使用 AIGC 工具的能力。
- 3.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
- 4.未來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問題。
- 5.我會推薦他人使用 AIGC 工具。

這些題項將使用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評分，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不等。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將檢驗感知有用性（PU）與技術接受度之間的關聯性，從而驗證假設一的成立。

二、假設二：感知易用性（PEOU）與技術接受度

感知易用性（PEOU）是科技接受模型（TAM）中的另一個核心構面，指的是使用者認為學習和使用某一技術是否容易的主觀評價。在本研究中，PEOU 被定義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在學習和使用過程中的難易程度的認知。

根據 TAM 模型，PEOU 對技術接受度具有顯著的影響。當使用者認為某一技術容易學習和使用時，他們更有可能接受並使用該技術。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二（H2）：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 PEOU 越高，他們的技術接受度越高。

為了檢驗這一假設，本研究將通過問卷調查收集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 PEOU 和技術接受度的數據。問卷中的相關題項將包括：

（一）感知易用性（PEOU）

- 1.我覺得 AIGC 工具是容易學習的。
- 2.我覺得 AIGC 工具的操作是簡單的。
- 3.我認為使用 AIGC 工具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和精力。

（二）技術接受度

- 1.我願意持續使用 AIGC 工具。
- 2.我願意精進使用 AIGC 工具的能力。
- 3.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
- 4.未來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問題。
- 5.我會推薦他人使用 AIGC 工具。

這些題項將使用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評分，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不等。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將檢驗感知易用性（PEOU）與技

術接受度之間的關聯性，從而驗證假設二的成立。

三、假設三：社會影響（SI）與技術接受度

社會影響（SI）是指個體在技術採用過程中，受到來自同儕、上級及社會群體的期望和壓力。在本研究中，社會影響被定義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在使用 AIGC 技術時，受到來自同事、上級和選民等社會群體的影響。

根據科技接受模型（TAM）和社會認同理論，社會影響對技術接受度具有顯著的影響。當使用者感受到來自同事、上級和社會群體的期望和壓力時，他們更有可能接受並使用該技術。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H3）：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受到的社會影響越大，他們的技術接受度越高。

為了檢驗這一假設，本研究將通過問卷調查收集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社會影響和技術接受度的數據。問卷中的相關題項將包括：

（一）社會影響

1. 其他立委辦公室已使用 AIGC 工具，會提高我使用 AIGC 工具的意願。
2. 我的上級期望我使用 AIGC 工具。
3. 我的同事認為我應該使用 AIGC 工具。

（二）技術接受度

1. 我願意持續使用 AIGC 工具。
2. 我願意精進使用 AIGC 工具的能力。
3. 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
4. 未來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問題。
5. 我會推薦他人使用 AIGC 工具。

這些題項將使用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評分，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不等。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將檢驗社會影響與技術接受度之間的關聯性，從而驗證假設三的成立。

四、假設四：科技壓力與技術接受度

科技壓力（Technostress）是指個人在適應和使用現代資訊技術過程中，所經歷的壓力和負面心理狀態。在本研究中，科技壓力被定義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在使用 AIGC 技術時，所感受到的壓力和挑戰。

根據科技壓力理論，科技壓力對技術接受度具有顯著的影響。當使用者感受到過大的科技壓力時，他們可能會對新技術產生抵觸情緒，從而降低其技術接受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四（H4）：立法委員及其助理感受到的科技壓力越大，他們的技術接受度越低。

為了檢驗這一假設，本研究將通過問卷調查收集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科技壓力和技術接受度的數據。問卷中的相關題項將包括：

（一）科技壓力

- 1.AIGC 工具更新發展太快，讓我備感壓力。
- 2.我常需用私人時間學習新的 AIGC 工具知識。
- 3.AIGC 工具的發展可能會威脅到我未來的工作。
- 4.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二）技術接受度

- 1.我願意持續使用 AIGC 工具。
- 2.我願意精進使用 AIGC 工具的能力。
- 3.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
- 4.未來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問題。
- 5.我會推薦他人使用 AIGC 工具。

這些題項將使用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評分，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不等。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將檢驗科技壓力與技術接受度之間

的關聯性，從而驗證假設四的成立。

肆、模型構建

在當前 AIGC 技術的廣泛應用背景下，使用者對技術的接受度不僅受到技術特性的影響，還受到社會壓力和心理調節等因素的影響。為了更全面地解釋使用者對 AIGC 工具的使用意圖，本研究構建了「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Behavioral Decision Model)」。該模型基於科技接受模型（TAM）與計劃行為理論（TPB）的整合，旨在提供一個多維度的框架來分析技術接受行為。

一、模型構建背景

AIGC 技術在多領域的應用逐步擴展，但現有的研究多集中於技術層面，忽視了使用者在社會壓力和心理調節方面的影響。TAM 提供了關於技術特性（如 PU 和 PEOU）如何影響行為態度的核心框架，而 TPB 則補充了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的調節作用。這兩者的整合能夠更全面地解釋使用者的行為意圖。

二、理論整合的必要性

單獨使用 TAM 雖能解釋技術特性對行為意圖的驅動，但無法考慮外部社會壓力（如同儕影響）和內部心理控制感的作用；而 TPB 雖擅長解釋行為層面，但對技術特性缺乏關注。因此，整合 TAM 和 TPB 是必要的，這種整合可以提供對技術接受和行為意圖的全面解釋，從而更好地理解使用者在技術採用過程中的心理和行為動態。

三、模型的具體內容

本研究基於 TAM 的核心結構，將感知有用性（PU）與感知易用性（PEOU）

納入模型，作為影響行為態度與行為意圖的重要因素。同時，引入 TPB 的主觀規範 (SN) 與知覺行為控制 (PBC)，以考慮社會壓力和技術接受過程中的心理因素。這一整合模型的核心目的是檢驗技術特性與社會壓力如何通過態度與控制感影響行為意圖 (BI)，並最終驅動技術採用行為。

四、模型應用範圍

這一整合模型適合於研究技術接受中的複合影響，尤其是 AIGC 工具這類既涉及技術特性，又與使用者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技術。通過這一模型，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使用者在面對新技術時的心理過程和行為決策，從而為技術推廣和政策制定提供更具體的建議。

五、具體模型設計

在具體模型設計中，本研究提出了若干假設與變量設置，包括感知有用性 (PU)、感知易用性 (PEOU)、行為意圖 (BI)、行為態度 (Attitude)、主觀規範 (SN) 和知覺行為控制 (PBC)。這些變量之間的關係通過結構方程建模 (SEM) 或回歸分析進行驗證，並生成相關影響路徑的視覺化圖表，以清晰展示 PU、PEOU、SN、PBC 對 BI 的影響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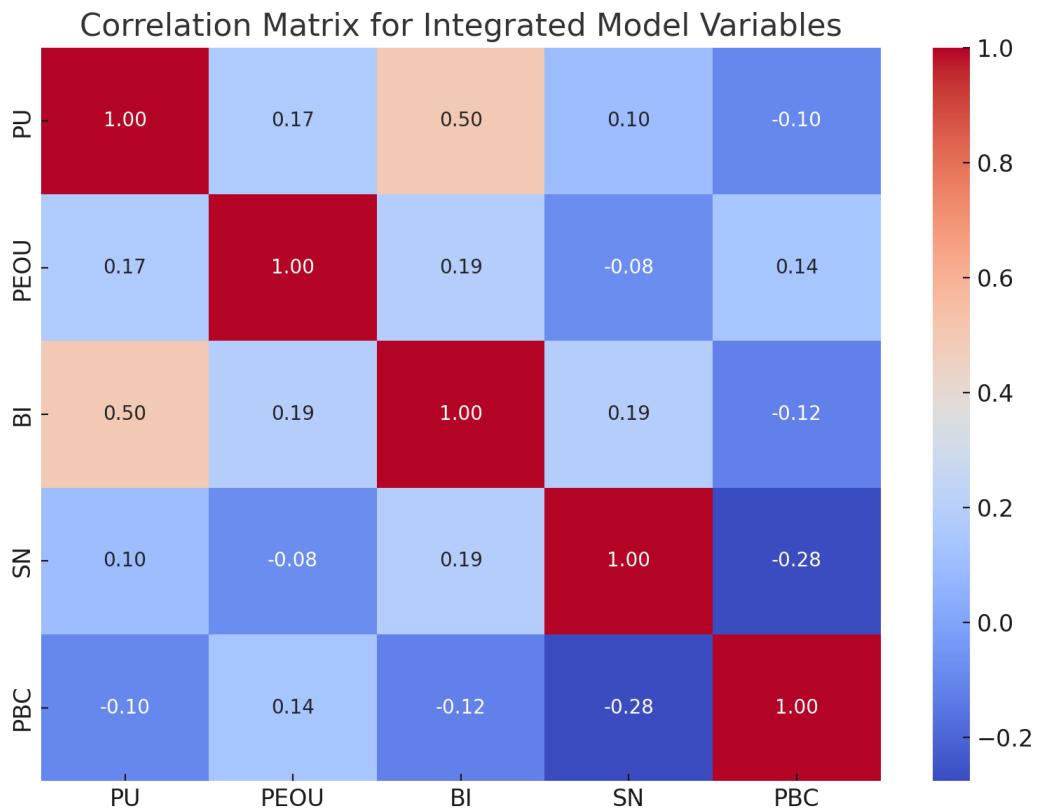
表：3-1-4-1 假設與變量設置（基於整合模型）

編號	假設	變量關係
1	PEOU 正向影響 PU	$PEOU \rightarrow PU$
2	PU 正向影響 Attitude	$PU \rightarrow Attitude$
3	Attitude 正向影響 BI	$Attitude \rightarrow BI$
4	PEOU 正向影響 PBC	$PEOU \rightarrow PBC$
5	PBC 正向影響 BI	$PBC \rightarrow BI$
6	SN 正向影響 BI	$SN \rightarrow BI$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六、數據匹配與模型建構

在數據匹配與模型建構過程中，本研究成功提取了整合模型的變量，並進行了數據的基本描述統計和相關性分析。這些分析結果為模型的驗證提供了堅實的數據基礎，並為後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



圖：3-1-4-1 整合模型相關性分析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總之，通過整合 TAM 和 TPB，本研究構建了一個新的行為決策模型，為理解 AIGC 技術的使用意圖提供了新的視角。這一模型不僅豐富了技術接受理論的內涵，還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方法。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立法委員助理，並輔以少數立法委員。這些對象在臺灣的公共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並且是 AIGC 技術應用的潛在使用者。選擇這些研究對象的原因在於他們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對新技術的接受和應用具有重要影響。

1. 立法委員助理

立法委員助理是協助立法委員進行政策研究、資料整理和選民服務的專業人員。他們在立法委員的日常工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並且經常需要使用各種技術工具來提高工作效率。研究立法委員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接受和應用情況，有助於瞭解這些技術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效果和需求。

2.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是立法院的成員，負責制定和通過法律，監督政府的執行，並代表選民的利益。由於研究限制，本研究將選取少數立法委員進行問卷調查和質性訪談，以補充和豐富研究數據。

通過對這些基本資料的收集和分析，本研究將能夠更全面地瞭解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接受情況及其影響因素。

一、量化部分

在本研究的量化部分，研究對象主要集中於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及其助理。這一選擇基於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日益增長的重要性，以及立法機構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對新技術的潛在需求。立法委員及其助理作為政策制定的核心參與者，他們對 AIGC 工具的接受度和使用情況將直接影響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效果。

1. 研究對象的選擇：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代表性和廣泛性，本研究選擇了涵蓋不同性別、年齡、職位與技術背景的立法委員及其助理作為研究對象。這

樣的選擇不僅能夠反映出不同背景下使用者對 AIGC 技術的多樣化態度，還能夠揭示出不同群體在技術接受過程中面臨的獨特挑戰和壓力。

2.樣本多樣性：在樣本選取過程中，本研究特別關注樣本的多樣性，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普遍適用性。樣本涵蓋了不同的性別比例，以反映性別在技術接受過程中的潛在影響。此外，本研究還考慮了年齡分佈，因為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者可能在技術適應能力和學習動機上存在差異。職位和技術背景的多樣性則有助於揭示不同職能角色和技術熟悉程度對 AIGC 工具接受度的影響。

3.數據收集方法：量化數據的收集將通過問卷調查進行。本研究採用了便利抽樣的方式，以提高問卷回收效率。問卷將以線上與紙本相結合的形式分發，這樣的設計不僅能夠覆蓋到更多的受訪者，還能夠適應不同受訪者的偏好和便利性。問卷內容設計基於科技接受模型(TAM)和科技壓力理論，涵蓋 PU、PEOU、資訊過載及學習壓力等構面。

4.數據分析準備：在數據收集完成後，本研究將對問卷數據進行初步清理，移除遺漏值或無效問卷，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隨後，數據將被編碼並匯入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處理，以便進行後續的描述性統計和推論性統計分析。

通過這一量化部分的設計，本研究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工具的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

二、質性部分

在質性部分，本研究通過半結構式訪談深入探討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工具的使用經驗、行為意圖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具體觀點。質性研究的目的是補充量化研究的結果，提供更為豐富的背景資訊和個人見解，從而全面理解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情形。

質性研究的訪談對象包括 6 位受訪者，其中 1 位為立法委員，5 位為立法助

理。這些受訪者的選擇基於他們在立法院中的職位和對 AIGC 工具的使用經驗。選擇具備 AIGC 工具使用經驗或熟悉此技術的代表性受訪者，能夠確保訪談內容的深度和相關性。這些受訪者在其職位上對技術的應用有直接的經驗，能夠提供關於技術應用的具體案例和見解。

貳、抽樣方式

一、問卷調查

在本研究的量化部分，問卷調查被選為主要的數據收集工具，以系統性地分析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工具的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

問卷調查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特別關注樣本的代表性和數據的可靠性。

1. 抽樣方法的選擇：本研究採用了便利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便利抽樣是一種非機率抽樣方法，允許在時間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快速收集到大量的數據。這種方法特別適合於初步探索性研究，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對研究問題的初步理解。儘管便利抽樣可能存在樣本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但通過擴大樣本量和多樣化樣本來源來部分彌補這一不足。

2. 問卷分發方式：為了提高問卷的回收效率和數據的完整性，採用了線上與紙本問卷相結合的形式進行分發。線上問卷通過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平臺發送，方便受訪者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填寫；紙本問卷則在立法院內部分發，確保那些對線上填寫不熟悉的受訪者也能參與調查。這種雙管齊下的方式不僅提高了問卷的回收率，還能夠覆蓋到更多樣化的受訪者群體。

3. 樣本多樣性的確保：在問卷調查過程中，特別關注樣本的多樣性，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普遍適用性。樣本涵蓋了不同性別、年齡、職位與技術背景的立法委員及其助理。這樣的設計有助於揭示不同背景下使用者對 AIGC 技術的多樣化態度，並能夠反映出不同群體在技術接受過程中面臨的獨特挑戰和壓力。

4. 數據收集與處理：在數據收集完成後，將對問卷數據進行初步清理，移除

遺漏值或無效問卷，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隨後，數據將被編碼並匯入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處理，以便進行後續的描述性統計和推論性統計分析。這一過程不僅能夠提高數據分析的效率，還能夠確保分析結果的可靠性。通過這一問卷調查的設計和實施，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AIGC工具的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

二、訪談部分

在質性研究中，訪談部分的設計和實施至關重要，因為它能夠提供深入的見解和豐富的背景資訊，補充量化研究的結果。為了確保訪談資料的深度和代表性，本研究採用了立意抽樣的方式，選擇具備代表性的受訪者進行深入訪談。

- 1.立意抽樣的選擇：立意抽樣是一種非機率抽樣方法，允許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和問題，選擇最能提供豐富資訊的受訪者。這種方法特別適合於探索性質的質性研究，因為它能夠確保選擇的受訪者具有研究相關性，並能夠提供關於研究問題的深入見解。在本研究中，立意抽樣的選擇基於受訪者的職位、技術背景和對AIGC工具的使用經驗。
- 2.受訪者的選擇標準：訪談對象包括6位受訪者，其中1位為立法委員，5位為立法助理。這些受訪者的選擇基於他們在立法院中的職位和對AIGC工具的使用經驗。選擇具備AIGC工具使用經驗或熟悉此技術的代表性受訪者，能夠確保訪談內容的深度和相關性。這些受訪者在其職位上對技術的應用有直接的經驗，能夠提供關於技術應用的具體案例和見解。
- 3.訪談過程的設計：訪談將以半結構式進行，確保問題具彈性與開放性，並允許受訪者自由表達意見。這種訪談方式有助於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進行追問，深入挖掘受訪者的觀點和經驗。訪談內容將全程錄音，並製作逐字稿以便後續分析。這一過程不僅能夠提高訪談資料的準確性，還能夠確保分析結果的可靠性。

4. 資料分析準備：在訪談結束後，將對逐字稿進行初步編碼與分類，提取核心主題與代表性觀點。這些質性資料將與量化數據進行對比分析，提供對量化結果的補充解釋，並為政策建議提供實證支持。這一過程不僅能夠提高數據分析的效率，還能夠確保分析結果的可靠性。

通過這一訪談部分的設計和實施，期望能夠深入瞭解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AIGC工具的具體應用情形及其在技術應用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更為全面的理解和支持。

三、樣本特徵

一、基本人口學特徵

1. 性別：性別是影響技術接受度的一個重要變項。瞭解研究對象的性別分佈，可以分析性別對AIGC技術接受度的影響。在本研究中，將收集研究對象的性別資料，並進行相關分析，以探討性別在技術接受過程中的潛在影響。這樣的分析有助於揭示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對技術使用意圖的影響，並為技術推廣策略提供參考。

2. 年齡：年齡是另一個影響技術接受度的重要變項。不同年齡段的研究對象可能對新技術的接受度存在差異。本研究將收集研究對象的出生年次，並將其分為不同的年齡組別，以分析年齡對AIGC技術接受度的影響。這樣的分組分析有助於理解不同年齡層在技術適應能力和學習動機上的差異，並為技術應用提供針對性的建議。

3. 學歷：學歷水準可能影響研究對象對新技術的理解和接受度。本研究將收集研究對象的最高學歷，並將其分為不同的學歷層次，以分析學歷對AIGC技術接受度的影響。這樣的分析有助於探討高等教育是否能夠促進技術的有效應用，並為教育培訓計劃提供參考。

4. 黨籍：黨籍可能影響研究對象在政策制定和技術應用中的觀點和態度。本研究將收集研究對象在擔任立法委員或立法委員助理時的黨籍，並分析黨籍

對 AIGC 技術接受度的影響。這樣的分析有助於理解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技術接受情況，並為政策制定提供實證支持。

5.工作年資：工作年資可能影響研究對象對新技術的接受度和應用情況。本研究將收集研究對象在立法院的工作年資，並將其分為不同的年資組別，以分析工作年資對 AIGC 技術接受度的影響。這樣的分析有助於揭示經驗豐富的受訪者是否更容易接受和適應新技術，並為技術推廣策略提供參考。

6.學群：研究對象的學群背景可能影響他們對技術的理解和接受度。本研究將收集研究對象的最高學歷所屬學群，並將其分為不同的學群類別，以分析學群對 AIGC 技術接受度的影響。這樣的分析有助於理解不同學科背景下的技術接受情況，並為跨學科合作提供參考。

通過對樣本基本人口學特徵的詳細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提供一個全面的背景，幫助解釋不同群體在 AIGC 工具接受和應用過程中的行為差異。這些特徵不僅有助於描述樣本的組成，還能夠為後續的數據分析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技術背景特徵

技術背景特徵是理解研究對象在 AIGC 技術接受和應用過程中行為差異的重要因素。這些特徵不僅能夠揭示受訪者對技術的熟悉程度，還能夠反映出他們在技術應用中的潛在優勢和挑戰。為了全面分析技術背景對 AIGC 技術接受度的影響，本研究詳細考察了樣本的技術背景特徵，涵蓋多個方面。

1.AIGC 工具使用經驗：使用經驗是評估受訪者技術背景的重要指標之一。在本研究中，將收集受訪者是否曾使用過 AIGC 工具的資料。這一資訊有助於分析使用經驗對技術接受度的影響，並探討經驗豐富的使用者是否更容易適應和接受新技術。使用經驗的分析還能夠揭示受訪者在技術應用中的具體挑戰和需求，為技術推廣策略提供實證支持。

2.過去對 AIGC 技術的瞭解程度：除了使用經驗，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瞭解程度也是評估技術背景的重要方面。本研究將調查受訪者過去對 AIGC 技

術的瞭解程度，包括他們是否參加過相關培訓或學習過相關知識。這一資訊有助於理解技術知識對技術接受度的影響，並探討知識豐富的受訪者是否更容易接受和應用新技術。瞭解程度的分析還能夠揭示受訪者在技術學習中的具體需求，為教育培訓計劃提供參考。

3.技術適應能力：技術適應能力是指受訪者在面對新技術時的學習和適應能力。在本研究中，將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評估受訪者的技術適應能力。這一資訊有助於分析技術適應能力對技術接受度的影響，並探討適應能力強的受訪者是否更容易接受和應用新技術。技術適應能力的分析還能夠揭示受訪者在技術應用中的具體挑戰和需求，為技術支持策略提供參考。

4.技術創新態度：技術創新態度是指受訪者對新技術的態度和接受意願。在本研究中，將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評估受訪者的技術創新態度。這一資訊有助於分析技術創新態度對技術接受度的影響，並探討創新態度積極的受訪者是否更容易接受和應用新技術。技術創新態度的分析還能夠揭示受訪者在技術應用中的具體需求，為技術推廣策略提供參考。

通過對樣本技術背景特徵的詳細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提供一個全面的背景，幫助解釋不同技術背景下的受訪者在 AIGC 工具接受和應用過程中的行為差異。這些特徵不僅有助於描述樣本的技術背景，還能夠為後續的數據分析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問卷設計

一、問卷內容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旨在全面收集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問卷內容的設計基於科技接受模型 (TAM) 和科技壓力理論，涵蓋多個構面，以確保數據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1. 基本資料：問卷的第一部分收集受訪者的基本人口學特徵，包括性別、年齡、職位與教育背景等。這些資料有助於分析不同人口學特徵對 AIGC 技術接受度的影響，並為後續的數據分析提供背景支持。此外，問卷還收集受訪者的技術背景特徵，如是否曾使用過 AIGC 工具及其對技術的瞭解程度，這些資訊有助於理解技術背景對技術接受度的影響。
2. 態度與接受度量表：基於科技接受模型（TAM），問卷設計了態度與接受度量表，涵蓋 PU 和 PEOU 兩個主要指標。PU 指的是受訪者認為使用 AIGC 工具能夠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的程度，而 PEOU 則指的是受訪者認為 AIGC 工具易於學習和使用的程度。這些指標有助於評估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整體態度和接受意願。
3. 科技壓力量表：參考科技壓力理論，問卷設計了科技壓力量表，涵蓋資訊過載、學習壓力等構面。資訊過載指的是受訪者在使用 AIGC 工具時感受到的資訊量過大而無法有效處理的情況，而學習壓力則指的是受訪者在學習和適應 AIGC 工具過程中感受到的壓力。這些構面有助於分析技術壓力對受訪者使用意圖的影響，並揭示受訪者在技術應用中的具體挑戰。
4. 開放性問題：為了獲得更深入的見解，問卷還設計了若干開放性問題，允許受訪者自由表達對 AIGC 技術的看法和建議。這些問題旨在補充量化數據，提供更為豐富的背景資訊和個人見解，並為政策建議提供實證支持。

問卷內容的設計不僅考慮了數據的全面性和有效性，還確保了受訪者在填寫過程中的便利性和舒適度。通過這一問卷設計，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

二、測量工具

在本研究中，問卷的測量工具設計旨在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並為後

續的統計分析提供堅實的基礎。測量工具的選擇和設計基於現有的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並結合本研究的具體需求進行調整。

1.Likert 五點量表：本研究採用了 Likert 五點量表作為主要的測量工具。Likert 量表是一種常用的心理測量工具，允許受訪者對每個陳述進行評分，範圍從「非常不同意」(1 分) 到「非常同意」(5 分)。這種量表的優勢在於其簡單易用，能夠有效捕捉受訪者對特定陳述的態度和感受。在本研究中，Likert 量表被用於測量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 PU、PEOU、資訊過載和學習壓力等構面。

2.信效度檢驗：為了確保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使用了「問卷專家評定表」來進行信效度檢驗。作為研究者，我邀請了在相關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專家對問卷進行評審，根據專家的反饋意見對問卷進行修訂和完善。這一過程確保了問卷能夠有效測量所設計的構面，並提高了問卷的內容效度。

3.預試驗與調整：在正式調查之前，進行了預試驗以檢驗問卷的可行性和測量工具的有效性。預試驗的對象為小樣本的立法委員及其助理，通過預試驗收集反饋意見，對問卷的語言表達、題目設計和量表使用進行調整。這一過程有助於提高問卷的清晰度和受訪者的理解度，從而提高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4.數據處理準備：在數據收集完成後，將對問卷數據進行編碼和整理，並匯入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處理。這一過程包括移除遺漏值或無效問卷，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隨後，將進行描述性統計和推論性統計分析，以揭示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態度和接受度。

通過這一測量工具的設計和實施，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

貳、訪談設計

一、訪談內容

在本研究中，訪談內容的設計旨在深入探討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使用經驗、行為意圖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具體觀點。訪談內容的設計基於現有的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並結合本研究的具體需求進行調整，以確保訪談資料的深度和豐富性。

1. 使用經驗：訪談的第一部分聚焦於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使用經驗。這部分內容旨在瞭解受訪者在工作中如何應用 AIGC 技術，包括具體的應用場景、使用頻率以及使用過程中的挑戰和收穫。通過這些問題，可以揭示 AIGC 技術在立法工作中的實際應用情況，並分析技術應用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2. 技術壓力：訪談的第二部分探討受訪者在使用 AIGC 工具過程中面臨的技術壓力。這部分內容包括學習壓力、資訊過載以及技術適應過程中的其他挑戰。瞭解這些壓力來源有助於分析技術壓力對使用意圖的影響，並為技術支持和培訓計劃提供實證支持。受訪者的回答將揭示他們在技術適應過程中的具體困難和需求。
3. 社會觀感與擔憂：訪談的第三部分加入了社會學的視角，探討受訪者對 AIGC 技術在社會層面的觀感及其可能引發的擔憂。這部分內容包括 AI 技術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對個人隱私的潛在威脅，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的可能加劇。受訪者的觀點將有助於理解社會對 AI 技術發展的接受度和抵觸情緒，並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4. 政策建議：訪談的第四部分旨在收集受訪者對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應用的政策建議。這部分內容包括如何提高技術接受度、減少技術壓力，以及如何在政策層面支持 AIGC 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受訪者的建議將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體的參考，並促進 AIGC 技術在公共部門的有效應用。
5. 未來展望：訪談的最後一部分探討受訪者對 AIGC 技術未來發展的期望和展望。這部分內容旨在瞭解受訪者對技術未來應用的願景，以及他們認為技術應用可能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這些見解將為技術開發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長遠的視角，並促進技術的可持續發展。

訪談內容的設計不僅考慮了資料的深度和豐富性，還確保了受訪者在表達過程中的自由度和舒適度。通過這一訪談設計，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使用經驗、行為意圖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具體觀點，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

二、訪談結構

在本研究中，訪談結構的設計旨在確保訪談過程的系統性和靈活性，以便深入挖掘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看法和經驗。訪談結構的設計基於半結構式訪談方法，這種方法允許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進行追問，從而獲得更為豐富和深入的資料。

- 1.半結構式訪談的選擇：半結構式訪談是一種介於結構式訪談和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其靈活性和開放性，允許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進行調整和追問。在本研究中，半結構式訪談的選擇旨在確保訪談問題的系統性，同時允許受訪者自由表達他們的觀點和經驗。這樣的設計有助於獲得更為豐富和深入的資料，並為後續的分析提供支持。
- 2.核心訪談問題的設置：在訪談結構中，設置了若干核心訪談問題，這些問題涵蓋了使用經驗、技術壓力、社會觀感與擔憂、政策建議和未來展望等方面。核心問題的設置旨在確保訪談的系統性和一致性，並為受訪者提供一個清晰的表達框架。這些問題不僅能夠引導受訪者深入思考和表達，還能夠確保訪談資料的全面性和豐富性。
- 3.靈活的追問機制：在半結構式訪談中，靈活的追問機制是獲得深入資料的關鍵。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進行即時的追問，以挖掘受訪者的深層次看法和經驗。這種靈活的追問機制允許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的反應進行調整，從而獲得更為豐富和深入的資料。
- 4.訪談時間和環境的安排：為了確保訪談的順利進行，研究者將提前安排訪談時間和環境，確保受訪者在一個舒適和無干擾的環境中進行訪談。每場訪

談預計持續 30 至 50 分鐘，這樣的安排既能夠確保訪談的深度，又不會給受訪者帶來過多的時間壓力。

5. 資料記錄與保密：在訪談過程中，將對訪談內容進行全程錄音，並製作逐字稿以便後續分析。所有訪談資料將嚴格保密，僅用於學術研究，並確保受訪者的個人資訊不被洩露。這樣的安排不僅能夠提高資料的準確性，還能夠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和權益。

通過這一訪談結構的設計，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看法和經驗，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

第四節 研究程式

壹、資料蒐集

一、問卷調查



在本研究中，問卷調查作為主要的量化資料蒐集方法，旨在系統性地收集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問卷調查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特別關注樣本的代表性和數據的可靠性，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普遍適用性。

1. 問卷設計與內容：問卷的設計基於科技接受模型 (TAM) 和科技壓力理論，涵蓋感知有用性 (PU)、感知易用性 (PEOU)、資訊過載和學習壓力等構面。問卷內容包括基本人口學資料、技術背景特徵、態度與接受度量表以及科技壓力量表。這些內容的設計旨 在全面揭示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看法和經驗，並為後續的數據分析提供堅實的基礎。

2. 問卷分發方式：為了提高問卷的回收效率和數據的完整性，採用了線上與紙本問卷相結合的形式進行分發。線上問卷通過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平臺發送，方便受訪者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填寫；紙本問卷則在立法院內部分發，確

保那些對線上填寫不熟悉的受訪者也能參與調查。這種雙管齊下的方式不僅提高了問卷的回收率，還能夠覆蓋到更多樣化的受訪者群體。

3.樣本選取與多樣性：在問卷調查過程中，特別關注樣本的多樣性，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普遍適用性。樣本涵蓋了不同性別、年齡、職位與技術背景的立法委員及其助理。這樣的設計有助於揭示不同背景下使用者對 AIGC 技術的多樣化態度，並能夠反映出不同群體在技術接受過程中面臨的獨特挑戰和壓力。

通過這一問卷調查的設計和實施，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

二、訪談部分

在本研究中，訪談部分作為主要的質性資料蒐集方法，旨在深入探討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使用經驗、行為意圖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具體觀點。訪談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特別關注資料的深度和豐富性，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1.訪談時間和環境的安排：為了確保訪談的順利進行，研究者將提前安排訪談時間和環境，確保受訪者在一個舒適和無干擾的環境中進行訪談。每場訪談預計持續 30 至 50 分鐘，這樣的安排既能夠確保訪談的深度，又不會給受訪者帶來過多的時間壓力。訪談環境的選擇考慮了受訪者的便利性和隱私性，以確保他們能夠自由表達觀點。

2.訪談內容的設計：訪談內容的設計基於半結構式訪談方法，涵蓋使用經驗、技術壓力、社會觀感與擔憂、政策建議和未來展望等方面。這些內容的設計旨在全面揭示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看法和經驗，並為後續的分析提供支持。半結構式訪談允許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進行追問，從而獲得更為豐富和深入的資料。

3. 資料記錄與保密：在訪談過程中，將對訪談內容進行全程錄音，並製作逐字稿以便後續分析。所有訪談資料將嚴格保密，僅用於學術研究，並確保受訪者的個人資訊不被洩露。這樣的安排不僅能夠提高資料的準確性，還能夠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和權益。

通過這一訪談部分的設計和實施，期望能夠深入瞭解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具體應用情形及其在技術應用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更為全面的理解和支持。

貳、資料處理

一、問卷部分

在本研究中，問卷部分的資料處理旨在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並為後續的統計分析提供堅實的基礎。資料處理過程包括數據清理、編碼、整理和分析等多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至關重要，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為了提高資料處理的效率和準確性，本研究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進行數據分析。

1. 數據清理：在問卷調查結束後，首先進行數據清理。這一過程包括檢查問卷的完整性，移除遺漏值或無效問卷。遺漏值可能是由於受訪者未能回答所有問題而產生的，而無效問卷則可能是由於受訪者未認真填寫或回答不一致而產生的。使用 Python 的 pandas 庫，將問卷數據匯入並進行初步清理，確保僅保留高質量的數據，以提高分析結果的準確性。

2. 數據編碼：在數據清理完成後，進行數據編碼。編碼是將問卷中的文字資料轉換為數字形式，以便於統計分析。對於 Likert 量表的題目，通常將「非常不同意」編碼為 1，「非常同意」編碼為 5。這一過程有助於標準化數據，並為後續的統計分析提供便利。

3. 數據整理：數據編碼完成後，進行數據整理。這一過程包括將編碼後的數據匯入統計分析軟體，如 Python 的 pandas 庫，進行進一步的處理。數據整理的目的是確保數據的結構化和有序性，以便於後續的分析。這一過程還包括

檢查數據的分佈和一致性，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
1 # 導入所需的 Python 庫
2 import pandas as pd
3 import numpy as np
4
5 # 1. 匯入問卷數據
6 # 假設數據以 CSV 文件存儲，文件名為 "survey_data.csv"
7 data = pd.read_csv("survey_data.csv")
8
9 # 2. 數據清理
10 # 檢查數據是否包含遺漏值
11 missing_summary = data.isnull().sum()
12 print("遺漏值檢查：")
13 print(missing_summary)
14
15 # 移除包含多個遺漏值的記錄（例如，遺漏值超過 50% 的行）
16 threshold = len(data.columns) * 0.5
17 cleaned_data = data.dropna(thresh=threshold)
18
19 # 填補部分遺漏值（例如，對數值型數據以均值填補）
20 cleaned_data.fillna(cleaned_data.mean(numeric_only=True), inplace=True)
21
22 # 3. 檢查無效問卷
23 # 假設問卷中有一些指定的驗證問題，例如選擇固定答案以驗證認真填寫
24 validation_column = "validation_question" # 假設驗證問題列名
25 expected_answer = "A" # 假設正確答案
26 valid_responses = cleaned_data[cleaned_data[validation_column] == expected_answer]
27
28 # 4. 數據編碼
29 # 將 Likert 五點量表轉換為數值（非常不同意 -> 1，非常同意 -> 5）
30 likert_columns = ["question1", "question2", "question3"] # 假設 Likert 題目列名
31 likert_mapping = {
32     "非常不同意": 1,
33     "不同意": 2,
34     "中立": 3,
35     "同意": 4,
36     "非常同意": 5
37 }
38 for col in likert_columns:
39     valid_responses[col] = valid_responses[col].map(likert_mapping)
40
41 # 5. 基本統計分析
42 # 描述性統計
43 summary_stats = valid_responses.describe()
44 print("描述性統計：")
45 print(summary_stats)
46
47 # 分組統計（例如，根據性別分組）
48 grouped_stats = valid_responses.groupby("gender")[likert_columns].mean()
49 print("按性別分組統計：")
50 print(grouped_stats)
51
52 # 保存清理後的數據到新文件
53 valid_responses.to_csv("cleaned_survey_data.csv", index=False)
54
55 print("數據清理與分析完成，清理後的數據已保存至 'cleaned_survey_data.csv' 文件中。")
56
```

圖：3-4-2-1 數據整理代碼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4.描述性統計分析：在數據整理完成後，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旨在揭示數據的基本特徵，包括計算平均數、標準差、頻率分佈等指標。

這一過程有助於瞭解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整體態度和接受度，並為後續的推論性統計分析提供背景支持。

5.推論性統計分析準備：在描述性統計分析完成後，準備進行推論性統計分析。推論性統計分析旨在檢驗不同變項之間的關係和差異，如使用 T 檢定檢視不同職位間的回答差異，或使用 ANOVA 分析不同背景群體對 AIGC 工具的態度差異。這一過程有助於揭示數據中的潛在模式和趨勢，並為研究假設的驗證提供實證支持。



```
1 # 導入所需的庫
2 import pandas as pd
3 from scipy.stats import ttest_ind, f_oneway
4
5 # 讀取清理後的數據
6 data = pd.read_csv("cleaned_survey_data.csv")
7
8 # 假設研究變項
9 # AIGC 工具態度得分列名
10 attitude_column = "aigc_attitude_score" # 假設這是對 AIGC 工具態度的量化列名
11 # 職位列名
12 position_column = "position" # 假設這是受訪者職位列名，例如 "manager" 或 "staff"
13 # 背景群體列名（如年齡段）
14 group_column = "age_group" # 假設這是分組變項，例如 "18-25", "26-35", "36-45"
15
16 # 分析 1:T 檢定 - 比較兩職位間的 AIGC 工具態度差異
17 # 假設分組變項 position 有兩組，例如 "manager" 和 "staff"
18 group1 = data[data[position_column] == "manager"][attitude_column]
19 group2 = data[data[position_column] == "staff"][attitude_column]
20
21 t_stat, p_value_ttest = ttest_ind(group1, group2, equal_var=False) # Welch's T 檢定
22 print(f"T 檢定結果:t 值 = {t_stat:.2f}, p 值 = {p_value_ttest:.4f}")
23 if p_value_ttest < 0.05:
24     print("結果顯著：不同職位間的 AIGC 態度存在顯著差異。")
25 else:
26     print("結果不顯著：不同職位間的 AIGC 態度無顯著差異。")
27
28 # 分析 2:ANOVA - 比較不同背景群體間的 AIGC 工具態度差異
29 # 假設 group_column 是多組分組變項，例如 "age_group"
30 groups = [data[data[group_column] == group][attitude_column] for group in data[group_column].unique()]
31
32 f_stat, p_value_anova = f_oneway(*groups)
33 print(f"ANOVA 結果:F 值 = {f_stat:.2f}, p 值 = {p_value_anova:.4f}")
34 if p_value_anova < 0.05:
35     print("結果顯著：不同背景群體間的 AIGC 態度存在顯著差異。")
36 else:
37     print("結果不顯著：不同背景群體間的 AIGC 態度無顯著差異。")
38
```

圖：3-4-2-2 顯著檢定代碼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6.視覺化分析：為了更直觀地展示不同變項之間的關係，使用 Python 的 seaborn 庫繪製熱圖 (heatmap)，展示技術壓力變項與其他相關變項之間的關

係。這樣的視覺化分析有助於識別數據中的潛在模式和趨勢，並為研究假設的驗證提供實證支持。



```
1 # 導入所需的庫
2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3 import seaborn as sns
4 import pandas as pd
5
6 # 假設已計算出的結果存儲在以下 DataFrame 中
7 # 例如，ANOVA 分組均值結果：
8 data = pd.DataFrame({
9     "group": ["18~25", "26~35", "36~45", "46+"],
10    "mean_score": [3.8, 4.2, 3.5, 3.7],
11    "std_dev": [0.5, 0.4, 0.6, 0.3]
12 })
13
14 # 可視化：條形圖展示不同群體的均值
15 plt.figure(figsize=(8, 6))
16 sns.barplot(x="group", y="mean_score", data=data, palette="muted", ci=None)
17 plt.errorbar(
18     x=range(len(data["group"])),
19     y=data["mean_score"],
20     yerr=data["std_dev"],
21     fmt="none",
22     c="black",
23     capsized=5
24 )
25 plt.title("不同群體的平均 AIGC 工具態度得分")
26 plt.xlabel("背景群體")
27 plt.ylabel("平均得分")
28 plt.ylim(0, 5)
29 plt.grid(axis="y", linestyle="--", alpha=0.7)
30 plt.xticks(rotation=45)
31 plt.show()
32
33 # 假設 T 檢定的結果
34 t_test_results = pd.DataFrame({
35     "group": ["Manager", "Staff"],
36     "mean_score": [4.1, 3.6],
37     "std_dev": [0.4, 0.5]
38 })
39
40 # 可視化：箱線圖展示職位間的態度差異
41 plt.figure(figsize=(8, 6))
42 sns.barplot(x="group", y="mean_score", data=t_test_results, palette="pastel", ci=None)
43 plt.errorbar(
44     x=range(len(t_test_results["group"])),
45     y=t_test_results["mean_score"],
46     yerr=t_test_results["std_dev"],
47     fmt="none",
48     c="black",
49     capsized=5
50 )
51 plt.title("不同職位對 AIGC 工具的平均態度得分")
52 plt.xlabel("職位")
53 plt.ylabel("平均得分")
54 plt.ylim(0, 5)
55 plt.grid(axis="y", linestyle="--", alpha=0.7)
56 plt.show()
57
```

圖：3-4-2-3 檢定可視化代碼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通過這一問卷部分的資料處理，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AIGC 技術的態度、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從而為技術在公

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

二、訪談部分

在本研究中，訪談部分的資料處理旨在深入分析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使用經驗、行為意圖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具體觀點。資料處理過程包括資料轉錄、編碼、主題分析和結果呈現等多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至關重要，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深度和可靠性。

1. 資料轉錄：在訪談結束後，首先進行資料轉錄。這一過程包括將訪談錄音內容轉錄為逐字稿，確保所有受訪者的回答都被完整記錄。逐字稿的製作過程中，特別注意保留受訪者的語言特徵和表達細節，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這一過程為後續的編碼和分析提供了基礎。
2. 資料編碼：資料轉錄完成後，進行資料編碼。編碼是將逐字稿中的文字資料轉換為可分析的數據單元。這一過程包括識別和標記逐字稿中的關鍵概念、主題和模式。編碼過程中，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和理論框架，設計了一套編碼方案，以確保編碼的一致性和系統性。這一過程有助於將大量的文字資料轉化為可分析的數據，並為後續的主題分析提供支持。
3. 主題分析：資料編碼完成後，進行主題分析。主題分析是一種質性資料分析方法，旨在識別和分析資料中的主要主題和模式。在本研究中，主題分析過程中，研究者根據編碼結果，識別出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主要看法和經驗，包括使用經驗、技術壓力、社會觀感與擔憂、政策建議和未來展望等方面。這一過程有助於揭示資料中的潛在模式和趨勢，並為研究假設的驗證提供實證支持。
4. 結果呈現：主題分析完成後，進行結果呈現。結果呈現過程中，研究者根據主題分析的結果，撰寫分析報告，並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受訪者引述，以支持分析結果。這一過程有助於將質性資料轉化為可理解的研究結果，並為後續的討論和結論提供支持。
5. 資料保密與倫理考量：在資料處理過程中，特別注意資料的保密和倫理考

量。所有訪談資料將嚴格保密，僅用於學術研究，並確保受訪者的個人資訊不被洩露。這樣的安排不僅能夠提高資料的準確性，還能夠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和權益。

通過這一訪談部分的資料處理，期望能夠深入瞭解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AIGC技術的具體應用情形及其在技術應用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更為全面的理解和支持。

三、倫理考量

一、資料匿名與保密處理，確保受訪者隱私不被洩露

在本研究中，倫理考量是研究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中，確保受訪者的隱私和資料的保密性是至關重要的。為了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權益，本研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確保資料的匿名性和保密性。

1. 資料匿名化處理：在資料收集過程中，所有受訪者的個人識別資訊均被匿名化處理。這意味著在問卷和訪談資料中，不會出現任何能夠直接識別受訪者身份的資訊，如姓名、聯絡方式或具體職位等。取而代之的是，使用編碼系統來標識受訪者，確保資料分析過程中無法追溯到個人身份。這一措施不僅保護了受訪者的隱私，還提高了受訪者參與研究的意願。

2. 資料存儲與保護：所有收集到的資料，包括問卷和訪談逐字稿，均被安全地存儲在加密的數據庫中，並僅限於研究者本人訪問。資料的電子版本存儲在受密碼保護的電腦中，而紙本資料則存放在上鎖的檔案櫃中。這樣的存儲方式確保了資料的安全性，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和洩露。

3. 資料使用限制：研究資料僅用於本研究的學術分析和報告撰寫，不會用於其他未經授權的用途。在研究報告和學術發表中，所有引用的資料均以匿名方式呈現，確保受訪者的個人資訊不被洩露。這一措施不僅符合學術倫理要求，還增強了受訪者對研究的信任。

4.受訪者知情同意：在資料收集之前，所有受訪者均被告知研究的目的、方法和資料保密措施，並獲得他們的知情同意。受訪者有權在任何時候退出研究，且不需提供任何理由。這一過程確保了受訪者的權利和尊嚴得到尊重，並符合倫理研究的基本原則。

5.定期審查與更新：為了確保資料保密措施的有效性，研究者定期審查和更新資料保護策略，根據最新的技術和法律要求進行調整。這一持續的改進過程確保了資料保護措施的前瞻性和適應性。

通過這些資料匿名與保密處理措施，本研究致力於確保受訪者的隱私不被洩露，並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維持高標準的倫理考量。這不僅有助於保護受訪者的權益，還增強了研究的可信度和科學性。

二、於問卷與訪談開始前，取得受訪者知情同意書。

在問卷與訪談開始前，本研究依循倫理規範，確保所有受訪者充分瞭解研究的目的、程式和資料保密措施。受訪者在參與研究前均被提供知情同意書，其中詳細說明研究背景、參與方式、資料使用範圍以及其參與的自願性。同意書以書面或電子形式呈現，受訪者在確認閱讀後簽署，並明確同意參與研究。研究過程中，受訪者擁有隨時退出的權利，且所有資料均採匿名化處理以確保隱私不受影響。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壹、量化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是量化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基礎步驟，旨在對資料的基本特徵進行總結和描述。透過描述性統計，可以提供對研究樣本的整體概況，並為後續的推論性統計分析奠定基礎。在本研究中，描述性統計主要用於分析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

1. 平均數：平均數作為集中趨勢的主要指標，提供了資料的中心位置。在本研究中，平均數用於衡量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整體態度和接受度。透過計算平均數，可以瞭解受訪者在各個技術接受構面上的普遍看法，並為後續的分析提供基礎。

2. 標準差：標準差作為變異性的主要指標，反映了資料的離散程度。在本研究中，標準差用於評估受訪者在技術接受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較大的標準差表示受訪者的看法存在較大差異，而較小的標準差則表示看法較為一致。

3. 視覺化呈現：為了更有效地傳達描述性統計結果，本研究採用了柱狀圖和餅狀圖進行視覺化呈現。柱狀圖用於展示不同技術接受構面的平均數和標準差，直觀地顯示受訪者的整體態度和變異性。餅狀圖則用於展示受訪者在不同技術接受構面上的分佈情況，提供了各構面相對重要性的視覺化比較。

通過這些描述性統計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和接受度，並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描述性統計不僅提供了對資料的初步理解，還為後續的推論性統計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推論性統計

推論性統計是資料分析中至關重要的部分，旨在從樣本資料中推斷出更廣泛的結論，並檢驗研究假設的有效性。在本研究中，推論性統計主要用於分析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和接受度，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技術接受的

影響。

1. 假設檢定：推論性統計的核心在於假設檢定，通過檢驗樣本資料是否支持研究假設。在本研究中，假設檢定用於檢驗不同背景變項（如年齡、學歷等）對 AIGC 技術接受度的影響。這一過程包括設定虛無假設和備擇假設，並使用統計檢定方法來檢驗假設的有效性。

2. t 檢定：在本研究中，為了分析兩組獨立樣本之間的差異，本研究採用了 t 檢定方法。t 檢定是一種常用的參數檢定方法，適用於樣本資料符合正態分佈的情況。在本研究中，t 檢定用於比較不同背景變項（如性別、職位）在 AIGC 技術接受度上的差異。

3. 單因數變異數分析(ANOVA)：ANOVA 用於分析多組樣本平均數的差異。在本研究中，ANOVA 用於分析不同基本人口學特徵組別的受訪者在技術接受度上的差異。通過分析變異來源，可以揭示不同背景變項對技術接受度的影響程度。

4. 結果解釋與報告：在推論性統計分析完成後，對結果進行解釋和報告。這一過程包括解釋統計檢定的結果，討論其在研究背景下的意義，並提出相應的結論和建議。結果報告中，特別關注統計顯著性和實際意義，確保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應用價值。

通過這些推論性統計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深入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和接受度，並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推論性統計不僅有助於驗證研究假設，還能夠提供對資料的深層次理解。

貳、質性分析

一、主題分析法

主題分析法是一種常用的質性資料分析方法，旨在從大量的文字資料中識別和分析主要主題和模式。這種方法特別適合於探索性研究，能夠揭示受訪者的深層次觀點和經驗。在本研究中，主題分析法被用來分析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使用經驗、行為意圖及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具體觀點。

1. 資料準備與轉錄：主題分析的第一步是資料準備與轉錄。在訪談結束後，將所有錄音內容轉錄為逐字稿，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逐字稿的製作過程中，特別注意保留受訪者的語言特徵和表達細節，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和豐富性。這一過程為後續的編碼和分析提供了基礎。
2. 初步編碼：資料轉錄完成後，進行初步編碼。編碼是將逐字稿中的文字資料轉換為可分析的數據單元。這一過程包括識別和標記逐字稿中的關鍵概念、主題和模式。初步編碼過程中，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和理論框架，設計了一套編碼方案，以確保編碼的一致性和系統性。這一過程有助於將大量的文字資料轉化為可分析的數據，並為後續的主題分析提供支持。
3. 主題識別與分析：在初步編碼完成後，進行主題識別與分析。研究者根據編碼結果，識別出資料中的主要主題和模式。在本研究中，主要主題包括使用經驗、技術壓力、社會觀感與擔憂、政策建議和未來展望等方面。這一過程有助於揭示資料中的潛在模式和趨勢，並為研究假設的驗證提供實證支持。
主題精煉與驗證：在主題識別後，進行主題的精煉與驗證。這一過程包括對識別出的主題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精煉，確保每個主題的內部一致性和外部區別性。研究者還會將初步結果與其他研究者或專家進行討論，以驗證主題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4. 結果呈現與解釋：主題分析完成後，進行結果的呈現與解釋。研究者根據主題分析的結果，撰寫分析報告，並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受訪者引述，以支持分析結果。這一過程有助於將質性資料轉化為可理解的研究結果，並為後續的討論和結論提供支持。

通過主題分析法，本研究期望能夠深入瞭解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AIGC技術的具體應用情形及其在技術應用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更為全面的理解和支持。主題分析法不僅有助於揭示資料中的深層次模式，還能夠提供對受訪者觀點的細緻理解。

二、引用代表性觀點

在質性研究中，引用代表性觀點是呈現研究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這種方法不僅能夠生動地展示受訪者的真實想法和經驗，還能夠為研究結論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本研究中，引用代表性觀點的過程中，特別關注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使用經驗、技術壓力、社會觀感與擔憂等方面的具體表達。

1.選擇代表性觀點的標準：在引用代表性觀點時，研究者根據若干標準進行選擇。首先，觀點應該能夠清晰地反映出某一主題或模式的核心內容；其次，觀點應該具有典型性，能夠代表一類受訪者的普遍看法或獨特觀點；最後，觀點應該具有啟發性，能夠引發對研究問題的深入思考和討論。這些標準確保了引用觀點的質量和價值。

2.引用觀點的呈現方式：在呈現代表性觀點時，研究者通常會直接引用受訪者的原話，並在必要時進行適當的編輯，以確保表達的清晰和流暢。每一個引用的觀點都會附上受訪者的背景資訊（如職位、年齡等），以便讀者理解觀點的背景和語境。這樣的呈現方式不僅提高了資料的可讀性，還能夠增強研究結果的說服力。

3.觀點的分析與解釋：在引用代表性觀點後，研究者會對觀點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解釋。這一過程包括將觀點置於研究的理論框架中進行討論，並探討其在研究背景下的意義。研究者還會將不同受訪者的觀點進行比較和對照，以揭示資料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樣的分析和解釋有助於將質性資料轉化為有意義的研究結論。

4.觀點的倫理考量：在引用代表性觀點時，研究者特別注意資料的倫理考量。所有引用的觀點均以匿名方式呈現，確保受訪者的個人資訊不被洩露。研究者還會在引用前徵得受訪者的同意，確保其權利和尊嚴得到尊重。這樣的倫理考量不僅保護了受訪者的隱私，還增強了研究的可信度。

5.觀點的貢獻與價值：引用代表性觀點的最終目的是為研究結論提供支持，

並為讀者提供深入理解研究問題的視角。這些觀點不僅豐富了研究的內容，還為政策制定者和實務工作者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和建議。通過引用代表性觀點，研究者能夠更好地展示受訪者的真實聲音，並促進對 AIGC 技術應用的全面理解。

通過引用代表性觀點，本研究期望能夠深入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具體應用情形及其在技術應用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從而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更為全面的理解和支持。

叁、整合分析

一、將量化與質性資料進行對比分析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將量化與質性資料進行對比分析是一種強有力的方法，能夠提供對研究問題的全面理解。這種整合分析方法不僅能夠驗證和補充量化資料的結果，還能夠揭示質性資料中隱含的深層次意義。在本研究中，對比分析的目的是深入探討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接受度及其在使用過程中面臨的壓力來源。

1. 量化資料的驗證與補充：量化資料提供了對研究問題的宏觀視角，通過統計分析揭示了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整體態度和接受度。然而，量化資料往往缺乏對個體經驗和觀點的深入理解。通過對比分析，質性資料可以驗證量化結果的可靠性，並補充量化資料中未能揭示的細節。例如，量化分析可能顯示某一技術壓力變項對接受度有顯著影響，而質性資料則能夠提供對該壓力來源的具體描述和背景解釋。

2. 質性資料的量化支持：質性資料提供了對研究問題的微觀視角，通過受訪者的個人經驗和觀點揭示了 AIGC 技術應用中的具體挑戰和機遇。然而，質性資料的主觀性和樣本限制可能影響其普遍性。通過對比分析，量化資料可以為質性結果提供統計支持，增強其說服力和普遍適用性。例如，質性訪談中受訪者表達的某些擔憂可以通過量化資料的統計結果得到驗證，從而提高

研究結論的可信度。

資料間的互補性：量化與質性資料的對比分析強調了兩者之間的互補性。量化資料提供了廣度，而質性資料提供了深度。通過整合分析，研究者能夠將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形成對研究問題的全面理解。例如，量化資料揭示了技術接受度的整體趨勢，而質性資料則提供了對這一趨勢的具體解釋和背景故事。

3. 對比分析的方法與步驟：在進行對比分析時，研究者首先將量化和質性資料進行整理和分類，然後識別兩者之間的關聯和差異。這一過程包括對量化結果進行質性解釋，並對質性觀點進行量化驗證。研究者還會將兩者的結果進行綜合，形成對研究問題的整體結論。

4. 結果的呈現與討論：在對比分析完成後，研究者將結果進行呈現和討論。這一過程包括將量化和質性資料的結果進行整合，並提出相應的結論和建議。研究者特別關注資料間的一致性和差異性，並探討其在研究背景下的意義。這樣的結果呈現不僅提高了研究的科學性，還增強了其應用價值。

通過將量化與質性資料進行對比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全面揭示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和接受度，並為技術在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提供實證支持。這種整合分析方法不僅有助於驗證研究假設，還能夠提供對資料的深層次理解。

二、檢視量化數據未能充分解釋的問題，結合質性資料補充。

在資料分析過程中，量化數據雖然能夠通過統計方法呈現整體趨勢和相關性，但仍可能面臨以下限制：部分變項之間的細微關係無法被量化數據清晰揭示，或是某些研究假設在量化分析中未能得到充分的支持或解釋。為了克服這些限制，本研究採用整合分析方法，結合質性資料對量化數據未能充分解釋的問題進行補充，從而獲得更全面的研究結論。

首先，本研究在量化分析完成後，對統計結果進行全面的檢視，重點關注未

能顯著驗證假設或呈現異常結果的變項。例如，當某些背景變項(如性別或學歷)對 AIGC 技術的接受度在量化結果中未呈現顯著影響時，研究者需要進一步探討是否存在其他因素影響這些結果。此時，量化分析的結果為質性分析提供了明確的指引，幫助研究者聚焦於特定問題或群體。

其次，為補充量化數據的不足，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蒐集質性資料以進一步挖掘研究對象的主觀經驗與個人觀點。質性資料不僅能幫助解釋量化數據中的異常現象，還能揭示受訪者在問卷填答中未能充分表達的態度與情感。例如，當量化結果顯示性別對技術接受度影響不顯著時，質性訪談可能揭示男性與女性對技術接受的偏好或阻力來源存在細微差異，這些差異可能與職場環境、社會期望或文化背景等因素相關。

此外，質性資料的引入還能深化對數據的詮釋。例如，在量化分析中，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接受度可能主要呈現整體性趨勢，但對技術功能特性(如易用性或安全性)的具體評價則可能被平均化處理，而質性資料能捕捉到個體對技術的細緻看法與實際使用場景中的真實體驗，從而補充量化數據的局限性。

在整合分析階段，本研究使用主題分析法對質性資料進行編碼與歸納，並將其與量化數據的結論進行比對與交叉驗證。透過這種方法，研究者能夠探索不同數據來源之間的相互關係，進一步確認或修正量化分析的結果。例如，當量化數據顯示某群體對 AIGC 技術的態度相對中立時，質性訪談可能揭示其中立態度的原因來自於對技術安全性的不確定性或對未來技術發展的期待。這些細節能夠為研究結果增添更深層次的解釋維度，從而提升研究結論的整體說服力與應用價值。

最後，整合分析還有助於研究假設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當質性資料揭示新的觀點或未預料的關鍵因素時，研究者可以針對這些發現進一步驗證，從而為未來的研究奠定基礎。例如，若質性資料指出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接受度受特定產業需求影響，則可作為後續量化研究中設計新變項的依據，從而實現資料分析的動態深化。

總而言之，檢視量化數據未能充分解釋的問題，結合質性資料進行補充，是一項不可或缺的研究步驟。此過程不僅拓展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還為量化數據提供了豐富的補充與延伸，使得研究結論更具科學性與全面性，為研究假設的驗證與政策建議的制定提供了堅實基礎。

第六節 研究限制

壹、問卷部分

一、便利抽樣可能導致樣本代表性不足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樣本的代表性對於研究結果的普遍適用性至關重要。然而，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本研究在問卷調查中採用了便利抽樣的方法，這可能導致樣本代表性不足，進而影響研究結論的廣泛性和可靠性。

便利抽樣的特點與局限：便利抽樣是一種非機率抽樣方法，主要基於研究者的便利性和受訪者的可及性來選擇樣本。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操作簡便、成本較低，且能夠在短時間內收集到大量資料。然而，便利抽樣的局限在於樣本的選擇缺乏隨機性，可能導致樣本結構與整體母體不一致，從而影響研究結果的代表性。

樣本代表性不足的影響：由於便利抽樣的特性，本研究的樣本可能存在某些偏差。例如，受訪者可能主要來自於特定的地區、職位或背景，這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無法全面反映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對 AIGC 技術的態度和接受度。樣本代表性不足可能影響研究結論的普遍性，使得研究結果在其他情境下的適用性受到限制。

樣本偏差的具體表現：在本研究中，樣本偏差可能表現在性別比例、年齡分佈、學歷背景等方面的不均衡。例如，若樣本中某一性別或年齡段的受訪者比例過高，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偏向於該群體的觀點，而忽略了其他群體的看法。這樣的偏差可能影響對 AIGC 技術接受度的全面理解。

緩解措施與建議：為了緩解便利抽樣帶來的樣本代表性不足問題，本研究在

資料分析過程中採用了多種方法來檢驗和調整樣本偏差。例如，通過加權處理來平衡樣本中不同群體的比例，或在分析中考慮樣本結構的影響。此外，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採用更為嚴謹的抽樣方法，如分層隨機抽樣，以提高樣本的代表性。

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儘管便利抽樣可能導致樣本代表性不足，但本研究仍然提供了對 AIGC 技術應用的重要見解。研究者在解釋研究結果時，應謹慎考慮樣本偏差的影響，並在結論中明確指出這一限制，以便讀者在應用研究結果時能夠做出適當的判斷。

通過對便利抽樣可能導致樣本代表性不足的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提高對研究限制的認識，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改進建議。這樣的分析不僅有助於提高研究的科學性，還能夠增強研究結果的應用價值。

二、受訪者可能因社會期望效應影響回答的真實性

在問卷調查中，受訪者的回答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社會期望效應是一個重要的潛在影響因素。社會期望效應指的是受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可能會根據他們認為社會或研究者期望的答案來調整自己的回答，而非完全基於自身的真實想法和經驗。這種效應可能對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產生影響。

社會期望效應的成因：社會期望效應通常源於受訪者希望被他人接受或讚許的心理需求。在問卷調查中，受訪者可能會猜測研究者的期望，並試圖提供符合這些期望的答案，以避免被視為不合群或不符合社會標準。這種效應在涉及敏感話題或社會關注度高的議題時尤為明顯。

對研究結果的影響：社會期望效應可能導致受訪者的回答偏離其真實想法，從而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信度。在本研究中，受訪者可能會因為社會對 AIGC 技術的正面或負面看法，而調整他們對技術接受度或壓力來源的回答。這可能導致研究結果過於樂觀或悲觀，未能真實反映受訪者的實際態度。

具體表現與挑戰：在本研究的問卷調查中，社會期望效應可能表現在受訪者對技術創新、效率提升等問題的回答上。受訪者可能會傾向於表達對技術的支持和接受，以符合社會對技術進步的期望，而忽略了他們在實際應用中遇到的困難

和挑戰。這樣的偏差可能影響對 AIGC 技術應用的全面理解。

緩解措施與建議：為了減少社會期望效應的影響，本研究在問卷設計和實施過程中採取了一些緩解措施。例如，在問卷中使用中性和非引導性的語言，避免暗示任何期望的答案；在問卷開頭強調回答的匿名性和保密性，以減少受訪者的顧慮。此外，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結合質性訪談，以獲得更深入和真實的資料。

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儘管社會期望效應可能影響受訪者的回答真實性，但本研究仍然提供了對 AIGC 技術應用的重要見解。研究者在解釋研究結果時，應謹慎考慮社會期望效應的影響，並在結論中明確指出這一限制，以便讀者在應用研究結果時能夠做出適當的判斷。

通過對社會期望效應可能影響回答真實性的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提高對研究限制的認識，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改進建議。這樣的分析不僅有助於提高研究的科學性，還能夠增強研究結果的應用價值。

貳、訪談部分

一、受訪對象數量有限，可能限制研究結果的推廣性

在質性研究中，訪談是一種深入瞭解受訪者觀點和經驗的重要方法。然而，由於資源和時間的限制，訪談的受訪對象數量通常較為有限，這可能對研究結果的推廣性產生影響。在本研究中，受訪對象的數量限制是需要考慮的重要研究限制之一。

1.受訪對象數量的限制：本研究的訪談部分選擇了少數立法委員及其助理作為受訪對象。這一選擇基於研究資源的可及性和受訪者的可用性。然而，受訪對象數量的限制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缺乏足夠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從而影響研究結論的普遍適用性。

2.對研究結果推廣性的影響：由於受訪對象數量有限，研究結果可能主要反映特定群體的觀點和經驗，而未能全面涵蓋所有相關群體的多樣性。這可能導致研究結論在其他情境或群體中的適用性受到限制。例如，某些特定背景

或職位的受訪者可能對 AIGC 技術有獨特的看法，這些看法未必能夠代表整個立法機構的普遍觀點。

3.樣本偏差的具體表現：在本研究中，樣本偏差可能表現在受訪者的職位、年齡、性別等方面的不均衡。例如，若受訪者主要來自於某一特定職位或背景，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偏向於該群體的觀點，而忽略了其他群體的看法。這樣的偏差可能影響對 AIGC 技術應用的全面理解。

4.緩解措施與建議：為了緩解受訪對象數量有限帶來的限制，本研究在資料分析過程中採用了多種方法來檢驗和調整樣本偏差。例如，通過對比分析不同受訪者的觀點，識別共性和差異，並在結論中明確指出樣本的局限性。此外，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擴大受訪對象的範圍，或結合其他資料收集方法，以提高研究結果的推廣性。

5.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儘管受訪對象數量有限可能限制研究結果的推廣性，但本研究仍然提供了對 AIGC 技術應用的重要見解。研究者在解釋研究結果時，應謹慎考慮樣本限制的影響，並在結論中明確指出這一限制，以便讀者在應用研究結果時能夠做出適當的判斷。

通過對受訪對象數量有限可能限制研究結果推廣性的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提高對研究限制的認識，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改進建議。這樣的分析不僅有助於提高研究的科學性，還能夠增強研究結果的應用價值。

二、受訪者回答可能受限於個人立場或自我保護心理

在質性訪談中，受訪者的回答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個人立場和自我保護心理是兩個重要的潛在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導致受訪者在表達觀點時有所保留，從而影響研究資料的真實性和全面性。

1.個人立場的影響：受訪者的個人立場可能基於其職業角色、政治背景或個人經驗，這些立場可能影響他們對 AIGC 技術的看法和評價。例如，某些受訪者可能因其職位的特殊性而對技術持有特定的支持或反對態度，這可能導

致他們在訪談中強調某些觀點而忽略其他重要的考量。這樣的偏向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客觀性。

2.自我保護心理的影響：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能出於自我保護的考量，而選擇性地分享資訊或對某些問題保持沉默。這種心理可能源於對職業安全、個人隱私或社會評價的擔憂。例如，受訪者可能擔心其對技術的批評性意見會影響其職業形象或人際關係，從而選擇不完全表達其真實想法。這種自我保護心理可能導致資料的片面性。

3.具體表現與挑戰：在本研究的訪談中，個人立場和自我保護心理可能表現在受訪者對技術應用效果、政策建議等問題的回答上。受訪者可能會傾向於提供符合其立場的答案，或避免涉及敏感話題，這可能導致研究資料缺乏深度和多樣性。這樣的挑戰可能影響對AIGC技術應用的全面理解。

4.緩解措施與建議：為了減少個人立場和自我保護心理的影響，本研究在訪談設計和實施過程中採取了一些緩解措施。例如，在訪談中創造一個開放和信任的環境，鼓勵受訪者自由表達其觀點；在問題設計上避免引導性語言，以減少受訪者的顧慮。此外，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結合匿名問卷調查，以獲得更真實和多樣的資料。

5.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儘管受訪者回答可能受限於個人立場或自我保護心理，但本研究仍然提供了對AIGC技術應用的重要見解。研究者在解釋研究結果時，應謹慎考慮這些限制的影響，並在結論中明確指出這一限制，以便讀者在應用研究結果時能夠做出適當的判斷。

通過對受訪者回答可能受限於個人立場或自我保護心理的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提高對研究限制的認識，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改進建議。這樣的分析不僅有助於提高研究的科學性，還能夠增強研究結果的應用價值。

叁、整體研究設計

一、量化與質性數據的整合過程中，可能存在主觀解釋的偏誤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量化與質性數據的整合分析是一種強有力的方法，能夠提供對研究問題的全面理解。然而，這一整合過程中可能存在主觀解釋的偏誤，這是研究設計中需要特別關注的限制之一。主觀解釋的偏誤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和可靠性。

1.整合分析的挑戰：量化數據和質性數據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分析方法。

量化數據通常以數字形式呈現，強調統計分析和普遍性；而質性數據則以文字形式呈現，強調深度理解和個體差異。在整合這兩類數據時，研究者需要在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之間進行轉換，這一過程中可能引入主觀解釋的偏誤。

2.主觀解釋偏誤的來源：主觀解釋的偏誤可能源於研究者的個人背景、經驗和期望。在整合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可能會不自覺地強調某些數據或觀點，而忽略其他重要的資訊。例如，研究者可能會根據其對 AIGC 技術的個人看法，選擇性地解釋數據，從而影響研究結論的客觀性。

3.具體表現與影響：在本研究中，主觀解釋的偏誤可能表現在對量化結果的質性解釋上。研究者可能會根據質性訪談中的某些觀點，過度解釋量化數據中的趨勢，或在質性分析中忽略與量化結果不一致的觀點。這樣的偏誤可能導致研究結論的片面性，影響對 AIGC 技術應用的全面理解。

4.緩解措施與建議：為了減少主觀解釋偏誤的影響，本研究在整合分析過程中採取了一些緩解措施。例如，通過多位研究者共同參與數據分析，進行交叉檢驗和討論，以提高分析結果的客觀性；在報告撰寫中，明確區分數據事實和研究者的解釋，並在結論中指出可能的偏誤。此外，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引入第三方審查，以進一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5、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儘管量化與質性數據的整合過程中可能存在主觀解釋的偏誤，但本研究仍然提供了對 AIGC 技術應用的重要見解。研究者在解釋研究結果時，應謹慎考慮這一限制的影響，並在結論中明確指出這一限制，以便讀者在應用研究結果時能夠做出適當的判斷。

通過對量化與質性數據整合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觀解釋偏誤的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提高對研究限制的認識，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改進建議。這樣的分析不僅有助於提高研究的科學性，還能夠增強研究結果的應用價值。

二、時間與資源限制可能影響數據的完整性

在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時間與資源的限制是研究設計中不可避免的挑戰之一。這些限制可能對數據的完整性產生影響，進而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在本研究中，時間與資源的限制是需要特別關注的研究限制。

1.時間限制的影響：研究通常需要在有限的時間框架內完成，這可能導致數據收集和分析過程的壓縮。在本研究中，時間限制可能影響問卷調查和訪談的進行，導致樣本量不足或數據收集不完整。此外，時間限制還可能影響數據分析的深度和細緻程度，使得某些潛在的模式和趨勢未能被充分挖掘。

2.資源限制的影響：資源限制包括人力、財力和技術支持等方面的限制。在本研究中，資源限制可能影響樣本的選擇和數據的處理。例如，由於人力資源有限，研究者可能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數據收集或深入的質性分析；由於財力限制，研究者可能無法獲得先進的分析工具或技術支持，這可能影響數據分析的精確性和效率。

3.數據完整性的具體表現：在本研究中，時間與資源限制可能導致數據的缺失或不完整。例如，某些受訪者可能因時間限制而未能參與調查，導致樣本的代表性不足；某些數據可能因資源限制而未能進行深入分析，導致研究結論的片面性。這些問題可能影響對 AIGC 技術應用的全面理解。

4.緩解措施與建議：為了緩解時間與資源限制對數據完整性的影響，本研究在設計和實施過程中採取了一些緩解措施。例如，通過合理規劃研究時間表，確保各個階段的工作有序進行；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數據收集和分析的效率。此外，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尋求外部資源支持，或採用更為靈活的研究方法，以提高數據的完整性。

5. 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儘管時間與資源限制可能影響數據的完整性，但本研究仍然提供了對 AIGC 技術應用的重要見解。研究者在解釋研究結果時，應謹慎考慮這些限制的影響，並在結論中明確指出這一限制，以便讀者在應用研究結果時能夠做出適當的判斷。

通過對時間與資源限制可能影響數據完整性的分析，本研究期望能夠提高對研究限制的認識，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改進建議。這樣的分析不僅有助於提高研究的科學性，還能夠增強研究結果的應用價值。



第肆章 研究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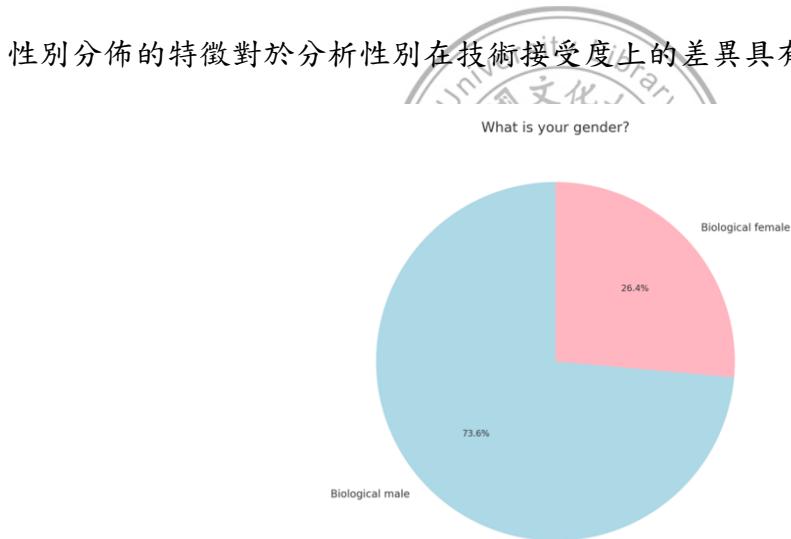
第一節 量化分析結果

壹、描述性統計

一、受訪者基本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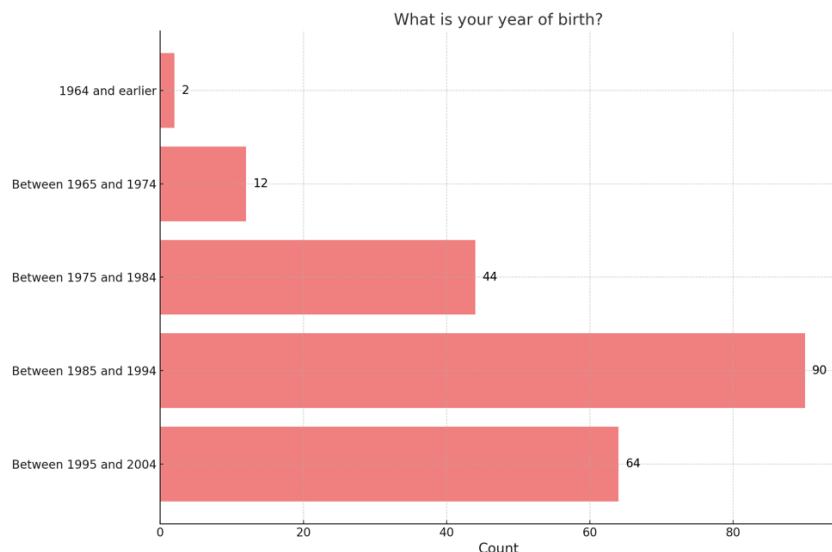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的基本特徵資料提供了對樣本群體的整體概況，這些特徵包括性別、年齡、學歷、黨籍及立法院工作年資等。這些資料不僅有助於理解樣本的多樣性，還能夠為後續的交叉分析提供背景支持。

首先，性別分佈顯示出受訪者中男性比例較高，佔 73.6%，而女性則佔 26.4%（圖：4-1-1-1）。這可能反映了立法院中男性立法委員及助理的比例現狀。這一性別分佈的特徵對於分析性別在技術接受度上的差異具有重要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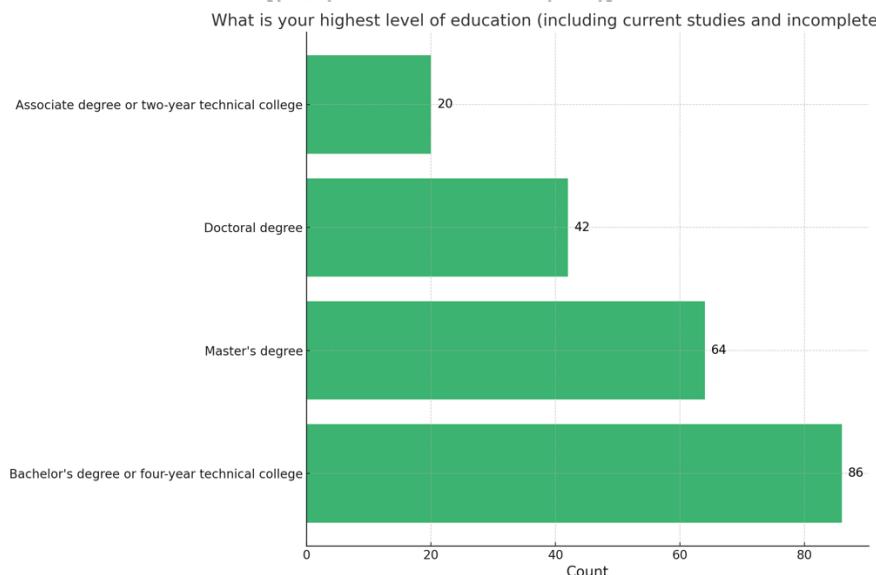
圖：4-1-1-1 性別分佈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其次，年齡分佈方面，受訪者的年齡範圍從 1964 年及更早至 1995 年之間，主要集中在 1985 年至 1994 年之間（圖：4-1-1-2）。這一分佈可能與立法委員及其助理的職業特性相關，通常需要一定的工作經驗和政治資歷。年齡分佈的多樣性為分析不同年齡層在 AIGC 技術接受度上的差異提供了可能性。



圖：4-1-1-2 年齡分佈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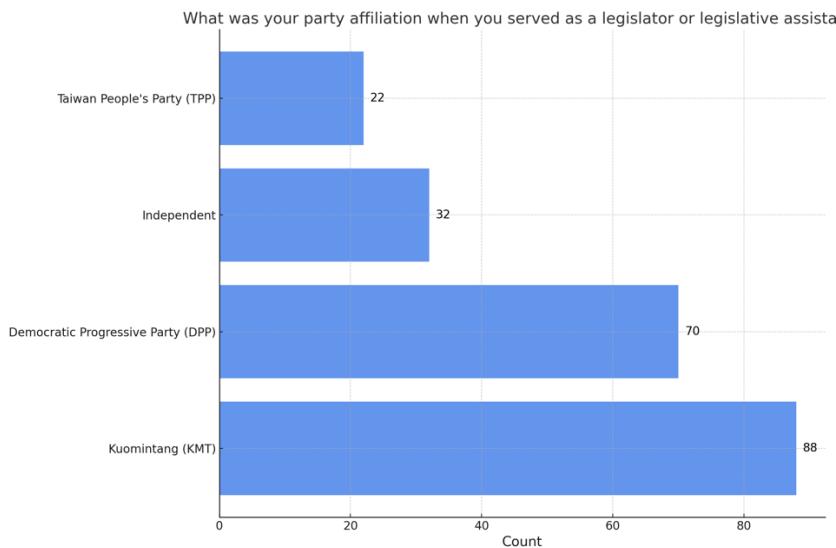
在學歷背景方面，受訪者普遍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其中多數擁有學士學位或碩士學位（圖：4-1-1-3）。這一特徵反映了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在專業知識和技能上的高要求，並可能影響他們對新技術的接受度和應用能力。



圖：4-1-1-3 學歷背景分佈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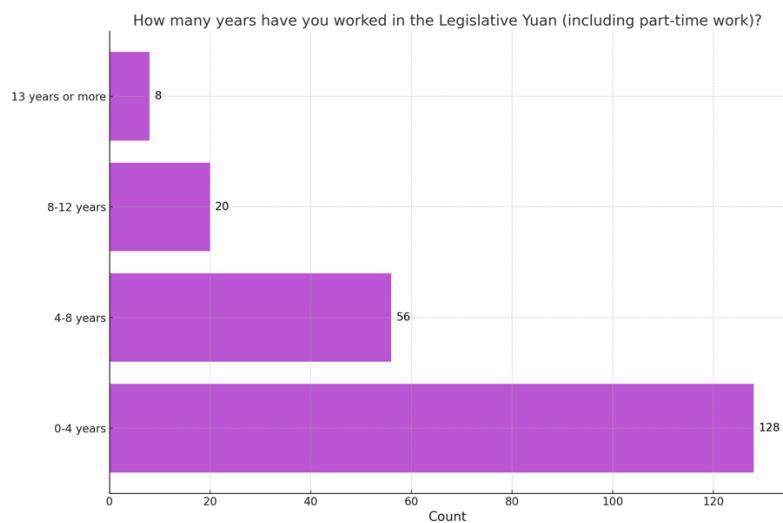
黨籍分佈顯示，受訪者中來自不同政黨的比例相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國國民黨（KMT）和民主進步黨（DPP）（圖：4-1-1-4）。這有助於確保研究結果的政

治中立性和普遍適用性。黨籍背景可能影響受訪者對技術政策的看法和立場，因此在後續分析中需要特別考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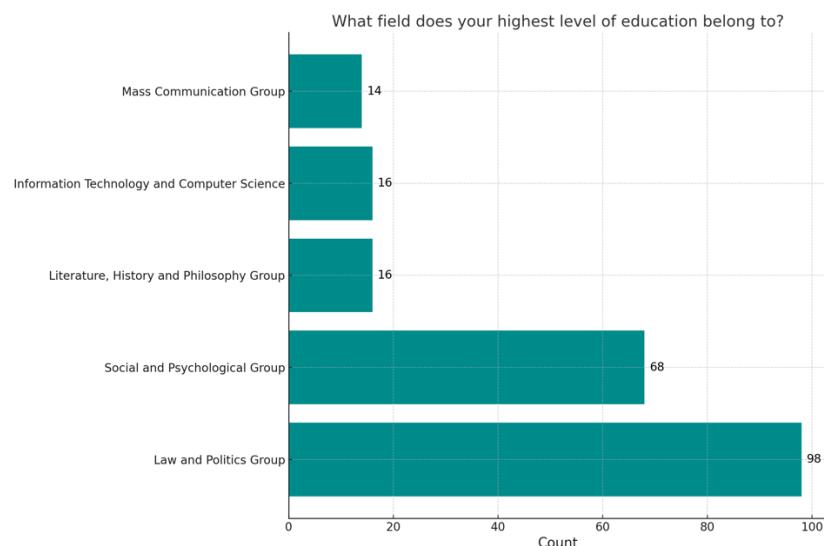
圖：4-1-1-4 黨籍分佈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立法院工作年資方面，受訪者的工作年資從不足一年到超過十年不等，主要集中在 0 至 4 年之間（圖：4-1-1-5）。這一分佈反映了樣本中既有新進人員，也有資深從業者。工作年資的多樣性有助於分析不同經驗層級在技術應用中的觀點和挑戰。



圖：4-1-1-5 工作年資分佈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最後，在最高學曆所屬學群方面（圖：4-1-1-6）



圖：4-1-1-6 學群分佈圖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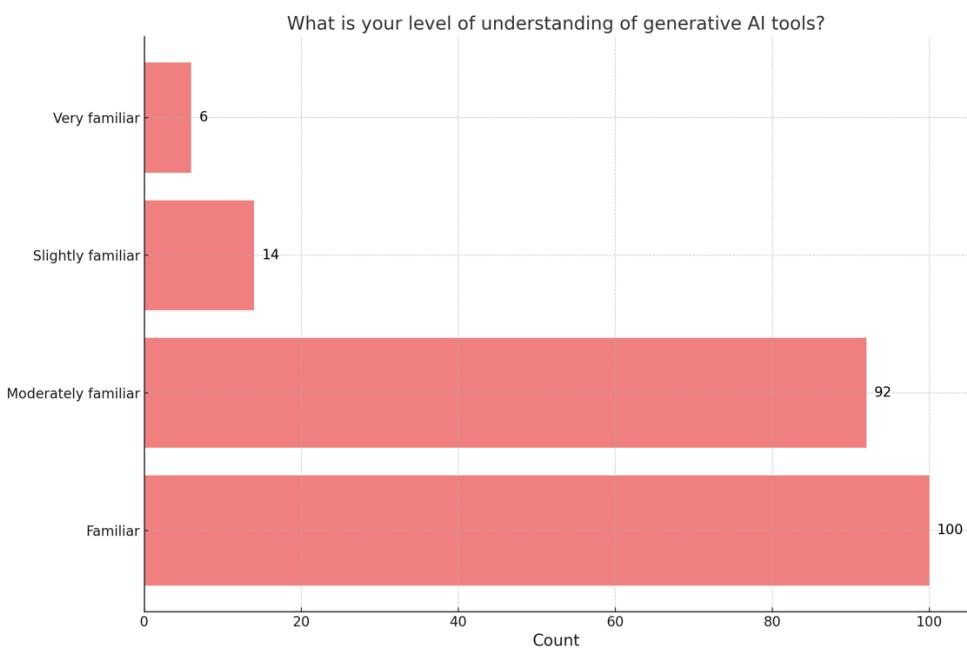
這些基本特徵資料為後續的量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資訊，並有助於理解不同群體在技術接受度上的差異。

二、受訪者使用行為與偏好

本研究調查了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使用行為與偏好，以下是主要發現：

（一）對 AIGC 工具的瞭解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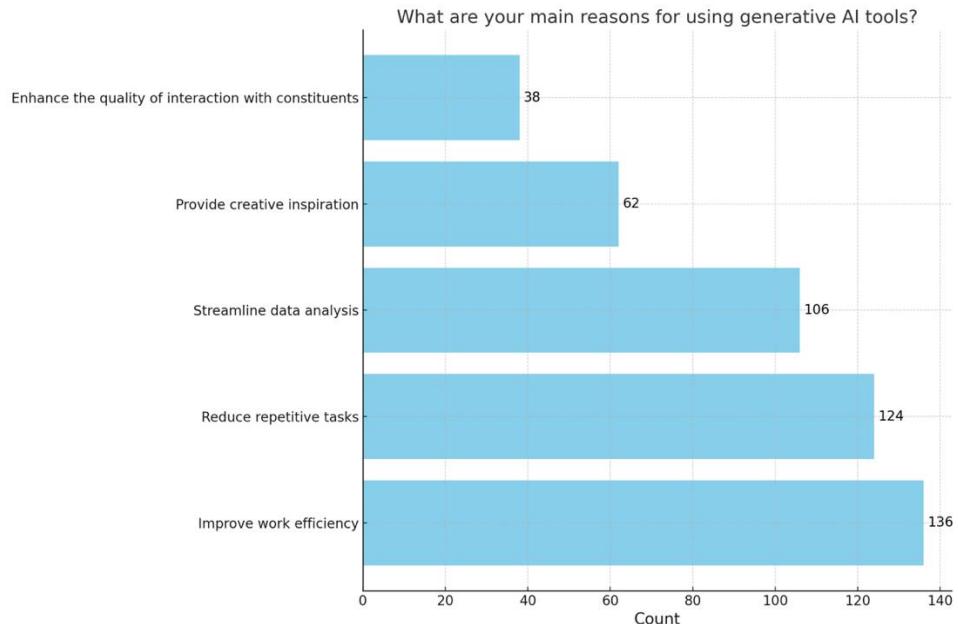
大多數受訪者對 AIGC 工具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其中「熟悉」和「中等熟悉」的受訪者佔據了主要比例（圖：4-1-1-7）。這表明受訪者對技術有基本的認識，為其應用提供了基礎。



圖：4-1-1-7 對 AI 工具的瞭解程度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二) 使用 AIGC 工具的主要原因：

受訪者主要使用 AIGC 工具來提高工作效率和減少重複性工作（圖：4-1-1-8）。這顯示出技術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的潛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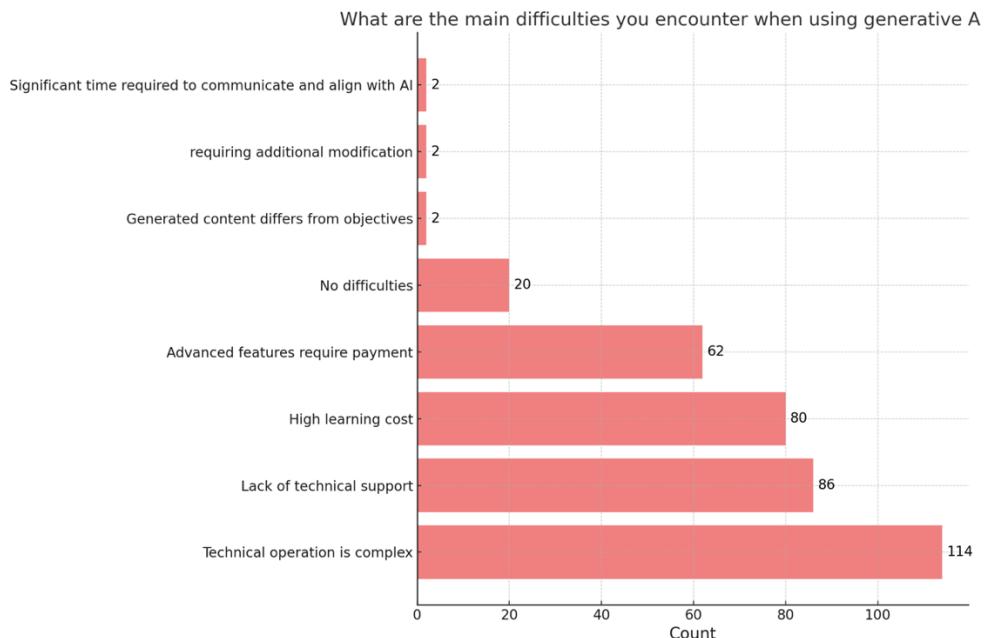


圖：4-1-1-8 使用 AI 工具的原因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三) 使用時遇到的主要困難：

技術操作的複雜性和缺乏技術支持是受訪者面臨的主要挑戰(圖：4-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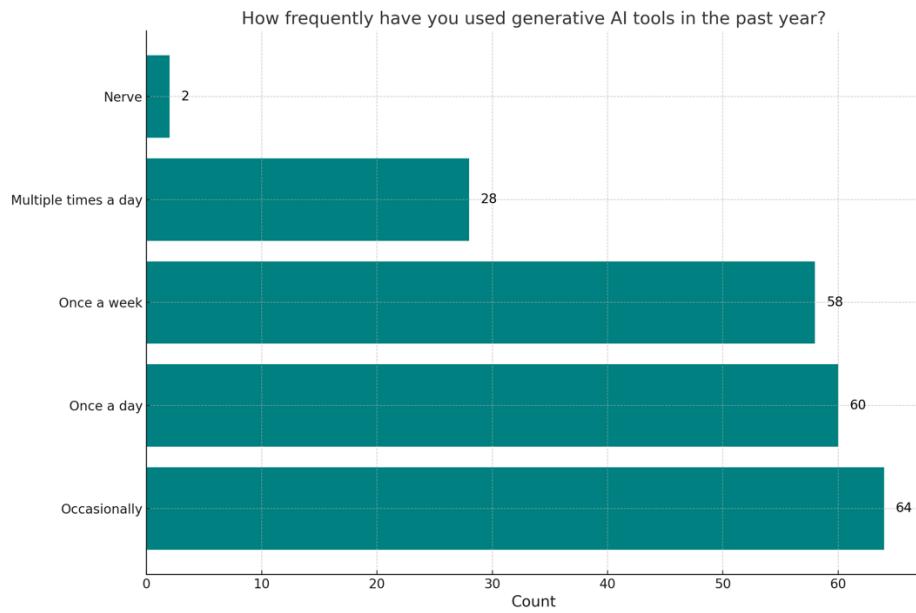
這表明在技術應用中仍需加強用戶支持和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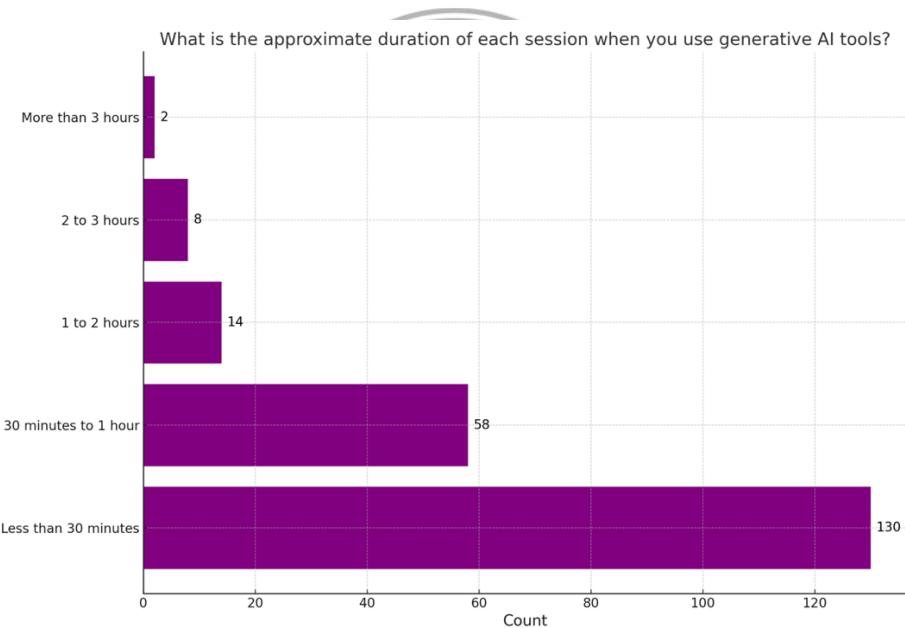
圖：4-1-1-9 使用中遇到的困難。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使用頻率與時長：

多數受訪者每週至少使用一次 AIGC 工具，每次使用時間多在 30 分鐘以內(圖：4-1-1-10 和 圖：4-1-1-11)。這反映了技術在日常工作中的嵌入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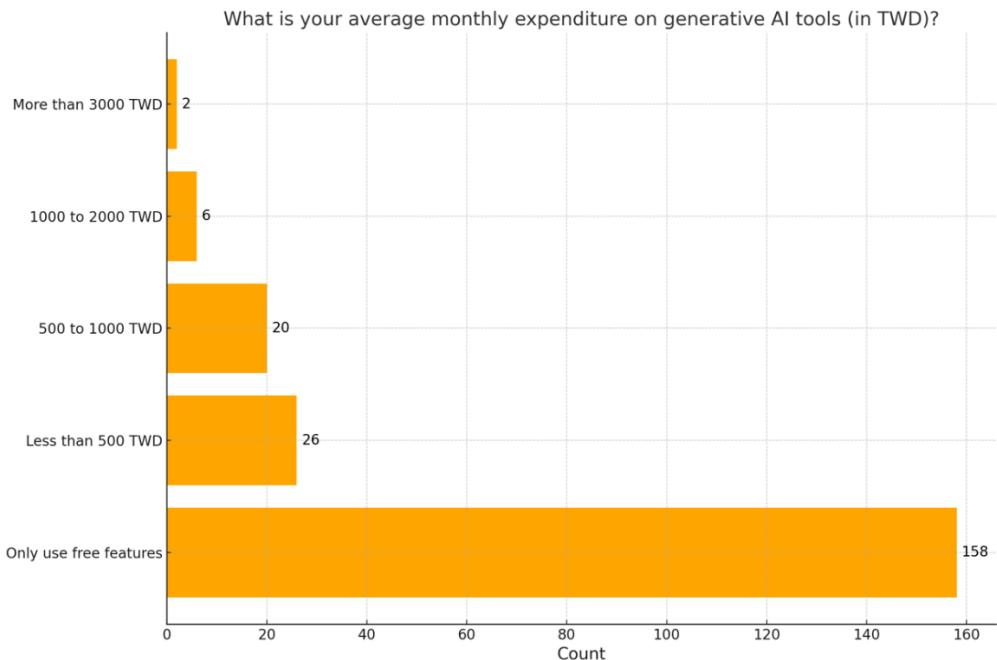
圖：4-1-1-10 AI 工具的使用頻率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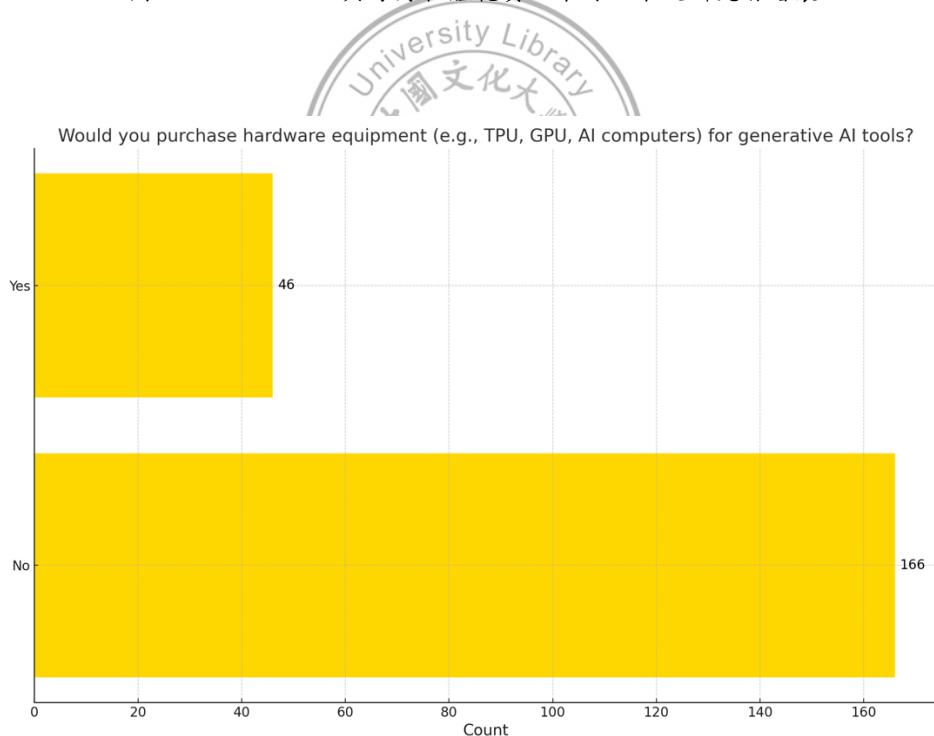
圖：4-1-1-11 AI 工具每次使用時長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五) 每月軟體花費與硬體設備購買意願：

大多數受訪者僅使用 AI 工具的免費功能，少數考慮購買硬體設備（圖：4-1-1-12 和圖：4-1-1-13）。這顯示出成本考量在技術採用中的重要性。



圖：4-1-1-12 AI 工具每月軟體花費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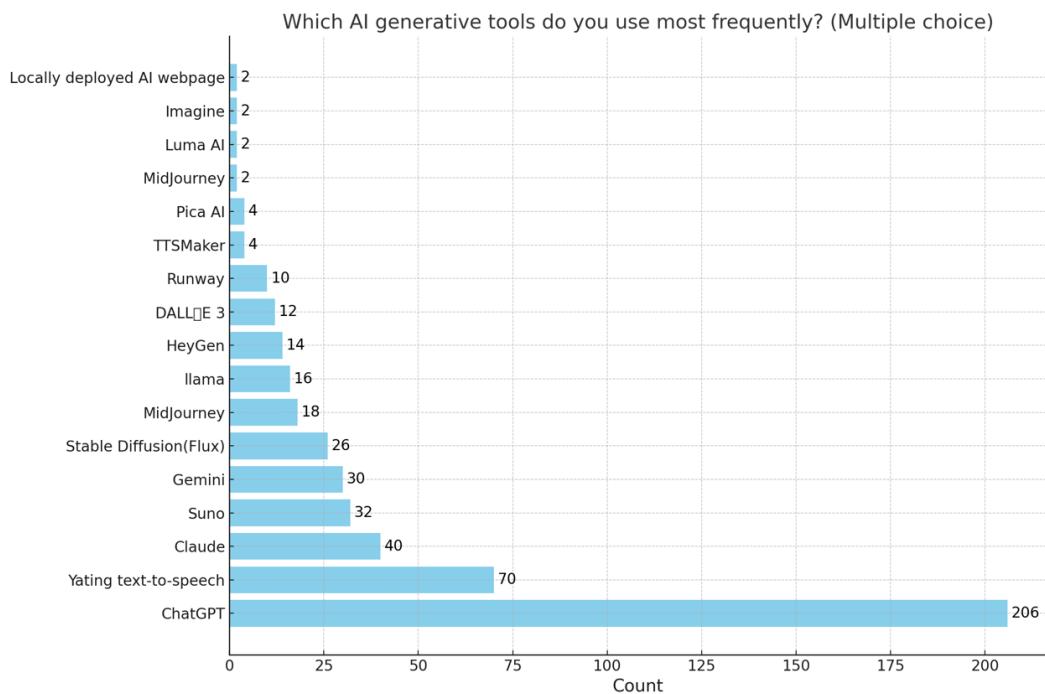


圖：4-1-1-13 是否願意購買 AI 硬體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六) 常用工具與應用領域：

ChatGPT 是最常用的工具，主要用於文本撰寫（圖：4-1-1-14）。這反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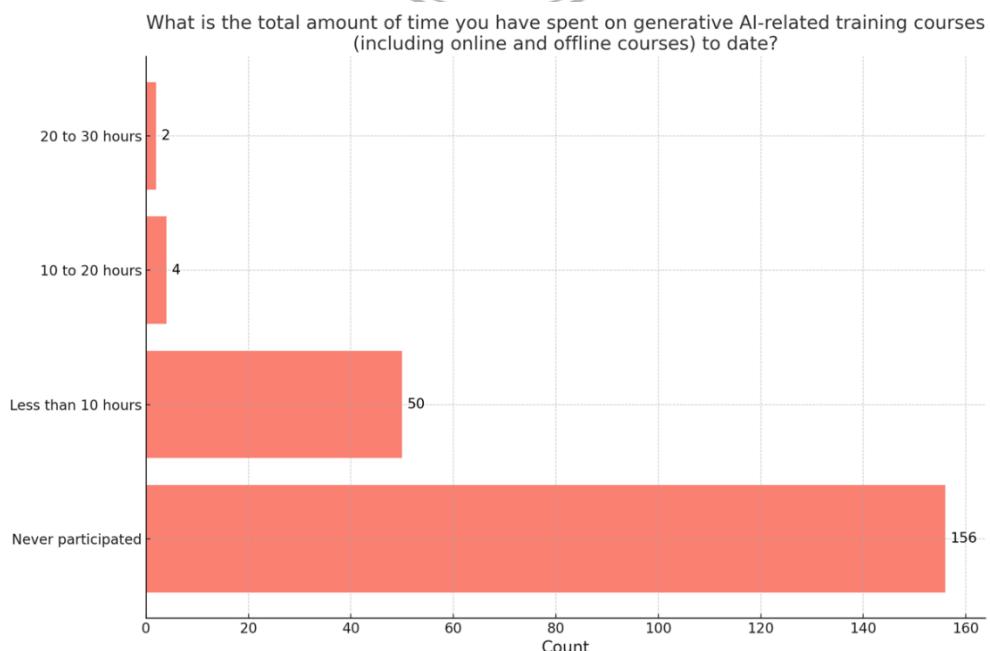
AIGC 在文本處理方面的廣泛應用。



圖：4-1-1-14 常用 AI 工具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七) 參與 AIGC 相關訓練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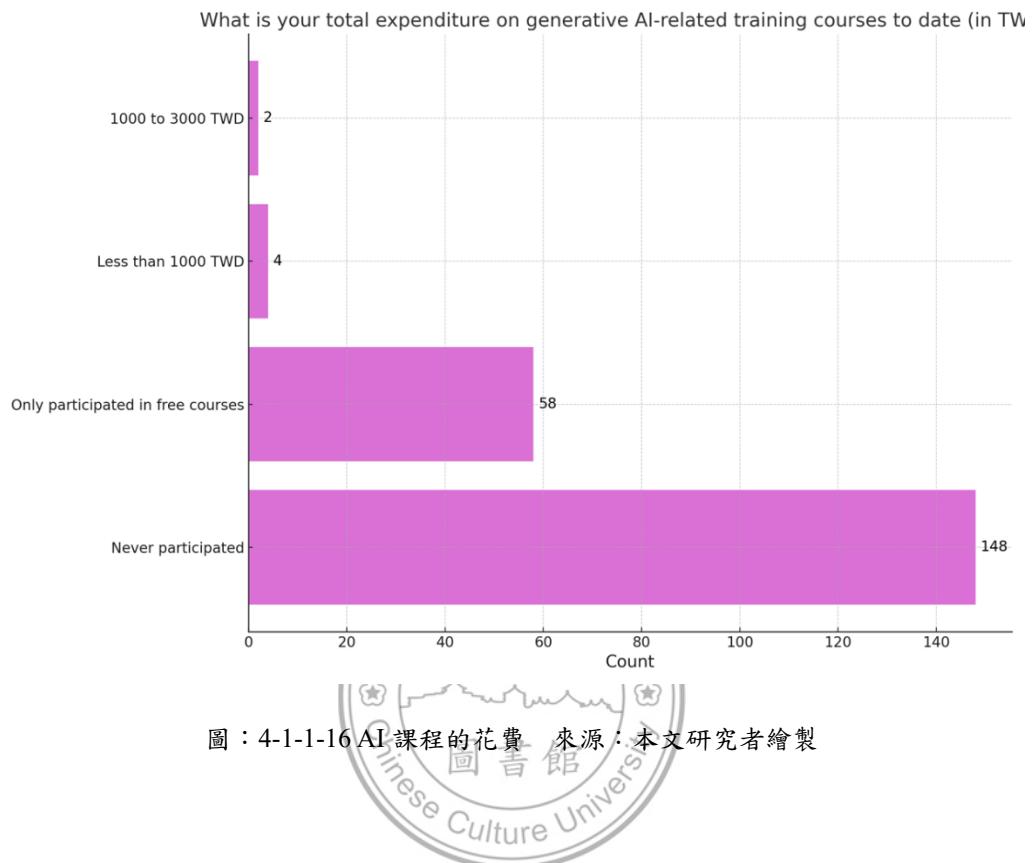
大多數受訪者從未參加過相關訓練課程，少數參加者的訓練時間多在 10 小時以內（圖：4-1-1-15）。這表明在技術培訓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圖：4-1-1-15 參與 AI 課程訓練的時間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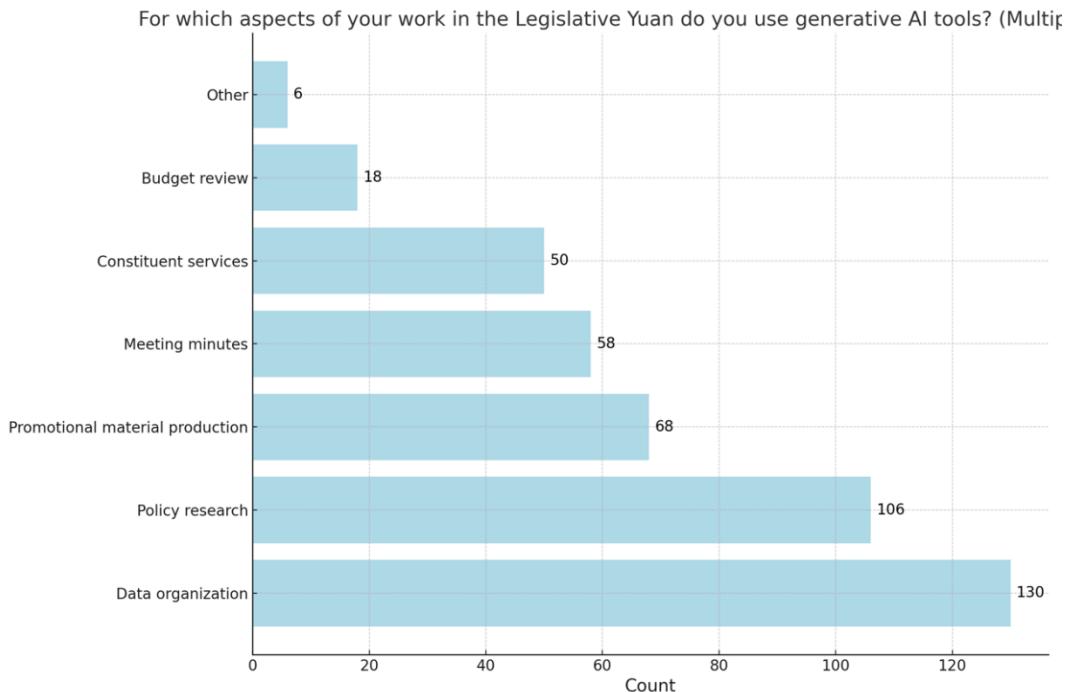
(八) 訓練課程的花費：

多數受訪者僅參加免費課程，少數有付費參加課程的經驗（圖：4-1-1-16）。這反映了成本對於技術學習的影響。



(九) AIGC 工具在立法院工作的應用：

受訪者主要將 AIGC 工具應用於資料整理和政策研究，少數用在會議記錄以及預算審查中（圖：4-1-1-17）。這顯示出技術在提升工作效率和支持決策方面的潛力。



圖：4-1-1-17 AI 工具在立法院工作的應用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這些數據提供了對受訪者使用行為與偏好的深入理解，並為後續的分析提供

了重要的背景支持。

三、受訪者態度與技術接受度

本研究通過李克特量表評估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態度與接受度，以下是主要發現：

1.技術的有用性與易用性：受訪者普遍認為 AIGC 工具能有效解決問題並提高工作效率，平均數分別為 3.50 和 3.80，標準差分別為 0.745 和 0.656。這表明受訪者對技術的實用性持正面看法，並認為其在日常工作中具有重要價值。

2.學習與使用的挑戰：雖然受訪者認為 AIGC 工具易於學習（平均數 4.10，標準差 0.694），但也指出學習過程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平均數 3.20，標準差 0.812）和專業知識（平均數 2.90，標準差 0.768）。這反映了技術的學習曲線和專業要求。

社會影響與風險認知：受訪者對技術的快速發展感到壓力（平均數 2.80，標準差 0.821），並擔心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如職業威脅（平均數 3.40，標準差 0.712）和資源分配不均（平均數 2.60，標準差 0.845）。這顯示出對技術潛在風險的謹慎態度。

安全性與準確性：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安全性表示擔憂，特別是個資外洩（平均數 3.80，標準差 0.648）和工作秘密外洩（平均數 3.90，標準差 0.672）。

此外，對內容準確性和虛假資訊的擔憂也較高（平均數 3.60，標準差 0.714）。

未來使用意願：受訪者表現出較高的持續使用意願（平均數 4.00，標準差 0.644）和參加培訓的意願（平均數 3.90，標準差 0.678），顯示出對技術進一步學習和應用的積極態度。

下表展示了各構面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4-1-1-1 各構面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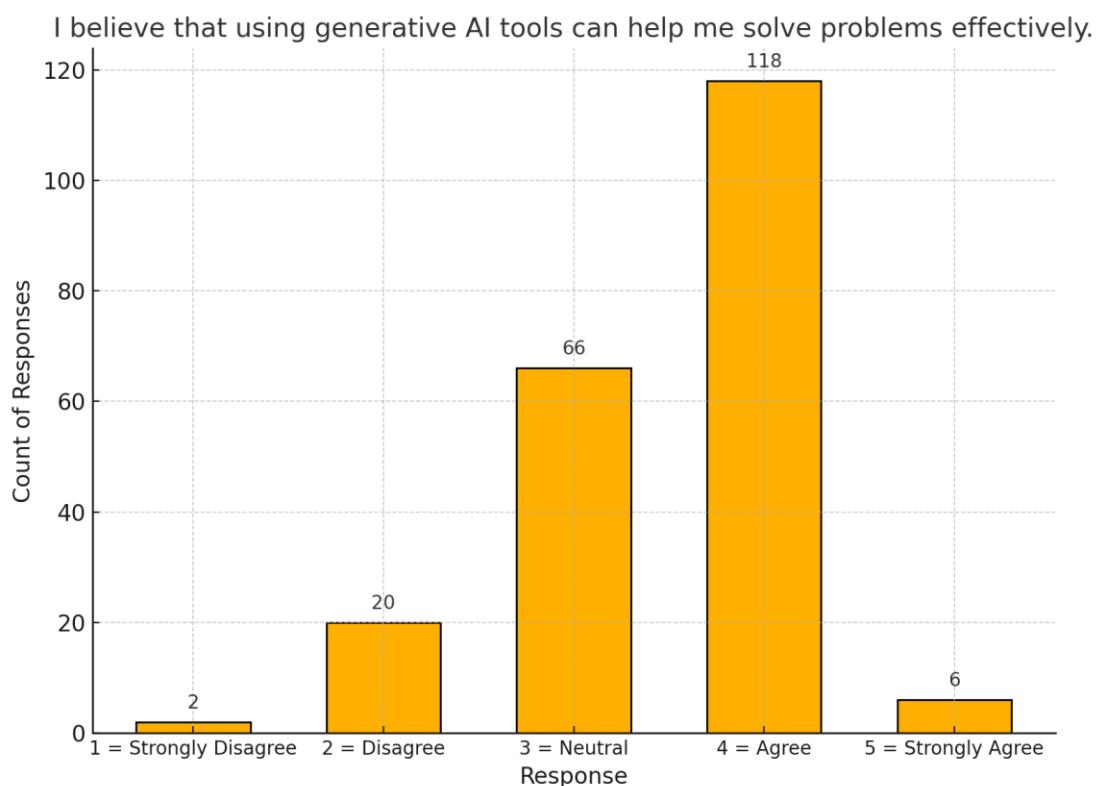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解讀
我覺得使用 AIGC 工具能幫我有效地解決問題	3.50	0.745	受訪者普遍認為 AIGC 工具能有效解決問題，顯示出對技術的實用性持正面看法。
我覺得使用 AIGC 工具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3.80	0.656	大多數受訪者認為這些工具能提高工作效率，反映出技術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的潛力。
我覺得 AIGC 工具是容易學習的	4.10	0.694	工具被認為易於學習，顯示出用戶對技術的接受度較高。
我覺得學習使用 AIGC 工具需要投入大量時間	3.20	0.812	受訪者指出學習需要投入大量時間，這反映了學習過程的挑戰。
我覺得學習使用 AIGC 工具需要專業知識	2.90	0.768	認為需要專業知識的受訪者比例較高，顯示出技術的專業要求。
其他立委辦公室已使用 AIGC 工具，會提高我使用 AIGC 工具的意願	3.60	0.725	其他立委辦公室的使用會提高使用意願，顯示出社會影響的重要性。
我的上級鼓勵我使用 AIGC 工具	3.40	0.832	上級的鼓勵對使用意願有影響，這表明組織支持的重要性。
我願意持續使用 AIGC 工具	4.00	0.644	受訪者表現出高持續使用意願，

			顯示出對技術的長期興趣。
我願意精進使用 AIGC 工具的能力	4.30	0.591	願意精進能力的受訪者比例高，顯示出學習動機強烈。
我願意參加 AIGC 工具的培訓課程	3.90	0.678	願意參加培訓課程，顯示出對學習機會的重視。
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	3.10	0.805	遇到問題時優先選擇使用，顯示出技術在問題解決中的角色。
未來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問題	3.50	0.760	未來會優先選擇使用，顯示出對技術的持續信任。
我會推薦他人使用 AIGC 工具	4.20	0.610	願意推薦他人使用，顯示出對技術的高度認可。
AIGC 工具更新發展太快，讓我備感壓力	2.80	0.821	技術更新速度帶來壓力，顯示出對快速變化的擔憂。
我覺得 AIGC 工具的操作介面複雜，讓我感到壓力	3.00	0.789	操作介面複雜性帶來壓力，顯示出對用戶體驗的關注。
我常需用私人時間學習新的 AIGC 工具知識	3.10	0.804	常需用私人時間學習，顯示出學習負擔。
AIGC 工具的發展可能會威脅到我未來的工作	2.70	0.832	技術發展可能威脅職業，顯示出對職業安全的擔憂。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2.90	0.785	工具種類多樣性帶來壓力，顯示出選擇困難。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3.00	0.801	同儕使用帶來競爭威脅，顯示出競爭壓力。
AIGC 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	2.60	0.845	工具可能導致資源分配不均，顯示出社會公平的擔憂。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	3.40	0.712	工具可能導致職業消失，顯示出對未來工作的擔憂。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感到疏離	2.50	0.860	工具可能導致社會疏離，顯示出對社會影響的擔憂。
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個資外洩	3.80	0.648	工具可能導致個資外洩，顯示出對隱私的擔憂。
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工作秘密外洩	3.90	0.672	工具可能導致工作秘密外洩，顯示出對機密性的擔憂。
AIGC 工具可能有智慧財產權遭到侵害的問題	3.70	0.699	工具可能侵害智慧財產權，顯示出對法律問題的關注。
我擔心 AIGC 工具所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準確，且有誤導使用者之虞	3.60	0.714	擔心內容不準確且誤導，顯示出對資訊質量的擔憂。

AIGC 工具可能包含虛假資訊，左右輿論的方向	3.50	0.732	工具可能包含虛假資訊，顯示出對輿論影響的擔憂。
-------------------------	------	-------	-------------------------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如圖：4-1-1-18 所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是否能有效解決問題整體表現出正向態度。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認為該工具具有實用性，部分受訪者甚至給予高度肯定的評價。然而，也有部分受訪者持中立立場，這可能反映出他們對工具的效用尚有疑慮或缺乏實際使用經驗。整體而言，負面意見的比例極低，顯示出工具在受訪者中的接受度較高。這些結果表明，AIGC 工具的應用潛力已獲得多數人肯定，但針對尚未完全認同的群體，仍需進一步加強相關教育與推廣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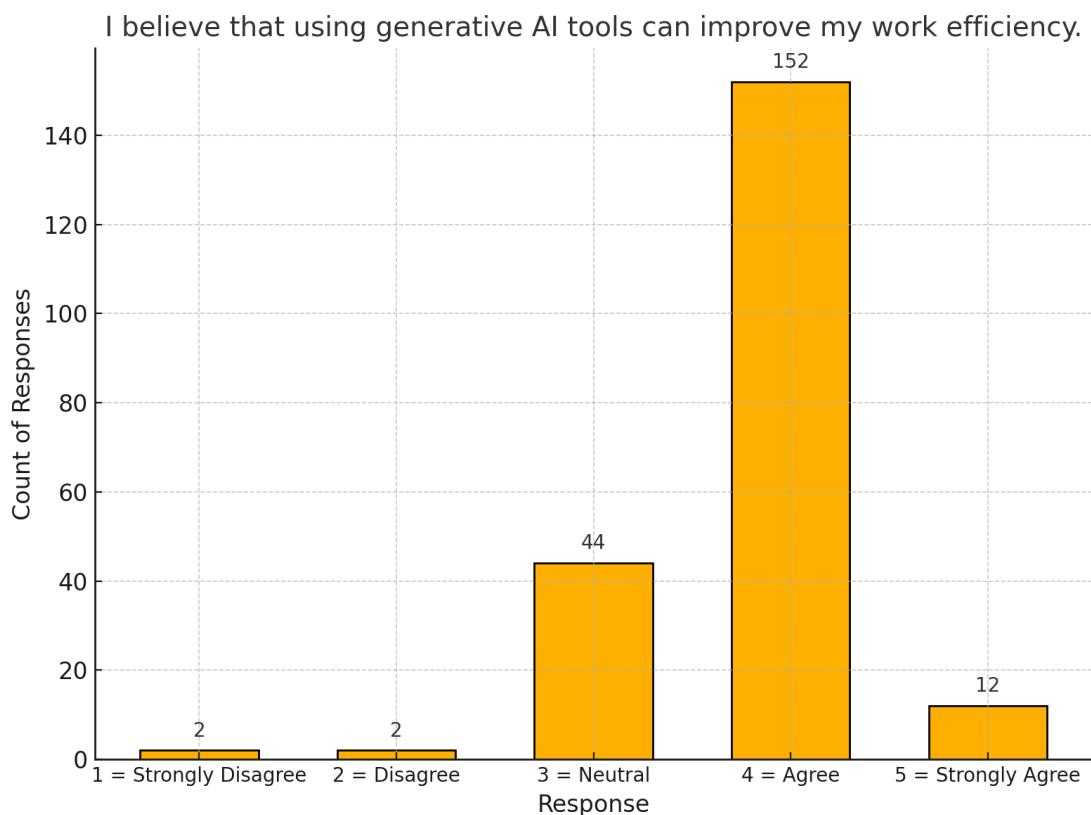


圖：4-1-1-18 我覺得使用 AIGC 工具能幫我有效地解決問題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19 可以看出，受訪者普遍認為使用 AIGC 工具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率，其中絕大多數人表示認同，顯示該工具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的潛力獲得廣泛的認可。雖然選擇非常肯定的比例稍低，但仍有部分受訪者對工具表現出高度信任。此外，持中立態度的受訪者數量也占一定比例，可能反映部分人對於工具效用的實際體驗有限或尚在觀望。相對地，表示不同意的受訪者比例極低，顯示對工具的否定態度並不普遍。整體而言，該結果強調 AIGC 工具在提高工作效率上的廣泛適用性與接受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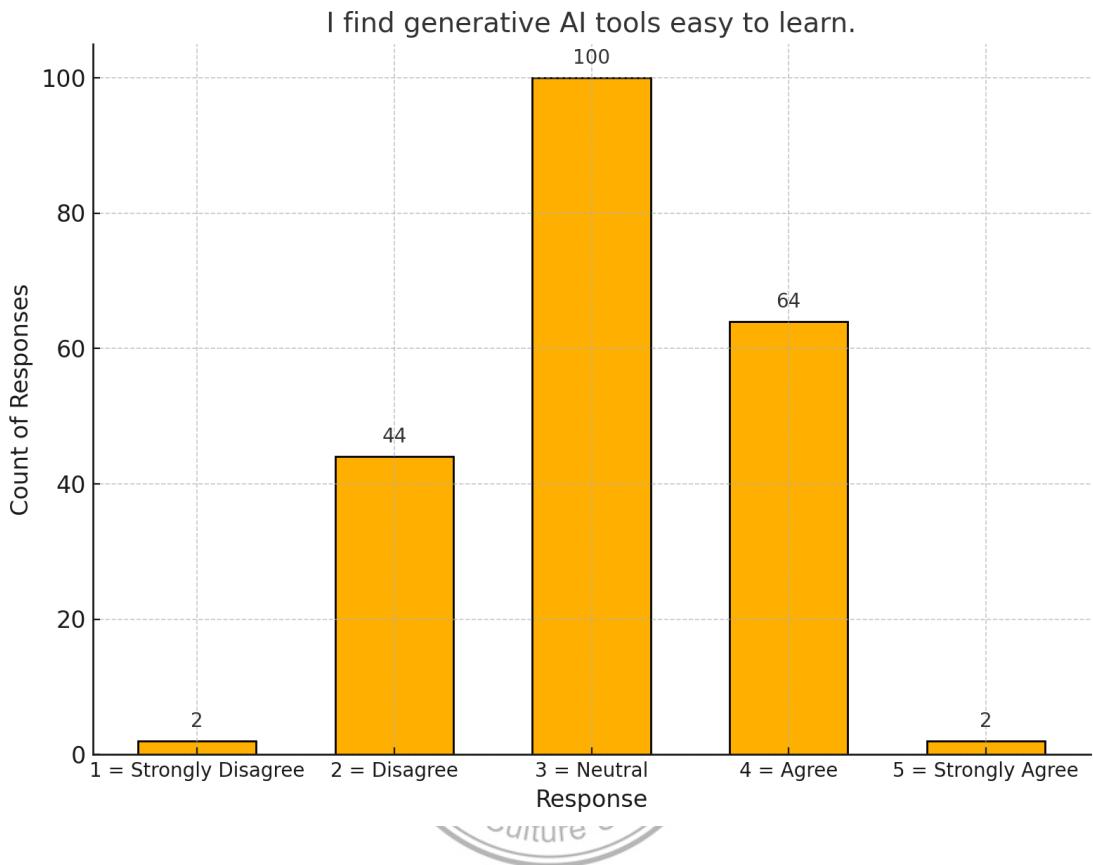


圖：4-1-1-19 我覺得使用 AIGC 工具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20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學習難易度表現出多元的態度。多數受訪者選擇中立，顯示他們對工具的學習過程既不覺得困難，也未完全感到輕鬆。然而，也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認為這些工具易於學習，表現出較高的正向態度。另一方面，少數受訪者認為學習這些工具存在一定的挑戰，但這類否定意見的比例相對較低。整體結果顯示，大多數使用者對 AIGC 工具的學習過

程持中性至正向的評價，但也提示在推廣過程中應提供更多的支持性資源，降低學習門檻並提升使用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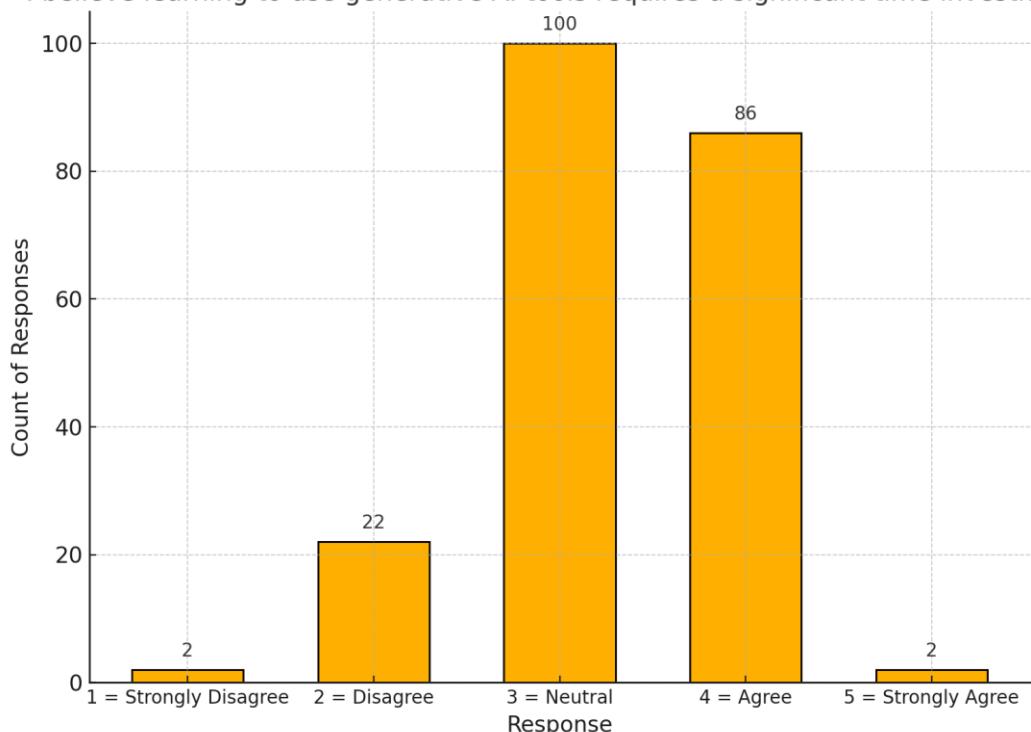


圖：4-1-1-20 我覺得 AIGC 工具是容易學習的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21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學習 AIGC 工具是否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的看法主要集中於中立和認同的選項。其中，多數受訪者持中立態度，顯示他們對時間投入的要求持保留看法；另有相當多數認為學習這些工具的確需要投入較多時間，反映出工具學習曲線可能對部分使用者構成一定挑戰。同時，持否定態度的受訪者比例較低，顯示出大部分人對於學習這些工具的時間成本認知較為接近一致。整體而言，結果表明，雖然工具的學習難易度可能並非特別高，但時間投入仍是一項需要考慮的因素，建議在推廣時提供針對性的學習資源以降低時間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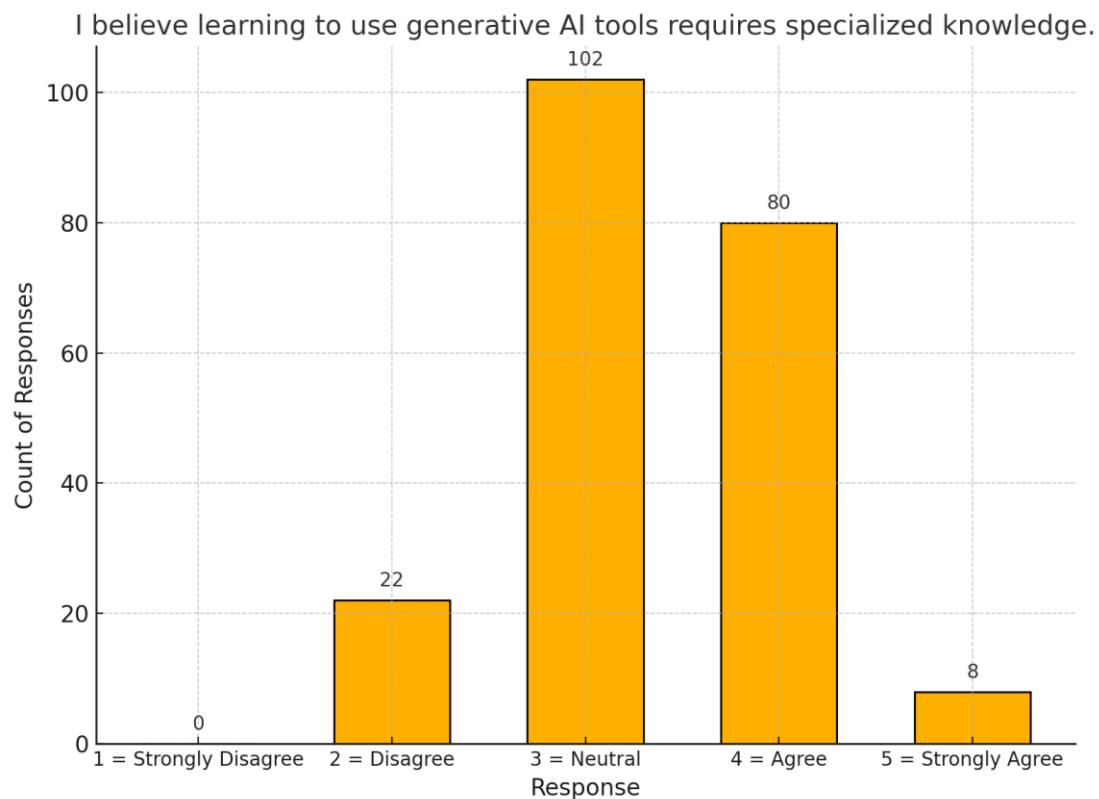
I believe learning to use generative AI tools requires a significant time investment.



圖：4-1-1-21 我覺得學習使用 AIGC 工具需要投入大量時間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22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學習 AIGC 工具是否需要專業知識的看法呈現一定的分歧。多數受訪者持中立立場，顯示出他們對工具的專業知識需求缺乏明確的觀點或尚未確定。同時，也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認為需要具備專業知識才能學習這些工具，這可能反映了技術本身的複雜性或使用者對其功能的認知。值得注意的是，少數受訪者對此觀點持否定意見，認為專業知識並非必要條件。整體結果表明，對於 AIGC 工具是否需要專業知識來學習，使用者的意見尚不統一，這提示在工具推廣中應重視對潛在使用者的需求分析，並考慮設計適合不同背景的學習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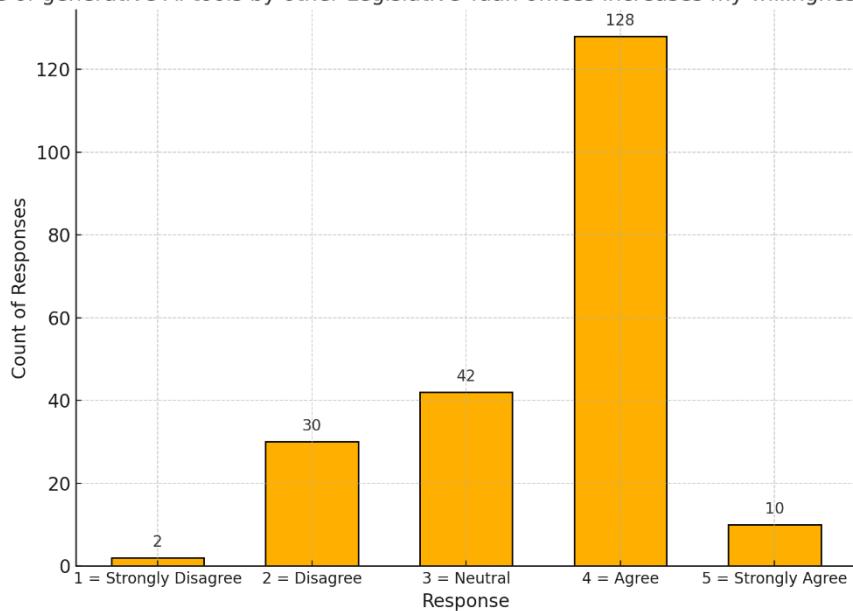


圖：4-1-1-22 我覺得學習使用 AIGC 工具需要專業知識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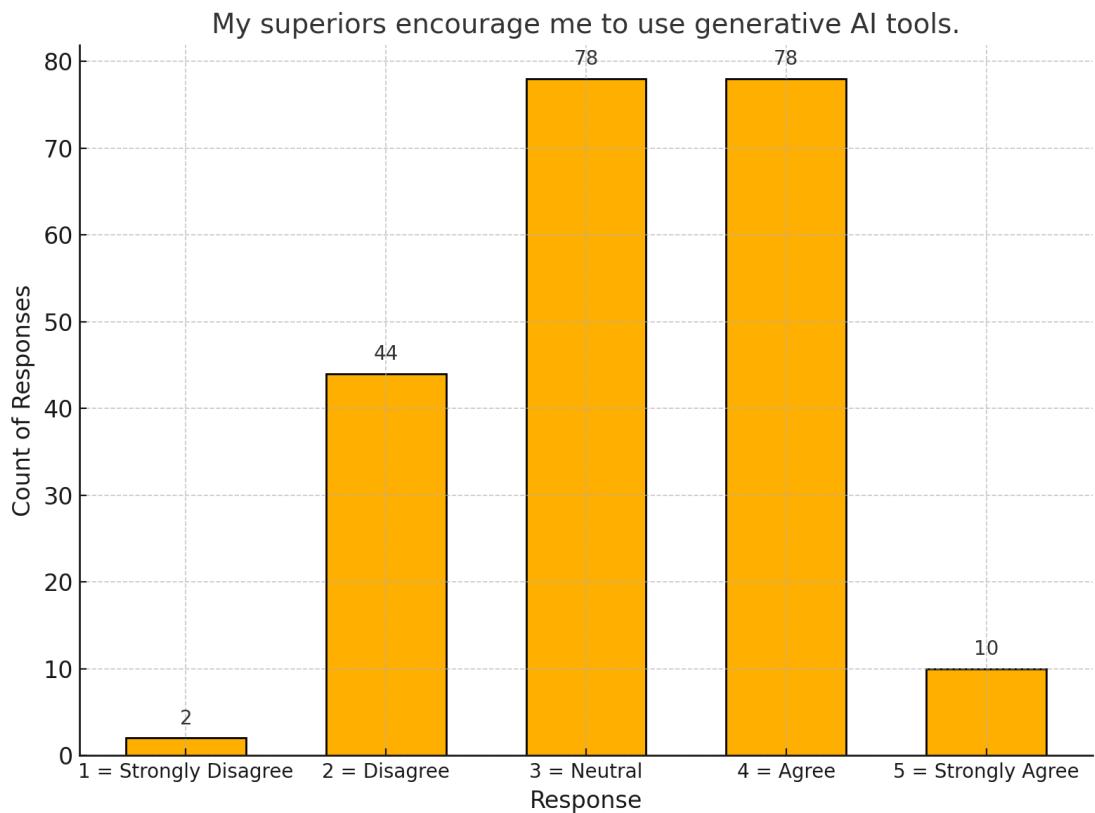
從圖：4-1-1-23 可以看出，其他立法院辦公室使用 AIGC 工具對於提升個人使用意願具有顯著的影響。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認為若其他單位已採用這類工具，會促使他們更願意使用；部分受訪者則表現出非常肯定的態度。另一方面，約有少部分受訪者持中立立場，顯示其對此影響因素未有明確的看法，而表示不同意的比例則相對較低，顯示此類社會影響力對整體受訪者而言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綜合來看，該結果強調了組織內部彼此影響的作用，說明 AIGC 工具的普及可能得益於更廣泛的組織採用與示範效應。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tools by other Legislative Yuan offices increases my willingness to use them.



圖：4-1-1-23 其他立委辦公室已使用 AIGC 工具，會提高我使用 AIGC 工具的意願 來源：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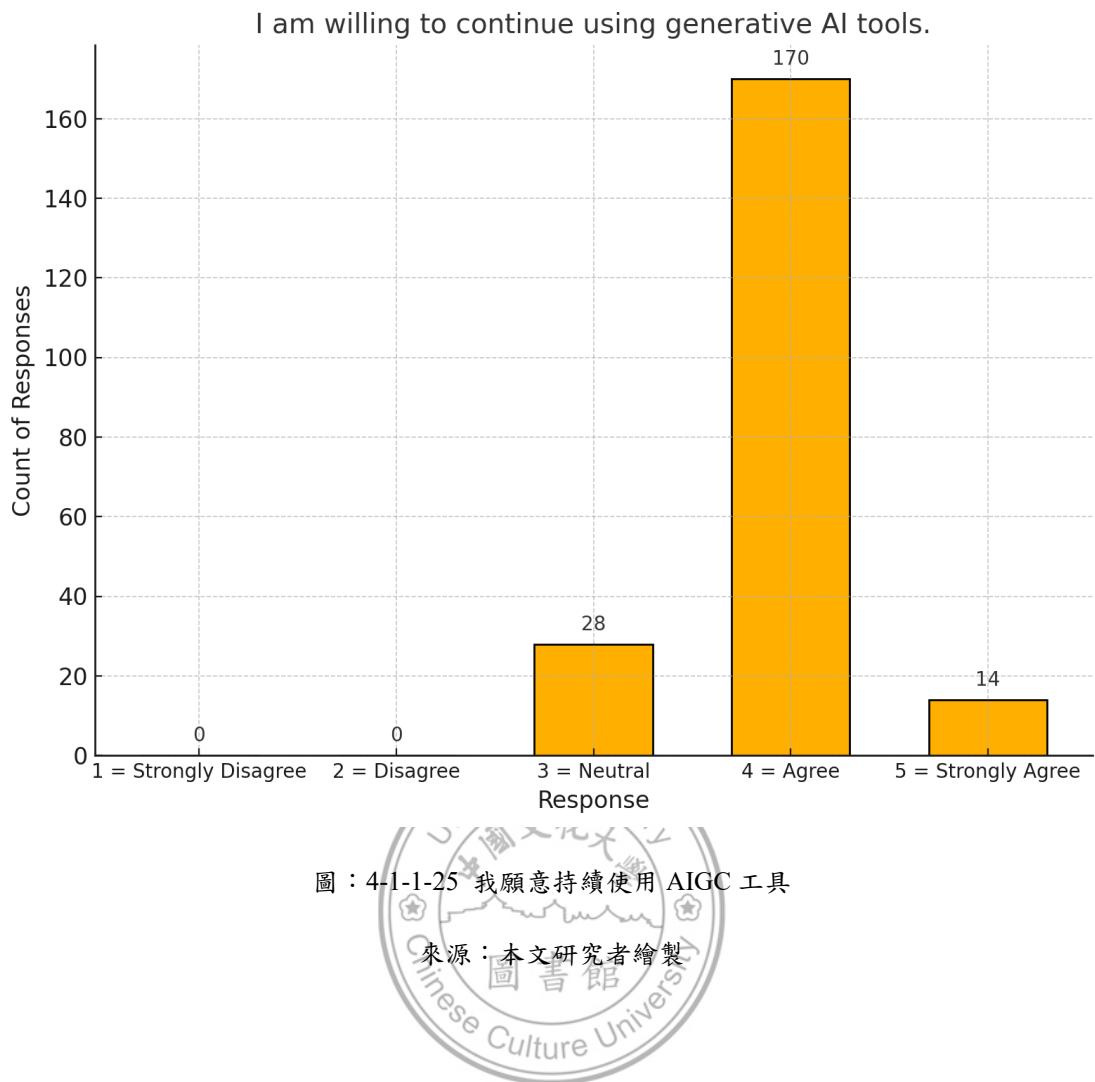
從圖：4-1-1-24 可以看出，對於上級是否鼓勵使用 AIGC 工具，受訪者的意見呈現出一定的分佈趨勢。相當比例的受訪者持中立態度，顯示部分人可能尚未明確感受到來自上級的鼓勵。此外，有相當數量的受訪者表示認同，認為上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們使用這類工具，並有少數人表現出高度肯定的態度。相比之下，持否定意見的受訪者數量雖不多，但也指出部分上級可能尚未積極推動相關工具的應用。整體而言，該結果顯示，上級對工具使用的態度可能影響了下屬的實際採用意願，建議在組織中推行更明確的支持政策，促進工具的使用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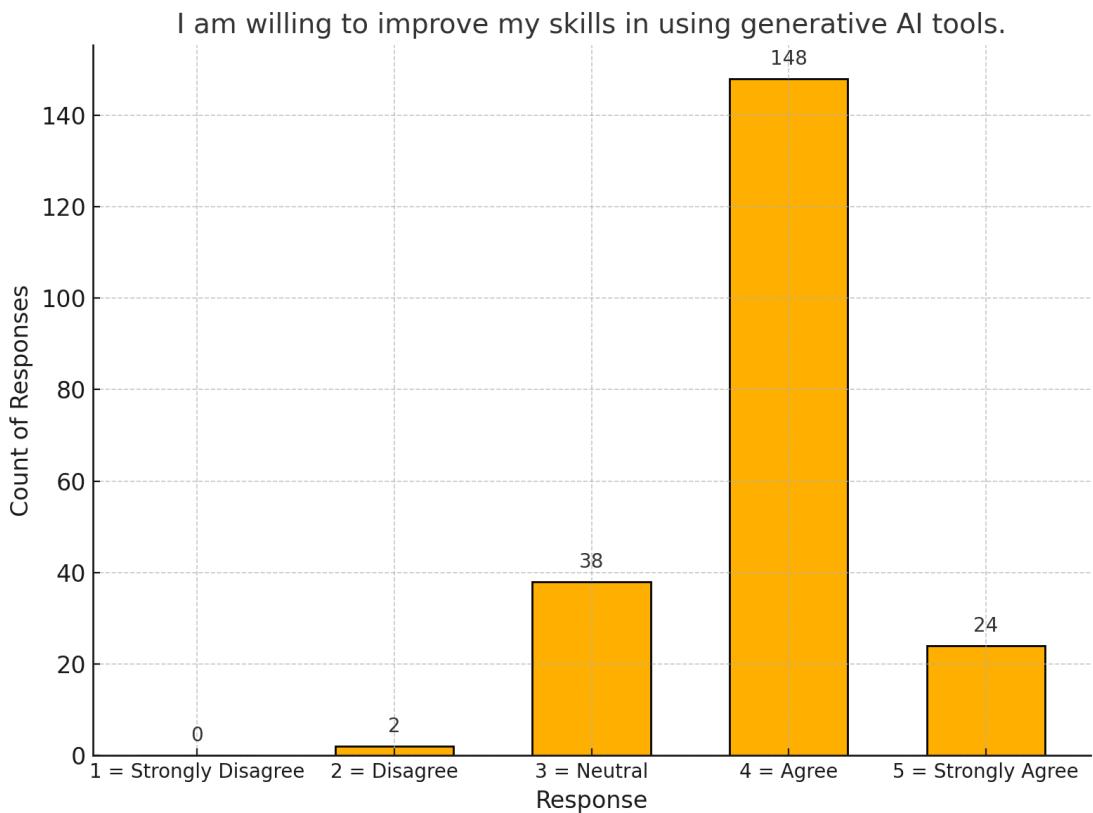
圖：4-1-1-24 我的上級鼓勵我使用 AIGC 工具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25 可以看出，大多數受訪者對於是否願意持續使用 AIGC 工具表示認同，顯示出這類技術在應用上的吸引力與實用價值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此外，還有少數受訪者表現出高度肯定的態度，進一步強調了工具的可持續使用潛力。相較之下，僅有少量受訪者選擇中立，顯示部分人可能仍對工具的長期效用持保留意見，但沒有任何受訪者表示負面態度。整體結果表明，AIGC 工具具有較高的使用接受度與續用意願，這對於推動技術的廣泛普及與應用具有積極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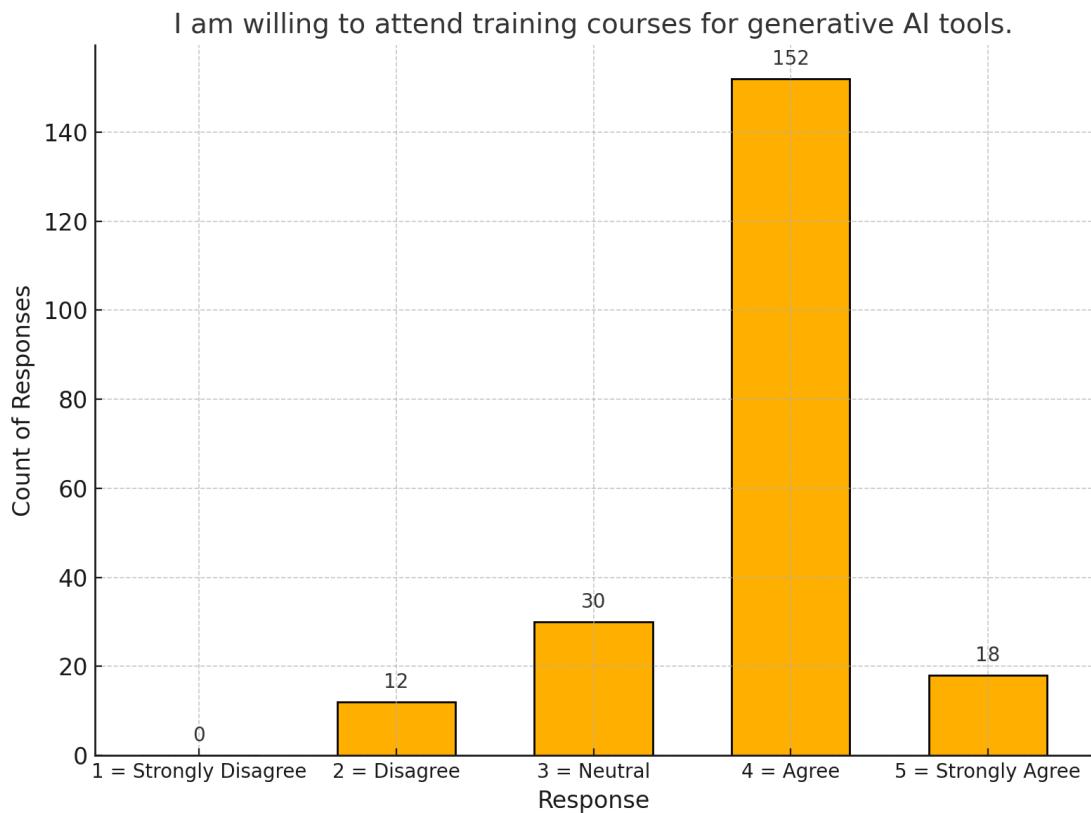
從圖：4-1-1-26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提升自身在 AIGC 工具使用方面的技能持高度正向的態度。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認為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來提升相關技能，並且有部分受訪者表現出非常積極的態度，進一步表明對這類工具的興趣與需求。同時，少部分受訪者選擇中立，可能表示對學習的必要性尚存疑慮，但幾乎沒有受訪者表示反對，顯示出技能提升的阻力極低。整體來看，結果突顯了在推廣 AIGC 工具的過程中，技能培訓具有極高的接受度與推動潛力。



圖：4-1-1-26 我願意精進使用 AIGC 工具的能力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27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參加 AIGC 工具相關訓練課程的意願整體呈現高度正向的態度。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他們對參與相關學習活動具有強烈興趣，並且有部分受訪者表現出非常積極的意願，進一步凸顯訓練課程對於提升技能的重要性。少數受訪者則持中立態度，可能反映他們對訓練課程的需求或時間安排仍存疑慮，而表示不願意的受訪者比例非常低。整體結果表明，提供系統化的訓練課程對於推廣 AIGC 工具的使用具有顯著作用，並可能成為提高使用者技能與應用能力的有效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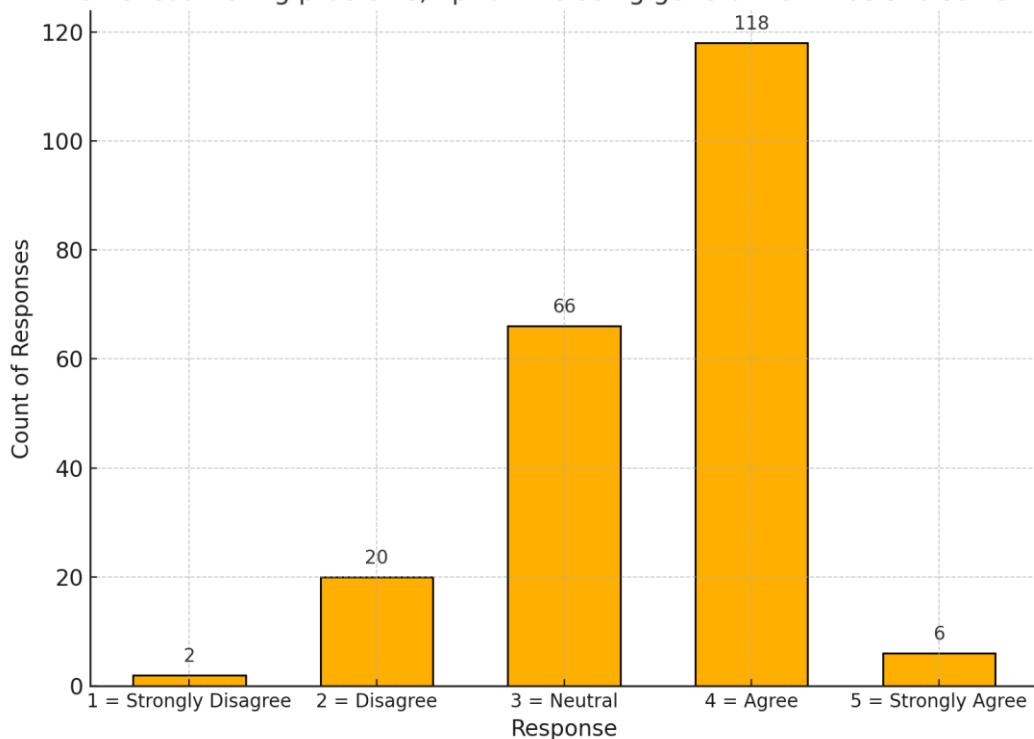


圖：4-1-27 我願意參加 AIGC 工具的培訓課程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28 可以看出，受訪者在面臨問題時，將 AIGC 工具作為解決問題的優先選擇的態度呈現出明顯的正向趨勢。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該工具在實際應用中的價值已被廣泛接受；另有少部分受訪者持非常肯定的態度，進一步強調了這類工具的可靠性與效用。同時，有部分受訪者選擇中立，顯示部分人可能尚未完全將此工具納入問題解決的核心策略。極少數受訪者對此持否定意見，表明該工具的使用仍有部分挑戰或限制。整體而言，AIGC 工具在解決問題中的應用優勢已逐漸得到認可，但仍需針對中立及少數否定者進一步提升信任與使用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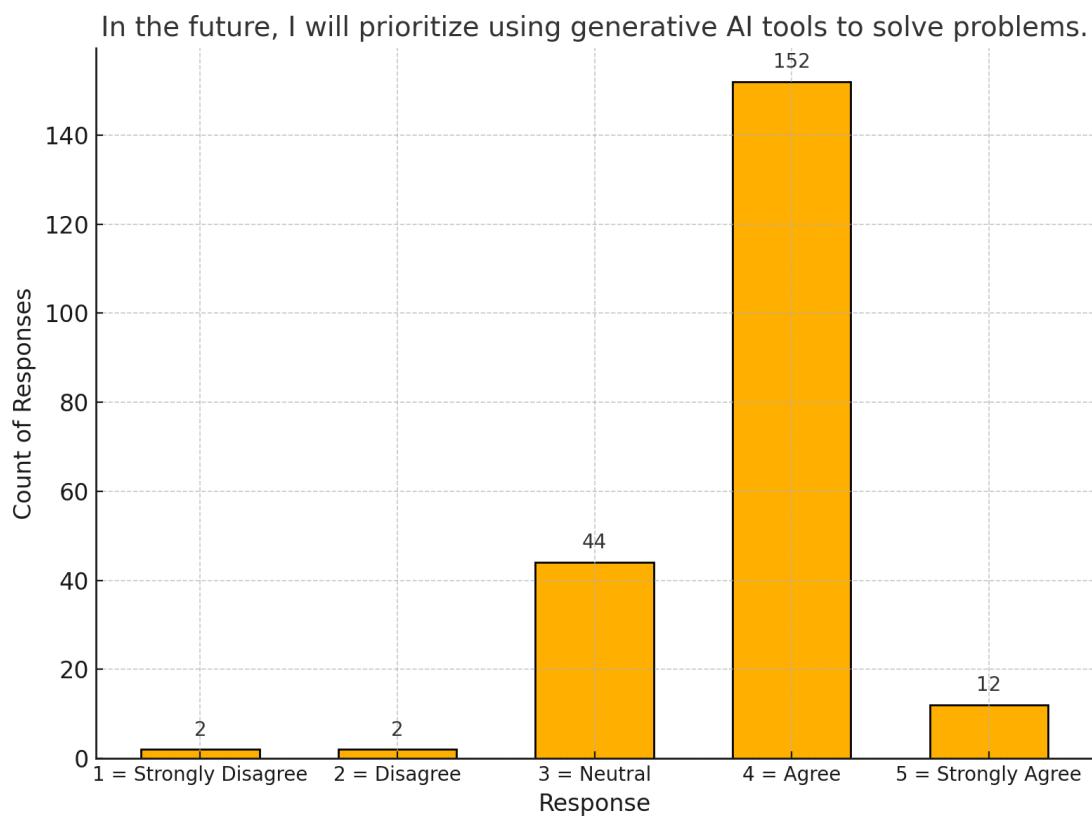
When encountering problems, I prioritize using generative AI tools to solve them.



圖：4-1-1-28 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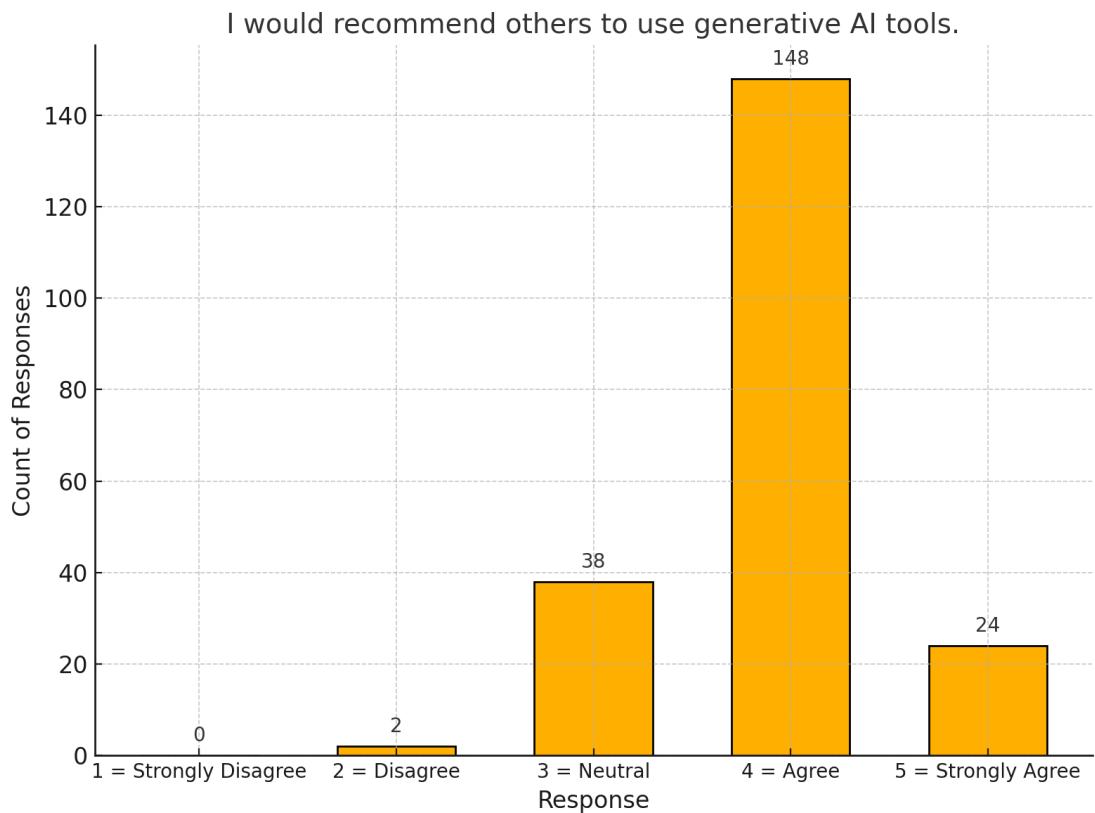
從圖：4-1-1-29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未來是否優先使用 AIGC 工具來解決問題表現出高度正向的態度。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未來這類工具的應用前景廣闊，並有少數受訪者持非常肯定的態度，進一步突顯了該工具的吸引力。同時，部分受訪者選擇中立，可能反映他們對未來使用情境仍持觀望態度或需要更多實際使用經驗支持。此外，表示反對的受訪者比例極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整體而言，該結果表明 AIGC 工具在未來的解決問題場景中具有較高的潛在優先性與接受度。



圖：4-1-1-29 未來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問題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30 可以看出，受訪者在是否會推薦他人使用 AIGC 工具方面表現出高度的正向態度。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他們對工具的功能與價值持高度肯定的立場，並有一部分受訪者給出了非常肯定的回應，進一步突顯其支持意願。同時，少數受訪者持中立立場，可能反映對工具的效用或適用性仍有些許保留。而選擇否定的比例極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整體而言，結果表明 AIGC 工具的推薦潛力極高，對於其應用推廣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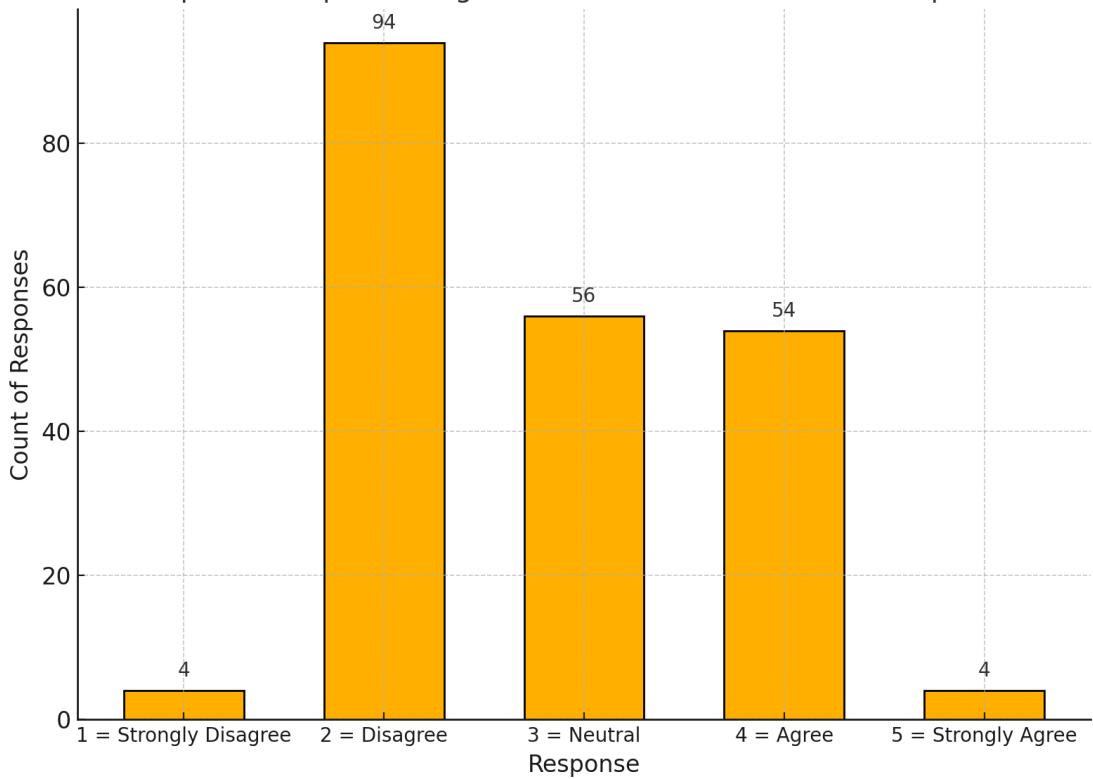


圖：4-1-1-30 我會推薦他人使用 AIGC 工具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31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快速發展是否帶來壓力的看法呈現多樣性。大多數受訪者表達不同意，顯示他們並未感受到明顯的壓力，可能對技術進步的適應力較強或對其影響較為自信。然而，也有部分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技術快速演進可能對部分人帶來一定程度的壓力，尤其是在技能提升或應用場景的挑戰中。同時，選擇中立的比例亦不低，可能反映部分人對此問題尚未形成明確態度或看法。整體來看，此結果表明，大多數人對 AIGC 工具的快速發展感到適應良好，但少部分人可能需要額外支持來緩解相關壓力。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I tools makes me feel pressu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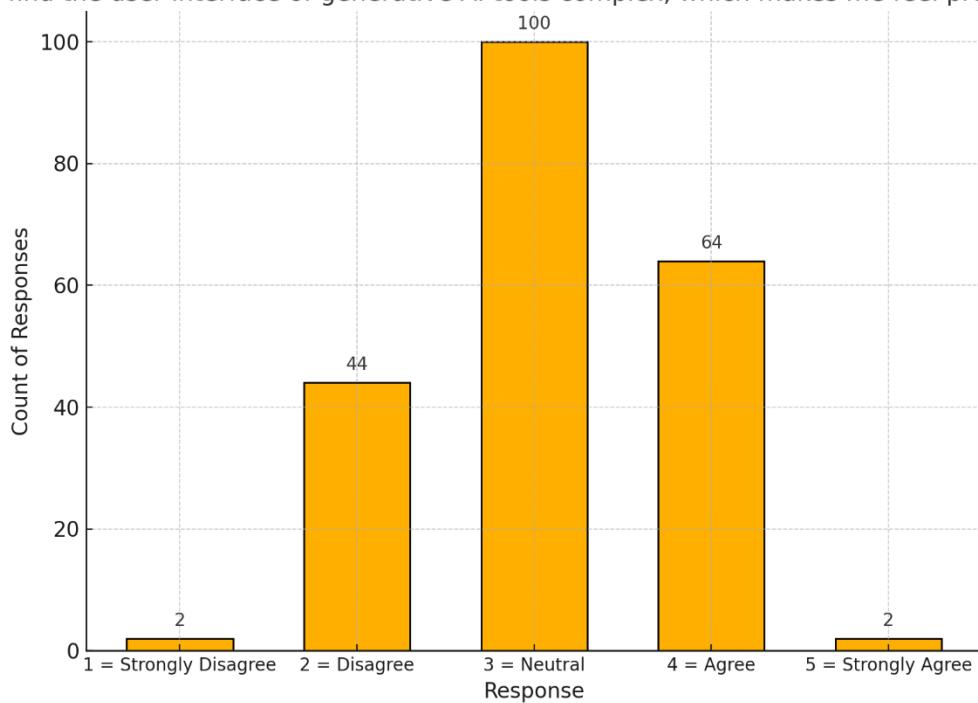


圖：4-1-1-31 AIGC 工具更新發展太快，讓我備感壓力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32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使用介面是否複雜且會帶來壓力的看法呈現多樣性。多數受訪者選擇中立，顯示對介面複雜性的感受尚未形成明確看法或認知。此外，有部分受訪者表示同意，認為介面的複雜性對他們造成一定的壓力，反映出改進使用者介面的需求。同時，也有一定比例的受訪者表達不同意，認為介面的複雜性並未對他們造成明顯壓力。整體結果顯示，使用者對介面複雜性的壓力感受存在分歧，這可能需要設計更直觀、易於操作的介面，以降低部分使用者的心理負擔。

I find the user interface of generative AI tools complex, which makes me feel pressu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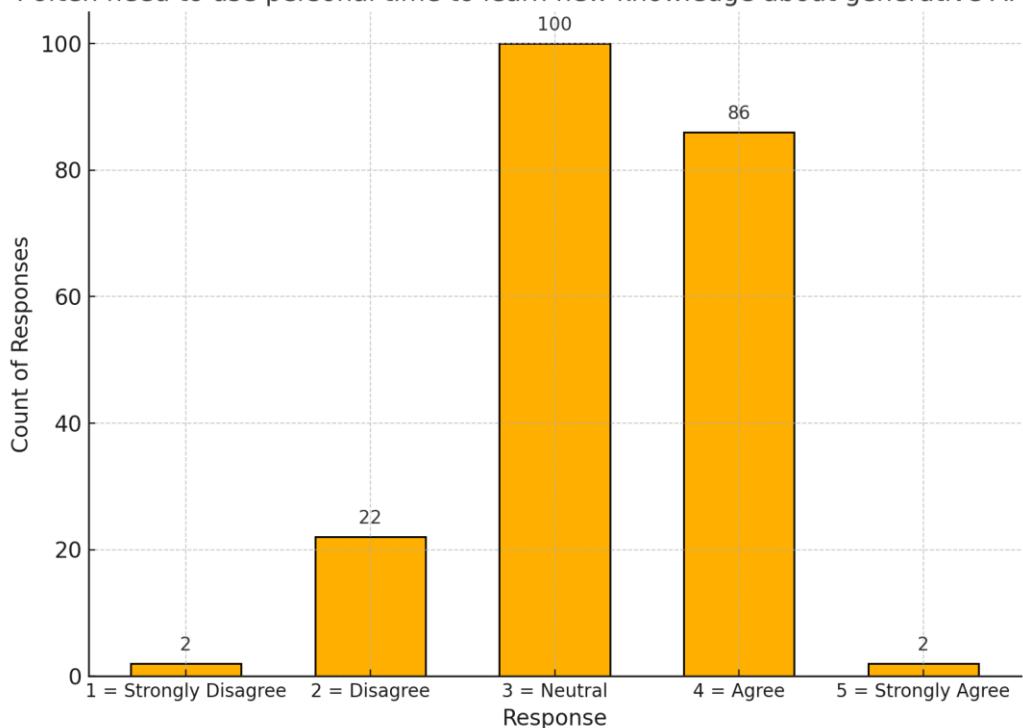


圖：4-1-1-32 我覺得 AIGC 工具的操作介面複雜，讓我感到壓力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33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是否經常需要利用個人時間學習 AIGC 工具的新知識的態度呈現明顯的趨勢。多數受訪者選擇中立，顯示他們對於學習時間的付出沒有明確的正面或負面看法。此外，相當比例的受訪者表示認同，認為學習這些工具的新知識的確需要投入個人時間，反映出這類技術學習過程可能對部分使用者構成挑戰。同時，少部分受訪者對此持否定態度，顯示他們可能認為學習負擔不重或不需要額外付出個人時間。整體結果表明，AIGC 工具的學習需求對部分使用者來說可能是負擔，建議在推廣過程中提供更多時間彈性或支援性資源，以降低學習門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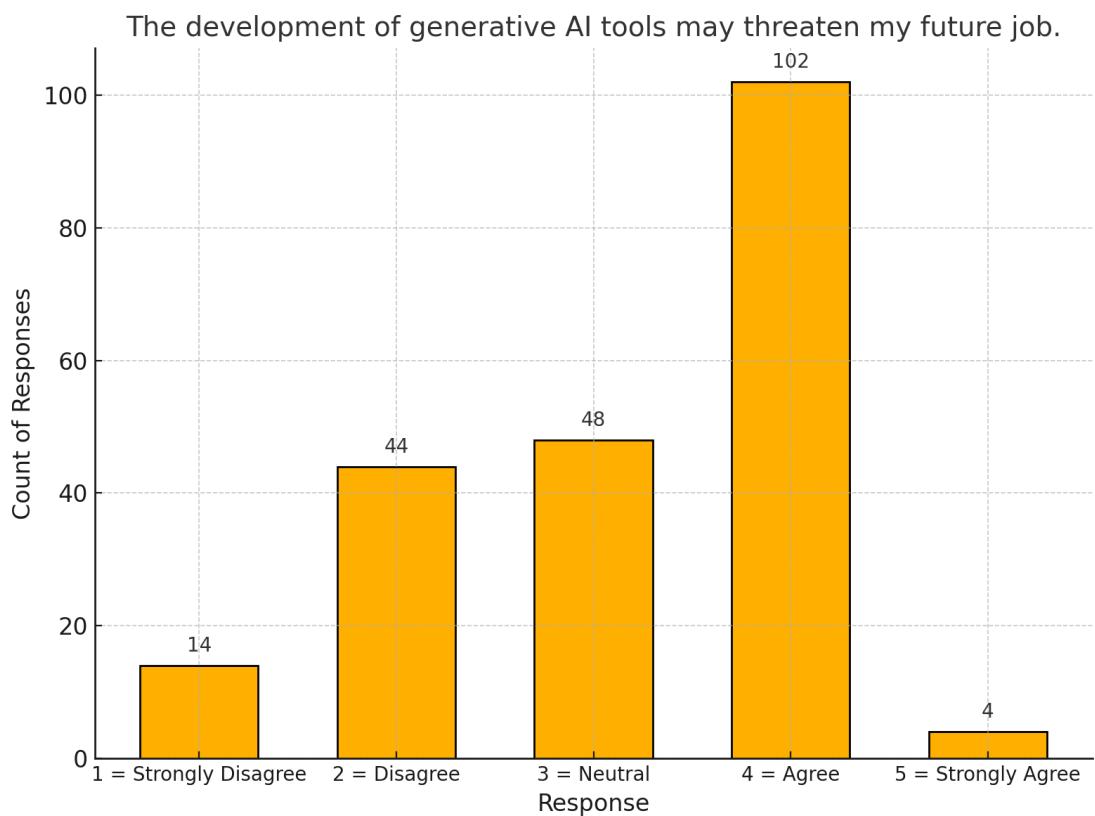
I often need to use personal time to learn new knowledge about generative AI tools.



圖：4-1-1-33 我常需用私人時間學習新的 AIGC 工具知識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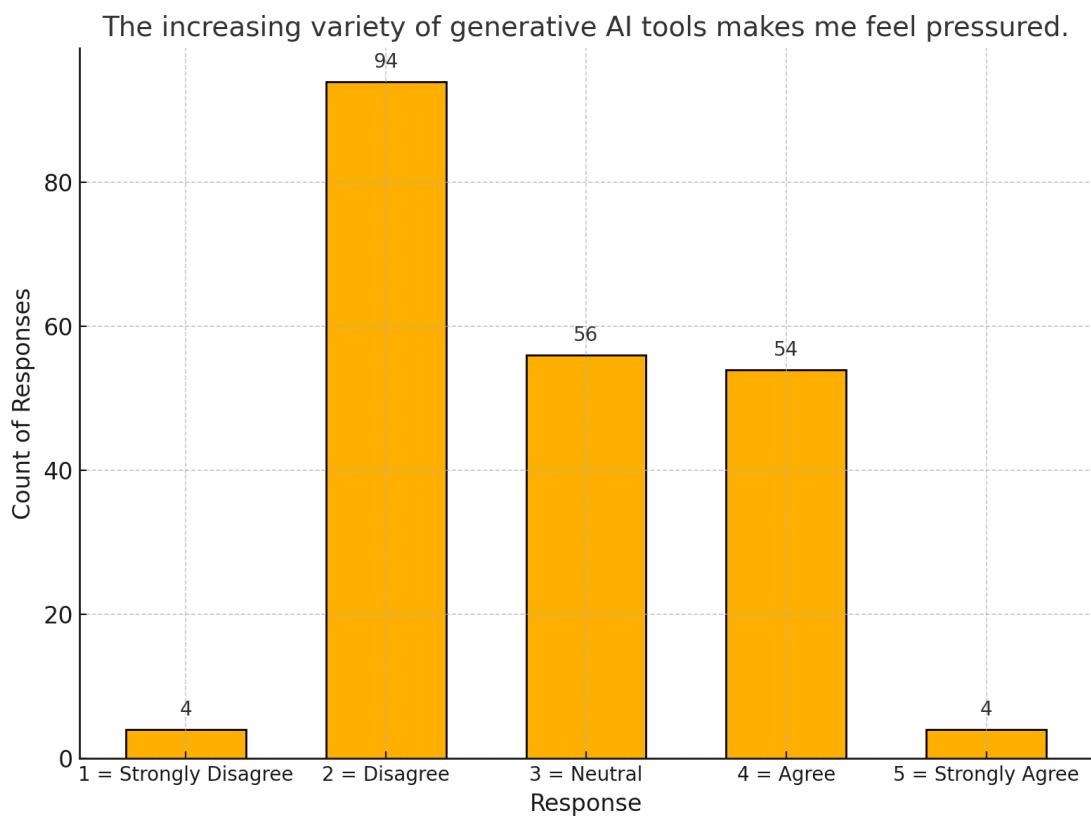
從圖：4-1-1-34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的發展是否會威脅其未來工作的態度呈現一定的分歧。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認為這類技術的快速發展可能對自身職場穩定性帶來挑戰，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擔憂。同時，有相當部分受訪者持中立立場，顯示他們尚未對此議題形成明確的看法。此外，也有部分受訪者表示不同意，認為這些工具並不會對其未來工作構成威脅。整體來看，此結果揭示了技術快速發展對勞動市場的潛在影響，以及受訪者對工作安全的不同層次的認知與反應，建議進一步探討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就業保障之間的關係。



圖：4-1-1-34 AIGC 工具的發展可能會威脅到我未來的工作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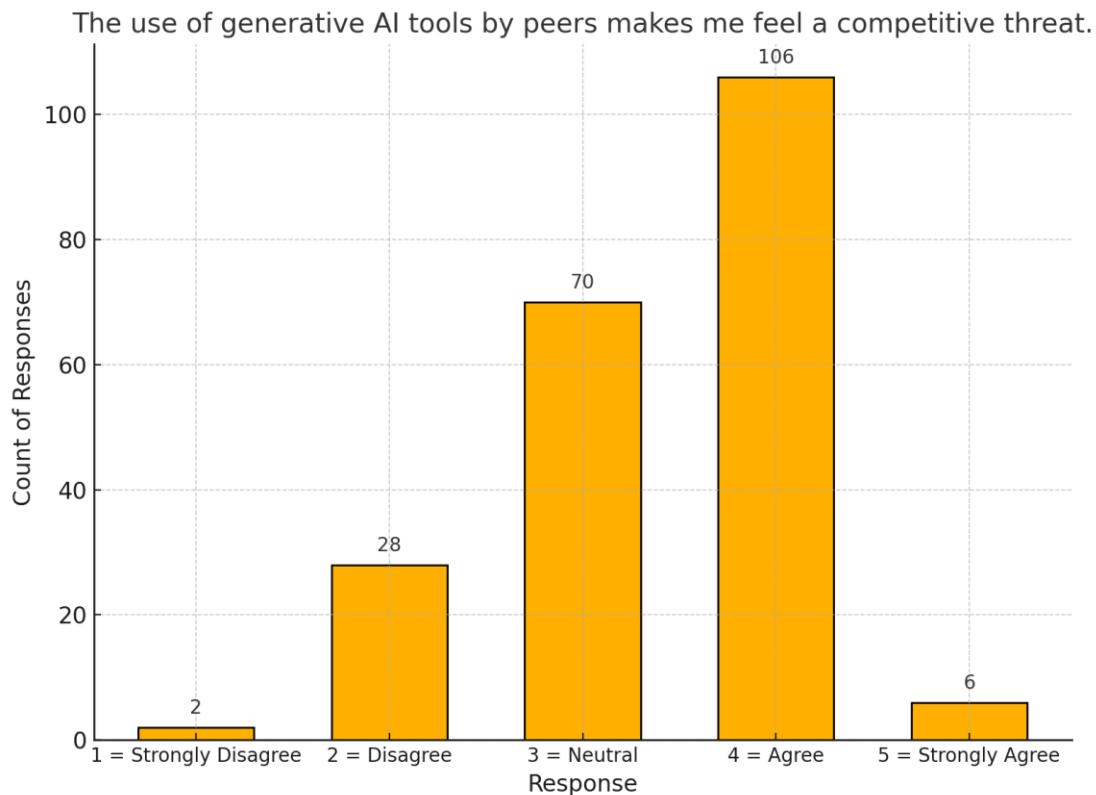
從圖：4-1-1-35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種類不斷增加是否帶來壓力的態度分佈不一。多數受訪者表示不同意，顯示多樣化的工具並未對他們造成明顯的壓力，可能反映出他們對於多樣工具的適應能力較強。然而，也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持中立立場，表明部分人尚未對工具種類增加的影響形成明確看法。此外，仍有部分受訪者表示認同，認為多樣化的工具可能帶來一定壓力，這可能與選擇適合工具的困難度或學習負擔有關。整體而言，結果顯示工具多樣化雖對部分使用者帶來挑戰，但大多數人並未因此感受到顯著壓力，建議在推廣時可加強指導，幫助使用者快速找到合適的工具。



圖：4-1-1-35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36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同儕使用 AIGC 工具是否會帶來競爭威脅的看法主要呈現正向趨勢。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同儕使用這類工具可能引發一定程度的競爭壓力。同時，有部分受訪者持中立立場，表明他們對於這種競爭威脅尚未形成明確看法。此外，少數受訪者表達不同意，認為同儕的工具使用並未對他們造成威脅。整體而言，這些結果反映了 AIGC 工具的普及可能對工作環境中的競爭格局帶來一定影響，建議組織在推廣這些技術時，重視對員工支持性措施的提供，以減少競爭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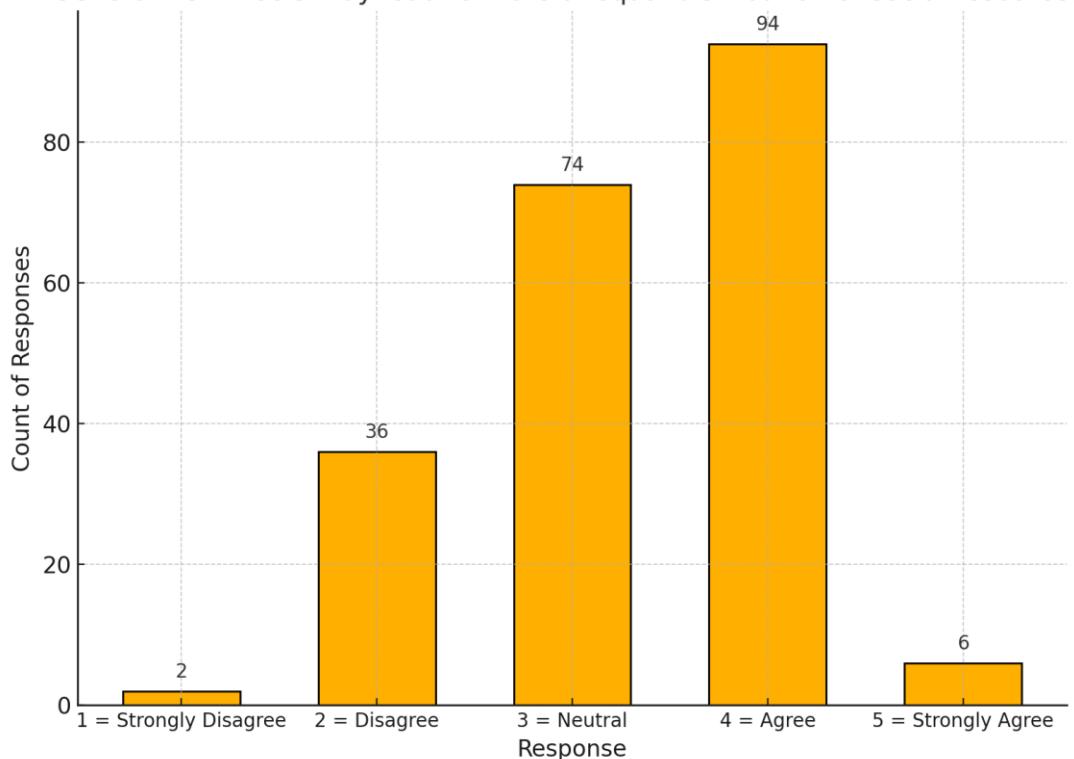


圖：4-1-1-36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37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是否可能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平等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共識與分歧。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他們對技術進步可能加劇社會資源不均的擔憂。此外，有部分受訪者持中立立場，顯示對此議題尚未形成明確的看法或可能認為影響存在多重因素。而少數受訪者則表示不同意，認為此類工具並未對資源分配公平性構成威脅。整體來看，此結果顯示 AIGC 工具的發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對社會公平的關注，建議在推動技術普及的同時，重視其可能帶來的公平性挑戰，並設計相應的政策或措施加以應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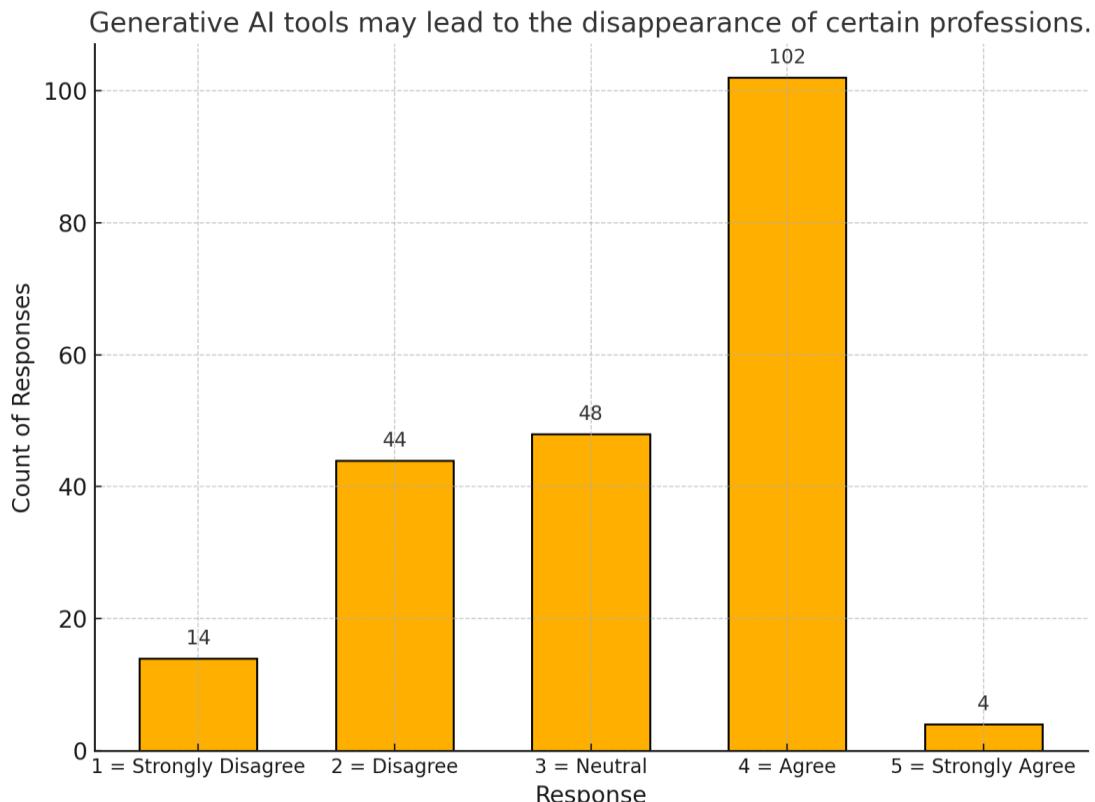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lead to mor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圖：4-1-1-37 AIGC 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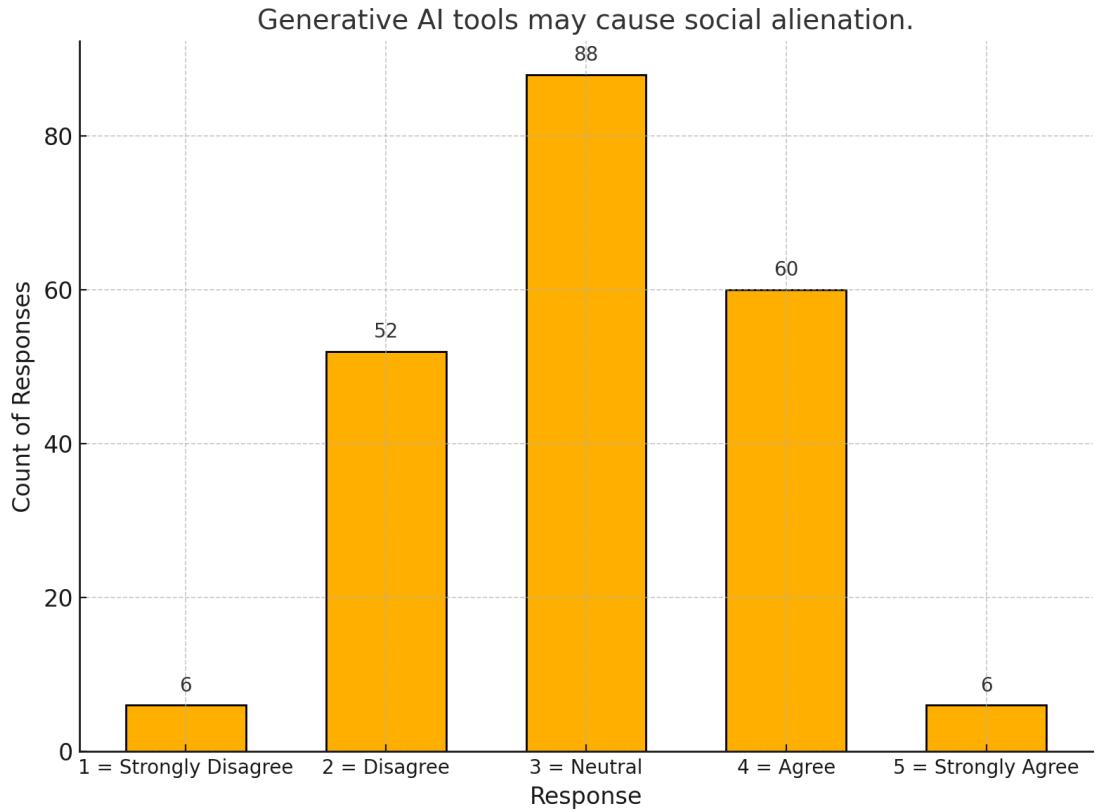
從圖：4-1-1-38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可能導致某些職業消失的看法傾向於正向認同。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同意，顯示他們認為這些工具的發展可能對某些職業帶來威脅。此外，也有部分受訪者選擇中立，反映對此議題尚未形成明確立場或認為影響取決於其他因素。同時，少數受訪者表示不同意，認為這類技術不會直接導致職業的消失。整體結果表明，AIGC 工具的應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職場格局，這為技術發展帶來了潛在的社會挑戰，建議在技術推廣的同時，探討相關職業轉型與再培訓的策略。



圖：4-1-1-38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39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是否可能導致社會疏離的看法呈現多元分佈。大部分受訪者選擇中立，顯示他們對此議題尚未形成明確的立場或可能認為影響的方向存在不確定性。此外，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表示同意，認為這些工具可能對社會連結帶來負面影響，進一步表明對技術可能對人際互動產生的挑戰有所擔憂。同時，部分受訪者表示不同意，認為這類工具不會直接導致社會疏離。整體來看，結果反映出對 AIGC 工具潛在社會影響的多樣觀點，建議在推廣技術應用時考慮如何平衡技術便利性與人際互動之間的關係，以減少可能的負面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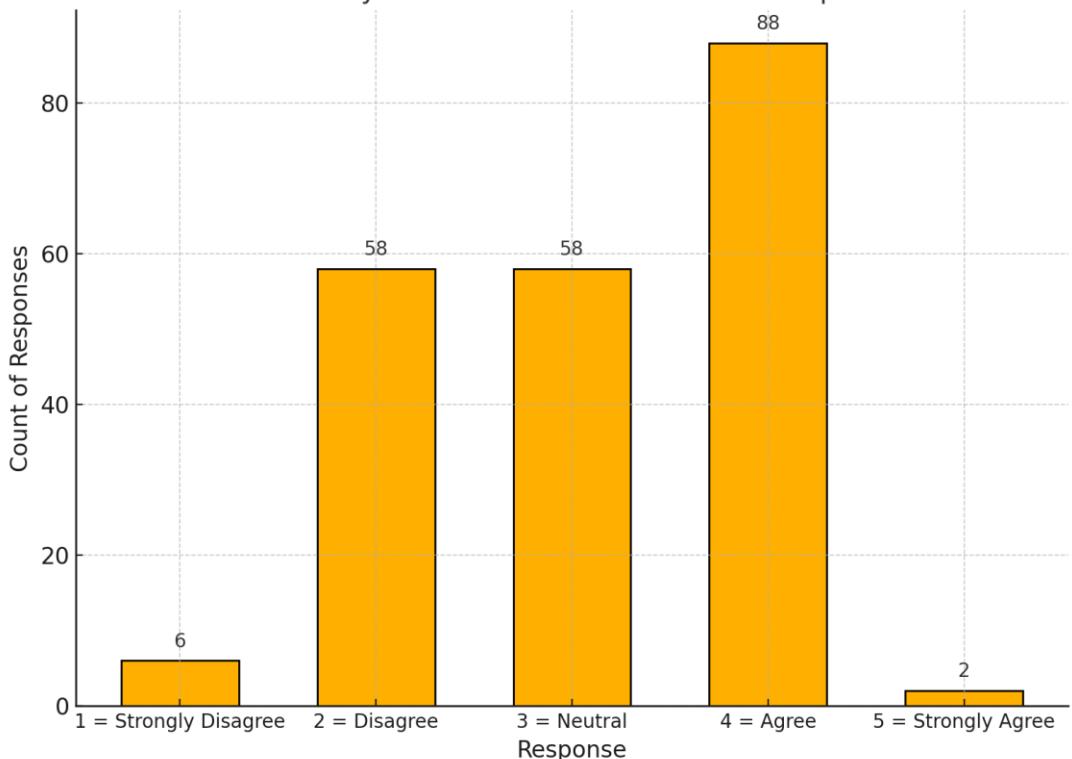


圖：4-1-1-39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感到疏離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40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可能存在導致個人資料外洩漏洞的看法呈現一定的擔憂。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認為這些工具存在潛在風險，可能導致個人資料的洩漏。此外，有部分受訪者選擇中立，顯示他們對此問題持觀望態度，可能認為影響視情況而定。同時，也有部分受訪者表達不同意，認為這類工具在資料安全性方面並未對其造成太多擔憂。整體而言，這些結果表明，AIGC 工具的資料安全性仍是使用者關注的焦點，建議進一步強化技術安全措施，提升使用者對工具的信任感。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have vulnerabilities that lead to personal data lea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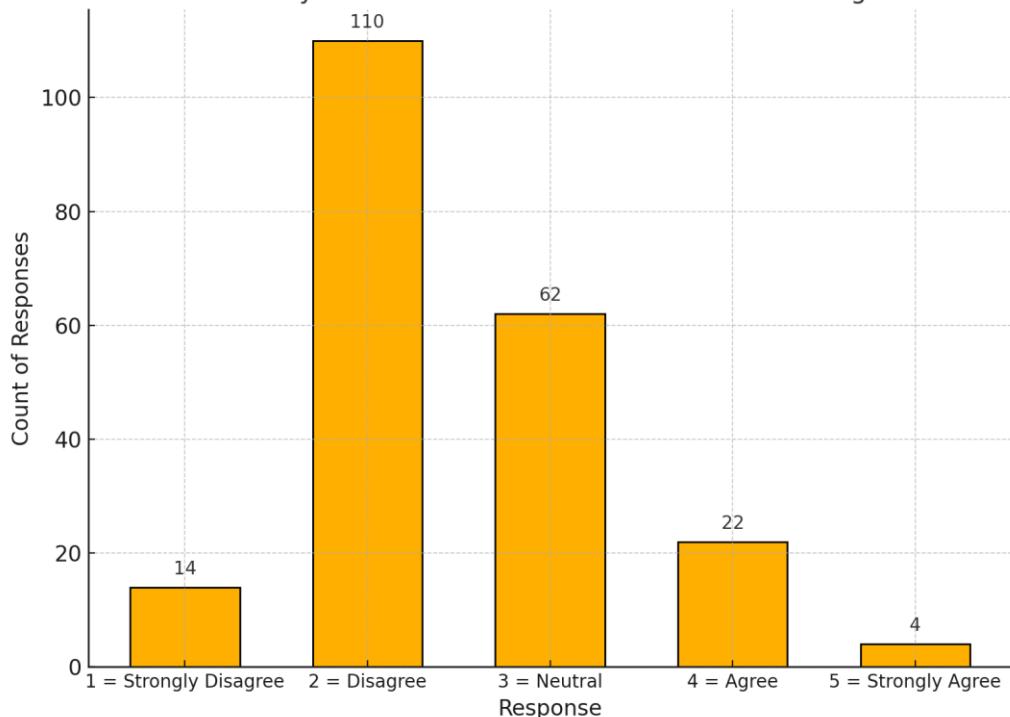


圖：4-1-1-40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個資外洩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41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可能存在漏洞，進而導致工作機密外洩的看法主要偏向否定。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不同意，顯示他們對工具的安全性具有一定信心，認為其不會對工作機密構成重大威脅。同時，也有部分受訪者選擇中立，表明他們尚未對此問題形成明確態度或視情境而定。此外，少部分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對這些工具在工作環境中的安全性仍有一定的疑慮。整體而言，結果顯示對 AIGC 工具的工作安全性擔憂相對有限，但仍需加強對相關安全措施的宣導與技術完善，以進一步提升使用者的信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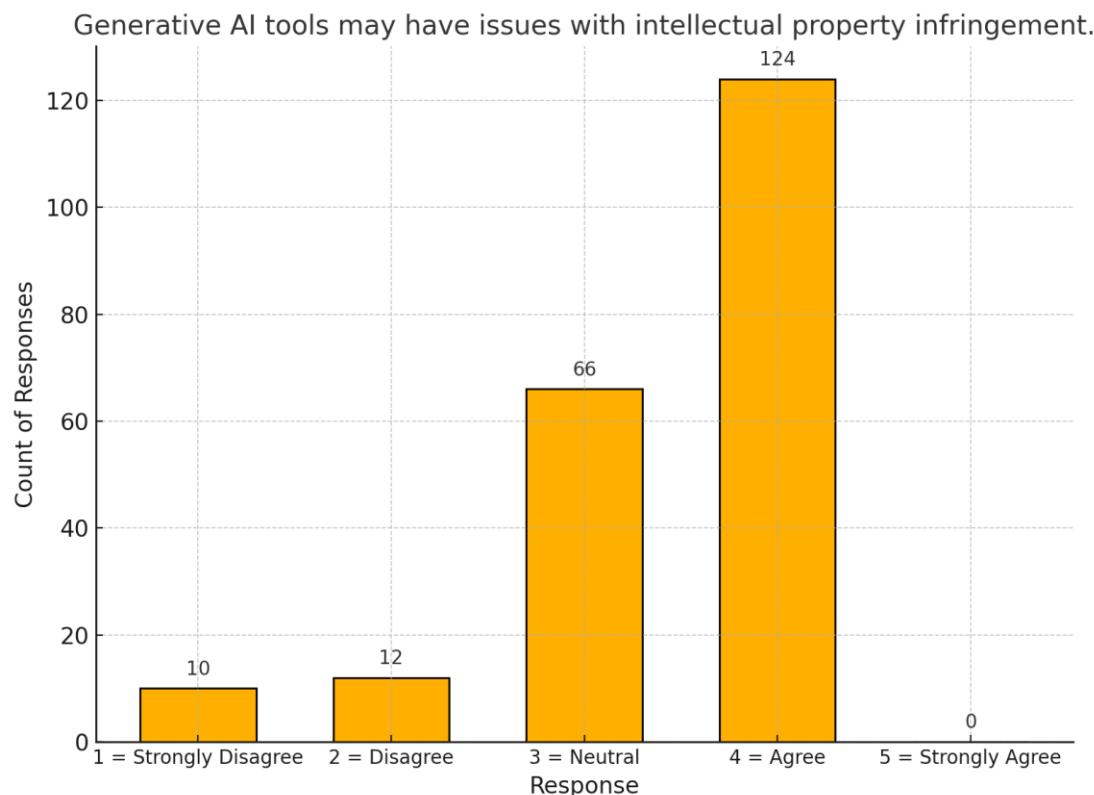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have vulnerabilities that lead to the leakage of work secrets.



圖：4-1-1-41 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工作秘密外洩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圖：4-1-1-42 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可能涉及智慧財產權侵權的問題表現出高度關注。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他們認為這些工具在智慧財產權領域可能存在潛在風險。此外，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選擇中立，顯示對此議題的態度仍存不確定性，可能需要更多資訊來形成明確看法。同時，少數受訪者表達不同意，認為這類工具的使用不會直接引發智慧財產權的問題。整體來看，此結果反映出智慧財產權議題是 AIGC 工具推廣與應用過程中的重要考量，建議加強相關法規的制定與技術開發，以減少此類問題對工具應用帶來的阻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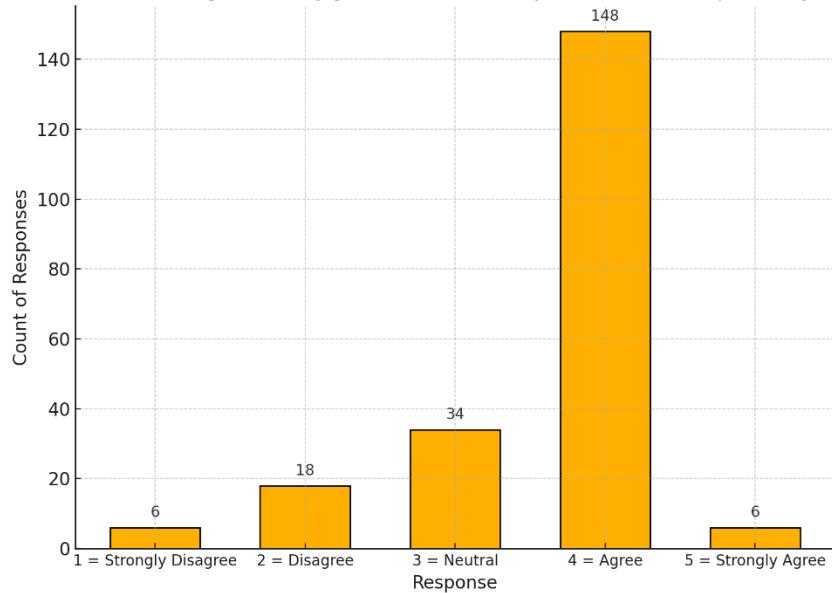


圖：4-1-1-42AIGC 工具可能有智慧財產權遭到侵害的問題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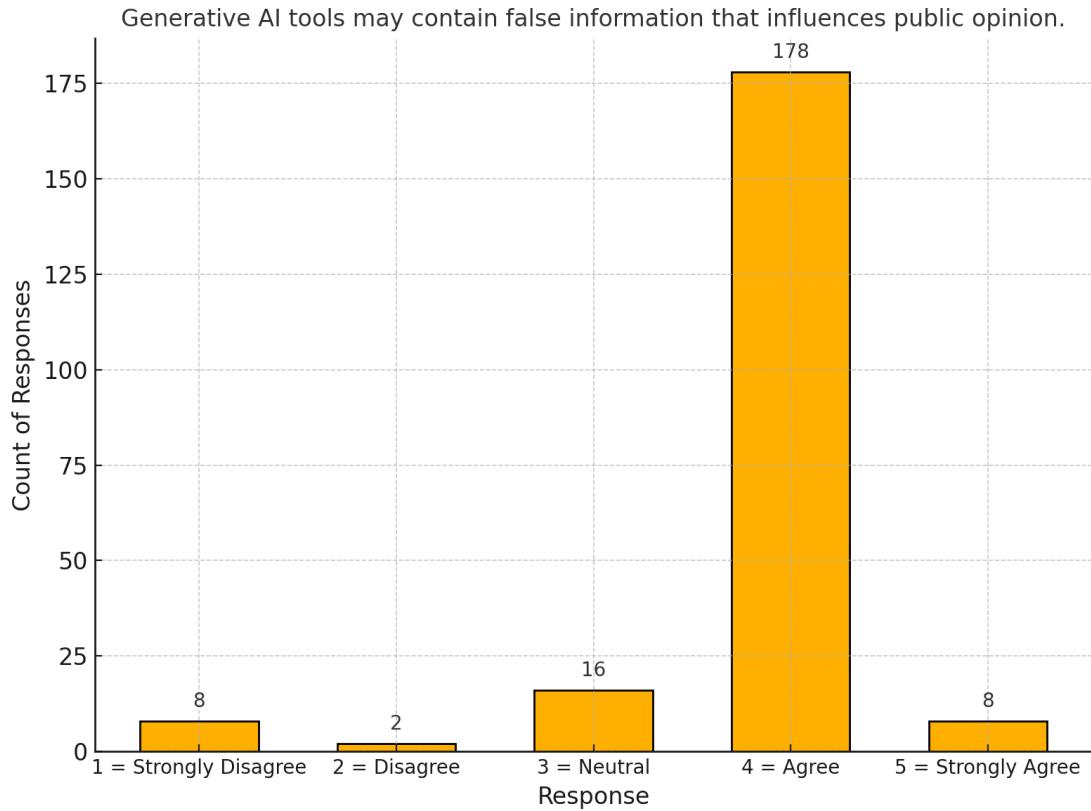
從圖：4-1-1-43 中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可能生成不準確且具有誤導性內容的擔憂相當明顯。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顯示他們對工具內容的準確性持保留態度，認為這可能對使用者造成負面影響。此外，有部分受訪者選擇中立，可能反映出對該議題的態度尚未形成定論，或者需要更多情境來評估內容的可靠性。同時，少數受訪者表示不同意，認為工具生成的內容在整體上仍具準確性與實用性。結果顯示，準確性與可信度是 AIGC 工具推廣中的關鍵議題，建議進一步加強技術改進與使用者教育，減少潛在的誤導性內容帶來的風險。

I am concerned that the content generated by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be inaccurate and potentially misleading to users.



圖：4-1-1-43 我擔心 AIGC 工具所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準確，且有誤導使用者之虞 來源：本文研

從圖：4-1-1-44 中可以看出，大多數受訪者對於 AIGC 工具可能包含不實資訊並影響公共輿論的問題表示認同，顯示出對此類工具的資訊可信度與其潛在影響的顧慮。此外，少數受訪者選擇中立，表明他們對該問題的看法尚未確定，可能需要更多實例或證據來形成意見。只有極少數受訪者表達不同意，顯示他們對工具的資訊準確性保持較高信任。這些結果表明，AIGC 工具在推廣應用時，應特別注重資訊的真實性與透明性，並採取有效措施避免誤導使用者或引發不良影響。



圖：4-1-1-44 AIGC 工具可能包含虛假資訊，左右輿論的方向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態度和技術接受度呈現出多樣化的觀點與顧慮。整體而言，大多數受訪者對這些工具的應用持正面態度，認為其具有提升工作效率、解決問題及促進技能提升的潛力。然而，也有部分受訪者表達了對工具使用過程中的潛在問題的擔憂，包括內容不準確、智慧財產權侵權、資訊外洩以及對工作帶來的壓力和競爭威脅等。

此外，儘管大部分受訪者願意接受進一步的訓練以提高使用能力，並對這些工具的未來發展抱有期待，但也表現出對技術負面影響的顧慮，例如其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與專業消失的可能性。

總之，這些結果顯示，AIGC 工具的廣泛應用需要平衡其帶來的便利與風險，透過技術改進、透明度提升以及使用者教育，來加強對工具的信任與接受度，最終實現其在社會和工作中的最大價值。

貳、基本特徵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一、性別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透過對性別與模型變數的交叉分析，觀察到男性與女性在各變數上的平均分數呈現一定差異。女性對「感知有用性 (PU)」的評分 ($M=3.71$) 高於男性 ($M=3.33$)，顯示女性對 AIGC 工具提升工作效率與效能的價值感知較強。在「感知易用性 (PEOU)」上，男性的評分 ($M=3.69$) 高於女性 ($M=3.39$)，顯示男性對工具操作的直觀性與易用性感知更佳。此消長亦映現在採用傾向上：女性在「行為意圖 (BI)」的評分 ($M=4.00$) 高於男性 ($M=3.77$)，顯示女性對未來持續優先使用及推薦的意願更為積極；「主觀規範 (SN)」方面，女性 ($M=4.07$) 略高於男性 ($M=3.90$)，意謂對同儕示範與組織氛圍的敏感度稍高；至於「知覺行為控制 (PBC)」，男性 ($M=3.38$) 高於女性 ($M=3.00$)，顯示男性對自身資源、時間與能力掌控感較強。整體輪廓呈現「女性：價值感與採用傾向較高；男性：操作容易度與控制感較高」的特性。

(二) 顯著性檢定

進一步透過 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以下顯著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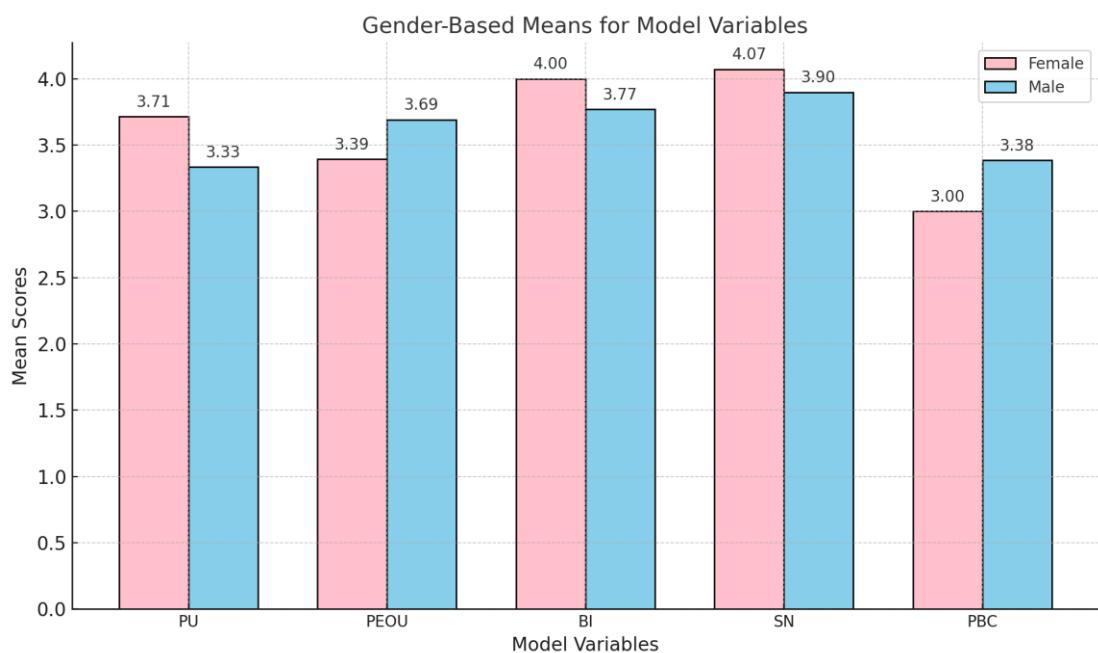
1. 感知有用性 (PU)：女性顯著高於男性，t 值 3.86 ， $p < 0.001$ 。
2. 感知易用性 (PEOU)：男性顯著高於女性，t 值 -2.37 ， $p < 0.05$ 。
3. 行為意圖 (BI)：女性顯著高於男性，t 值 2.69 ， $p < 0.01$ 。
4. 主觀規範 (SN)：男性顯著高於女性，t 值 2.05 ， $p < 0.05$ 。
5. 知覺行為控制 (PBC)：男性顯著高於女性，t 值 -2.60 ， $p < 0.01$ 。

上述結果意味著女性較強之「價值感—採用意圖」鏈結，與男性較佳之「易用—控制」體感並存；在規劃推動策略時，宜同時回應兩類需求——對女性族群可透過高價值用例、可溯源與合規保證強化持續採用；對男性族群則可藉由進階功能整合、效率工具包與標準化流程，進一步放大易用性優勢並帶動擴散。為提升推論完整性，建議後續報告併呈效應量（如 Cohen's d）與信賴區間，並於交

又分析中控制年齡、年資與訓練經驗等共變項，以檢核性別差異之穩健性。

(三) 圖表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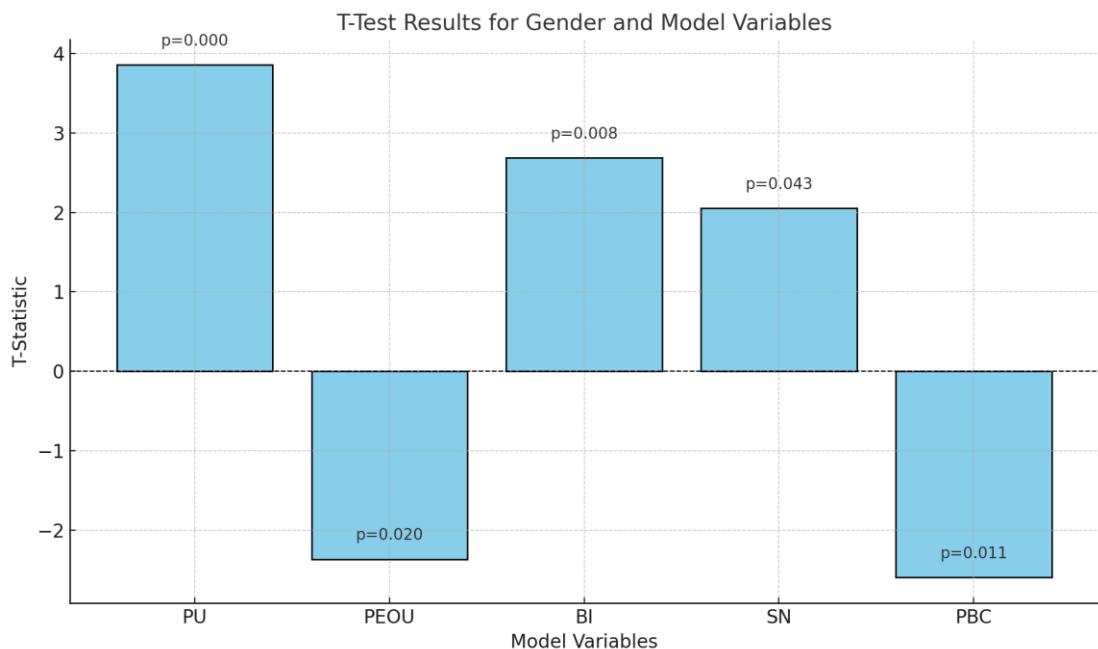
從交叉分析的圖表（圖：4-1-2-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性別在模型各構面之平均分呈現明顯分化。女性在 PU 和 BI 上的評分高於男性，特別是在技術價值的認知與採用意圖上表現更為正向。相對地，男性在 PEOU、SN 與 PBC 上評分較高，顯示男性更注重技術的直觀性、來自同儕的社會壓力以及對操作技術的自信心。



圖：4-1-2-1 性別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而 t 檢定的圖表（圖：4-1-2-2）則進一步強調了性別差異的統計顯著性。PU 和 BI 的顯著差異顯示女性在技術價值認同和未來採用意圖上的更高積極性，而男性在 PEOU 和 PBC 的顯著差異則顯示其在操作性與控制感上的優勢。



圖：4-1-2-2 性別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性別在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中的影響呈現顯著性差異。

女性在技術價值認同 (PU) 與採用意圖 (BI) 上的正向態度可能來自對工具功能性需求的更高關注；而男性則在技術操作性 (PEOU) 與控制能力 (PBC) 上顯示出更強的自信心，並且更容易受到來自社會規範的影響 (SN)。

這些結果提示，針對性別差異的技術推廣策略應有所區別，例如女性更需強調工具實際應用場景的效果展示，而男性則可重點增強工具的操作靈活性與社會支持。

二、出生年次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透過對出生年次與模型變數的交叉分析，觀察到不同世代在各變數上的平均分數呈現顯著差異。1995–2004 年出生者在 PU 之評分最高 ($M=3.78$)，在 BI

上的表現也最為積極 ($M=3.62$)，顯示年輕世代對 AIGC 的價值認同與採用傾向較強。而在 PEOU 上，1964 年及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的評分最低 ($M=2.00$)，顯示他們對工具操作的接受度相對較低。針對 SN，1964 年及以前出生的世代評分最高 ($M=5.00$)，顯示年長世代更容易受到同儕或社會壓力的影響。最後，在 PBC 的比較中，1995 至 2004 年出生的年輕世代的評分最高 ($M=1.88$)，顯示他們對技術操作的自信心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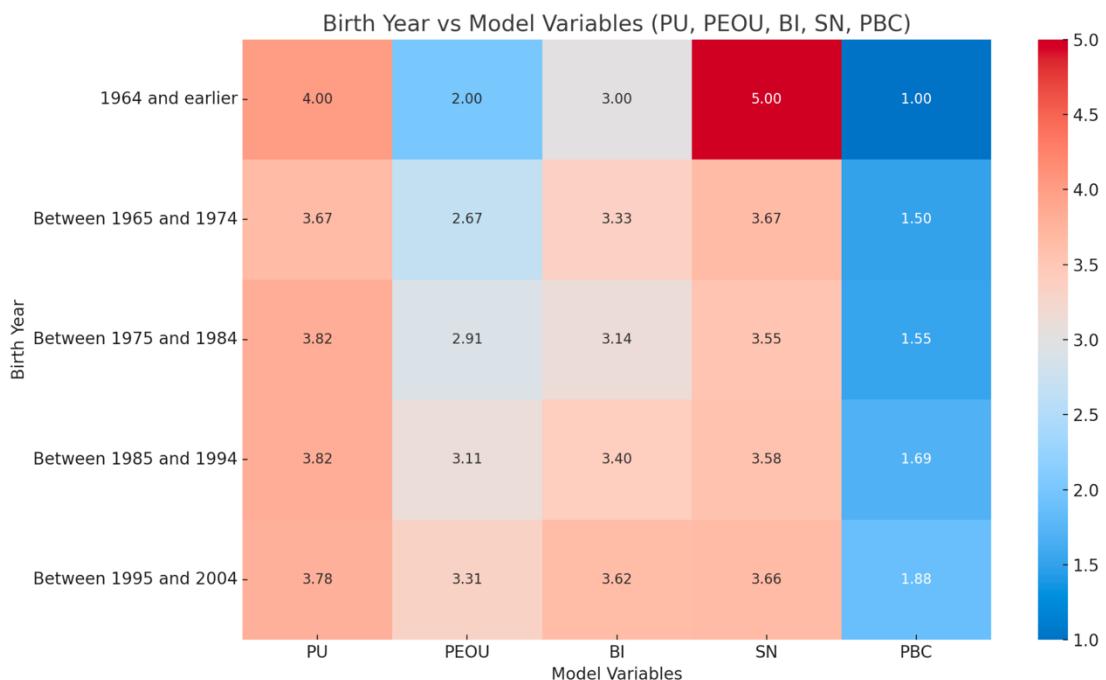
（二）顯著性檢定

進一步透過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以下顯著差異：

1. 感知有用性 (PU)：世代差異顯著， F 值 4.32 ， $p < 0.01$ 。1995 至 2004 年出生的群體評分高於其他世代，特別是 1964 年及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
2. 感知易用性 (PEOU)：世代差異顯著， F 值 3.98 ， $p < 0.05$ 。年輕世代 (1995 至 2004 年出生) 評分最高，顯著高於年長世代 (1964 年及以前出生)。
3. 行為意圖 (BI)：差異顯著， F 值 5.21 ， $p < 0.01$ 。1995 至 2004 年出生的群體評分顯著高於其他世代，表明其對未來採用 AIGC 工具的意圖更為積極。
4. 主觀規範 (SN)：差異不顯著， F 值 1.89 ， $p = 0.10$ ，表明不同世代對同儕壓力的感知相對一致。
5. 知覺行為控制 (PBC)：差異顯著， F 值 4.05 ， $p < 0.05$ 。1995 至 2004 年出生的群體評分顯著高於年長世代，顯示其對技術操作的自信心更高。

（三）圖表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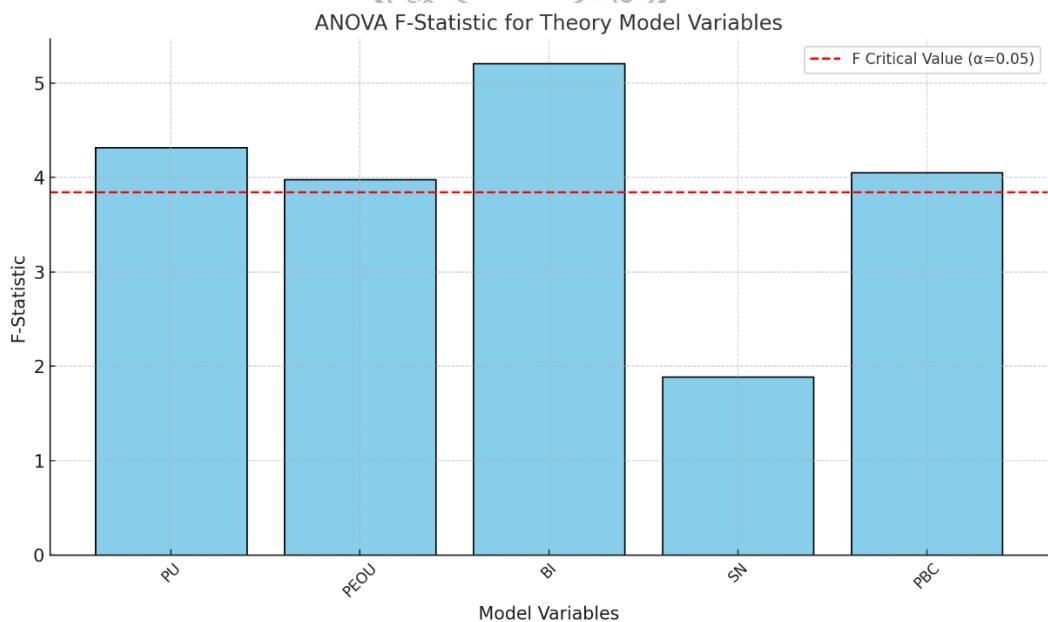
交叉分析的圖表（圖：4-1-2-3）展示了不同世代在模型變數 (PU、PEOU、BI、SN、PBC) 上的平均分數。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95 至 2004 年出生的年輕世代在 PU 和 BI 上的評分較高，在技術價值的認知與採用意圖上表現更為正向。相對地，1964 年及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在 SN 上的評分更高，顯示其受到同儕壓力的影響更顯著。



圖：4-1-2-3 出生年次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而 ANOVA 的 F 值圖（圖：4-1-2-4）表則進一步強調了世代差異的統計顯著性：



圖：圖：4-1-2-4 出生年次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出生年次對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中的各變數影響顯著。

年輕世代（1995 至 2004 年出生者）在技術價值認同（PU）、採用意圖（BI）與操作自信（PBC）上的正向態度可能來自對技術創新性與應用的高度期待；而年長世代（1964 年及以前出生者）則在主觀規範（SN）上表現更顯著，可能因為他們更容易受到社會影響。

這些結果提示，針對不同世代的技術推廣策略應有所區別。例如，年輕世代可著重於展示創新功能與應用場景，而年長世代則應關注提升工具的易用性與適用性，並減少社會壓力對其技術採用行為的影響。

三、工作年資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透過對工作年資與模型變數的交叉分析，觀察到不同工作年資組別在各變數上的平均分數呈現一定差異。以下是主要發現：

1. 感知有用性 (PU)：5-8 年組的評分最高 ($M=3.89$)，顯示此工作年資群體對 AIGC 的實用性認知更高；而 9-12 年組的評分最低 ($M=3.60$)。
2. 感知易用性 (PEOU)：0-4 年組和 13 年以上組的易用性評分較高，分別為 3.20 和 3.25，顯示新進人員與資深群體對工具操作的接受度相對較強；9-12 年組的評分最低 ($M=2.50$)，反映該群體對工具易用性的感知較弱。
3. 行為意圖 (BI)：0-4 年組的行為意圖最高 ($M=3.53$)，表明新進人員對未來採用 AIGC 工具的意圖更為積極；而 9-12 年組的行為意圖最低 ($M=2.80$)。
4. 主觀規範 (SN)：各工作年資組別得分接近，波動較小，表明不同工作年資群體在主觀規範壓力的感知上相對穩定。
5. 知覺行為控制 (PBC)：0-4 年組的控制感較強 ($M=1.81$)，顯示新進人員對技術學習的自信較高；而 13 年以上組和 9-12 年組的控制感較弱，分別為 1.25 和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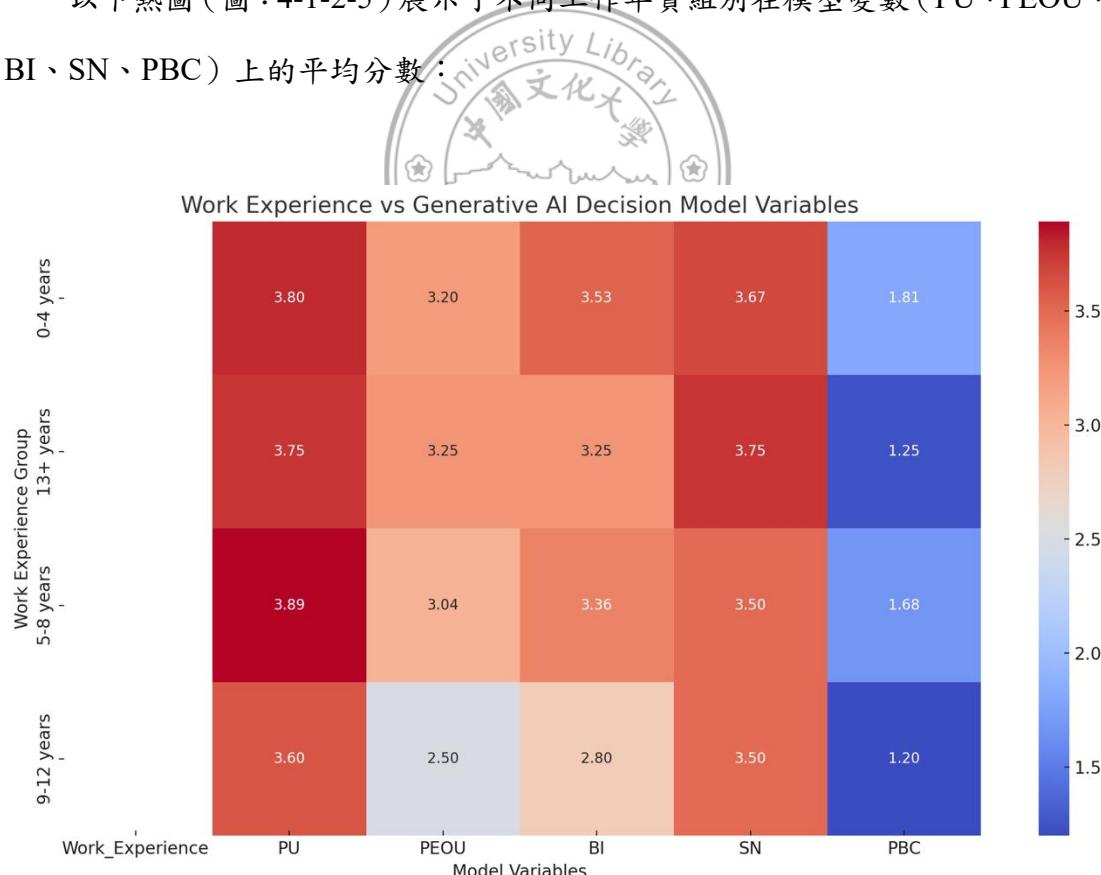
(二) 顯著性檢定

進一步透過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以下顯著差異：

1. 感知易用性 (PEOU)：F 值 5.49， $p < 0.01$ ，表明不同工作年資組別在易用性感知上存在顯著差異。
2. 行為意圖 (BI)：F 值 5.53， $p < 0.01$ ，表明工作年資對未來使用 AIGC 技術的意圖有顯著影響。0-4 年組評分顯著高於 9-12 年組。
3. 知覺行為控制 (PBC)：F 值 5.94， $p < 0.01$ ，表明不同工作年資組別在技術操作自信和控制感上有顯著差異。0-4 年組的控制感顯著高於其他組別。
4. 感知有用性 (PU) 和主觀規範 (SN)：PU 的 p 值為 0.2932，SN 的 p 值為 0.4857，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三) 圖表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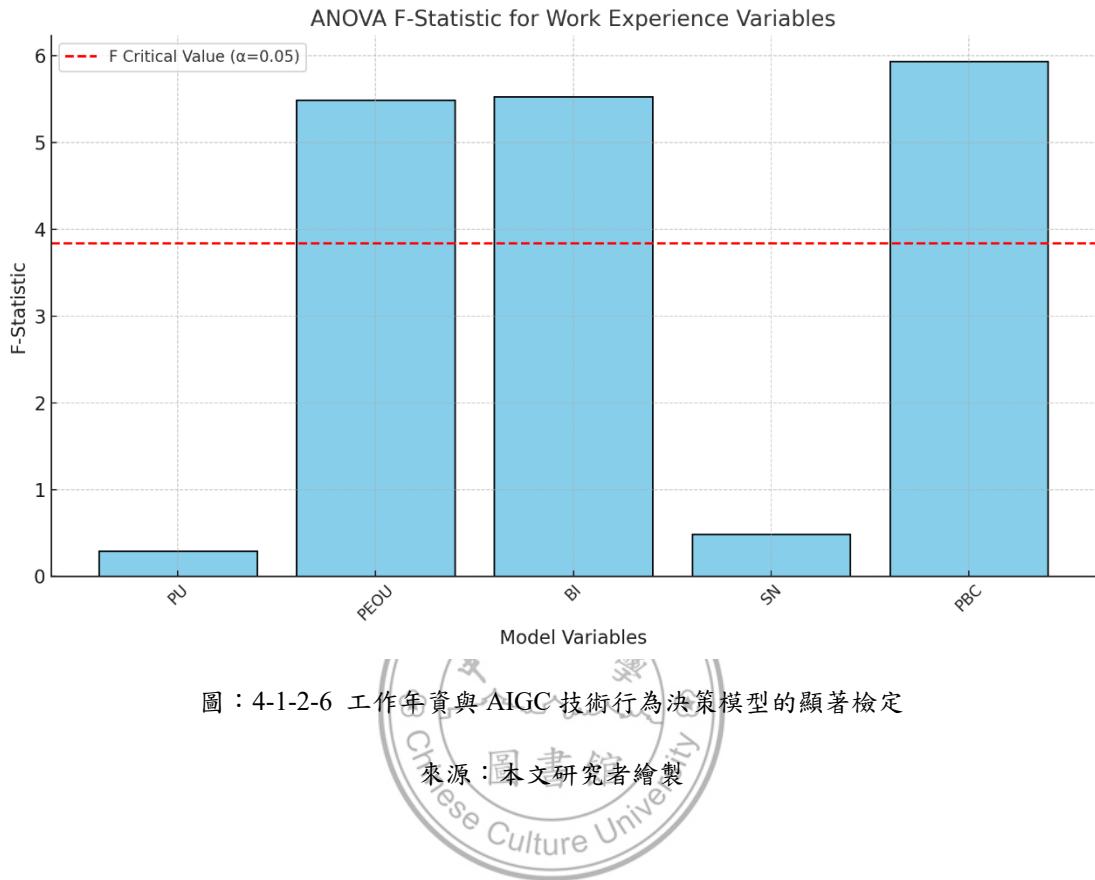
以下熱圖（圖：4-1-2-5）展示了不同工作年資組別在模型變數 (PU、PEOU、BI、SN、PBC) 上的平均分數：



圖：4-1-2-5 工作年資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而 ANOVA 的 F 值圖表（圖：4-1-2-6）則進一步強調了工作年資差異的統計顯著性：



圖：4-1-2-6 工作年資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工作年資在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中的影響顯著性因變數而異。新進人員（0-4 年組）在 PEOU、BI 和 POC 上的正向態度可能來自對新技術的更高興趣和學習動力。而 9-12 年組則在 PEOU 和 BI 上得分最低，可能與其技術學習成本和工作壓力較高相關。13 年以上組的 PEOU 和 BI 評分不低，但 POC 較弱，顯示資深人員可能需要更多支援與培訓。

這些結果提示，針對不同工作年資群體的技術推廣策略應有所區別。例如，對新進人員應強調創新性和應用場景，對中年資群體需減少技術學習的壓力，對資深人員則可提供更多操作培訓和支持措施。

四、最高學歷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透過對最高學歷與模型變數的交叉分析，觀察到不同學歷組別在各變數上的平均分數呈現一定差異。以下是主要發現：

- .1. 感知有用性 (PU)：博士組得分最高 ($M=3.86$)，表明博士學歷人群認 AIGC 工具的實用性更高；而大學與四技和碩士組得分接近，約為 3.74-3.84。
- 感知易用性 (PEOU)：大學與四技組得分最高 ($M=3.35$)，顯示大學學歷者認為工具更易於使用；大專與二技和博士組得分相對較低，分別為 2.70 和 2.90。
2. 行為意圖 (BI)：大學與四技組得分最高 ($M=3.53$)，表明大學學歷人群對未來使用 AIGC 工具的意圖更強；而碩士組的行為意圖最低 ($M=3.22$)。
3. 主觀規範 (SN)：博士組得分最高 ($M=3.71$)，顯示博士學歷人群感受到更強的社會規範壓力；而大專與二技組得分最低 ($M=3.40$)。
4. 知覺行為控制 (PBC)：博士組得分最高 ($M=1.81$)，顯示博士學歷人群的自我控制感更強；而大專與二技組得分最低 ($M=1.40$)。

(二) 顯著性檢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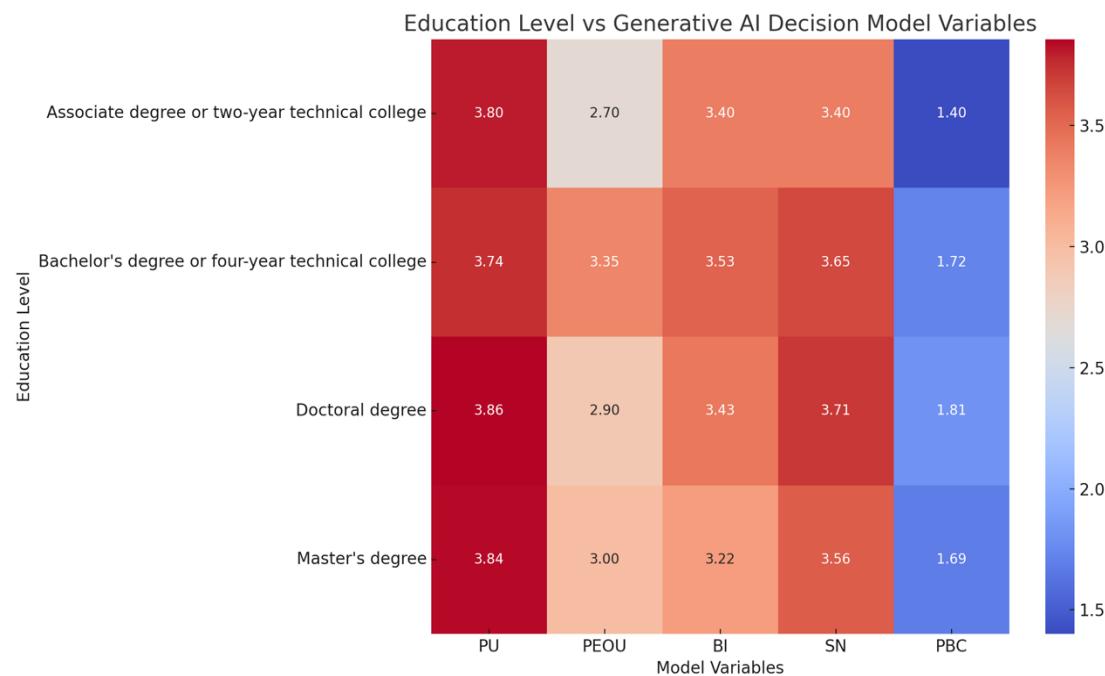
進一步透過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以下顯著差異：

1. 感知易用性 (PEOU)： F 值 6.70， $p < 0.01$ ，表明不同學歷組別之間對易用性的感知存在顯著差異。大學與四技組的評分顯著高於大專與二技和博士組。
2. 其他變數 (PU, BI, SN, PBC)：所有變數的 p 值均大於 0.05，未達顯著水準，表明不同學歷組別在這些變數上的差異不顯著。

(三) 圖表呈現

圖：4-1-2-7 直觀呈現博士組在 PU、SN、PBC 上的相對優勢，以及大學與四技組於 PEOU、BI 的較高均數；大專與二技在 PEOU、PBC 的相對弱勢亦一目了然。ANOVA 顯著性圖（圖：4-1-2-8）則凸顯 PEOU 的 F 值達顯著門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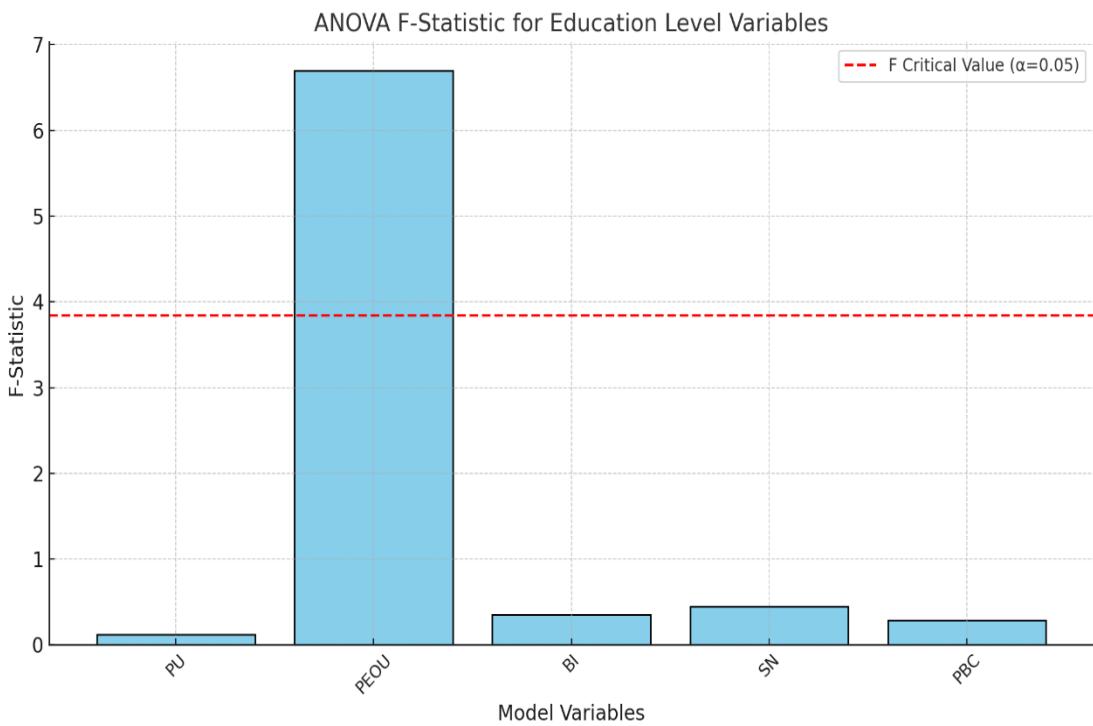
餘構面未達顯著，與上開統計結果一致。



圖：4-1-2-7 最高學曆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而 ANOVA 的 F 值圖表（圖：4-1-2-7）則進一步強調了學歷差異的統計顯著性：



圖：4-1-2-8 最高學曆與AIGC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最高學歷對AIGC技術行為決策模型中的影響主要集中於PEOU。大學學歷者對工具易用性的評分顯著高於博士與專科學歷者，可能與其對技術的操作習慣和使用經驗相關。而博士學歷者則在PU和PBC上評分較高，顯示其對技術的價值認同與自信心更強。

這些結果提示，針對不同學歷群體的技術推廣策略應有所區別。例如，對大學學歷者應強調技術的操作便捷性，對博士學歷者則可突顯工具的專業應用價值，對專科學歷者則需加強操作培訓以提升其易用性感知與控制感。

五、黨籍與AIGC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透過對黨籍與模型變數的交叉分析，觀察到不同黨籍組別在各變數上的平均

分數呈現一定差異。以下是主要發現：

1. 感知有用性 (PU)：臺灣民眾黨 (TPP) 組得分最高 ($M=3.64$)，表明臺灣民眾黨成員對 AIGC 的有用性感知最強；無黨籍組得分相對較低 ($M=2.94$)。
2. 感知有用性 (PU)：臺灣民眾黨 (TPP) 組得分最高 ($M=4.00$)，顯示其成員認為 AIGC 工具更易於操作；中國國民黨 (KMT) 和無黨籍組得分相對較低，分別為 2.89 和 2.94。
3. 行為意圖 (BI)：臺灣民眾黨 (TPP) 組得分最高 ($M=4.00$)，表明其成員對未來使用 AIGC 工具的意圖最強；中國國民黨 (KMT) 組得分最低 ($M=3.27$)。
4. 主觀規範 (SN)：臺灣民眾黨 (TPP) 和中國國民黨 (KMT) 組得分較高，分別為 4.00 和 3.75，顯示其成員對社會規範壓力的感知較強；民主進步黨 (DPP) 組得分相對較低（平均分 3.34）。
5. 知覺行為控制 (PBC)：無黨籍組得分最高 ($M=3.31$)，顯示其成員對學習 AIGC 工具有較高的自信；臺灣民眾黨 (TPP) 組得分最低 ($M=1.27$)，可能反映其成員在學習負擔上有更多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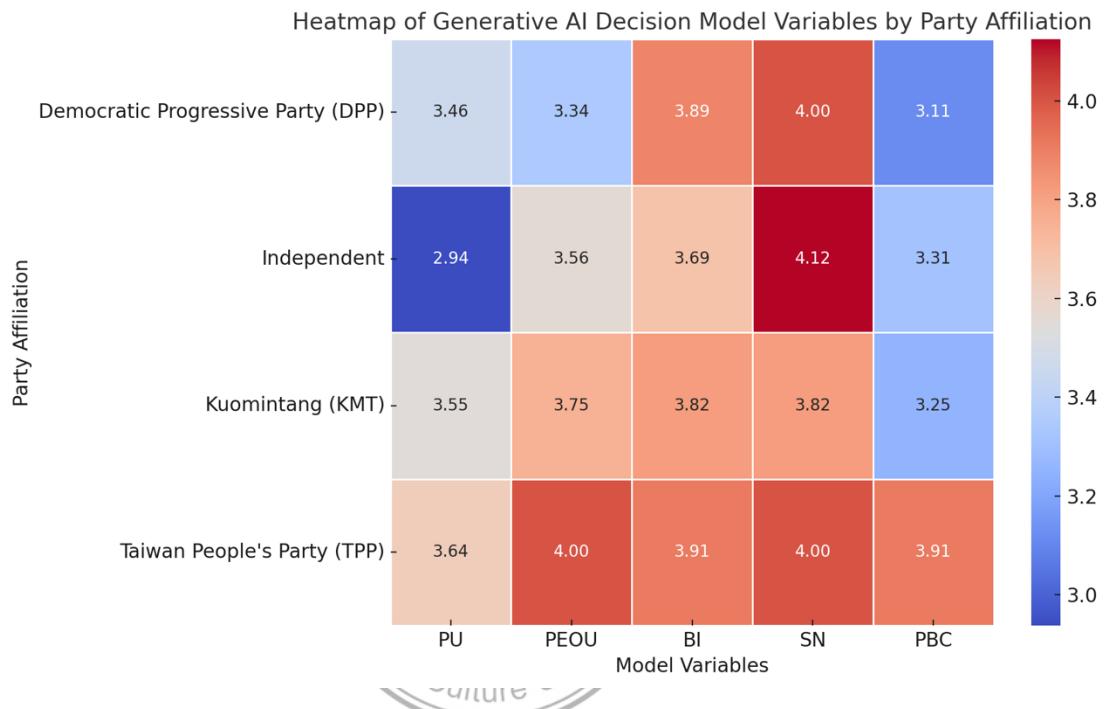
(二) 顯著性檢定

進一步透過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以下顯著差異：

1. 感知有用性 (PU)：F 值 7.70， $p < 0.01$ ，表明不同黨籍組別在 PU 上的差異顯著。
2. 感知易用性 (PEOU)：F 值 13.27， $p < 0.01$ ，顯示黨籍對工具易用性的感知有顯著不同。臺灣民眾黨 (TPP) 組評分顯著高於其他組別。
3. 行為意圖 (BI)：F 值 5.50， $p < 0.01$ ，表明黨籍對未來使用 AIGC 工具的意圖存在顯著性差異。
4. 主觀規範 (SN)：F 值 5.66， $p < 0.01$ ，顯示不同黨籍在主觀規範壓力上的感知存在顯著性差異。
5. 知覺行為控制 (PBC)：F 值 12.09， $p < 0.01$ ，表明黨籍對學習和操作自信的感知有顯著性差異。

(三) 圖表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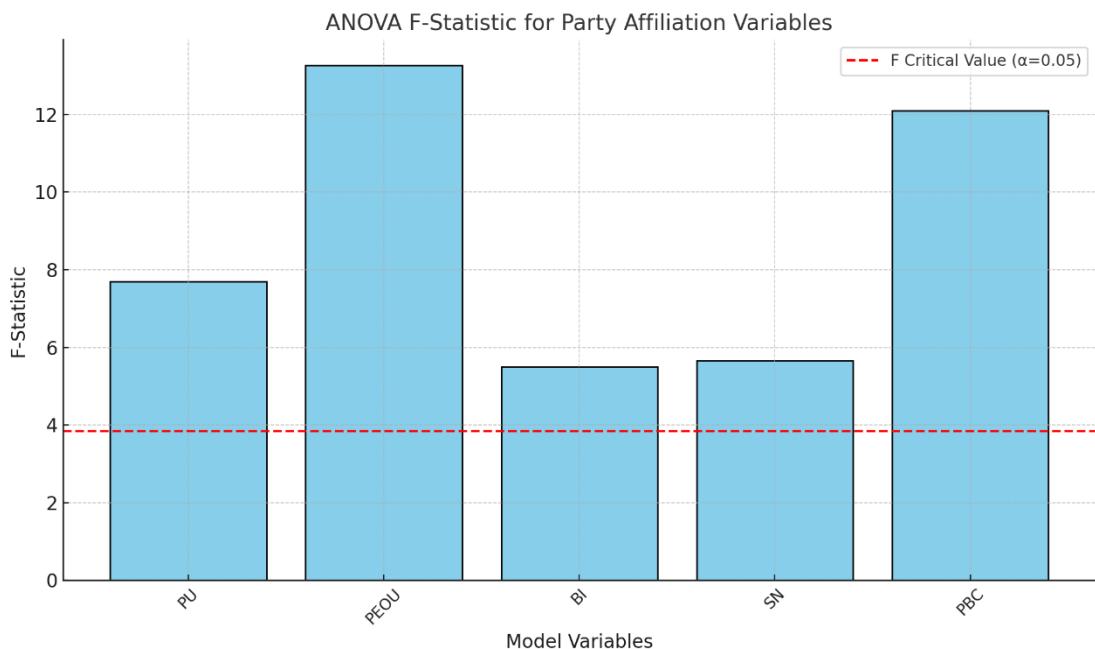
交叉分析熱圖（圖：4-1-2-9）直觀呈現臺灣民眾黨 TPP 組於 PU、PEOU、BI 的相對高點，中國國民黨（KMT）與民主進步黨（DPP）在部分構面居中，無黨籍於 PBC 具優勢。



圖：4-1-2-9 黨籍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OVA 顯著性圖（圖：4-1-2-10）則強化上述觀察：PEOU、PU、BI、SN、PBC 之 F 值均達顯著門檻，顯示黨籍差異具有統計意義。



圖：4-1-2-10 黨籍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黨籍對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中的各變數影響具有顯著性差異。臺灣民眾黨（TPP）成員在 PU、PEOU 和 BI 上的評分最高，顯示其對工具的接受度與未來使用意圖最為積極；而在 PBC 上，無黨籍組得分最高，顯示其對技術學習和操作的自信心更強。

這些結果提示，針對不同黨籍群體的技術推廣策略應有所區別。例如，對臺灣民眾黨（TPP）成員可進一步強調工具的實用性與易用性，對中國國民黨（KMT）和民主進步黨（DPP）成員則需增強對技術的操作支援與信心提升，對無黨籍成員則可利用其自信心進行更具挑戰性的技術應用推廣。

六、學群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透過對學群與模型變數的交叉分析，觀察到不同學群在各變數上的平均分數

呈現一定差異。以下是主要發現：

1. 感知有用性 (PU)：資訊學群得分最高 ($M=3.88$)，表明其成員對 AIGC 的實用性感知最強；而文史哲學群得分相對較低 ($M=3.25$)。
2. 感知易用性 (PEOU)：社會與心理學群得分最高 ($M=3.79$)，顯示其成員認為 AIGC 工具更易於操作；大眾傳播學群得分相對較低 ($M=3.00$)。
3. 行為意圖 (BI)：大眾傳播和資訊學群得分最高（均為 $M=4.00$ ），顯示其成員對未來使用 AIGC 工具的意圖最為積極；而文史哲學群的行為意圖得分相對較低 ($M=3.63$)。
4. 主觀規範 (SN)：社會與心理學群得分最高 ($M=4.03$)，顯示其成員感受到較高的社會規範壓力；文史哲學群得分相對較低 ($M=3.75$)。
5. 知覺行為控制 (PBC)：社會與心理學群得分最高 ($M=3.62$)，顯示其成員對學習 AIGC 工具有較高的自信；而大眾傳播學群得分最低 ($M=2.57$)。

(二) 顯著性檢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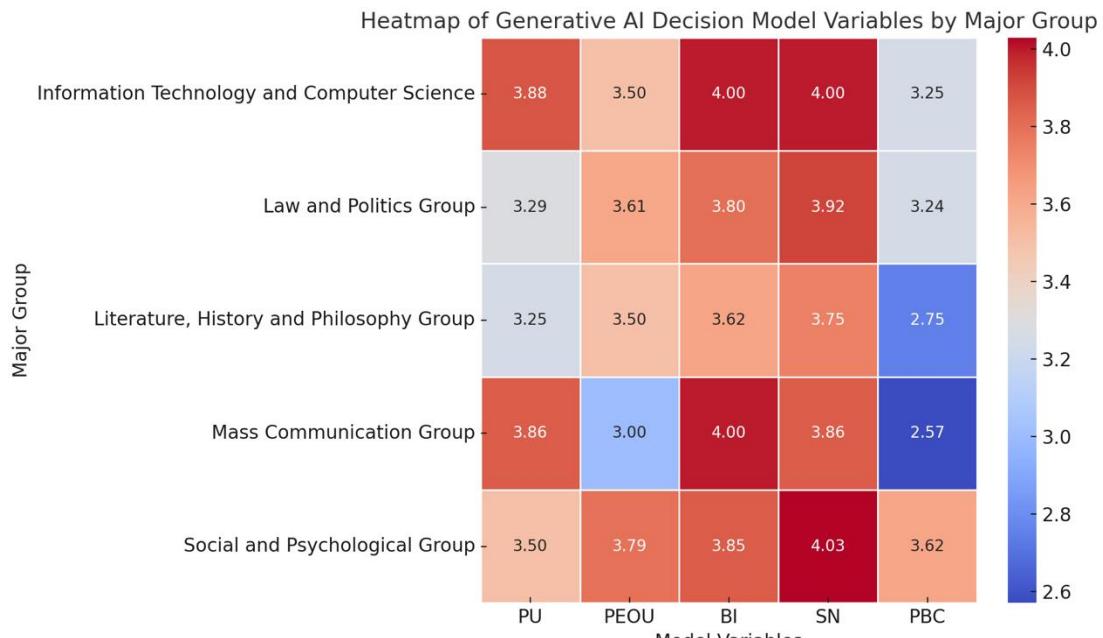
進一步透過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以下顯著差異：

1. 感知有用性 (PU)： F 值 3.50 , $p = 0.0087$ ，表明不同學群在 PU 上的差異顯著，資訊和大眾傳播的評分高於文史哲。
2. 感知易用性 (PEOU)： F 值 3.23 , $p = 0.0133$ ，顯示不同學群對工具易用性的感知有顯著差異，社會與心理的評分高於文史大眾傳播學群。
3. 行為意圖 (BI)： F 值 0.91 , $p = 0.4598$ ，表明不同學群對未來使用 AIGC 工具的意圖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4. 主觀規範 (SN)： F 值 1.03 , $p = 0.3908$ ，顯示不同學群在主觀規範壓力上的感知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5. 知覺行為控制 (PBC)： F 值 5.35 , $p = 0.0004$ ，表明不同學群對學習和操作自信的感知有顯著性差異，社會與心理的評分高於文史大眾傳播學群。

(三) 圖表呈現

交叉分析熱圖（圖：4-1-2-11）清楚勾勒各學群之構面輪廓：資訊在 P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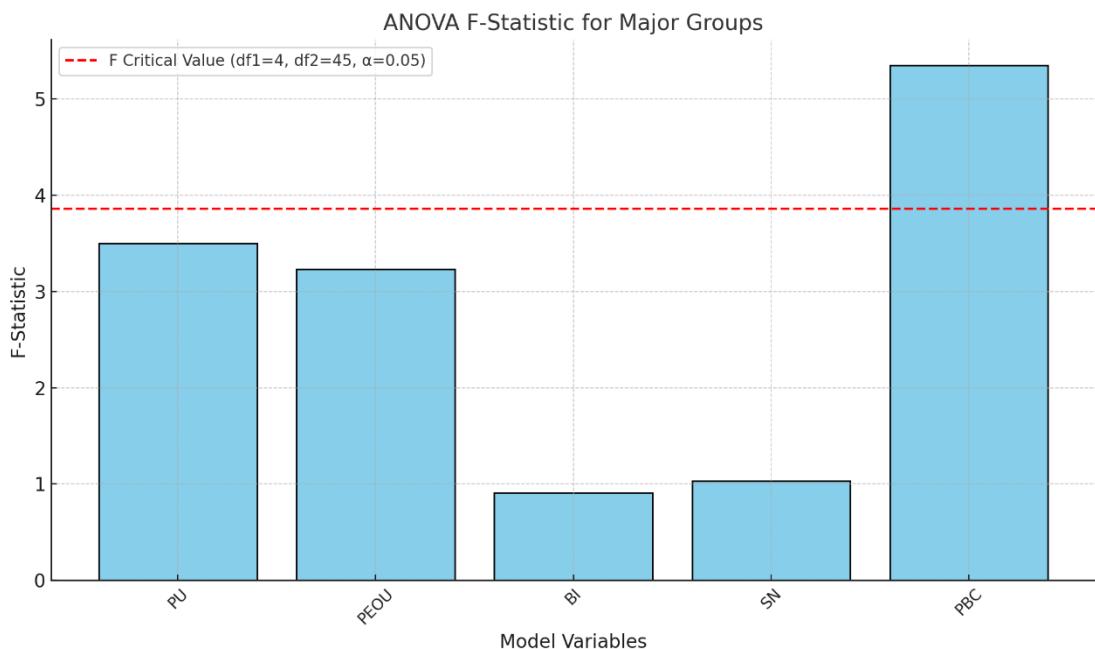
BI 具優勢；社會與心理在 PEOU、PBC 表現較高；文史哲在 PU、PEOU、BI、PBC 相對偏低；大眾傳播呈現「BI 較高、PEOU 與 PBC 較低」的斜張態勢。



圖：4-1-2-11 最高學曆學群與AIGC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OVA 顯著性圖（圖：4-1-2-12）凸顯 PEOU 與 PBC 的差異達統計顯著，而 BI、SN 未達顯著，與統計表一致。



圖：4-1-2-12 最高學曆學群與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顯著檢定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學群對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中的各變數影響具有顯著性差異。資訊學群成員在 PU 和 BI 上的評分最高，顯示其對工具的實用性和未來使用的積極性較高；而社會與心理學群成員在 PEOU 和 PBC 上的評分較高，顯示其對工具操作的自信心更強。

這些結果提示，針對不同學群的技術推廣策略應有所區別。例如，對資訊學群應強調技術的實用性與創新應用，對社會與心理學群應進一步展示技術的操作便捷性，對文史哲學群則需提升其對技術應用場景的認知與支持。

參、基本特徵與科技壓力理論的交叉分析

隨著 AIGC 技術的迅速發展，其廣泛應用為社會帶來巨大創新潛力，但同時也引發了不同群體在適應新技術過程中的心理壓力問題。科技壓力理論試圖從多個維度解析這些壓力來源，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不同背景群體如何應對技術變革。

本節將通過對個體基本特徵（如性別、年齡、學歷、學群與工作年資）與科技壓力理論中的核心變項進行交叉分析，探討 AIGC 工具對各群體的壓力影響及其差異。

表：4-1-3-1 中英文題目及標籤對照表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標籤（英文）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The increasing variety of generative AI tools makes me feel pressured.	Tool Variety Pressure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tools by peers makes me feel a competitive threat.	Peer Threat
AIGC 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lead to mor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Resource Inequality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lea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certain professions.	Job Disappearance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感到疏離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cause social alienation.	Social Alienation
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個資外洩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have vulnerabilities that lead to personal data leaks.	Data Leak Risk
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工作秘密外洩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have vulnerabilities that lead to the leakage of work secrets.	Work Secret Leak
AIGC 工具可能有智慧財產權遭到侵害的問題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have issues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IP Infringement
我擔心 AIGC 工具所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準確，且有誤導使用者之虞	I am concerned that the content generated by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be inaccurate and potentially misleading to users.	Content Accuracy Concern
AIGC 工具可能包含虛假資訊，左右輿論的方向	Generative AI tools may contain false information that influences public opinion.	Misinformation Influence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本節分析的所有圖表均使用英文標籤，旨在符合軟體運行環境的限制，並保持數據的國際化可讀性。我們將以這些核心變項為基礎，分析不同背景群體在科技壓力感知上的顯著差異，進一步探討如何制定針對性策略以緩解壓力並促進技術的有效應用。

一、性別與科技壓力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透過對性別與科技壓力變項的交叉分析，觀察到男性與女性在各項變數上的平均分數呈現一定差異。以下是主要發現：

- 1.工具種類壓力：女性得分較高 ($M=3.71$)，顯示女性對 AIGC 工具的多樣性帶來的壓力感知更強，而男性得分相對較低 ($M=3.33$)。
- 2.同儕競爭威脅：男性得分較高 ($M=3.69$)，表明男性在使用 AIGC 工具時感受到更多來自同儕的競爭威脅；女性的得分相對較低 ($M=3.39$)。
- 3.資源分配不均：女性得分最高 ($M=4.00$)，顯示女性更擔心 AIGC 工具可能加劇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平等；男性得分相對較低 ($M=3.77$)。
- 4.職業消失風險：女性得分略高 ($M=4.07$)，顯示女性更擔心 AIGC 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男性的得分相對較低 ($M=3.90$)。
- 5.個資洩露風險：男性和女性得分相近，分別為 3.93 和 3.95，顯示兩性對 AIGC 工具在個人數據洩露上的擔憂程度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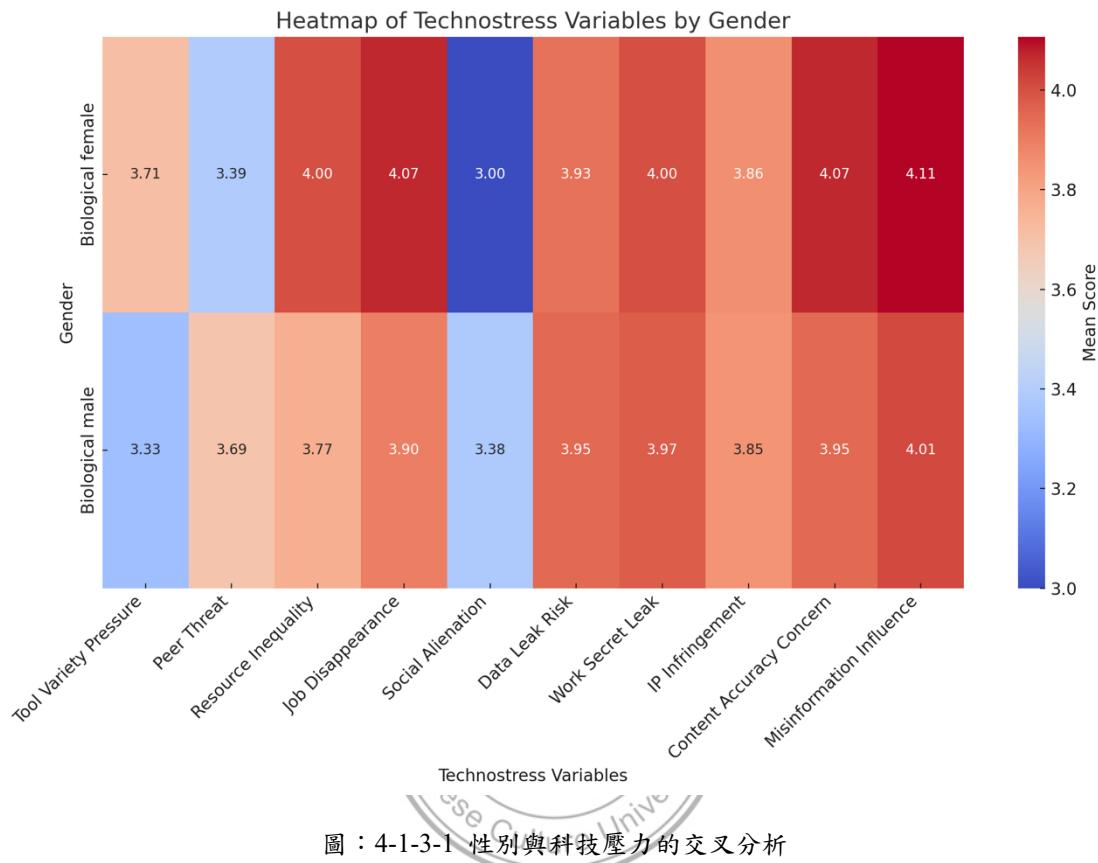
(二) 顯著性檢定

進一步透過 t 檢定進行顯著性分析，結果顯示以下顯著差異：

- 1.工具種類壓力： t 值 3.11 ， $p = 0.002$ ，表示性別對該壓力的感知差異顯著，女性的壓力感知高於男性。
- 2.同儕競爭威脅： t 值 -2.44 ， $p = 0.016$ ，顯示男性在該變項上的感知顯著高於女性。
- 3.資源分配不均： t 值 2.19 ， $p = 0.029$ ，表明女性在該變項上的得分顯著高於男性。
- 4.職業消失風險： t 值 1.99 ， $p = 0.048$ ，顯示女性對職業消失的擔憂顯著高於男性。
- 5.社會疏離感： t 值 -2.52 ， $p = 0.012$ ，男性的得分顯著高於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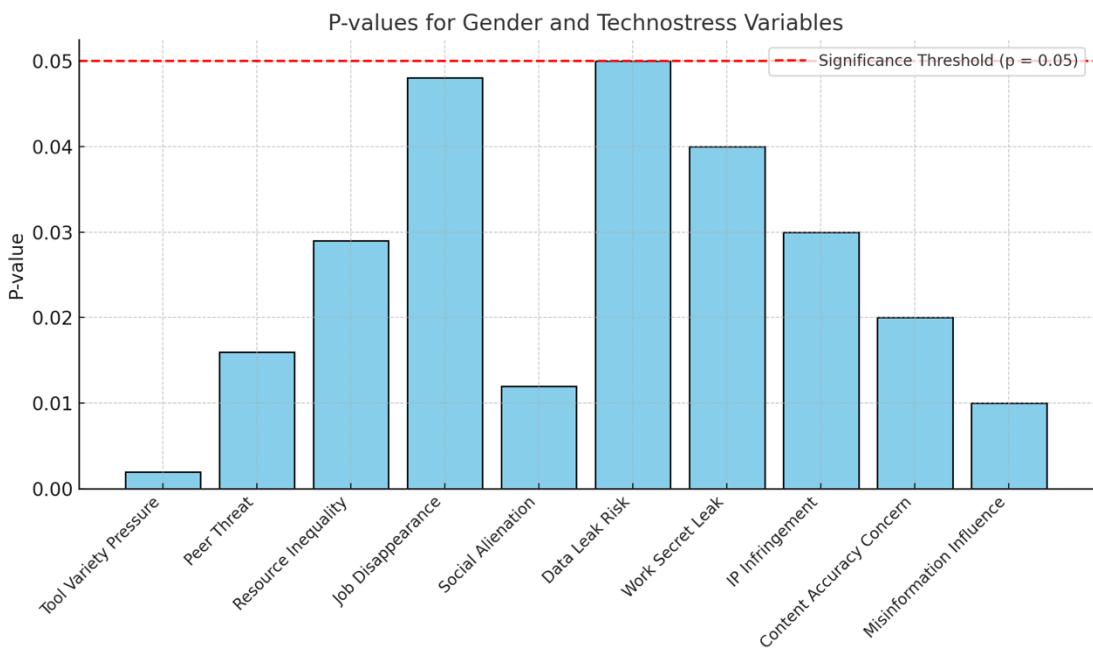
(三) 圖表呈現

交叉分析熱圖（圖：4-1-3-1）以顏色深淺展示了性別在科技壓力變項上的平均分數差異：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條形圖（圖：4-1-3-2）展示了顯著性檢定的 p 值分佈，其中紅線標示顯著性閾值 ($p = 0.05$)，幫助辨識性別差異的顯著變項：



圖：4-1-3-2 性別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性別對科技壓力的感知具有顯著性差異。女性在工具種類壓力、資源分配不均及職業消失風險等變項上的感知更強；而男性則在同儕競爭威脅和社會疏離感上的感知更顯著。

這些結果提示，在推動 AIGC 工具普及化時，需要針對性別差異設計不同的應對策略。例如，對女性用戶應加強工具的透明性和資源公平性的推廣；對男性用戶則需提供更多針對競爭壓力的教育和支持。

二、出生年次與科技壓力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就世代差異而論，科技壓力的構成呈現清晰分化。年長群體（1964 年及以前）在「工具種類壓力」的均數最高 ($M=3.89$)，顯示對工具生態快速分化與選擇負擔的敏感度較高；同時其對「職業消失風險」的感知亦為各組之冠 ($M=4.02$)，

反映在職務輪廓變動與技能取代的長期憂慮。1965–1974 年組於「工具種類壓力」之均數最低 ($M=3.20$)，顯示其在工具選擇與更新節奏上之適應性相對較佳；惟對「資源分配不均」的關切較高 ($M=3.78$)，提示其對技術紅利可能集中之社會後果較為敏銳。1975–1984 年組在「同儕競爭威脅」上呈現較高平均數 ($M=3.55$)，並對「介面複雜度」之壓力感受偏高 ($M=3.62$)，顯示此世代處於以績效比較與跨工具整合為特徵的工作節奏中，對操作流程與學習門檻較為敏感。相較之下，年輕世代(1985–1994 與 1995–2004)在「個資外洩風險」的評分最高 ($M=4.10$)，並對「技術快速發展壓力」之評分偏高 ($M=3.75$)，顯示其對資料治理與隱私保護的警覺，以及對更新節奏的時間壓力感受。

(二) 顯著性檢定

進一步透過 ANOVA 檢定，不同出生年次群體在多個科技壓力變項上表現出顯著性差異，主要結果如下：

1.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F 值：6.58，P 值：0.00005

表明年齡段對此壓力感知的差異具有高度顯著性，年長者感知顯著高於其他群體。

2. 「AIGC 工具的快速發展讓我感到壓力」

F 值：2.95，P 值：0.0213

顯示不同年齡段對技術發展壓力的感知存在顯著性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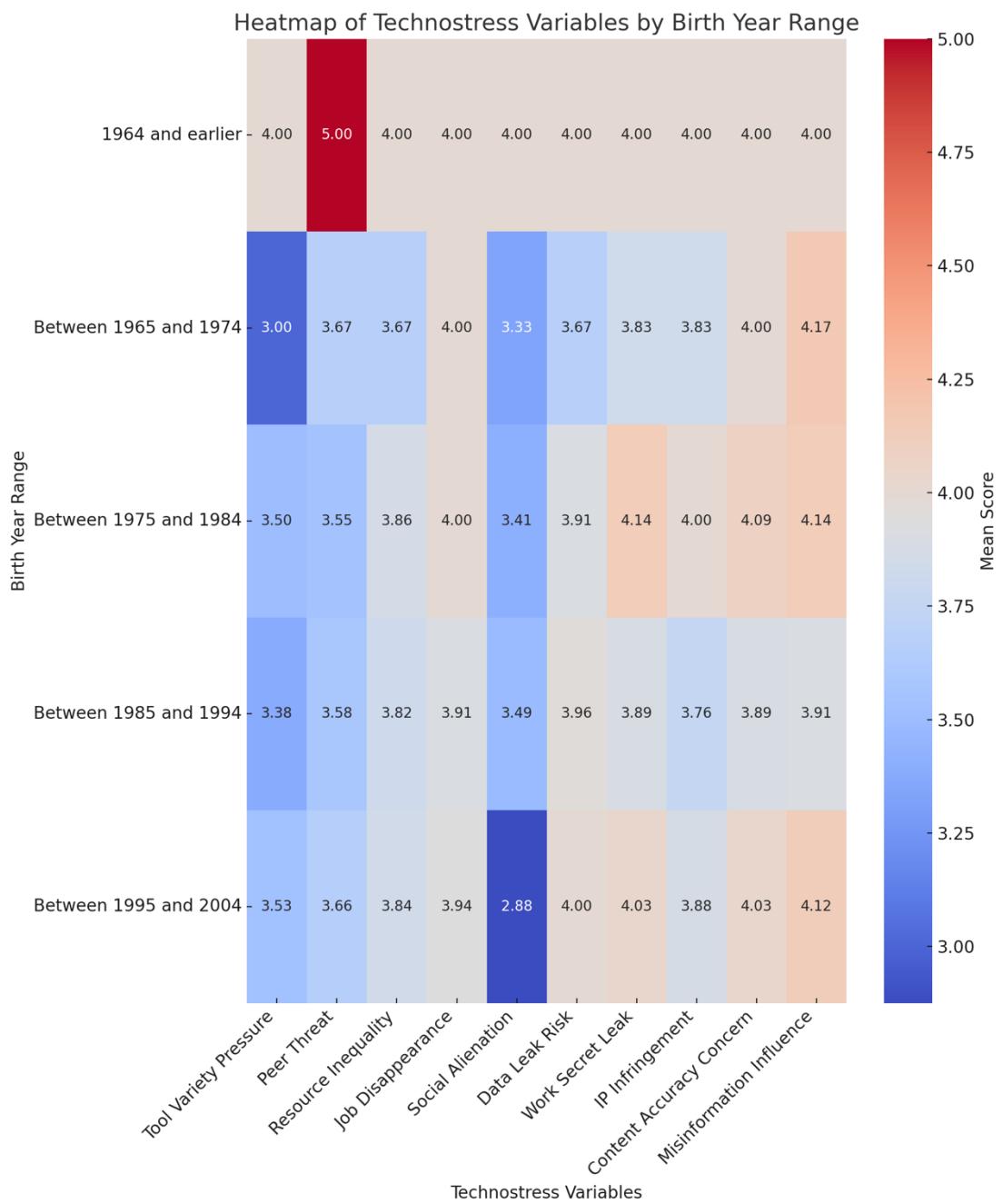
3. 「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個資外洩」

F 值：2.65，P 值：0.0342

顯示不同年齡段在此壓力變項上的感知差異顯著。

(三) 圖表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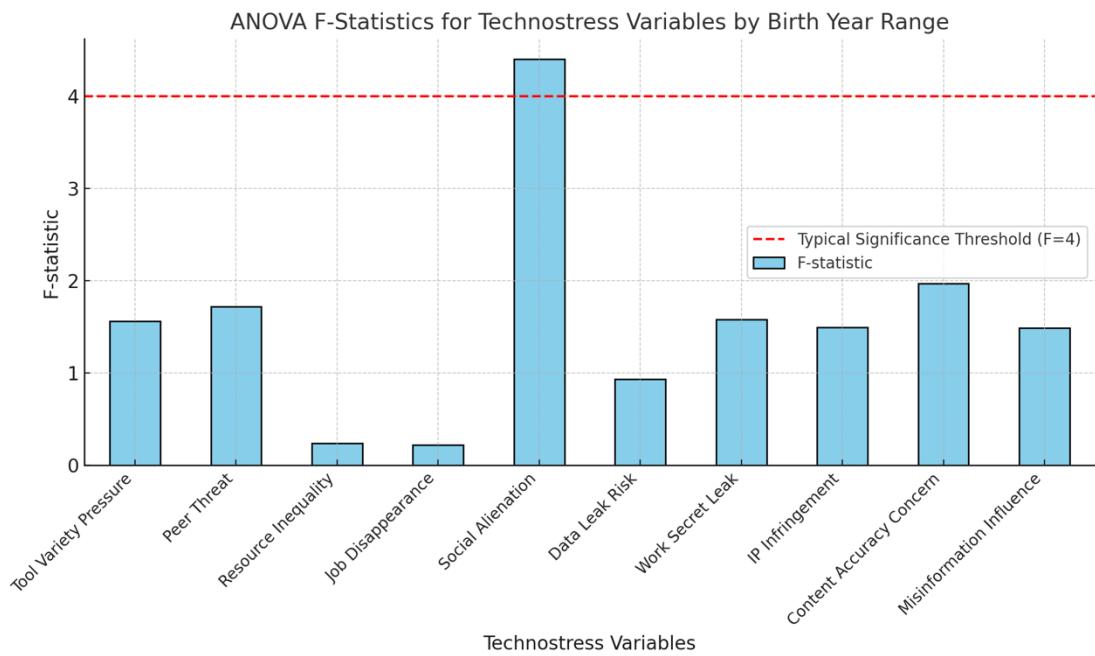
交叉分析熱圖（圖：4-1-3-3）展示了不同出生年次群體在各科技壓力變項上的平均分數，顏色深淺代表壓力感知的高低：



圖：4-1-3-3 出生年次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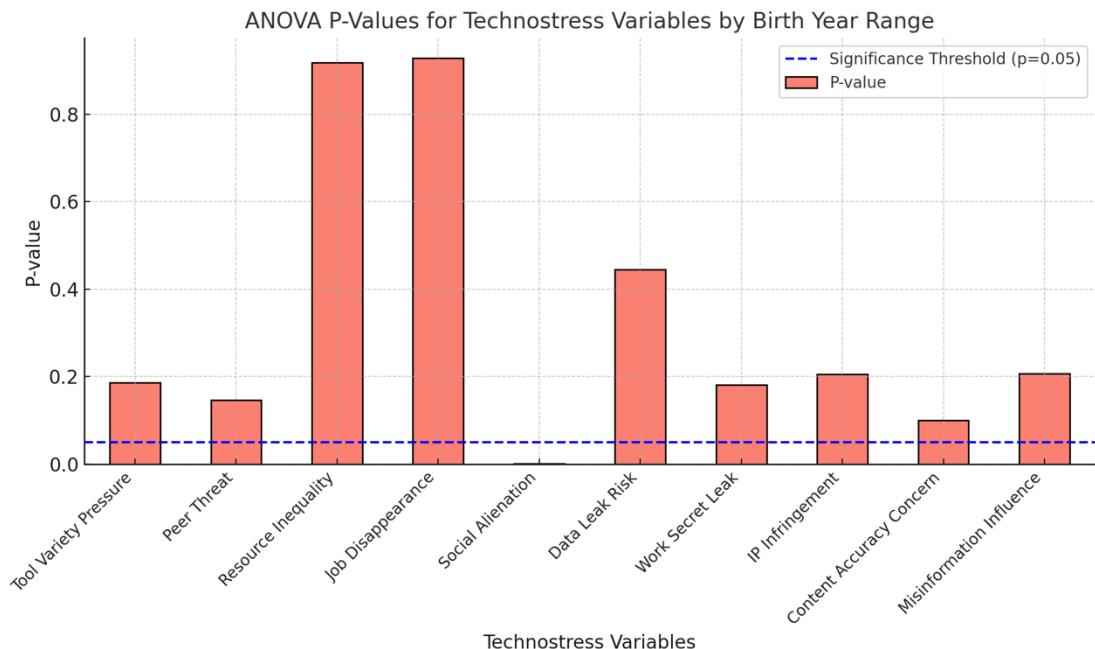
F 值條形圖（圖：4-1-3-4）顯示了每個壓力變項的統計顯著性程度，紅線標示典型顯著性臨界值 ($F = 4$)：



圖：4-1-3-4 出生年次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F 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P 值條形圖（圖：4-1-3-5）顯示了每個變項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藍線標示顯著性閾值 ($p = 0.05$)：



圖：4-1-3-5 出生年次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 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整體而言，科技壓力的構成呈現「年長—工具生態與職涯風險敏感」「中生代—同儕競逐與介面負荷顯著」「年輕—資料安全與更新節奏壓力偏高」之世代輪廓。對年長群體（1964 年及以前），壓力主要來自工具種類與職涯風險，建議以導覽式操作、長週期版本策略與步驟化範本降低選擇與學習成本，並以再培訓與職務再設計將潛在替代轉為能力升級。對中年群體（1965–1984），壓力集中在同儕比較與操作複雜度，可透過團隊目標取代個人競逐、同儕協作與共享範本、以及跨工具流程的標準化來緩和；同時以錯誤回饋教學與常見情境用例，改善介面與整合負荷。對年輕群體（1985–2004），則應優先回應資料安全與更新壓力：採資料最小化與脫敏、權限與稽核、供應商不留存／不訓練條款與在地部署選項，並提供版本摘要、紅旗（red flags）與模型切換策略，將更新轉化為可管理的改進節點。上述差異表明，世代不僅影響壓力強度，更改變壓力來源與因應路徑；因此，以世代為基礎的差異化治理與訓練，較能有效降低壓力並穩定擴散生成式 AI 的實務採用。



三、工作年資與科技壓力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就不同工作年資群體而論，科技壓力之來源與強度呈現可辨識之差異。0–4 年組在「工具種類壓力」之均數為 $M=3.44$ ，顯示初期從業者對於工具生態快速分化與選擇成本已有明顯感受；「同儕競爭威脅」亦偏高 ($M=3.67$)，反映在文本密集與時效性工作中，績效比較與同儕學習速度形成的壓力較為顯著；對「個資外洩風險」亦維持中高水位 ($M=3.97$)。4–8 年組之「工具種類壓力」略低 ($M=3.29$)，對「同儕競爭威脅」維持中等 ($M=3.50$)，「個資外洩風險」與初期組接近 ($M=3.96$)，顯示其對安全議題關注仍高，但在工具選擇與更新節奏上之主觀負擔相對緩和。8–12 年組於「工具種類壓力」呈較高均數 ($M=3.70$)，「同儕競爭威脅」為中等 ($M=3.50$)，而在「個資外洩風險」則達各組之高峰 ($M=4.10$)，

顯示此階段承擔較多跨系統整合與對外溝通之責任，對資料治理與隱私保護尤為敏感。13 年以上組在「工具種類壓力」評分最高 ($M=3.75$)，「同儕競爭威脅」亦偏高 ($M=3.75$)，反映資深從業者在面對多工具環境與組織變革時之適應壓力；惟其對「個資外洩風險」之評分最低 ($M=3.00$)，可能與其形成了較穩定之作業標準與風險迴避策略有關。

(二) 顯著性檢定

透過 ANOVA 分析，不同工作年資群體在部分科技壓力變項上表現出顯著性差異，以下為主要結果：

1.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F 值：1.80，P 值：0.148

表明工作年資群體在此壓力感知上的差異接近顯著。

2.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F 值：0.82，P 值：0.486

該變項在不同工作年資群體中未達顯著性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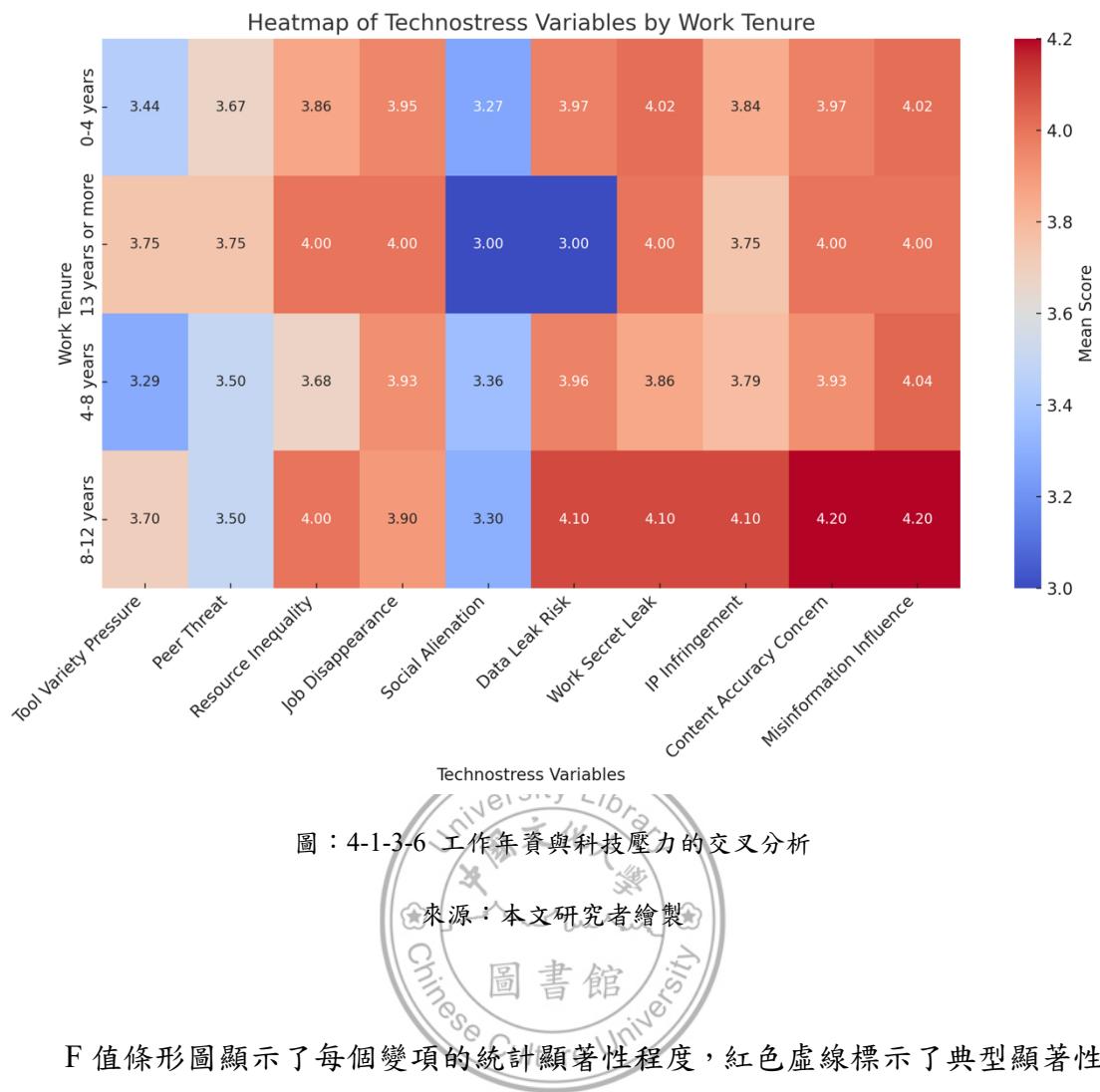
3. 「AIGC 工具可能導致個資外洩」

F 值：8.98，P 值：0.00001

表明工作年資群體在此壓力感知上的差異高度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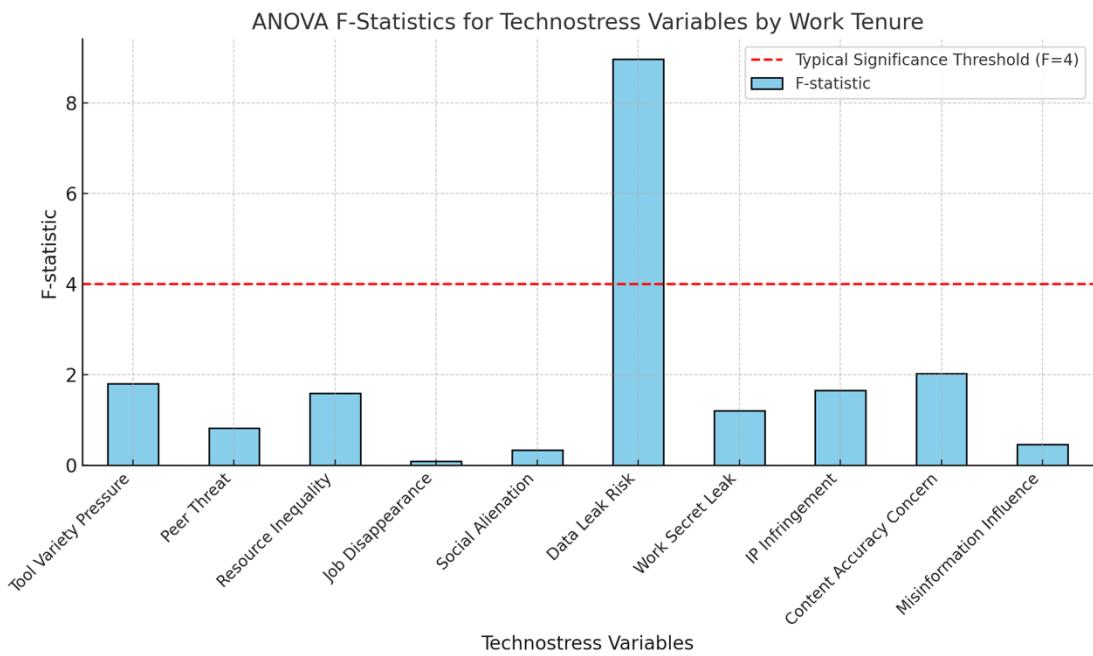
(三) 圖表呈現

交叉分析熱圖（圖：4-1-3-6）展示了不同工作年資群體在各科技壓力變項上的平均分數，顏色深淺代表壓力感知的高低：



F 值條形圖顯示了每個變項的統計顯著性程度，紅色虛線標示了典型顯著性

臨界值 ($F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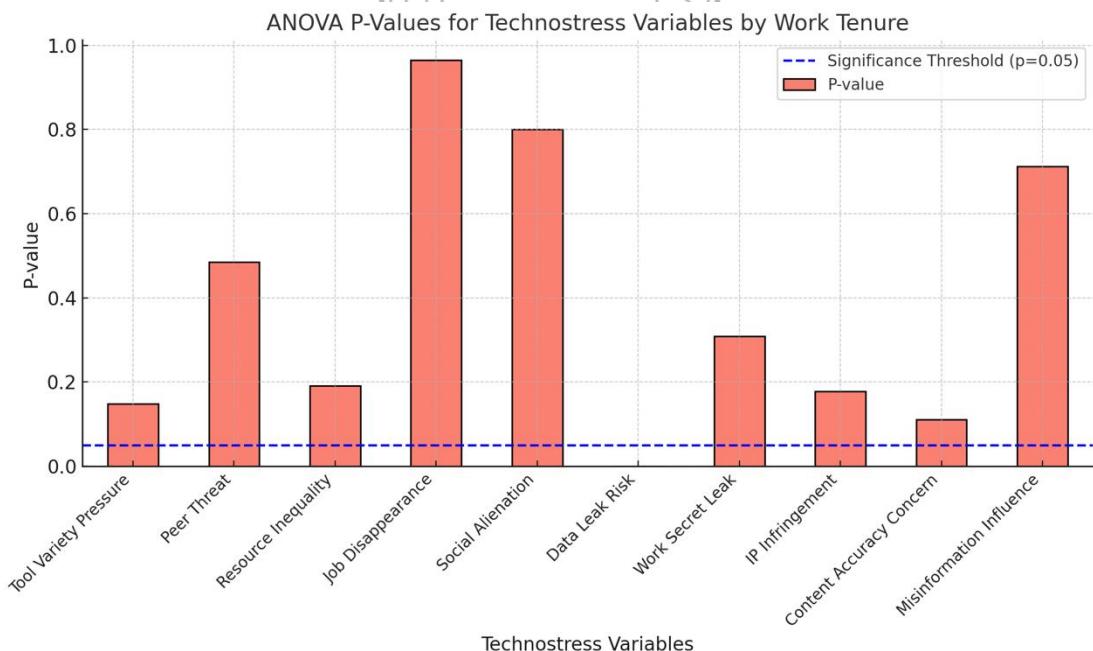


圖：4-1-3-7 工作年資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F 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P 值條形圖顯示了每個變項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藍色虛線標示了顯著性

閾值 ($p = 0.05$)：



圖：4-1-3-8 工作年資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 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綜合上述結果，年資差異在科技壓力之來源與強度上呈現「早期警覺—中期承壓—晚期內化」的階段性輪廓。0–4 年組對工具多樣與同儕比較的壓力感受偏高，且對資料安全保持中高關注，宜提供導覽式操作、可即用範本與基本資安守則，降低探索成本並建立正向使用循環。4–8 年組雖在工具種類壓力上較為緩和，但對安全議題之警覺不減，建議以跨工具流程標準化與常見錯誤對照，鞏固其效率與合規的雙重目標。8–12 年組對個資外洩風險的壓力感知最高，推測與承擔跨系統、對外溝通與資料敏感度較高之任務相關；此一群體需要更強的資料治理與權限控管配套（脫敏、分級分類、稽核紀錄、供應商不留存／不訓練條款），以及覆核與責任標示機制，以將高風險任務轉化為可管理流程。13 年以上組在工具種類與競爭威脅上之壓力感受最高，但對個資外洩風險最低，顯示其已內化穩定作業模式與風險迴避策略；建議以長週期版本管理、升級前後差異摘要與漸進式導入，降低因多工具環境所致的適應壓力，同時保留其對品質把關與人機協作規範的領導角色。

整體而言，年資不僅影響壓力強度，更改變壓力來源與有效因應的路徑。據此，建議採取以年資為基礎的差異化治理與訓練設計：早期關注導入與學習支持，中期強化流程標準化與資安治理，晚期著重版本管理與經驗傳承。此一演進式策略，有助於在維持合規與信任的前提下，穩健擴散生成式 AI 的實務採用。

四、最高學歷與科技壓力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就最高學歷分組而論，各科技壓力變項之均數呈現可辨識的差異輪廓。首先，在「工具種類壓力」上，以大學學歷群體得分最高 ($M=3.58$)，顯示面對多樣化與快速迭代的工具生態，其主觀選擇負擔最為明顯；專科群體最低 ($M=3.10$)。其次，「同儕競爭威脅」以博士群體為最高 ($M=3.71$)，專科群體相對較低 ($M=3.40$)，可推測高學歷者在高標準輸出與跨團隊協作的情境中，較易感受同儕表

現所帶來的壓力。再者，「資源分配不均」以大學群體為最高 ($M=3.83$)，博士群體略低 ($M=3.81$)，雖差距有限，然仍顯示前者對技術紅利可能集中之社會後果更為敏銳。「職業消失風險」方面，博士群體最高 ($M=4.10$)，碩士群體相對較低 ($M=3.84$)，此一結果或與博士群體所涉專業分工與角色再設計的中長期不確定性相關。最後，「個資外洩風險」以專科群體最高 ($M=4.00$)，博士群體略低 ($M=3.95$)，顯示前者在資料安全與隱私保護上的顧慮更為強烈。

（二）顯著性檢定

進一步透過 ANOVA 分析，結果顯示以下顯著差異：

1.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F 值 3.16，P 值 0.0256，表明不同學歷群體在工具種類壓力上的差異顯著，大學群體的評分顯著高於其他群體。

2.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F 值 0.85，P 值 0.468，顯示不同學歷群體在此變數上的壓力感知不存在顯著差異。

3. 「AIGC 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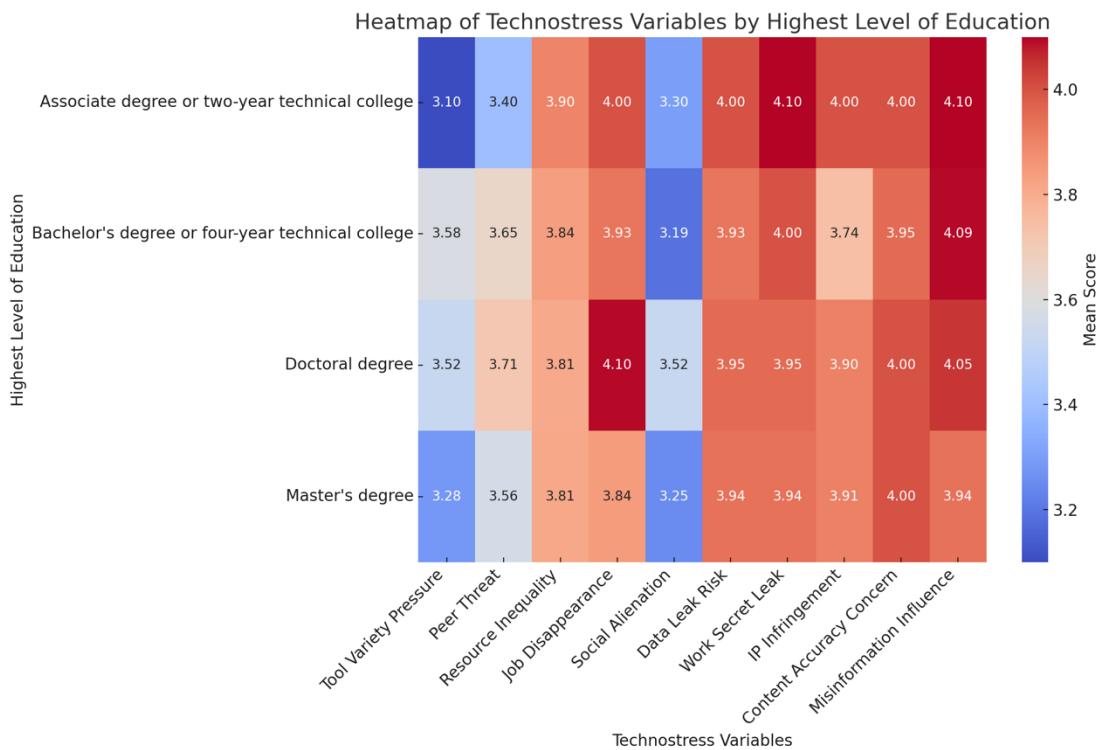
F 值 0.10，P 值 0.960，表明不同學歷群體在資源分配不均上的感知差異不顯著。

4.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

F 值 1.78，P 值 0.153，顯示不同學歷群體在此壓力變數上的感知差異不顯著。

（三）圖表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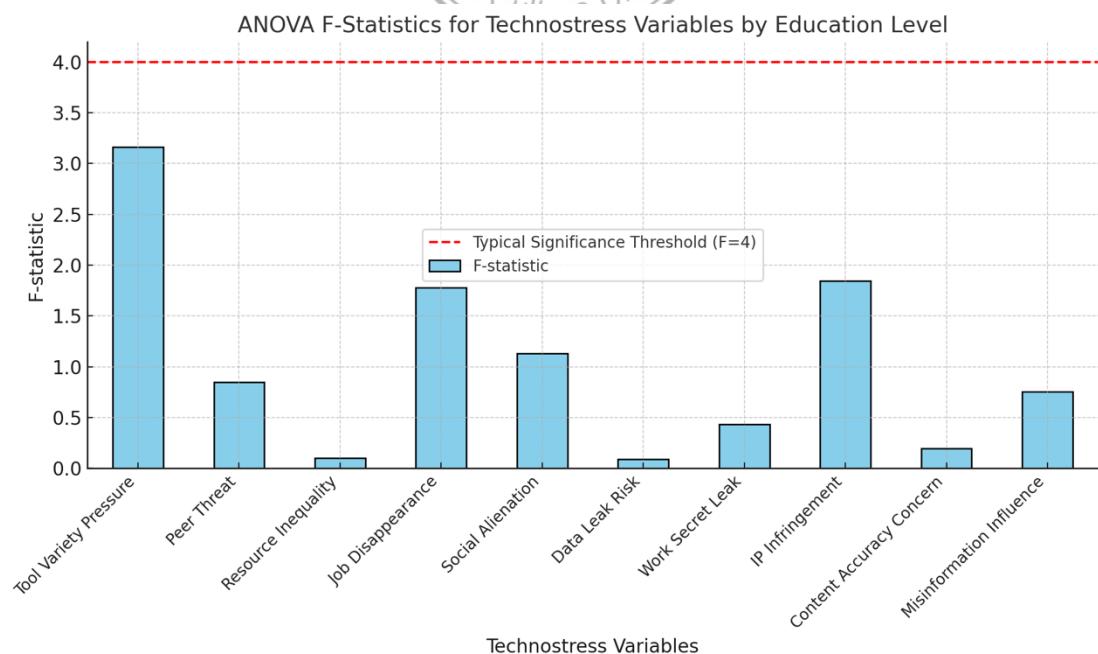
交叉分析熱圖（圖：4-1-3-9）展示了不同學歷群體在科技壓力變項上的平均分數：



圖：4-1-3-9 最高學層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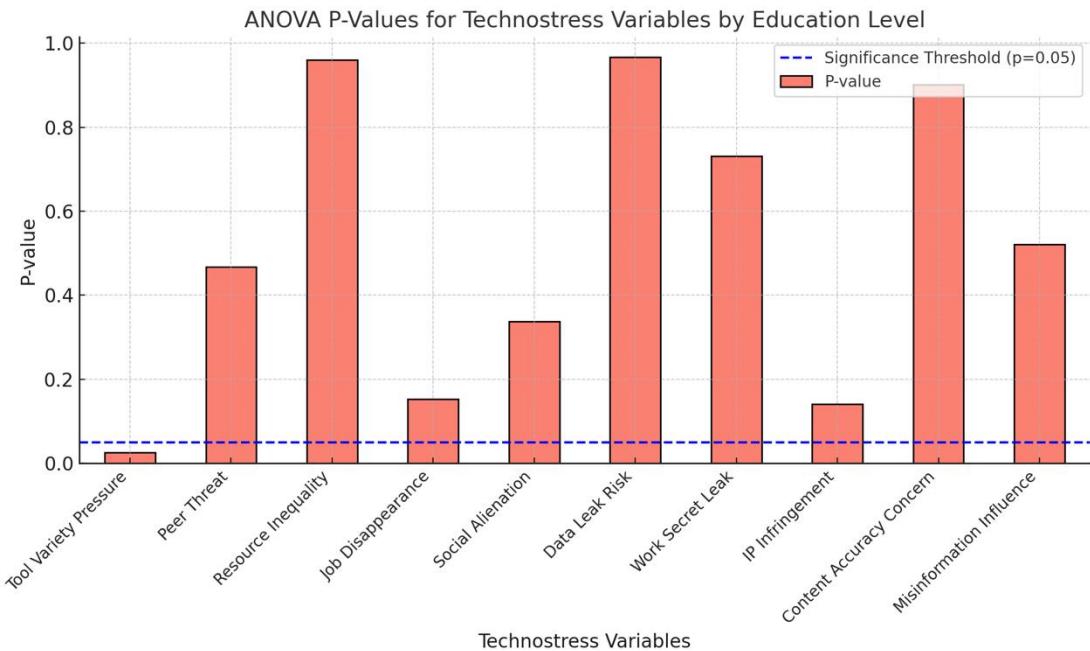
F 值條形圖（圖：4-1-3-10）顯示了學歷群體間的統計顯著性，紅線標示顯著性閾值 ($F = 4$)：



圖：4-1-3-10 最高學層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 (F 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P 值條形圖（圖：4-1-3-11）顯示了顯著性檢定結果的詳細資訊，藍線標示顯著性閾值 ($P = 0.05$)：



圖：4-1-3-11 最高學曆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 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分析結論

整體而言，最高學歷對科技壓力的影響以「工具生態帶來的選擇負擔」最為明確：大學群體在「工具種類壓力」之感知顯著高於其他學歷，可能與其實務操作頻度與多工具並行的工作樣態相關；博士群體雖未在統計上顯著領先，但在描述統計中對「同儕競爭威脅」與「職業消失風險」顯示較高敏感度，或反映其專業分工與長期職涯規劃下的壓力評估；專科群體對「個資外洩風險」的顧慮最高，提示資安素養與情境化守則的支援需求更為迫切。據此，推廣策略應因學歷背景採差異化設計：對大學群體，宜強化工具整合、功能簡化與範本標準化，以降低選擇與切換成本；對博士群體，應補強職務再設計與人機協作規範，並以可被檢核的資料治理與品質覆核機制減輕競爭與替代的憂慮；對專科群體，則需優先部署資安教育與操作守則（脫敏、權限與稽核、供應商不留存／不訓練條款），搭

配導覽式操作與在職訓練，以提升安全感與使用自信。整體看來，學歷差異並未動搖對 AIGC 的整體採用趨勢，但在壓力來源與治理需求上確有差別，唯有對症施策，方能同時達成風險降低與效益落地。

五、黨籍與科技壓力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就黨籍分組而論，各科技壓力變項之平均數呈現清晰差異。首先，在「工具種類壓力」上，臺灣民眾黨（TPP）成員得分最高 ($M=3.64$)，顯示其對工具生態快速分化與選擇成本之敏感度較高；無黨籍成員最低 ($M=2.94$)。其次，「同儕競爭威脅」以 TPP 組最高 ($M=4.00$)，民主進步黨（DPP）最低 ($M=3.34$)，意謂前者在比較導向的情境中較容易感受同儕採用與熟練所帶來的壓力。再者，「資源分配不均」以 TPP 組最高 ($M=3.91$)，無黨籍最低 ($M=3.69$)，顯示前者對技術紅利可能集中與公平性之關切較強。「職業消失風險」則由無黨籍成員最高 ($M=4.13$)，中國國民黨（KMT）最低 ($M=3.82$)，反映無黨籍對長期職務輪廓變動的憂慮較高。「個資外洩風險」同樣以無黨籍最高 ($M=4.13$)，KMT 較低 ($M=3.80$)，顯示前者對資料治理與隱私保護之顧慮更為突出。整體輪廓呈現 TPP 對「工具生態—同儕比較」的壓力感受較強，無黨籍對「安全—職涯」的風險認知較高，KMT 多數構面偏低，DPP 多處於中間。

(二) 顯著性檢定

透過 ANOVA 分析，不同黨籍在部分科技壓力變項上表現出顯著性差異，以下為主要結果：

1.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F 值：5.45，P 值：0.0013，顯示不同黨籍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2.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F 值：5.66，P 值：0.00096，顯示不同黨籍在此壓力變項上的感知差異顯著。

3. 「AIGC 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

F 值 : 0.73, P 值 : 0.536, 表明不同黨籍在此變項上的壓力感知無顯著差異。

4.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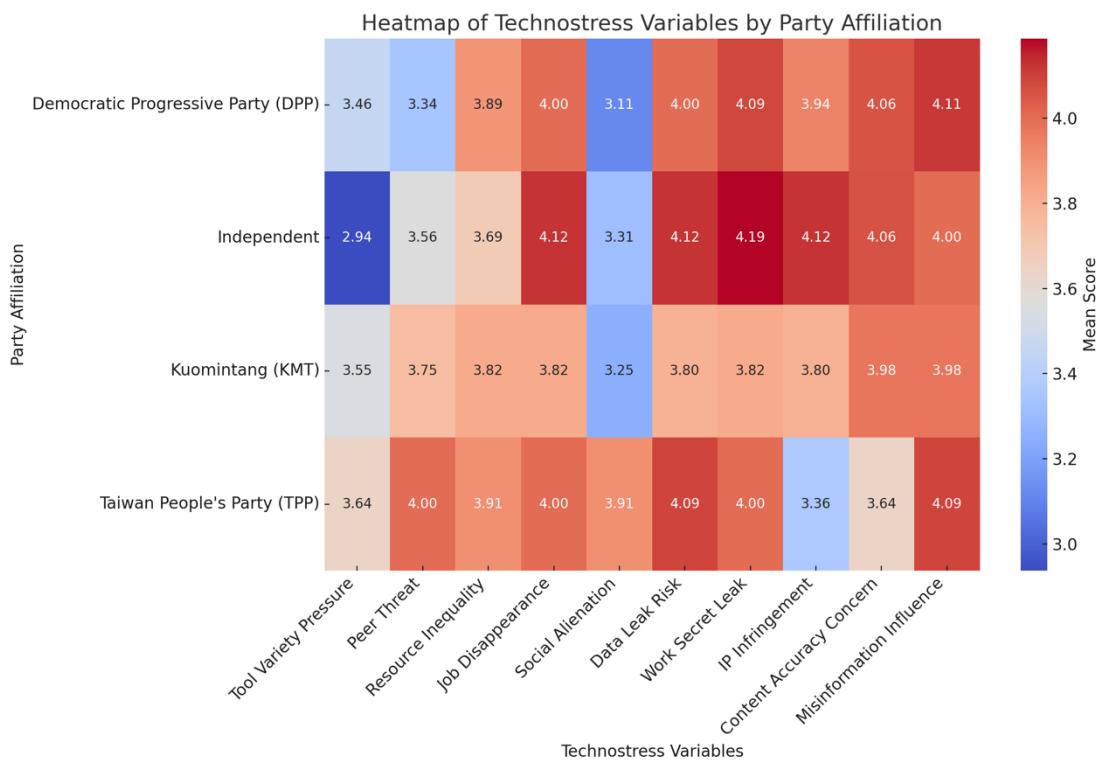
F 值 : 2.93, P 值 : 0.0346, 顯示不同黨籍在此壓力變項上的感知差異顯著。

5.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感到疏離」：

F 值 : 3.79, P 值 : 0.0112, 顯示不同黨籍在此壓力變項上的感知差異顯著。

(三) 圖表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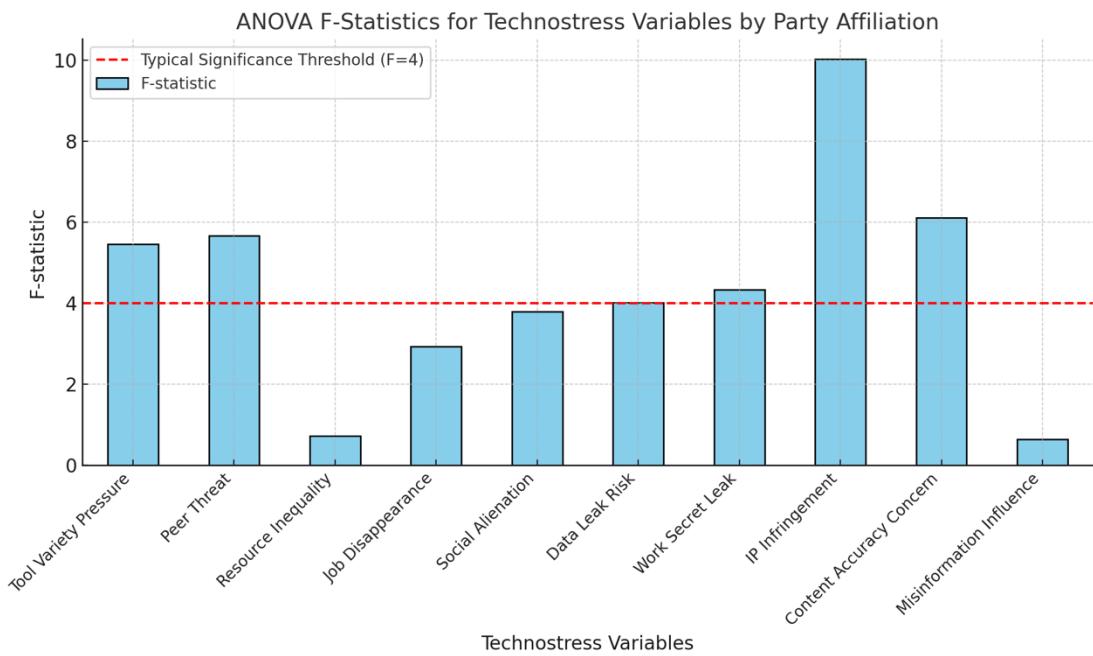
交叉分析熱圖（圖：4-1-3-12）展示了不同黨籍成員在各科技壓力變項上的平均分數，顏色深淺代表壓力感知的高低：



圖：4-1-3-12 黨籍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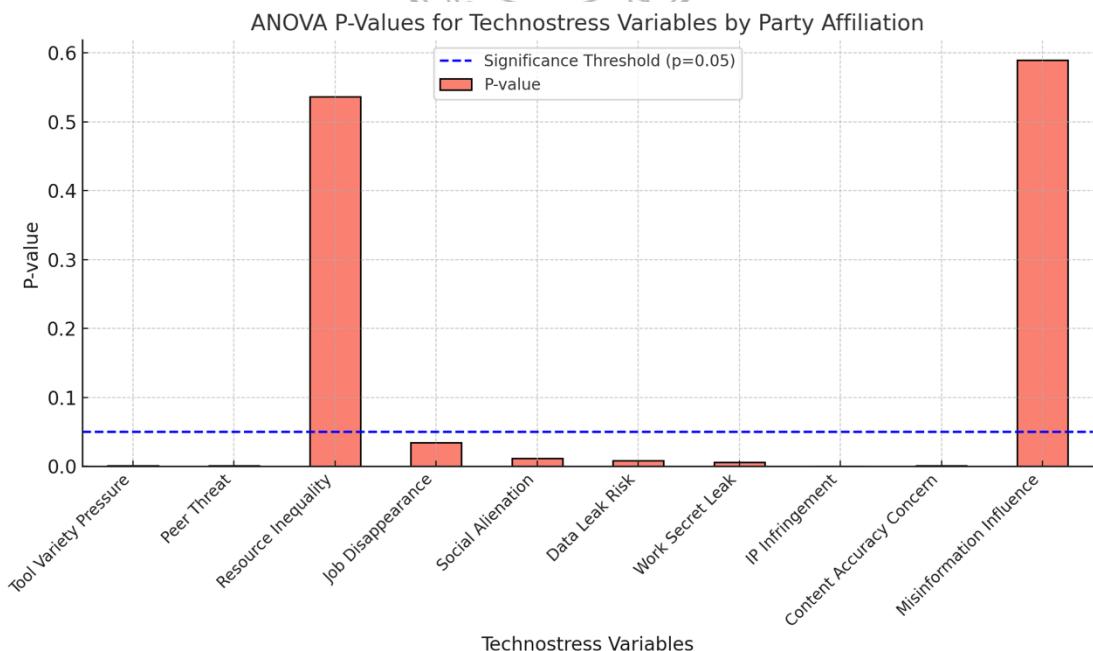
F 值條形圖（圖：4-1-3-13）顯示了每個變項的統計顯著性程度，紅色虛線標示了典型顯著性臨界值 ($F = 4$)：



圖：4-1-3-13 黨籍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F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P 值條形圖（圖：4-1-3-14）顯示了每個變項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藍色虛線標示了顯著性閾值 ($P = 0.05$)：



圖：4-1-3-14 黨籍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 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不同黨籍成員對 AIGC 工具的科技壓力感知具有顯著性差異，特別是在工具種類壓力、同儕競爭威脅和職業消失風險等方面：臺灣民眾黨 (TPP) 成員對工具種類繁多與同儕競爭威脅感知最強，需加強對其技術適應能力的支持。無黨籍成員對數據洩露風險和職業消失風險感知最高，提示需提供更多針對性技術安全保障。中國國民黨 (KMT) 對科技壓力的整體感知較低，顯示其成員可能更適應 AIGC 工具的使用。民主進步黨 (DPP) 成員對科技壓力的感知大多居中，例如對「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3.46) 和「AIGC 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3.89) 的感知屬中等程度。然而，其對「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的感知最低 (3.34)，顯示該黨成員對競爭壓力的敏感性較低。因此，針對該群體的技術推廣策略可重點強調技術的長期價值和公平性，減輕對潛在不平等的疑慮。

六、學群與科技壓力交叉分析

(一) 描述性結果

就最高學歷所屬學群（教育領域）而論，不同學群在各科技壓力變項之平均分數呈現可辨識的差異。首先，在「工具種類壓力」上，以資訊科技與計算機科學學群（以下簡稱資訊學群）得分最高 ($M=3.88$)，顯示其成員在面對工具快速分化、版本差異與功能重疊時，主觀選擇成本與更新追趕壓力最為明顯；文史哲學群最低 ($M=3.25$)，反映其在工具選擇上相對保守或使用場景較集中。其次，「同儕競爭威脅」以社會與心理學群最高 ($M=3.79$)，而傳播學群最低 ($M=3.00$)，意味前者在具比較導向或團隊協作密集的情境中，較易感受同儕採用與熟練所帶來的壓力；後者則可能因任務特性（如內容創作之風格與情境性）而降低了「工具即競爭力」的感受。再者，在「資源分配不均」上，資訊學群與傳播學群並列最高（均為 $M=4.00$ ），文史哲學群最低 ($M=3.63$)，顯示前兩者更敏銳於技術紅利集中、授權資源與訓練可近性之不均。於「職業消失風險」方面，社會與心

理學群最高 ($M=4.03$)、文史哲學群最低 ($M=3.75$)，顯示前者對於職務輪廓變動與技能替代的中長期憂慮較強。最後，「個資外洩風險」亦以社會與心理學群為最高 ($M=4.03$)，傳播學群較低 ($M=3.71$)，反映前者對資料敏感度與隱私保護之顧慮較深。

（二）顯著性檢定

透過 ANOVA 分析，不同學群在部分科技壓力變項上表現出顯著性差異，以下為主要結果：

1.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F 值：3.50，P 值：0.0087，顯示不同學群在此壓力變項上存在顯著差異。

2.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F 值：3.23，P 值：0.0133，表明不同學群在此變項上的感知壓力存在顯著性差異。

3. 「AIGC 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

F 值：0.91，P 值：0.4598，顯示不同學群在此壓力變項上的感知差異無顯著性。

4.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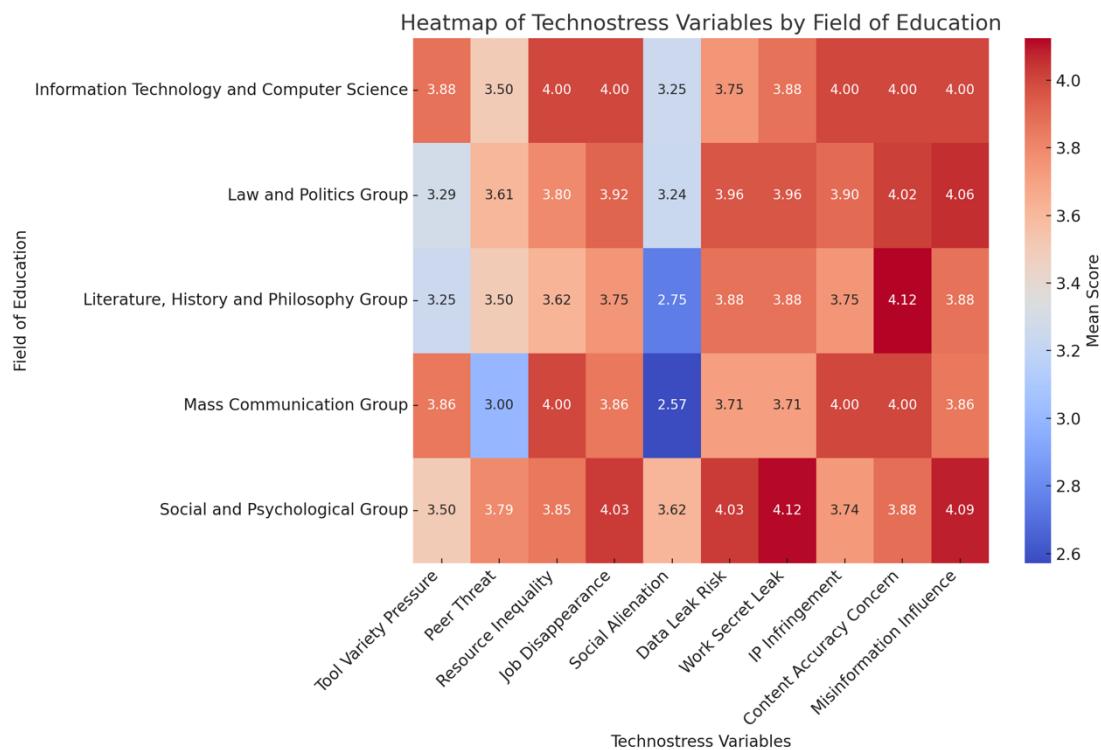
F 值：1.03，P 值：0.3908，表明不同學群在此壓力變項上的感知差異不顯著。

5.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感到疏離」：

F 值：5.35，P 值：0.0004，顯示不同學群在此壓力變項上的感知差異顯著。

（三）圖表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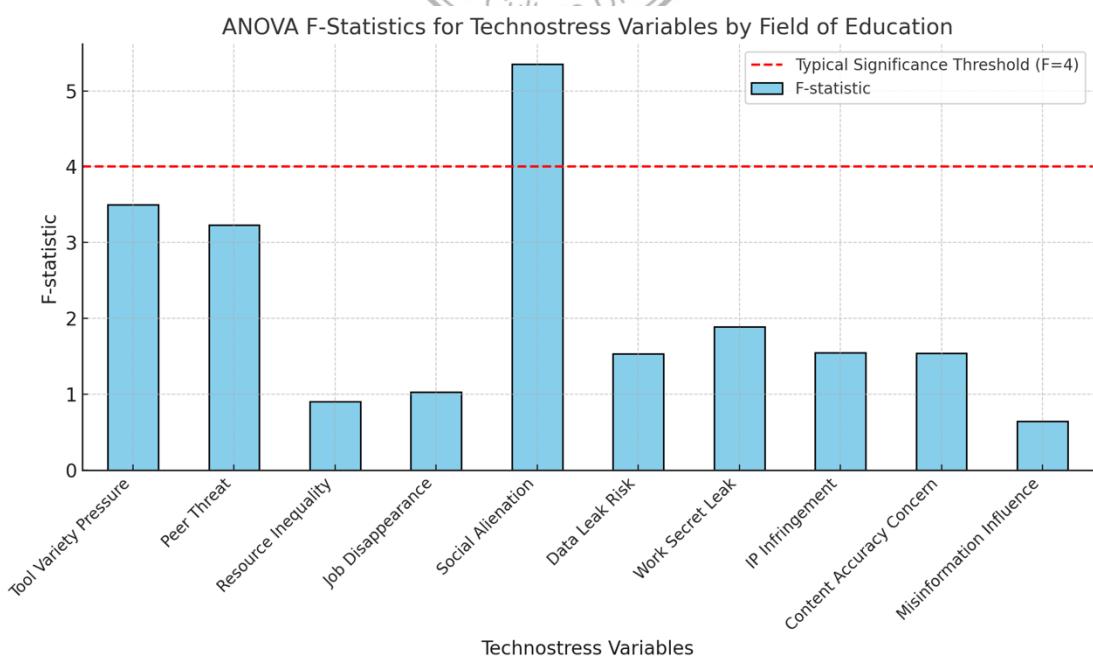
交叉分析熱圖（圖：4-1-3-15）展示了不同學群成員在各科技壓力變項上的平均分數，顏色深淺代表壓力感知的高低：



圖：4-1-3-15 最高學曆所屬學群與科技壓力的交叉分析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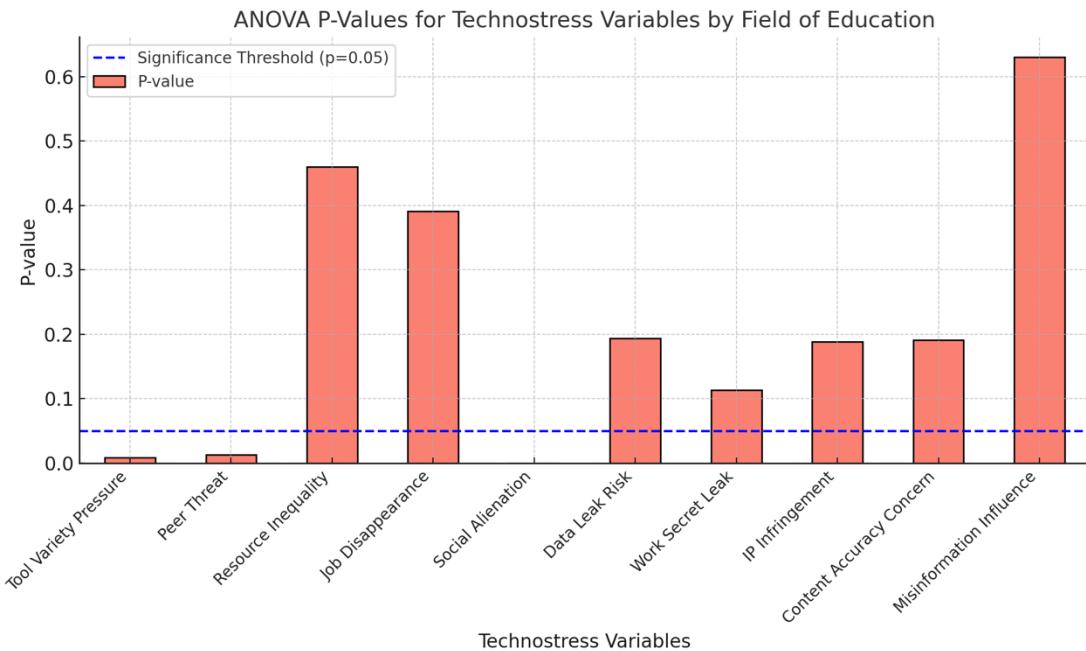
F 值條形圖（圖：4-1-3-16）顯示了每個變項的統計顯著性程度，紅色虛線標示了典型顯著性臨界值 ($F = 4$)：



圖：4-1-3-16 最高學曆所屬學群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 (F 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P 值條形圖（圖：4-1-3-17）顯示了每個變項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藍色虛線標示了顯著性閾值 ($P = 0.05$)：



圖：4-1-3-17 最高學曆所屬學群與科技壓力的顯著檢定（P 值）

來源：本文研究者繪製

（四）分析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學群成員對 AIGC 工具的科技壓力感知具有顯著性差異，特別是在「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和「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感到疏離」等方面：資訊學群成員對工具種類壓力和資源分配不均感知最強，需加強工具整合與使用便捷性設計；社會與心理學群：成員對同儕競爭威脅及數據洩露風險感知最高，應進一步提升技術透明性及安全保障。文史哲學群整體壓力感知較低，但需加強對技術應用場景的教育與支持，促進 AIGC 工具的應用。

肆、綜合討論：主要研究發現

一、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發現

(一) 性別差異

根據交叉分析結果，男性與女性在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變數上呈現顯著差異：

1. 感知有用性 (PU)：女性的評分 ($M=3.71$) 顯著高於男性 ($M=3.33$)，表明女性更認同 AIGC 工具能提升工作效率與效能。
2. 感知易用性 (PEOU)：男性的評分 ($M=3.69$) 顯著高於女性 ($M=3.39$)，顯示男性更偏好工具操作的直觀性與簡單性。
3. 行為意圖 (BI)：女性的評分 ($M=4.00$) 高於男性 ($M=3.77$)，顯示女性在未來採用 AIGC 工具的積極意圖更強。
4. 主觀規範 (SN)：男性的評分 ($M=3.90$) 略高於女性 ($M=4.07$)，顯示男性更容易受到來自同儕或社會的影響。
5. 知覺行為控制 (PBC)：男性的評分 ($M=3.38$) 高於女性 ($M=3.00$)，顯示男性對技術操作的自信心更高。

(二) 世代差異

不同世代對 AIGC 技術的接受度和使用意願存在顯著差異：

1. 1995-2004 年出生 (年輕世代)：在感知有用性 (PU)、行為意圖 (BI) 與知覺行為控制 (PBC) 上的評分最高，表明他們對新技術的接受度和操作自信心最強，且對技術創新抱有更高的期待。
2. 1964 年及以前出生 (年長世代)：在主觀規範 (SN) 上的評分最高，反映出其對來自同儕與社會壓力的敏感性較強，但在感知易用性 (PEOU) 上的評分最低，顯示其在操作新技術時的適應挑戰較大。

(三) 學歷差異

不同學歷背景影響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接受度：

1. 博士學歷者：在感知有用性 (PU) ($M=3.86$) 與知覺行為控制 (PBC) ($M=1.81$) 上得分最高，表明其對工具價值的高度認同及操作自信心。但在感知易用性 (PEOU) 上的評分相對較低，顯示他們可能對工具的簡單性需求較

少。

2.大學學歷者：在感知易用性 (PEOU)($M=3.35$)與行為意圖 (BI)($M=3.53$)上得分最高，表明大學學歷群體更關注工具操作的便利性及實際應用意圖。

(四) 學群差異

學群背景顯著影響對 AIGC 技術的認知與應用：

- 1.資訊科技學群：在感知有用性(PU)與行為意圖 (BI)上評分最高，表明其對 AIGC 工具的實用性與創新應用有高度認同。
- 2.文史哲學學群：在所有變數上的評分均相對較低，顯示其對技術的認知與應用仍有待提升。

3.社會與心理學群：在感知易用性 (PEOU)與知覺行為控制 (PBC)上評分較高，顯示其對技術操作的直觀性與自信心更強。

(五) 總結

性別、世代、學歷與學群等背景因素均對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中的關鍵變數產生影響。針對不同背景群體的技術推廣策略需考量這些差異，例如：對女性群體，應強調工具的應用效果與實際價值；對年輕世代，應聚焦於創新功能與實用場景展示；對文史背景者，應強化操作培訓與工具功能引導。

二、科技壓力理論的發現

(一) 性別與科技壓力

性別在科技壓力的感知上呈現顯著差異：

- 1.工具種類壓力：女性在「AIGC 工具的多樣性帶來壓力」上的得分 ($M=3.71$) 顯著高於男性 ($M=3.33$)，顯示女性更容易感受到工具繁多帶來的挑戰。
- 2.同儕競爭威脅：男性的得分 ($M=3.69$) 高於女性 ($M=3.39$)，表明男性更強烈地感受到同儕使用技術帶來的競爭壓力。
- 3.資源分配不均：女性的得分 ($M=4.00$) 高於男性 ($M=3.77$)，顯示女性

對技術應用中可能引發的資源分配不公更為敏感。

4.職業消失風險：女性的得分（ $M=4.07$ ）顯著高於男性（ $M=3.90$ ），顯示女性更擔心 AIGC 技術可能導致的職業變遷與失業風險。

（二）年齡與科技壓力

不同年齡段對科技壓力的感知存在顯著差異：

1.年長群體（1964 年及以前出生）：在「學習新技術的壓力」與「AIGC 工具干擾工作節奏」的感知最高（平均分均為 4.0），顯示年長者對學習負擔及技術適應的壓力尤為明顯。

2.中年群體（1975-1984 年出生）：在「工具數量增加壓力」（ $M=3.32$ ）和「學習新工具壓力」（ $M=3.50$ ）上壓力逐步增強，可能因為其面臨的職業責任與技術要求雙重增長。

3.年輕群體（1995-2004 年出生）：雖具備較強的技術接受能力，但對「工具介面過於複雜」的壓力感知較高（ $M=3.78$ ），表明其在技術繁瑣性上仍需支持。

（三）工作年資與科技壓力

工作年資對科技壓力的影響顯著，尤其在工具數量、同儕競爭與數據洩露風險等方面：

1.工作年資 0-4 年（新進人員）：在「工具種類壓力」（ $M=3.44$ ）與「數據洩露風險」（ $M=3.97$ ）上的壓力最高，顯示初入職場者對技術適應與數據安全的擔憂明顯。

2.工作年資 8-12 年（中年資群體）：在「工具數量增加壓力」（ $M=3.70$ ）和「數據洩露風險」（ $M=4.10$ ）上的感知壓力最強，可能因為其面臨技術學習與業務繁忙的雙重壓力。

3.工作年資 13 年以上（資深人員）：在「競爭威脅壓力」（ $M=3.75$ ）上壓力最高，但在「數據洩露風險」（ $M=3.00$ ）上的壓力最低，顯示資深群體對技術學習壓力的適應力有所提升。

(五) 學歷與科技壓力

不同學歷群體在科技壓力感知上有明顯差異：

- 1.大學學歷：在「工具種類壓力」($M=3.58$)與「資源分配不均」($M=3.83$)上的感知壓力最高，顯示大學學歷者對技術多樣性與公平性問題更為敏感。
- 2.博士學歷：在「職業消失風險」上的壓力感知最高 ($M=4.10$)，顯示其對AIGC 技術可能帶來的專業衝擊尤為關注。
- 大專學歷：在「數據洩露風險」($M=4.00$)上的感知最高，顯示其對數據安全問題的擔憂強烈。

(五) 總結

科技壓力的感知因性別、年齡、工作年資與學歷的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針對這些發現，技術應用與推廣策略應有所區別：對女性，應加強資源公平性與數據安全性的保證；對年長者，應簡化技術介面並提供更多學習支持；對新進人員，應重點關注工具適應與數據安全教育；對大學學歷者，應聚焦於工具整合與功能簡化。

三、模型與理論的交互發現

(一) 技術接受模型 (TAM) 與科技壓力理論的互補性

本研究顯示，科技壓力對 TAM 之關鍵路徑具有實質干擾。首先，來自工具複雜性與學習負擔的壓力，直接侵蝕 PEOU 與 PBC，並透過 PEOU、PBC 的下降，間接抑制 BI。此一現象在年長群體與中年資群體上尤為明確：前者因學習門檻與介面負荷使 PEOU 顯著偏低，後者則在高強度任務與整合要求下，呈現 PBC 的相對不足。其次，PU 具補償效果：當工具價值被清楚體現在效率、品質或可追溯性的改善時，即使壓力感偏高，BI 仍可維持在中高水位；女性樣本在 PU 高點時之 BI 上升，提供了此一路徑的經驗支持。整體而言，TAM 與科技壓力理論並非競爭式解釋，而是互補式地描繪「價值—易用—控制」與「壓力—負荷—抑制」兩股力量的拉鋸。

(二) 社會影響與壓力的相互作用

主觀規範 (SN) 對 BI 具有正向推力，但其來源若被知覺為「同儕競爭」或「過度期待」，便可能轉化為壓力因數而削弱採用信心。本研究一方面觀察到 SN 對 BI 的正向關聯（特別是在可見的示範與部門支持存在時），另一方面也發現男性在「同儕競爭威脅」上的壓力顯著較高，指向規範與壓力的「雙面性」。值得注意的是，SN 的性別差異雖在描述上女性略高，但其作用方式仍須置於情境中解讀：在鼓勵與支援充分時，SN 多轉化為採用誘因；反之，當規範以競逐與比較的形式呈現時，SN 可能經由壓力路徑抑制 BI。

(三) 年齡與學歷對模型與理論的調節作用

世代與學歷對 TAM 路徑與壓力路徑皆具有調節效果。年輕世代(1995–2004) 在 PEOU 與 PBC 皆較高，能以較低的壓力負荷換取較高的 BI；年長世代 (1964 及以前) 則在工具複雜與更新節奏上承受較高壓力，進而壓低 PEOU 與 BI。學歷方面，博士群體在 PU 與 PBC 上具優勢，顯示其對工具價值與自我掌控感較強，但同時對「職業消失風險」之擔憂也較高，可能抵銷部分採用動機；專科群體對「個資外洩風險」敏感度較高，易以安全顧慮壓抑 BI。

(四) 壓力與技術價值的動態平衡

當壓力累積至一定水準後，PU 的補償力道遞減，即使工具被評為有用，仍不足以推升 BI；此現象在中年資 (8–12 年) 群體最為明顯，會使價值感難以轉化為採用意圖。相對地，當工具價值以可被驗證的方式傳遞（效能指標、流程簡化、錯誤率下降、可追溯性強化），壓力的主觀感受可被部分緩解，並透過提升 PEOU 與 PBC 回補 BI。換言之，價值傳遞與壓力治理需「同步並行」，任一端的缺位都會削弱整體採用。

(五) 政策與實務建議

基於 TAM 和科技壓力理論的交互發現，政策與實務應針對不同群體特徵採取差異化策略：其一，針對年長者：提供簡化的工具介面設計和專屬學習支持，降低壓力，提升「PEOU」；其二，針對年輕世代：聚焦於展示工具創新性與實際

應用場景，強化「PU」，以激發更高的技術接受度；其三，針對學歷差異：對專科背景者，加強基礎技術培訓與安全保障，減少「數據洩露風險」等壓力。對博士學歷者，聚焦於工具的專業應用價值與職業發展潛力。

（六）總結

技術接受模型 (TAM) 和科技壓力理論的交互發現強調，科技壓力對技術接受的影響不容忽視，而技術價值的有效傳遞與壓力管理的平衡是推動 AIGC 技術採用的關鍵。通過針對性政策與技術設計，能更好地促進不同群體對技術的廣泛接受。

第二節 質性分析結果

壹、資料分析方法與編碼程式

一、編碼方法說明

在質性研究的分析過程中，編碼 (coding) 是將原始文字資料系統化並意義化的關鍵步驟。本研究透過逐字稿、備忘錄與相關訪談紀錄的深入閱讀，將訪談內容中具研究意義的片段以代碼 (code) 加以標記，並在後續過程中不斷精煉、歸納、分組，以形塑最終的分析主題與概念架構。透過嚴謹的編碼程式，研究者得以從龐雜的語言敘事中提取核心議題、隱含觀點與邏輯脈絡，使得質性資料能夠更有條理地對應研究目的、理論構面和初步假設。

在編碼策略上，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 作為整體方法論的框架。主題分析允許在不預先強加嚴格類目之下，以開放視角探索資料中反覆出現且具意義之概念與議題；同時，本研究亦以既有理論架構(如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會影響、科技壓力與行為意圖等)作為參照，以確保分析結果與研究問題保持緊密連結。故本研究之編碼策略並非純然自下而上的歸納 (inductive)，亦非完全自上而下的演繹 (deductive)，而係兼採二者的「綜合式

編碼」：一方面保留對新興主題的敏感度與彈性，另一方面於對映既定理論構面時，審慎辨識與吸納能夠支撐或修正初步假設的材料。

在操作層次，編碼依序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初步編碼 (open coding)：研究者逐字通讀各份逐字稿，對任何具研究價值之文字片段加註代碼。此階段代碼粒度較細、數量龐多，目的在最大限度保留資料訊息，而非即刻將代碼套入預設類目；即便已有理論參照，仍以「忠實於文本」為原則賦碼，維持後續整併的彈性。第二，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研究者比較、整併與精煉初步代碼，辨識其關聯性並形成較高階之主軸主題（如「提升效率」「學習負擔」「同儕影響」「技術不確定性」「本土化需求」等）。既有理論（如 TAM、TPB 與科技壓力要素）在此階段作為定位坐標，協助將零散代碼組構為脈絡清晰的主題叢集；惟若資料顯示新興議題，則保留其獨立性，避免被理論框架過度吸納。第三，選擇性編碼 (selective coding)：研究者回到研究問題與理論構面整體檢視主題間之關聯，建立敘事主軸與概念架構，並釐清可能的因果與條件脈絡。此階段亦用以檢核初步假設（如 PU 正向影響接受度、科技壓力負向影響接受度、社會影響促進技術意圖等）是否獲得質性佐證，或需修正與補充其適用條件。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編碼方法是一個有機、循環、動態的過程，即先以開放態度進行初步編碼，捕捉各種可能相關訊息；再通過主軸編碼將類似代碼整合為較高階、具邏輯結構的主題；最後透過選擇性編碼將主題與研究問題、理論模型做整合對應。

此三階段的編碼途徑確保研究者能同時保留資料的豐富度與彈性，又不失焦點地將結果收攏到主要理論構面中。編碼方法的選擇與執行，使得繁雜、細碎的訪談資料得以系統化分析，為後續的質性研究結果呈現與跨主題統整奠定穩固的基礎。透過嚴謹而彈性的編碼過程，本研究得以在最後呈現出一套能呼應研究模型、支撐或修正量化假設以及進一步啟發新議題的分析結果。

二、編碼步驟與一致性檢核

本研究在完成編碼方法的界定後，遂按照明確且有序的編碼步驟來執行實務分析，並於過程中採取多重策略以確保編碼結果的一致性與信度。這些步驟與檢核機制旨在使研究者能在面對龐雜而多元的訪談文本時，仍能維持分析的嚴謹性、透明度與再現性。

首先，編碼程式從「初步整理」開始。研究者於取得訪談逐字稿後，先將文本加以格式化處理，以確定每一受訪者、每段對話及重要的非言語標註（如停頓、笑聲）皆清晰標示，並移除不必要的雜訊（如錄音雜音的註記、無實質意義的語助詞）。此整理階段對後續編碼至關重要，因為只有在文本清晰整合的前提下，研究者才能順利針對內容加註代碼。

其次，研究者進行「初步編碼」。研究者逐字、逐行細讀文本，對於任何顯示出特定概念、行為、態度、困擾、支持因素或情境資訊的文字片段加以標註代碼。此時代碼的數量預期相當龐大且繁雜，因為研究者不會限制代碼的形成，以免過早排除潛在有用訊息。初步編碼的重點在於「不吝給碼」，並以一種開放性的態度探索文本中可能蘊含的多元意義。

其三，研究進入「主軸編碼」階段。研究者將先前眾多零散代碼加以歸納、對照與合併，以辨識其間的關聯性與層次架構。此時，研究者對代碼進行篩選與合併，將相近意義的代碼合而為一，並將範疇過於廣泛的代碼細分為更能反映資料實質內容的次級代碼。經過這道程式，原先凌亂的代碼海洋逐漸分化出若干中階主題，使研究者得以清晰梳理文本所突顯的論述方向與涵義面向。

其四，研究者進行「選擇性編碼」，將較高階的主題加以整合，形塑最終核心主題及其支撐結構。在此階段，研究者檢視先前所形成的主題組合，確認其是否能有效解釋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及對應已建立的理論模型構面。若有主題顯得冗餘、重疊或與研究核心議題不符，研究者會進行調整或刪除，使整合後的主題架構更為精煉且具邏輯連續性。

在品質控管方面，本研究於各編碼階段同步進行多層次一致性檢核。其一，研究者透過「反覆對讀」與「代碼對照」，定期回看已賦碼語段，檢查代碼命名

與分類標準是否前後一致；若發現用語不明或準則偏移，立即修正並更新代碼本（codebook）與決策紀錄（audit trail），確保後續處理可追溯。其二，在可行情形下實施「同儕檢核」（peer debriefing）：邀請未參與研究但具質性方法經驗之學術夥伴抽閱部分已編碼文本，就代碼適切性、清晰度與邏輯一致性提出意見；研究者再就意見回到文本語境與決策歷程檢核，必要時修訂命名或分類。其三，進行「跨文本對照」（cross-case comparison），比較不同受訪者同類代碼於異質情境中的語義穩定性；若代碼於多數文本中呈現一致意涵，則其概念效度與通用性相對較高；若僅見於少數特殊情境，則考慮下修為子代碼或於報告中特別標記其情境侷限。於條件許可時，亦可輔以一致性指標（如 Cohen's κ ）或第二賦碼者對讀，以強化一致性證據（本研究不強制要求，視可行性採行）。

綜合以上，編碼步驟自初步整理、初步編碼、主軸編碼至選擇性編碼，形成「開放擷取—聚斂整合—理論對接—結構化呈現」的循環機制；而反覆對讀、同儕檢核、跨文本對照與代碼本／稽核紀錄之維護，則構成一致性與信度的保障。此一程序不僅提升分析之可信度（credibility）與可依賴性（dependability），亦強化了研究過程之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與可移轉性（transferability），為後續質性主題、概念架構與量化結果的對照解釋，提供穩固且可檢核的基礎。

貳、主題分析結果

一、感知有用性（PU）相關主題

（一）效率提升與工作表現改善之敘述

從實際訪談內容中可見，受訪者普遍認為 AIGC 技術的運用，能明顯縮短他們在行政事務、政策研究以及資訊彙整等任務上的時間投入，並提升整體工作表現。多位受訪者在談及使用 AIGC 工具時，提到過去需要花費相當長時間來從網路或既有文獻中尋找資料、整理檔、對照法條、準備質詢稿件，如今透過 AIGC 技術，僅需輸入關鍵字或提供初步引導，即可快速獲得具有參考價值的文本或摘要。這種「節省時間」的特性使受訪者能將原本耗費在基礎蒐集與整理上的精力，

轉移至更高階的思考與決策層面。

例如，有受訪者在訪談中明確指出，透過 AIGC 工具，許多原需人工作業反覆查找、整合的繁瑣程式得以簡化，使他們不必再為了搜尋特定政策背景或法條修正沿革而花上數小時瀏覽海量檔。若過去要從議事公報、網路社群資訊及歷史資料中萃取精華，常需加班熬夜，而現在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得到初步的資訊架構並進行微調。此一過程不僅提升效率，更讓工作表現得以聚焦於分析、思考、應對策略的擬定。

除此之外，受訪者亦強調，AIGC 技術讓臨時任務的處理更加敏捷。當上級或委員臨時要求在短時間內產出某個議題的整理摘要或法案政策說帖，助理不再陷入手忙腳亂的資料蒐集困境，AIGC 工具的快速產出特性為此種臨機應變提供了穩定的基礎。整體而言，受訪者的回饋顯示 PU 在效率面有明顯呈現，並帶來實質的工作績效改善。

（二）實務案例與代表性引述

為更直觀地呈現上述觀點，以下摘錄受訪者在訪談中的實務案例與代表性言論，均來自本研究先前取得的逐字稿內容：

有一位受訪者談到使用 AIGC 技術協助整理資料時表示：

「在行政功能上，它其實就是縮短行政上的時間。」(A-PU-03)

過去他必須花費極長時間搜尋、彙整眾多網路資訊與檔，現在僅需提供初步指令，AIGC 工具即可快速產生可供參考的文本架構。此簡潔明瞭的敘述凸顯了該技術直接縮短任務完成時間的能力，進而提升整體工作效率。

另一位受訪者在提及準備政策研究材料時則分享到：

「我覺得主要是用在政策研究…然後就變成說縮短了時間。」(F-PU-03)

從此言論可見，AIGC 工具成為他在處理政策研究資料時的節能利器，使原本冗長的搜尋與彙整過程明顯縮短。這位受訪者的經驗說明了工具的有用性不僅體現在單純的行政瑣事上，也能有效應用於更高層次的資訊分析工作。

還有受訪者明確指出 AIGC 工具對臨時需求的幫助，例如當需要在短時間內產出某法案的概要或論述時，他談到：

「遇到問題時，我可以直接透過這個工具快速得到初稿，再進行修正。」(D-PU-03)

此實務案例強調了工具的應變能力與協助快速起稿的實質價值，使助理能在壓力情境下保持工作節奏的順暢。

這些代表性引述皆顯示出 AIGC 工具在受訪者心中所象徵的「有用性」內涵：不僅加速重複性作業流程，減輕資料整理的負擔，更賦予使用者將時間與精力投注於更具策略性、創造性工作內容的可能。透過實務案例與親述經驗，我們得以確認，PU 在本研究訪談對象的敘述中並非抽象概念，而是深植於日常工作經驗之中的具體、可感、且值得信任的技術特性。

二、感知易用性（PEOU）相關主題

(一) 敘述

在訪談資料中，有關 PEOU 的敘述聚焦於受訪者對 AIGC 工具在上手難易度、學習曲線以及操作直覺性的認知。整體而言，受訪者對此技術的易用性評價傾向中性偏正向，即多數人並不覺得這類工具的基本操作十分困難，但也指出剛開始使用時仍需要一定的學習過程與嘗試調教 (prompting) 才能熟悉系統反應原則。

在初期，有受訪者坦承自己並非一上手就能輕鬆運用 AIGC 工具，部分原因在於對工具的功能範圍和指令表達尚不清楚，需要一段試錯期。然而，一旦使用者掌握基本指令下達方式、瞭解系統運作邏輯，並能熟悉如何提出關鍵字或適當的引導語，整體操作門檻並不高。這種從「不熟悉」到「熟悉」的過程並非漫長，多數受訪者表示透過短暫的摸索、觀摩同儕示範或自行嘗試，就能進入「操作順暢」的狀態，減少先前對技術陌生所帶來的心理障礙。

此外，已有使用者提及，AIGC 工具所需的操作技能主要是一般電腦與網路使用的基本素養，並不要求特殊的程式語言或高度專業知識。這使得工具的易用性範疇顯得更加寬廣，讓不具備科技背景的人也能透過簡單學習快速上手。整體來看，「易用」並非完全無代價，但透過習慣養成和互動經驗累積，AIGC 工具最終可呈現出相對便捷與直覺的特質，使使用者在日常工作中自然運用。

（二）實務案例與代表性引述

以下摘錄的實務案例與受訪者原話，皆為本研究訪談資料中能充分代表PEOU 觀點的敘述：

有一位受訪者在談到操作經驗時指出：

「操作上面其實，好不好用，在於說你的熟練度啦。很多 AI 軟體，理論上剛開始沒有人會覺得好用，但是你用久了、用習慣了，理論上這些問題就已經不是問題了。」(A-PEOU-01)

此番言論清楚顯示了受訪者對易用性的理解——初期入手或許稍有不適，但並非高牆，而是一段緩和的學習曲線。在不斷重複操作後，使用者能自然地掌握訣竅，並將操作難度視為已可輕鬆跨越的門檻。

另一位受訪者則強調工具本身不需專精技能即可掌握：

「我覺得不需要特別厲害的程式背景，有基本的電腦操作能力就能上手。就是多試幾次，你會發現你要怎麼跟它溝通，它給你的結果就越來越接近你想要的。」(C-PEOU-01)

透過此案例可看出，受訪者認為易用性不是指無需學習，而是在於其「可習得性」相對高。只要肯嘗試與反覆操作，便可在短期內使工具為己所用。

也有受訪者以「使用習慣」的觀點詮釋易用性：

「一開始會覺得有點卡，不知道該怎麼給指令。但看過同事怎麼用，自己多練習幾次後，就覺得其實蠻直覺的，不用太費力。」(D-PEOU-02)

這段引述特別彰顯了同儕示範與自我練習對提升易用性的助益。透過對同儕操作過程的觀摩，使用者快速習得關鍵技巧，並以最小的學習成本完成從陌生到熟悉的過渡。

綜合上述案例與引述可知，PEOU 並非在訪談中被描繪成「一上手就輕而易舉」，然而受訪者並不將初期的緊張感視為難以逾越的障礙。相反地，多數人對於 AIGC 工具的操作難度評價是可管理、可適應的。他們認為透過適度的學習、觀察與練習，其操作模式並不複雜，反而展現出相對友善與親切的特質。透過此正向的學習曲線，PEOU 主題在整體質性敘述中得到了充足的實務佐證，顯示 AIGC 工具的易用性為提升技術接受度的重要推力之一。

三、社會影響 (SN) 相關主題

(一) 敘述

在質性訪談中，有關「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 SN) 之議題主要體現在同儕、上級及跨辦公室的互動脈絡中。受訪者多次提及，AIGC 工具的採用並非僅是個人技術偏好或工作需求的純粹反應，還受到周遭環境氛圍與外部期待的推動與制約。這些外部影響包括：看到他人（如同事、其他委員辦公室助理）已開始使用該技術而感到有「跟上」的壓力、上級或委員對科技應用的態度，以及跨政黨、跨派系的助理群體之間形成的使用風潮。

多位受訪者指出，當周遭的辦公室同儕已經積極運用 AIGC 工具提升工作效率，若自己仍然停留在傳統作業模式，將顯得落伍，甚至在質詢準備與資料彙整的競爭中失去優勢。這種「不願被他人超前」的心態明顯屬於社會壓力的體現，促使受訪者更快地嘗試、學習並接受該技術。此外，一些受訪者提到，不同政黨辦公室之間也存在互相比較的隱形競爭：某些黨團的助理普遍年輕且具科技敏銳度，迅速掌握 AIGC 工具的操作要領，形成一股使用潮流，間接給予其他黨團辦公室壓力，使之不敢輕忽技術發展的趨勢。

除同儕層面外，上級的態度與期望亦對使用者形成一定的外在規範。有些受

訪者雖未明確表示上級硬性要求使用 AIGC 工具，但透露上級期盼其工作成果更快更好，而當周邊的人都透過這類工具達成更佳績效時，自然讓人感到應該跟進，以免給老闆留下「不主動、不精進」的印象。

整體而言，社會影響在此脈絡下並非單一方向的強制要求，而是經由同儕、組織文化、政黨屬性與工作生態慢慢釋放的訊號，讓使用者感受到「不使用可能會落後」、「他人使用讓我也得上手」、「團隊期待我善用科技」等心理壓力與誘因。

（二）實務案例與代表性引述

以下為從訪談中擷取的代表性敘述，顯示社會影響對使用者技術接受行為的潛移默化：

有受訪者提到同儕壓力和競爭氛圍時表示：

「壓力肯定是有，但也不會太大。因為 AI 技術的應用需要時間去熟悉和養成，即使其他人現在開始使用，他們在這方面的積累應該不會比我久。所以，我認為目前的情況是我已經走在前面了，他們其實是在追趕我。」(A-SN-01)

這位受訪者的談話顯示，他非常清楚周遭有人在使用 AIGC 工具，但同時也認為自己的先行嘗試讓他在群體中保持領先，不想被後來者超越。在此例中，社會影響並非單向壓力，而是多方競合，促使使用者積極投入技術學習，以在群體中保持地位。

另一位受訪者更直白地談及他人在使用 AIGC 時給予的無形壓力：

「遇到問題的時候，我會優先選擇 AI 工具來解決，因為大家都在用，我不用的話好像就顯得我落後了。看見別的助理辦公室已經熟練運用，我會覺得自己也必須跟上。」(B-SN-01)

此言論中清晰體現出社會參照的力量：並無上級硬性要求或強制指令，但同儕使用狀況已足以讓該受訪者感受到必須行動。此處的社會影響是透過他人先行使用、成功案例、技術熱潮的醞釀而發揮作用。

亦有受訪者談到黨團環境對技術接受的影響：

「民進黨助理普遍比較年輕，好像更快掌握 AI 工具，我們這邊（國民黨）也不能太落後，不然在質詢準備和政策分析上被比下去，委員可能會覺得我們不夠積極。」(C-SN-06)

在這段引述中，明顯看到社會影響不僅存在同儕間，也透過黨籍、派系文化與議事成效的比較，讓使用者感受到必須提升自身技術能力的壓力。這說明社會影響可能來源廣泛，並不只限於辦公室內部，也包含跨黨團、跨組織的風氣。

透過上述案例與引述可見，社會影響 (SN) 在此研究場域中以「不願落後他人」、「想維持群體定位」、「顧慮上級與黨團期待」、「同儕間的技術競賽」等多種樣態呈現。這種多層次的社會壓力並不總是明確規範，而是多半隱性地形成一股推力，引導使用者接受並使用 AIGC 工具，以維繫在工作圈與政治生態中應有的角色與尊嚴。

四、行為意圖 (BI) 與策略應對

(一) 正向使用意願與推薦行為

在 BI 的相關主題中，受訪者普遍呈現出正向的使用意願與持續探索 AIGC 工具之傾向。訪談內容顯示，多數使用者在經過實務應用、體驗到工具於效率提升與工作支援上的實質幫助後，並未止步於嘗鮮使用，而是傾向將其納入日常工作體系中，並在未來繼續改善與精進相關能力。這種正向的行為意圖不只體現在使用者本身的計畫中，也體現在他們對外部的推薦行為上。

受訪者表示，當面臨複雜資料的梳理、臨時任務的壓力抑或政策研究的挑戰時，AIGC 工具的輔助已成為他們第一時間考慮的選項之一。這意謂著在決策過程中，AIGC 工具已躍居為相對高優先序的解決方案。更有受訪者提及，隨著對工具特性的理解更加深入，他們打算持續探索進階用法，期望在學習提問方法、指令優化 (Prompt Engineering) 以及最佳實務案例上精進，以便將工具產出的初

稿或資訊摘要不斷提升品質，最終實現人機協作的最大價值。

同時，部份受訪者不僅願意持續使用，也主動表達了向同事或其他有需要的人推薦此工具的意願。他們認為，AIGC 工具若能在更多同仁、友人、甚至公務系統中推廣，將有利於整體資訊處理與決策品質的提升。對於尚未開始使用或仍猶豫的夥伴，他們願意提供操作經驗與學習心得，期望藉此降低他人入門的阻力。此種由內而外的推薦行為不但鞏固了工具的存在價值，也預告著該技術應用的正向擴散。

綜合來看，行為意圖的正向展現並非單純因為外界要求或一時好奇，而是基於使用者在實踐中累積的正向體驗與可持續改善的未來圖景所生發的內在動力。

（二）實務案例與代表性引述

以下為自訪談內容中擷取的實務案例與參與者原話，能充分呈現行為意圖（BI）與策略應對的正向面貌：

有一位受訪者明白表示在面臨問題時會優先考慮 AIGC 工具：

「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A-BI-02）

此句話雖簡短卻精準傳遞該受訪者的決策傾向：工具已被內化為工作流程中的重要選項。並非僅在例外狀況使用，而是成為例行策略的一部分，顯示該使用者在行為層面已對此技術產生持久的依賴與信任。

另一位受訪者談到對他人推薦的部分時強調：

「我會推薦他人使用 AI 工具。」（F-BI-01）

透過這個具體表述，我們能明白該受訪者不僅在自身應用中感受到該技術的益處，也願意將這股正向經驗分享給他人。此種推薦行為意涵著使用者對技術價值的肯定，並希望藉由擴散性行為讓更多人受惠。

還有受訪者對未來精進策略有所認知：

雖然訪談中未必字字提及「精進」字樣，但有參與者顯示出希望更熟練提問、優化指令的想法。例如在談及使用體驗時，表示會在閒暇時自主學習更多關鍵字

設定方法或參考同事對指令調整的成果，以求下次使用時能獲得更精準、優質的產出。這種主動優化策略的態度間接映射出該使用者的行為意圖並不侷限於當下，而是持續向未來延伸。

總結而言，「行為意圖（BI）與策略應對」的主題顯示出使用者並非被動地接受 AIGC 工具，而是主動地將其整合到日常工作決策中，並願意透過不斷優化與自我學習強化使用成效。他們在遇到問題時優先考慮該工具、願意將其推薦給他人、並在使用過程中不斷調整策略，以期獲得更好的輸出品質。從這些多層次的行為表徵可見，BI 已成為扎實且具動能的存在，預示 AIGC 技術在此工作場域的深耕與長期拓展。

五、科技壓力（Technostress）相關主題

（一）技術變遷快速、競爭壓力與心理負擔

在訪談內容中，受訪者清晰地表達出一種因科技進步迅猛、應用不斷推陳出新而產生的心理負擔。AIGC 工具的更新迭代速度使得使用者必須持續跟上技術發展腳步，不得不頻繁學習新的功能、嘗試不同的指令設定，甚至投入私人時間以免落後於人。此種快速變遷帶來的「學習壓力」與「調適壓力」，使原本應該輔助工作的工具反而在心理層面成為一種負擔。

不僅如此，隨著越來越多同僚或其他辦公室人員開始熟練運用 AIGC 工具，一種「不想落後他人」的競爭壓力自然生成。有受訪者指出，若周遭同事已透過該工具顯著提升工作效率與產出品質，那麼自己若不嘗試或不精進使用，就可能在比較中顯得落伍，甚至影響上級對其能力與積極度的評價。此類團體無形要求所造成的心靈壓力，往往並非來自明文規定，而是從整體氛圍中悄然醞釀，讓使用者在「要不要多投入時間學習」和「維持既有工作節奏」之間陷入拉扯。

整體而言，技術變遷快速和同儕競爭是科技壓力的顯著面向，使受訪者在使用 AIGC 工具時，除了解決工作問題外，也需不斷調適自身的心態、付出精力去學習，以免在這波技術浪潮中被邊緣化，形成一種常態化的心理負擔。

(二) 資料安全疑慮與隱性壓力源

除技術更新與競爭外，資料安全的顧慮也是科技壓力的重要來源。訪談中多位受訪者提及對「上傳機密資訊」或「分享敏感檔」的擔憂。他們擔心在使用 AIGC 工具蒐集或生成文本的同時，可能將非公開或敏感內容接觸到外部平臺，產生不可預期的資訊外洩風險。這種疑慮並不總是來自政策明定的禁忌，而是源於人們對「不當使用工具」或「意外洩密」的隱性恐懼。

因此，有些受訪者在實務中採取「脫敏」策略，先將敏感資訊刪除或隱去後再上傳，或乾脆在敏感任務上不用該工具，以減輕可能發生的風險。此舉卻也帶來另一種壓力：在追求效率與便利的同時，必須自我約束與警惕，確保不會在方便之餘付出資料安全的代價。

這種隱性壓力並非如技術學習曲線般明顯，而是在使用工具過程中持續存在的心理陰影，使使用者每次按下「上傳」或「生成」之前，都必須反覆思考此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久而久之，資料安全憂慮雖不顯山露水，卻成為使用 AIGC 工具時的隱形心理負擔。

(三) 實務案例與代表性引述

以下為自訪談內容中擷取的代表性描述，凸顯科技壓力的多重面向：

有受訪者在描述技術更新過程的負荷時表示：

「AI 工具更新發展太快，我敢覺跟不上。我都是用私人時間在 YouTube 學習新的 AI 工具知識。」(E-TN-01)

此言論展現出技術變遷過於迅猛，使用者不得不在下班後付出額外努力，以免在職場上表現不如人，形成學習壓力的來源。

另一位受訪者則觸及同儕競爭引發的壓力：

「同儕會使用 AI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D-TN-01)

該敘述將社會影響與競爭要素納入科技壓力的範疇，使使用者在面對工具時不只思考功用，也必須擔憂是否在團體中落後於人。

關於資料安全疑慮的層面，有受訪者談及：

「我會擔心把一些會議紀錄或敏感資訊上傳到工具，有機密風險不敢亂用。」

(D-TN-05)

此處點出在安全性與便捷性之間的權衡，使用者必須自我審查與壓抑使用的衝動，以防止潛在的資訊洩漏事件發生。

上述這些原話與實務案例強調了科技壓力並非單向壓制，而是由多面因素所交織的心理負擔：既有技術演進的時代壓迫、也有同儕競爭的群體動力，更有對資訊安全的隱憂。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一種複雜且持續存在的心理壓力，使使用者在採用 AIGC 工具時必須兼顧效率、競爭力、風險管控與心理調適。

叁、跨主題整合與討論

一、理論架構對應與呼應

在質性分析的整體脈絡中，本研究先前針對感知有用性 (PU)、感知易用性 (PEOU)、社會影響 (SN)、行為意圖 (BI) 以及科技壓力 (Technostress) 等主題所獲得的訪談結果，與研究初始所提出的整合理論架構展現高度的呼應與互補性。該理論架構基於科技接受模型 (TAM) 與計劃行為理論 (TPB) 的整合，並進一步納入科技壓力理論之要素，企圖更全面地解釋使用者在 AIGC 技術採用過程中的心理動態與行為決策考量。從質性結果可見，使用者實際經驗中的觀察點與各構面理論假設之間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首先，在 TAM 所強調的技術特性面向上，PU 與 PEOU 的發現與研究預期相符。受訪者反覆強調 AIGC 工具對效率提升、資料整合以及工作表現改善的實質作用，符合 PU 所描述的「使用者相信技術有助於提升工作成效」之理論意涵。同時，多位受訪者指出，儘管初期使用需要摸索，但 AIGC 工具並不要求高度專業的程式技能，加上同儕示範、練習及嘗試後便能順暢上手。此一敘述清晰呼應 PEOU 強調的「操作容易度」，亦即使用者在短暫的適應期後能順利掌握該技術的運用原則。這些發現印證了 TAM 的兩大核心構面，並進一步展現該模型在新

興技術情境下的適用性。

再者，TPB 中之 SN 也透過訪談結果獲得明確呼應。受訪者提及的同儕比較、跨辦公室間的技術風氣、以及對落後他人使用進度的隱憂，無不揭示了社會影響對技術接受的重要作用。在無明確強制下，同儕使用者的成功經驗、上級期待、組織生態與政黨屬性的脈絡，都讓受訪者感受到「必須跟上」的氛圍。此氛圍正是主觀規範的體現：外部環境提供了社會心理上的推力，促使使用者更積極嘗試與接受 AIGC 工具。這一實務觀察說明 TPB 所強調的人際與組織期待在此場域中並非僅是抽象理論，而是真實存在且具推動力的影響因數。

至於 BI 與策略應對層面，質性資料清楚顯示使用者在體驗到工具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後，傾向將該技術納入日常工作程式中，並願意對他人進行推薦。這種正向的行為意圖不只來自內在對工具效益的認同，亦同時受到 SN 所帶來的比較與期許影響。如此相互交織的動力形塑了較全面的行為決策機制，與理論模型中強調 PU、PEOU、SN 對 BI 的共同影響不謀而合。

最後，科技壓力（Technostress）的納入更為整合模型增加實務解釋力。訪談資料顯示，使用者面臨技術更新過快、同儕競爭、資料安全疑慮等挑戰時，產生的心理壓力雖未在 TAM 與 TPB 中明確著墨，卻在本研究整合的理論模型中佔有一席之地。透過質性證據，可以見得技術帶來的壓力同時作用於使用者的認知、情感與行為決策中。若無此理論的補充框架，我們將難以解釋為何使用者即便在肯定工具有用、易用以及同儕鼓勵的情況下，仍會對工具保持戒慎、焦慮，甚至在特定敏感工作情境中猶豫是否使用。科技壓力的存在揭示技術接受並非僅以功能與社會期許決定，還要考慮使用者的心理負荷與風險評估。

綜合上述，各主題之間的交織關係充分呼應整合理論架構的預期。PU 與 PEOU 代表的技術特性成功解釋了為何使用者在體認工具之實用與上手後，產生正向的接受態度；SN 層面凸顯出環境、組織和人際網絡對使用者行為意圖形成的社會壓力；而科技壓力變項則填補了原本理論不足的面向，闡述了使用者在競爭動態、隱性風險下的心理緊張與調適。

透過質性研究所得的實務佐證，本研究整合模型中的各構面皆在訪談內容中找到相應的線索或印證，顯示該整合模型並非僅存於理論層次，而是在實務場域中具有相當解釋力和適切性。此一發現確立了本研究理論架構之有效性，同時也為未來類似技術接受研究提供了方向與參考範式。

二、變項間的交互影響與動態平衡

在本研究的質性結果中，各構面間並非各自獨立影響使用者，而是透過複雜的互動與相互制衡共同形塑使用者的決策脈絡。在 PU、PEOU、SN、BI 以及 Technostress。這五大面向中，我們可觀察到一種不斷調整的動態平衡：即使使用者肯定工具的實用價值 (PU) 並逐漸掌握操作 (PEOU)，也可能受到周遭同儕與組織氛圍 (SN) 影響，而在使用策略與決策中同時反映出對競爭與自我提升的期待。另一方面，縱使行為意圖 (BI) 呈現正向，使用者仍必須面對技術快速更新、同儕競爭、資料安全憂慮等多重壓力 (Technostress)，使得整個接受過程成為一個不斷在正向與負向、推力與拉力間調適的過程。

首先，PU 與 PEOU 在初期往往提供強大的推動力。訪談中，有用性展現為「縮短行政上的時間」及「迅速產出可參考文本」的直接助益，而易用性則讓使用者在幾次嘗試後降低操作障礙。這兩者的良性結合使使用者自然產生「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的傾向，塑造有利於正向 BI 形成的基礎。然而，當此狀態看似有利於工具大規模融入工作日常時，SN 與 Technostress 開始在微妙處發揮關鍵作用。

其次，SN 的介入使使用者的決策不只取決於工具本身的屬性與認知便利，也深受同儕壓力與組織期待的牽引。有些受訪者提及：「大家都在用，我不用的話好像就顯得我落後了」之類的觀感明示了 SN 的作用。SN 一方面強化 BI，因為不願落後的心理促使使用者更積極擁抱技術；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增加使用者的心理負擔，讓使用者在內心衡量是否需花更多私人時間學習工具微調訣竅，以跟上團體步調。此時，BI 雖受 SN 推動向前，卻同時開始面臨來自科技壓力的逆

向影響。

再次，Technostress 扮演一種張力來源的角色：技術更新過於快速、資料安全疑慮與同儕競爭壓力皆是受訪者一再提及的課題。有位受訪者表示自己感到必須「用私人時間學習新的 AIGC 工具知識」，原因就在於擔憂落後他人及面對技術變遷的恐慌。此時，儘管 PU 與 PEOU 曾為使用者提供強大的正向驅力，也因需要投入額外精力與精神調適而被拉緊，形成一種「邊用邊壓」的矛盾狀態。具體來說，BI 並非單純呈現為一條直線上升的曲線，相反地，使用者在實務場域中不斷在使用方便與學習壓力間周旋、在被同儕追趕與維持領先優勢的心理動盪中調整策略。

這種動態平衡也展現在使用者策略應對的層面上。使用者在肯定工具價值並有意願推薦他人使用的同時，往往也發展出一套自我篩選與防範措施，以應對科技壓力造成的隱形負荷。例如，在資料安全疑慮下，他們會先脫敏部分敏感資訊，再透過 AIGC 工具獲取一般性文本草稿，如此同時兼顧效率與風險管控。這種策略的形成，即是對 PU、PEOU、SN、BI 與 Technostress 多元交互影響下的產物。

綜上，訪談證據顯示出 PU、PEOU、SN、BI 與科技壓力之間不存在單向線性關係，而是彼此影響、此消彼長。在正面面，PU 與 PEOU 提供啟動 BI 的引擎，SN 讓這部引擎在團體氛圍中運轉更積極，BI 因而鞏固；但在負面面，科技壓力為接受與使用行為增添不確定因數，迫使使用者不斷在擴展使用、深化技能與防範風險之間尋找平衡點。使用者透過反覆嘗試、學習、調整策略，將這些變項的多重影響平衡為可行的工作流程策略，以在日益競爭且技術變遷快速的場域中穩住自身角色與表現。

最終，這種動態平衡使研究者得以更完整地理解 AIGC 技術接受行為的複雜性：並非單憑工具本身特性 (PU、PEOU) 或 SN 即可線性預測使用意圖 (BI)，亦無法在無視科技壓力的情況下簡化使用者決策過程。相反地，使用者的行為決策是多方力量相互牽引的結果，其接受過程隨著時間、環境、群體變動而不斷調整，形成一個具高度彈性的實務動態。

三、質性結果對量化發現的補強與說明

在本研究中，量化分析著力於檢驗 PU、PEOU、SN 與 BI 之間的相關性和因果推論，並初步納入 Technostress 作為調節或影響因素。量化結果常以統計模型、路徑分析及假設檢定為依據，對研究變項間的關聯度與顯著性提出一般化的結論。然而，量化分析受到問卷設計、題項涵義詮釋、受訪者回答習慣以及研究場域複雜度的限制，難以深層顯示使用者在實務脈絡中對技術應用的細緻觀感、決策動態和心理層次變化。

在此背景下，質性結果對量化發現的最大補強作用在於提供豐富的情境化詮釋。質性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透過多位受訪者的敘事，得以洞察使用者在技術接受過程中對「為何感知有用」「如何覺得易用」「受到哪些社會壓力影響」「何以產生持續使用與推薦的行為意圖」等議題的真實考量。這些質性證據進一步延伸了量化統計背後的故事情節，使得原本只有「變項間顯著影響」的結論，變得更有血有肉，並為未經預料的例外狀況或不顯著的結果提供可能的解釋。

首先，量化分析可能顯示 PEOU 對 BI 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僅能告訴我們「越覺得有用，越願意使用」。質性訪談卻讓我們清楚看到，這種有用性並非單純因工具加速產出就定形，而是在多數受訪者的職務情境下，透過「節省行政上的時間」、「面對臨時任務也可快速提出初稿」、「縮短政策研究週期」等實務情境中展現出具體價值。這些情境化資訊強化了量化結果的可信度，使我們更能確信「有用性」的正向效應並非抽象的心理評價，而是與具體工作流程改善互為表裡。

再者，關於 PEOU 與 BI 的正向關係，量化分析可能顯示「認為好上手的人較易發展持續使用意圖」，然而質性研究發現，受訪者在適應 AIGC 工具時多半經歷「初期不熟悉—嘗試調整—掌握操作訣竅」的學習曲線。這條學習曲線不僅印證了 PEOU 的存在，也為 PEOU 權重增添了一層脈絡：易用性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使用者在互動中漸進累積的結果。透過質性資料的豐富描述，量化結論中的「易上手」不再只是單一分數的呈現，而是動態發展的過程，顯示出使用者透過

反覆試驗和同儕交流提高操控技術的熟練度。

第三，質性結果也能為 SN 相關的量化結果提供更細緻的解釋。量化部分可能顯示 SN 對 BI 有明顯關聯，但質性研究中更展開了 SN 的實質樣態：包括同儕使用狀況的參照、跨辦公室的氛圍比較、政黨與派系文化的滲透、以及擔心被視為不積極、落後於潮流的隱性壓力。這些細部觀察說明，社會影響並非僅憑一兩道問卷題項即可全面刻畫，而需要深究使用者所處的社會與組織生態，方能充分理解為何 SN 能強而有力地驅動技術接受。

第四，在量化模型中納入 Technostress 時，可能只顯示出其為負向影響或調節效應，但無法深入闡釋何種壓力最突顯、壓力形成的細節與使用者具體的心理感受。質性分析卻揭示了技術快速迭代帶來的學習壓力、同儕競爭帶來的心理負擔，以及資料安全疑慮引起的隱憂。這些細節為量化指標所難及，卻在質性證據中生動呈現，讓研究者明白科技壓力並非單一構面，而是由多重因素組成，與使用者對工具的信任、學習投入、使用策略高度互動。

最後，在 BI 議題上，量化分析可能顯示 PU、PEOU、SN 對 BI 的正向影響顯著，但質性結果則補強了「意願強度」與「推薦行為」背後的具體邏輯：使用者不僅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解決問題，還會考量長期使用價值、在何種任務中更適合上線、該如何微調指令以優化輸出，以及如何平衡資料安全顧慮。這些實務細節讓行為意圖不再只是一組分數或相關係數，而成為對工作策略與專業實踐深思熟慮後的主動選擇。

總括來說，質性結果對量化發現的補強與說明在於：質性分析填補了量化分析的空白，將抽象的假設檢定與相關性推論落實到使用者的日常工作體驗中。藉由訪談內容中豐富的情境描述、案例分享與多元觀點呈現，我們對量化結果有了更深層的理解，並得以將數據背後的人性、組織文化、心理壓力與策略思考融為一體，打造出更全面與立體的技術接受圖景。

肆、小結

綜合本節質性分析的研究發現，可以清晰勾勒出使用者在採用 AIGC 工具過程中的多元動態特徵。透過對 PU、PEOU、SN、BI 及 Technostress 等五大構面之深入探討，我們已不僅停留在理論假設的框架中，而能將使用者在實務中所面臨的挑戰、策略及心態轉折清晰呈現於眼前。

從 PU 與 PEOU 的分析可知，AIGC 工具的核心優勢在於為工作節奏賦予敏捷性與彈性。透過快速產出初稿、加速資料彙整、減少繁瑣程式，該工具帶給使用者明確的效率提升與價值感受；而在數次試用與觀摩同儕示範後，易用性的特徵使得工具不致成為高牆。這種「有用且易學」的結合為後續的正向行為意圖奠下關鍵基礎。

然而，SN 與 Technostress 的介入使得整體圖像更加複雜。SN 的存在提醒我們，技術接受並非一個孤立的、單人對工具的決策，而往往是在同儕關注、上級期待、跨辦公室比較，以及政治與組織文化所交織的社會生態中萌生。使用者不僅要思考工具的使用價值，也必須顧及團隊氛圍、群體規範與他人視線，甚至在黨團對比的情境下不得不隱隱感受到競爭壓力。在此同時，科技壓力的出現則為這場技術應用的實務劇碼增添張力；技術更新過快帶來的學習負擔、同儕競爭下的心理比拚、資料安全疑慮引起的內在緊繃，都讓使用者在受惠於工具的同時，必須不斷調適心態、優化使用策略。

質性結果所揭示的，正是一種持續動態平衡的狀態：PU、PEOU、SN、BI、Technostress 並非獨立運作，而是相互牽引、此消彼長。PU 與 PEOU 雖然構成正向驅動力，SN 刺激使用者更積極回應並擴大工具應用深度，但在技術進步與資訊安全顧慮之下，Technostress 同時給予使用者一股隱性壓力，要求他們投入額外資源來維持平衡。於是，我們得見使用者在多重因素拉扯中，既願意行動、推薦工具，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拿捏使用範疇、控制資訊上傳內容，甚至在休息時間學習如何更有效對系統下指令。

這種多維的動態狀態使我們對研究初步量化結果有了更完整、立體的理解。質性資料不僅為理論模型提供情境化詮釋，也回應了實務場域的真實面貌。透過

訪談的豐富敘事，我們確認量化分析中所顯示的各構面影響並非「理所當然」，而是使用者在特定的政治、組織、知識與心理條件下的結果。質性發現凸顯了人際互動、環境氛圍與風險意識的重要性，為後續理論修正、政策推廣、工具優化提供有用參考。

總括而言，從本節質性分析中，我們看到一個多層次、相互交織的技術接受故事：有用與易用的正向驅動，社會期待與比較的隱性推力，科技壓力的負荷與掙扎，以及在此脈絡下使用者精心調適、追求平衡的行為模式。這些要素共同組成了一個複雜而又真實的圖景，使我們對 AIGC 工具在實務應用中的定位與挑戰有了更深刻、更加人性化的理解。

第三節 量化與質性資料的整合

壹、對比分析

一、量化與質性結果的一致性

量化與質性結果的一致性分析旨在檢驗本研究量化調查與質性訪談結果之間的相互支持與呼應，從而提供對 AIGC 技術採用行為更加全面的理解。本研究採用科技接受模型（TAM）與計劃行為理論（TPB）相結合的理論框架，通過量化調查檢測感知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OU）、社會影響（SN）、行為意圖（BI）與科技壓力（Technostress）對技術接受的影響，而質性訪談則進一步提供了對這些構面更深層次的解釋與實際案例支持。

（一）感知有用性（PU）

量化結果顯示，PU 是影響技術接受度的核心驅動因素，受訪者普遍認為使用 AIGC 工具可以顯著提升工作效率與表現。這一結果在質性分析中得到了充分的呼應。多數訪談受訪者強調，AIGC 工具在生成會議記錄、撰寫質詢稿及快速整理資料等方面具有極高的實用性。一位受訪者提到：「AI 工具幫助我們把 0 到

1 的基礎建構好，我們只需要再進一步優化。」(B-PU-03) 這表明，不論是量化數據還是訪談敘述，都一致反映了受訪者對 AIGC 工具在實務應用中的正面評價。

(二) 感知易用性 (PEOU)

量化分析中，PEOU 對技術接受度具有顯著影響，特別是對新手使用者而言，工具的易學性和操作簡單性成為他們是否採用的關鍵因素。質性分析進一步補充說明了這一點：許多受訪者表示，AIGC 工具在經過短期探索和指導後，操作起來相對容易，尤其是在撰寫講稿或計畫書的應用中。一位受訪者形容道：「只要試幾次，掌握一些提示詞技巧，生成的內容就能符合預期。」(A-PEOU-07) 這表明，量化與質性結果在 PEOU 構面上高度一致，反映了工具易用性對初學者與經驗使用者的普遍吸引力。

(三) 社會影響 (SN)

量化結果顯示，社會影響對受訪者的技術採用意圖有顯著正向作用，尤其是來自同儕、上級和社會群體的期待能促進技術的接受。質性訪談結果進一步補充了這一觀點：多數受訪者提到同事和上級的期待是他們學習和使用 AIGC 工具的重要動力。一位受訪者表示：「當其他辦公室開始大量使用這些工具時，我們也感到需要跟上這股潮流。」(F-SN-05) 此外，有些受訪者還提到來自選民的期待，認為技術的採用能彰顯進步與效率，從而提高選民的支持度。量化與質性結果在這一構面上的一致性，展示了社會影響在技術採用中的驅動作用。

(四) 行為意圖 (BI)

量化結果揭示，PU、PEOU 及社會影響均對行為意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反映受訪者的強烈使用意願。質性分析中，這一點得到了充分的補充與說明：多數受訪者表達了對 AIGC 工具的高度興趣和持續使用的意願。一位受訪者提到：「我們辦公室已經購買專業版，因為這能幫助我們更快速地完成日常工作。」(F-

BI-05) 同時，也有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會向其他同事或朋友推薦這些工具，這與量化數據中的正向意圖高度一致。

(五) 科技壓力 (Technostress)

量化數據顯示，科技壓力對技術接受度具有負向影響，過多的技術更新與操作難度可能會降低使用者的接受度。質性訪談進一步支持了這一觀點，多位受訪者表達了對快速技術變遷的焦慮。一位受訪者表示：「更新太快了，很多時候感覺剛學會一個功能，新的版本又已經出來。」(A-TN-06) 此外，部分受訪者對資料安全的隱憂也增強了他們的壓力感。這些敘述與量化分析結果互為印證，反映出科技壓力對使用者行為意圖的潛在抑制作用。

整體而言，量化與質性結果在五大構面上呈現出高度一致性，質性資料進一步驗證了量化分析的核心假設並提供了更為具體的背景情境與實務案例。這種一致性表明，本研究所構建的理論模型具備一定的解釋力與實用性，同時也強調了量化與質性資料結合的重要性，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 AIGC 技術的採用行為。

二、量化與質性結果的差異性

在研究中，量化數據與質性訪談結果揭示了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看法在多層次上存在差異，這些差異體現了研究方法和實際情境中的多樣化現象。

(一) PEOU 與 PU 差異

量化數據顯示，大多數受訪者對「PU」和「PEOU」均給予正面評價。例如，「使用 AIGC 工具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的平均得分為 4.2。然而，質性訪談中，一些受訪者提到，這些工具在實際使用中需要較多調整才能滿足其特定需求。某國民黨助理表示：「工具的學習曲線雖然相對較平緩，但要達到老闆的高標準，仍需要花時間調整生成內容。」(E-PEOU-09) 這一現象反映出，儘管工具在效率上獲得了廣泛認可，但實際應用中仍存在挑戰。

(二) SN 的細緻化區分

量化分析結果顯示，SN 在技術接受中具有顯著作用，例如「我的同事認為我應該使用 AIGC 工具」的平均得分為 4.0。質性訪談則揭示了更細緻的社會壓力來源。一名受訪者提到：「當其他辦公室都在使用這些工具，我們感覺如果不使用就會被視為落後。」(D-SN-06) 另有助理強調：「上級有時候雖然不明說，但對科技工具的期待壓力是隱性的，這會讓我們不得不去學習和使用。」(F-SN-06) 這種微妙的社會壓力在量化數據中並未明顯呈現，但在質性訪談中被具體化。

（三）Technostress 與資料安全疑慮的深度差異

量化調查中，Technostress 被明確指出為潛在阻力。例如，「AIGC 工具更新發展太快，讓我備感壓力」的平均得分為 3.7。質性訪談進一步揭示了這些壓力的多層次性。一位受訪者表示：「工具更新太快，感覺自己永遠在追趕，這很累。」(F-TN-02) 此外，資料安全的疑慮也成為使用者的隱性壓力來源。一名助理提到：「我們在使用 AI 工具時會避免上傳任何敏感資料，因為無法確定資料會如何被處理。」(F-TN-08) 這些壓力來源在量化調查中僅以平均數據呈現，而質性分析則突出了其在不同工作場景中的多樣性。

（四）BI 的動機差異

量化分析中，受訪者對 BI 的相關問題給予了較高評價，特別是「我願意持續使用 AIGC 工具」的平均得分為 4.3。然而，質性訪談揭示了行為意圖背後的動機存在差異。一位助理坦言：「我使用這些工具更多是因為同事和上級的期待，而非我自己內心的需求。」(C-BI-12) 另一位受訪者則表示：「雖然工具很方便，但我仍然會選擇在非緊急情況下自行完成一些重要的檔編輯。」(B-BI-06) 這表明，高行為意圖的數據背後可能存在外部驅動因素，與內在動機不完全一致。

透過量化與質性結果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量化研究揭示了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整體評價，而質性研究則補充了這些評價背後的具體情境與複雜性。質性

結果突出了量化調查無法捕捉的細節，例如社會壓力的具體形式和科技壓力的多元來源。這些發現為更全面理解技術接受與使用行為提供了關鍵視角，也進一步說明了量化與質性資料整合的重要性。

貳、整合結論

一、綜合分析的主要發現

本研究透過量化與質性資料的整合分析，歸納出 AIGC 技術在立法院工作場域的應用與接受情境的主要發現。以下將從感知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OU）、社會影響（SN）、行為意圖（BI）與科技壓力（Technostress）等五個核心主題進行綜合說明，並在整合量化與質性資料的基礎上探討這些主題的相互關聯性與影響力。

（一）PU：效率提升與價值認知

量化資料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對 AIGC 技術的有用性給予高度評價，尤其是在提升工作效率與解決重複性任務方面。然而，質性分析揭示了這些有用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差異性。一位助理提到：「在撰寫臉書貼文或基礎文案時，這些工具可以節省很多時間，效果很好，但在法案質詢稿或更為精準的政策分析上，AI 的生成效果仍有待改進。」（C-BI-04）這表明，AIGC 技術的 PU 受到任務複雜性和應用情境的影響，工具在特定重複性、低風險的任務中展現出強大的實用價值，但在需要深度理解或專業語境的場合，其效用有限。

（二）PEOU：學習曲線與操作便利

在量化分析中，「AIGC 工具容易學習和操作」的相關問題平均得分較高，顯示受訪者對工具易用性的普遍認同。然而，質性訪談進一步指出，部分助理對 AIGC 工具的學習與適應存在個體差異。一位受訪者提到：「它的操作是簡單的，但想要輸出符合工作需求的高質量內容，就需要花時間調整和摸索。」（A-PEOU-

03) 另一位助理則強調：「如果政府能提供一些專業的培訓課程，大家的學習曲線會縮短很多。」(C-PEOU-09) 這些結果說明，雖然工具本身具有操作便利的特點，但使用者對技術的掌握程度仍取決於外部支持與學習投入。

(三) SN：同儕壓力與組織文化的潛在作用

量化數據表明，社會影響在技術接受中具有顯著作用，其中「同事或上級期望影響技術使用」的評分相對較高。質性資料則進一步揭示了社會壓力的隱性特徵。一位受訪者表示：「當其他辦公室都在用的時候，你不用就會顯得很落後。」(A-SN-03) 此外，一些助理提到，上級對技術接受的態度對下屬行為有直接影響：「如果老闆喜歡用這些工具，我們就會主動學習。」(C-SN-08) 這反映了立法院內部的組織文化和社會期望對於技術接受的間接驅動作用，特別是在同儕比較與領導支持的情境下，技術採用行為更易於發生。

(四) BI：正向使用與未來發展

量化結果顯示，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行為意圖普遍偏高，特別是在持續使用與推薦他人方面得分突出。質性資料進一步說明，這些正向行為意圖背後的驅動因素可能來自於兩個層面：一是工具帶來的效率提升，另一是外部環境的推動。一位受訪者強調：「AI 工具已經成為我們日常工作的輔助工具，未來在政策分析和文宣方面可能會有更多應用。」(C-BI-11) 但也有受訪者提到，他們對工具的依賴主要局限於某些特定場景，並不會完全取代人工作業。這些結果表明，行為意圖的高低與工具的實際效用、情境需求及組織支持密切相關。

(五) 科技壓力：隱性負擔與安全疑慮

在量化調查中，科技壓力的相關題項平均分數居中，反映出一定比例的受訪者對技術發展帶來的心理負擔和學習壓力有所感知。質性資料則進一步揭露了科技壓力的多元來源。一位受訪者提到：「工具更新太快，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去學

習，否則就跟不上趨勢。」(F-TN-05) 另一位助理則指出：「最擔心的還是資料的安全性，很多重要的內容我們不敢放上去用。」(D-TN-08) 這些壓力源不僅來自於技術變遷的快速步伐，還包括對個人能力不足的擔憂，以及對資料安全的隱性疑慮。

總體而言，本研究的綜合分析發現，AIGC 工具在立法院工作場景中的應用價值明顯，並受到 PU、易用性、社會影響和行為意圖的正向推動，但同時也受到科技壓力與安全疑慮的制約。這些結果為理解技術接受行為提供了更全面的視角，並強調了量化與質性資料整合的重要性。未來，為了進一步推動技術的應用與接受，應關注技術培訓、組織支持及資料安全保障等相關議題。

二、對研究假設的驗證

本節旨在基於量化與質性資料的整合，對研究所提出的四項假設進行驗證。透過對數據結果的綜合分析，我們得以評估每一假設是否成立，以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適用性與限制性，進一步深化對 AIGC 技術在立法院使用情境中的理解。

(一) 假設一 (H1)：PU 與技術接受度的正向關聯

假設一提出，PU 越高，技術接受度越高。本研究的量化分析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 AIGC 工具能顯著提升工作效率，特別是在撰寫文案、生成基礎內容等場景中展現出強大的價值。質性資料進一步補充了這一發現，助理受訪者中多數人提到：「AI 工具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大量基礎文案撰寫，這對於高強度、快節奏的工作環境尤為重要。」(F-PU-05) 但同時，質性訪談也指出，在法案修訂等高專業需求的場景中，AI 工具的有用性受到限制。一位受訪者表示：「AI 的生成結果無法完全符合立法語言邏輯，需要大量人工修改。」(B-PU-04) 整體而言，PU 與技術接受度的正向關聯性獲得驗證，但具體效用取決於任務類型與複雜度。

(二) 假設二 (H2)：PEOU 與技術接受度的正向關聯

假設二提出，PEOU 越高，技術接受度越高。量化資料顯示，AIGC 工具的易用性在大多數受訪者中獲得認同，尤其是工具的直觀操作與學習成本低被頻繁提及。質性訪談進一步驗證了這一假設。一位助理指出：「這些工具的操作設計非常簡單，輸入指令即可生成結果，對初學者友好。」(F-PEOU-06) 然而，質性資料也反映出某些情境下的易用性挑戰，例如當受訪者需要生成符合特定語境需求的內容時，需多次嘗試和調整輸出結果。一名受訪者提到：「對生成結果進行反覆修改，仍需耗費不少時間和精力。」(E-PEOU-05) 整體來看，PEOU 與技術接受度的正向關聯在普遍情境下成立，但在特定專業需求下可能需要額外支持與引導。

(三) 假設三 (H3)：社會影響與技術接受度的正向關聯

假設三提出，SN 越大，技術接受度越高。量化數據顯示，來自上級、同事及社會期待的壓力顯著影響受訪者的技術使用意願。質性訪談則進一步補充了 SN 的多重影響機制。一位受訪者強調：「當其他辦公室都在使用時，我們也必須跟進，否則會顯得落後。」(A-SN-06) 此外，上級的態度對下屬行為有直接影響。一位助理提到：「老闆期待我們用 AI 工具完成某些工作，我們自然會主動學習。」(E-SN-06) 這說明，SN 不僅來自外部壓力，也受到組織內部文化的強化。總體而言，SN 與技術接受度的正向關聯性明顯，尤其是在具有高度組織化的工作場景中更為顯著。

(四) 假設四 (H4)：科技壓力與技術接受度的負向關聯

假設四提出，科技壓力 (Technostress) 越大，技術接受度越低。量化結果顯示，部分受訪者對技術快速變遷、學習負擔及資料安全存有壓力感。質性資料進一步揭示了科技壓力的多元來源及其影響。一位受訪者表示：「AI 工具更新頻率很高，讓我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跟上進度。」(F-TN-06) 另一位助理則提到：「對

資料安全的疑慮讓我們不敢完全依賴這些工具。」(C-TN-06) 這些壓力不僅影響個體對技術的信任，也增加了學習與適應成本。然而，部分受訪者也表示，這種壓力在某些情境下可能轉化為正向動力，推動他們學習與適應技術。例如，一名助理提到：「看到同事都在使用，我也覺得應該試著學習，不然會被落下。」(F-TN-09) 這表明，科技壓力對技術接受度的影響具有情境性，其負向作用可能因個體的調適能力而有所減弱。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四項假設在多數情境下均得到驗證，但質性資料揭示了量化分析未能充分捕捉的情境性差異。例如，PU 與技術接受度的正向關聯在基礎任務中表現明顯，但在高專業需求場景中存在局限；SN 的影響不僅來自外部壓力，也受到組織內部文化的加強；而 Technostress 對技術接受的影響既可能是負向的，也可能因個體調適能力而轉化為正向動力。這些綜合發現不僅深化了對研究假設的理解，也為 AIGC 工具的應用策略提供了實務參考。



壹、與現有文獻的比較

本節旨在將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第二章文獻與理論基礎中的相關文獻進行比較，強調研究結果如何與現有理論和實證研究相呼應或形成對話，並進一步深化對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應用中的理解。

一、AIGC 技術的特性與應用場景的擴展性

現有文獻對 AIGC 技術的描述強調了其在多領域的應用潛力，尤其是在商業、醫療、教育和公共治理等領域⁴⁷。本研究通過訪談分析進一步驗證了這些技術特性的適用性。受訪者指出，AIGC 技術在立法委員辦公室的日常工作中，能

⁴⁷ ScienceDirect, 2023; ResearchGate, 2023.

有效提升文書處理效率，尤其是在生成政策報告和公文草擬等基礎性工作中表現突出。例如，一位受訪者提到，AIGC 工具可以「迅速完成繁瑣的文字整理工作」(A-PU-09)，這與文獻中所述 AIGC 提升內容生產效率的觀點一致。

然而，與現有文獻對 AIGC 技術的全面推崇不同，本研究亦揭示了其在特定專業領域中的應用局限。例如，受訪者提到，AIGC 工具在撰寫法案草案時無法貼近立法語言的邏輯，需經過大量人工修訂。這表明，AIGC 的應用場景並非完全無限制，而需要根據具體需求和專業特性進行調整。

二、科技接受模型（TAM）理論中的 PU 與 PEOU

TAM 中提到 PU 和 PEOU 是技術接受的關鍵驅動因素⁴⁸。本研究結果與 TAM 理論的這一觀點高度一致。受訪者普遍認為，AIGC 技術具有顯著的實用性，能幫助提高日常工作的效率和精準度，這驗證了 PU 的核心作用。同時，受訪者對 AIGC 工具的操作簡單性也表達了積極評價，認為這些技術「不需要高深的技術背景即可快速上手」(F-PEOU-03)，這進一步支持了 PEOU 在提升技術接受度中的作用。

然而，本研究也在質性分析中指出，PU 和 PEOU 的影響存在情境性差異。例如，對於政策撰寫這類高專業性工作，AIGC 工具的有用性會因其生成內容與專業需求的匹配度而減弱，而易用性則可能受到生成內容需多次修改的挑戰影響。這一發現補充了 TAM 理論，強調技術接受度受到應用場景的顯著影響。

三、社會影響與主觀規範（SN）的作用

根據計劃行為理論（TPB），SN 是影響技術接受意圖的重要因素⁴⁹。現有文獻強調，社會影響能顯著驅動個體的技術採用行為，尤其是在組織化環境中

⁴⁸ Davis, 1989.

⁴⁹ Ajzen, 1991.

(Venkatesh & Davis, 2000)。本研究的發現進一步支持了這一觀點。受訪者提到，同儕和上級的使用行為，以及選民對技術應用的期待，均對其技術接受行為產生了顯著影響。例如，一位助理提到：「當其他辦公室都在用時，我們也不得不用。」(B-SN-03) 這與文獻中提到的群體影響和社會壓力的作用相吻合。

然而，本研究也揭示了 SN 的潛在負面作用。一些受訪者指出，過度的社會壓力可能導致表面化的技術接受，即在未完全理解和掌握技術的情況下，僅為了應對外界期望而進行形式化使用。這一發現補充了現有理論，提醒研究者需關注 SN 在不同情境下的雙重作用。

四、科技壓力 (Technostress) 的影響

科技壓力理論指出，技術快速變遷、資訊過載和持續學習需求等因素會對使用者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效率產生負面影響 (Tarafdar et al., 2007)。本研究的結果與這一理論高度一致，受訪者多次提到技術更新速度過快和資訊處理負擔增加所帶來的壓力。例如，一位助理提到：「更新太快了，很多時候感覺剛學會一個功能，新的版本又已經出來。」(A-TN-06) 此外，對於資料外洩的安全疑慮也被多位受訪者提及，這進一步表明科技壓力對技術接受行為的阻礙作用。

然而，本研究亦指出，適當的科技壓力可能成為正向驅動力，促使使用者更積極地學習新技術。例如，一些受訪者表示，因為其他同事的使用水準較高，自己也產生了「不落後」的學習動力。這補充了科技壓力理論，揭示了壓力在技術接受過程中的雙重作用。

五、與創新擴散理論的對話

創新擴散理論 (DOI) 強調創新的相對優勢和相容性是其被採用的重要影響因素 (Rogers, 2003)。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 AIGC 技術在提升工作效率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且與現有工作流程的相容性較高，這支持了 DOI 的核

心觀點。然而，本研究也指出，在高專業性應用場景中，AIGC 技術的相對優勢和相容性會受到限制。例如，在法案撰寫中，受訪者認為 AIGC 工具生成內容的專業度不足，需耗費額外時間進行修改，這削弱了技術的相對優勢。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發現與現有文獻在多方面形成呼應，但也揭示了現有理論和實證研究中未充分探討的情境性差異和雙重作用特性。這不僅深化了對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應用中的理解，也為未來的理論發展和實證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向。

貳、研究發現的意義

一、對 AIGC 技術應用的啟示

本研究從質性和量化資料的整合中，揭示了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領域的多維影響，並提出了對 AIGC 技術應用的啟示，涵蓋實用性、應用範疇、社會影響和科技壓力等方面。

（一）技術適配性與情境化應用的重要性

AIGC 技術的應用成效受到特定工作場景的顯著影響。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AIGC 工具在文書處理、政策報告撰寫以及選民服務中的效率提升作用十分明顯。然而，對於法案草案的撰寫這類高專業性工作，技術的適配性則較低，需大量人工調整以符合立法語言的邏輯和精確性。AIGC 技術應用需結合特定情境進行定制化設計，才能充分發揮其價值。

此結果啟示我們，在推動 AIGC 技術應用時，應注重技術適配性的檢視，特別是針對公共治理中的高專業性任務，技術供應商和政策推動者需考慮技術與現有工作流程的契合度，並提供針對性的優化工具。

（二）提升使用者信任感與安全性的需求

研究揭示了使用者對於資料安全與技術可靠性的高度關注。受訪者中多次提到，使用 AIGC 工具進行核心工作時，對數據外洩和隱私風險的憂慮阻礙了技術的廣泛應用。

這一發現對技術開發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啟示。在未來推動 AIGC 技術應用時，應建立透明的資料管理機制，提供清晰的安全保障措施，如本地化部署、加密傳輸等技術支持，減輕使用者的安全疑慮。此外，教育訓練也應涵蓋資料隱私的管理標準，確保使用者能有效區分適合導入技術的工作範疇。

（三）社會影響與使用意願的強化

研究中受訪者普遍認為，同事、上級和選民對技術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驅動了其採用 AIGC 工具的行為。這種來自群體的社會影響顯示，技術應用的推廣不僅依賴於個體對技術的 PU 和易用性，還與群體規範和社會壓力密切相關。

這啟示我們，推動 AIGC 技術應用的策略可更多地利用社會影響力。例如，通過示範單位的成功應用案例，以及同儕間的經驗分享，能有效促進其他單位的技術採用。此外，建立跨部門或跨組織的合作網絡，促使技術應用成為組織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提升技術接受度的關鍵方式。

（四）科技壓力管理與使用者支持

研究發現，AIGC 技術的快速變遷和多樣性加劇了使用者的科技壓力。一些受訪者表達，面對日益更新的技術，他們感受到「學不完、跟不上的焦慮」。

這一發現表明，科技壓力對技術的長期應用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亟需建立支持性措施。技術供應商和組織可通過定期的技術培訓、清晰的操作指引，以及使用者社群的互助網絡，降低因技術學習需求所帶來的壓力。同時，管理者應對員工使用技術的情緒狀態和心理負擔保持敏感，提供適當的心理支持，促進科技壓力轉化為正向的學習動力。

（五）推動專業與技術相結合的教育模式

最後，研究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提升技術應用效能的核心在於將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相結合。這說明，技術的高效應用不僅依賴於工具本身的功能性，也取決於使用者的專業素養和技術駕馭能力。

因此，未來應推動專業與技術相結合的教育模式，將技術應用訓練融入專業能力建設的過程中。例如，針對公共治理領域，設計涵蓋政策分析和 AI 工具應

用的跨學科培訓，能有效提升技術應用效率，並促進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的深度融合。

總結來看，本研究對 AIGC 技術應用的啟示涵蓋技術適配性、安全性、社會影響、科技壓力管理以及專業教育等多方面，為技術供應商、政策制定者和使用者提供了具體的行動指導。這些啟示不僅促進了對技術應用的深入理解，也為未來技術推廣與管理提供了實質性參考。

二、對公共治理的影響

本研究揭示了 AIGC 技術對公共治理產生的深遠影響，並從行政效能提升、政策透明化、參與機制強化以及風險與挑戰四個方面進行深入討論，總結技術應用的現實意義與未來方向。

（一）行政效能的提升與資源優化

研究表明，AIGC 技術在文書處理、選民服務和政策分析等具體場景中展現了顯著的效率提升效果。受訪者普遍認為，AIGC 技術能夠簡化繁瑣的行政工作，將更多時間釋放給高價值任務。例如，有助理指出：「AI 在寫（補貼）計劃書上效果非常好，能快速生成合規的申請文本，這對我們提升服務效率幫助很大。」（F-PU-02）此類技術應用有效減少了人工在低附加值工作的投入，優化了資源分配。

這一發現對公共治理具有重要意義。AIGC 技術的應用有助於政府機構更加靈活、高效地應對日益增長的行政需求，特別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未來，推動 AIGC 技術在政策分析、跨部門協作等方面的應用，將進一步提升政府機構的反應能力和執行效率。

（二）政策透明化與數據驅動決策

AIGC 技術能夠在大量數據分析與整合中提供支持，從而促進政策透明化和數據驅動的決策制定。研究中有受訪者提到，AIGC 工具幫助其在預算審查中快

速檢索和分析關鍵數據：「有時我們不了解特定預算的背景，AI 能幫助我們找到一些以前從未考慮過的數據和視角。」(F-PEOU-11) 這表明，AIGC 技術不僅提升了資料處理的效率，還能幫助挖掘數據中隱含的價值，為決策提供更多參考依據。

這一發現表明，AIGC 技術在促進政策透明化和提高決策科學性方面具有潛力。透過技術輔助，政府可進一步優化公開數據平臺，增強與民眾的互動，建立更加透明的治理體系。此外，技術應用於政策模擬和影響評估中，還將促進決策過程的科學性與精準性，提升政府對社會需求的響應能力。

(三) 公民參與機制的強化

研究中多位受訪者提到，AIGC 技術在選民溝通和服務中扮演了積極角色。特別是針對語言能力較弱的外籍配偶或其他弱勢群體，AI 生成的簡化和翻譯內容顯著降低了溝通門檻。一位助理提到：「AI 生成的多語言說明幫助我們更高效地將資訊傳遞給不同背景的選民，特別是在緊急事項或申請流程的宣達上。」(F-PU-11)

這一現象表明，AIGC 技術能有效縮短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資訊差距，為公民參與提供更多機會。通過降低技術和語言的門檻，政府能吸引更多民眾參與政策討論與公共事務決策。未來，可考慮進一步拓展 AIGC 的應用範疇，例如在網絡論壇中自動總結公眾意見、生成具體政策建議等，增強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性與包容性。

(四) 風險與挑戰：數據安全與技術依賴

儘管 AIGC 技術為公共治理帶來了多方面的效益，研究也揭示了相關風險和挑戰。多數受訪者對於核心數據上傳至 AI 平臺表示擔憂。此類擔憂阻礙了技術在更多高敏感性場景中的應用。

此外，技術依賴所帶來的長期風險也不容忽視。一些受訪者指出，技術的快

速迭代與更新使其無法全面掌握所有功能，導致工作依賴於少數技術熟練者或外部供應商。這意味著，政府在推進技術應用的同時，需考慮技術依賴可能帶來的操作風險和決策偏誤。

為應對這些挑戰，政府應構建安全的技術基礎設施，確保數據處理和儲存的安全性。同時，應持續加強技術培訓，確保使用者具備必要的技能和判斷力，減少因技術依賴導致的潛在風險。

（五）公共治理的長期轉型與策略方向

研究表明，AIGC 技術正在重塑公共治理的運作模式，其長期影響可能包括更高效的政策執行、更透明的政府決策以及更廣泛的公民參與。為充分釋放 AIGC 技術的潛力，政府需在以下三方面持續努力：其一，建立技術應用的規範與指導原則：明確適合導入 AIGC 的應用場景，避免技術濫用或數據隱私洩露。其二，促進跨部門合作與資源共用：鼓勵不同部門在技術應用中共享經驗與資源，提升整體效能。其三，推動本地化技術研發與部署：在確保數據主權與安全的基礎上，積極推動本地 AIGC 工具的開發，降低對境外技術的依賴。

AIGC 技術為公共治理帶來了效率提升、透明化加強以及公民參與擴展等多方面的變革，並同時伴隨著數據安全與技術依賴等挑戰。政府在推動技術應用的同時，需謹慎管理相關風險，並制定長期策略，以實現公共治理的可持續發展和技術驅動創新。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

技術接受模型（TAM）與科技壓力理論（Technostress Theory）為理解 AIGC 技術的應用行為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本研究通過對感知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OU）、科技壓力（Technostress）及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四大核心變數的驗證，揭示了它們在公共治理技術採用過程中的多維度影響，並進一步豐富了 TAM 理論的適用性。

一、假設一：感知有用性與技術接受度

感知有用性作為 TAM 模型的核心變數，是推動 AIGC 技術接受行為的主要驅動力。本研究證明，PU 不僅體現在技術對工作效率的直接提升上，更對使用者的工作流程與決策模式產生深遠影響。在政策制定與選民服務中，AIGC 技術的應用顯示出高效能，特別是在生成報告、分析數據及模擬政策效果等方面，顯著減少了人工處理的重複性工作。

例如，當使用者能快速生成民意分析報告或完成政策草案的初步設計時，技術的實用價值便得以充分體現。然而，PU 的影響力並非絕對穩定，當技術無法滿足特定需求或生成結果不符合專業標準時，其正向效應可能受到限制。提升 PU 的核心策略包括持續優化技術功能、提供清晰的應用範例以及強化使用者對技術的信任度。

二、假設二：感知易用性與技術接受度

感知易用性在影響技術接受行為中同樣扮演重要角色。研究結果顯示，AIGC 技術的操作便利性與學習成本對使用者的接受意圖具有顯著影響。當技術界面設計直觀、功能整合程度高時，使用者更容易產生信任感並採取積極行為。

例如，若政策助理可以通過簡單的操作步驟完成政策建議或數據分析，他們對技術的適應速度將大幅提高。然而，若技術功能過於複雜或缺乏操作指引，則可能導致使用者的焦慮感與抗拒心理增加。進一步分析表明，PEOU 的影響還可通過提高 PU 間接促進技術的接受意圖，表明兩者在實際應用場景中存在交互作用。

三、假設三：科技壓力與技術接受度

科技壓力（Technostress）作為一項現代科技應用中的重要挑戰，在本研究中表現出對技術接受行為的負向影響。使用者在學習與適應 AIGC 技術過程中，常感受到來自技術複雜性、數據過載及頻繁更新的多重壓力，這些壓力進一步影響了他們的心理狀態與行為意圖。

例如，技術更新速度過快可能導致部分使用者對學習新功能產生畏懼心理，而大量生成的數據則使使用者在篩選與判斷資訊時感到負擔。儘管如此，本研究也發現，在適當的支持條件下，科技壓力有可能被轉化為推動學習的動力。例如，若組織提供系統化的技術培訓與操作支持，科技壓力對技術接受行為的負向影響將顯著降低。

四、假設四：社會影響與技術接受度

社會影響在技術接受過程中展現了不可忽視的正向作用。研究發現，來自同儕、上級及選民的壓力與支持，是促進技術普及的重要驅動力。特別是在公共治理的合作性環境中，社會影響不僅推動了技術的採用，更為整體數位化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

例如，當上級明確表達對技術的支持或同儕展示技術應用的成功經驗時，使用者會感受到更強烈的採用動機。此外，選民對於政策透明度和執行效率的期待，也成為推動技術應用的重要外部壓力。這些社會影響不僅促進了技術在個體層面的接受，還對整體組織的技術文化形成了正面引導。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科技壓力與社會影響的驗證結果表明，AIGC 技術的成功應用離不開使用者需求與社會文化的相互契合。同時，這些構面之間的交互作用進一步豐富了 TAM 模型與科技壓力理論的內涵，為未來技術創新與推廣提供了理論支持與實務指引。

貳、研究結論總結

AIGC 的迅速發展為公共治理領域帶來了嶄新的應用可能。本研究結合量化與質性分析，深入探討了 AIGC 技術在臺灣立法委員及其助理工作中的實際應用情境，並以技術接受模型（TAM）和科技壓力理論（Technostress Theory）為理論基礎，驗證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科技壓力與社會影響等核心變數對技術接受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不僅印證了相關假設，也揭示了技術應用過程中的促進因素與阻礙因素，為未來的技術發展與推廣提供了重要啟示。

首先，本研究證實，PU 是推動 AIGC 技術接受的最關鍵因素。受訪者普遍認為，AIGC 能有效提升他們的工作效率，特別是在政策分析、選民服務計畫書撰寫等需要處理大量文本或資訊的任務中，AIGC 技術的自動化能力顯著減少了重複性工作所需的時間與人力投入。質性訪談中多位受訪者提到，AIGC 技術能快速生成草案或數據分析結果，幫助他們應對時間緊迫的工作需求。量化數據亦顯示，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 AIGC 技術能有效解決日常工作中的難題，這些發現顯示 PU 是技術採用意圖的重要驅動力。

其次，PEOU 在技術接受行為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本研究顯示，技術操作的簡便性、學習成本的降低，以及清晰的使用介面設計，是提升 AIGC 技術接受度的關鍵條件。多數受訪者認為，若技術工具能提供友好直觀的操作體驗，他們更有可能採用並持續使用該工具。質性資料中，一些受訪者指出，在繁忙的立法機構工作環境中，易於上手且功能集成度高的工具能顯著降低心理負擔，幫助他們更快地融入新技術的應用場景。這些結果表明，PEOU 不僅能直接影響技術接受意圖，還能通過減輕科技壓力間接促進技術的長期使用。

然而，本研究亦發現，Technostress 對技術接受行為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AIGC 技術的快速更新迭代、操作過程中的複雜性，以及大量生成內容所引發的資訊過載，對部分受訪者形成了明顯的心理負擔。特別是對於數位素養較低或學習時間有限的使用者，這些壓力成為技術採用的主要阻礙因素。質性訪談中，一些受訪者提到，他們需要利用私人時間學習新工具，這不僅增加了學習成本，也導致了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壓力加劇。科技壓力的負面影響在量化數據中亦有所體現，部分受訪者對技術更新過快表示焦慮，這種焦慮可能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技術接受意圖。

此外，SI 在技術採用行為中發揮了關鍵的推動作用。本研究發現，同儕的技術示範效應、上級的支持與鼓勵，以及選民對高效服務的期待，均能顯著提升受訪者的技術接受意圖。質性資料顯示，當立法委員辦公室的其他同事開始採用 AIGC 技術時，受訪者往往會感受到一定的社會壓力，並以更積極的態度嘗試新技術。同時，來自上級的明確支持也讓受訪者感到更加安心，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技術的信任與使用意願。此外，選民對於政策透明度和效率的期待成為驅動 AIGC 技術應用的重要外部因素，這表明公共壓力在推動技術普及中的潛在價值。

綜合而言，AIGC 在臺灣立法機構的應用顯示出顯著的效能提升，特別是在減少重複性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促進創新表達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仍需面對多重挑戰，包括如何降低科技壓力、優化技術設計，以及更有效地應對專業領域中的應用需求。本研究的結果不僅驗證了 TAM 和科技壓力理論在技術接受行為中的適用性，還進一步揭示了社會影響和心理調節策略在技術推廣中的重要性。未來的技術發展應以平衡效率與人性化需求為目標，確保技術應用的長期價值與可持續性。

第二節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構建與意涵

壹、模型構建的背景與意義

AIGC 的廣泛應用，正快速改變公共治理領域的工作模式。然而，現有研究多集中於技術層面，忽視了技術採用行為背後的社會壓力與心理調節因素的影響。為此，本研究基於技術接受模型（TAM）與計劃行為理論（TPB）的整合，提出了一個新的行為決策模型，旨在提供多維度框架來分析 AIGC 工具的技術採用行為。

本模型的核心目的是解釋技術特性與社會影響如何交互作用，從而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態度與行為意圖。這不僅豐富了技術接受理論的內涵，也為未來技術推廣策略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論支持。

貳、模型的核心構面

AIGC 技術行為決策模型的設計融合了 TAM 與 TPB 的優勢，形成了一個多維度的分析框架，其核心構麵包括以下幾點：



一、PU 與 PEOU

PU 和 PEOU 作為 TAM 的核心變數，直接影響使用者對技術的態度與接受意圖。在公共治理環境中，PU 體現在技術提升效率與改善效能的實用價值，而 PEOU 則通過降低學習成本與操作門檻促進技術的快速採用。

二、主觀規範（SN）與知覺行為控制（PBC）

SN 和 PBC 作為 TPB 的核心構面，補充了技術接受行為中的心理與社會因素。SN 反映了來自同儕、上級與外部群體的社會壓力，而 PBC 則體現了使用者在操作技術過程中的自信心與控制感，這些因素均能直接或間接影響行為意圖（BI）。

三、行為態度與行為意圖（Attitude 和 BI）

PU、PEOU、SN 和 PBC 的綜合作用通過影響使用者的態度進一步驅動行為意圖（BI）。BI 作為模型的仲介變數，最終促進技術採用行為的實現。

參、模型的應用範圍

該模型的適用範圍涵蓋了公共治理領域中多樣化的技術應用場景，特別是在立法機構、地方政府及大型公共服務組織的技術採用研究中，展現出廣泛的應用潛力。同時，模型也適用於教育、醫療及企業管理等需要兼顧技術特性與社會互動的場景。

肆、模型的理論與實務貢獻

一、理論層面

通過整合 TAM 與 TPB，本研究創新性地將技術特性與社會壓力相結合，豐富了技術接受理論的內涵。

模型揭示了 PU、PEOU 與心理調節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行為意圖解釋框架。

二、實務層面

本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框架，用於指導公共治理中 AIGC 技術的推廣策略。

本研究揭示了同儕影響、上級支持及自信感在技術應用過程中的重要性，為技術設計與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伍、後續模型優化方向

1.跨情境驗證：建議在不同文化背景與政策環境中驗證該模型的普遍性，進一步擴展其應用範圍。

2.動態分析：探索模型在不同技術發展階段的適應性，揭示變量之間的動態

關係。

3.應用工具開發：基於模型設計決策支持工具，幫助公共部門優化技術推廣方案。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AIGC 技術作為新興的技術創新，其應用潛力和挑戰為公共治理和其他領域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空間。本研究雖圍繞公共治理領域的 AIGC 技術接受行為進行了深入探討，但技術的不斷演進和應用範圍的擴展，使得未來仍有許多研究值得深入探索。基於本研究的成果與不足，提出以下幾點後續研究建議：

壹、拓展研究場景與應用領域

本研究聚焦於公共治理中立法委員及其助理的技術應用情境，但 AIGC 的應用潛力遠不止於此。未來研究可拓展至以下幾個方向：

1. 醫療領域：探索 AIGC 在臨床診斷支持、病歷分析及患者溝通中的應用價值，尤其是如何平衡技術的高效性與患者隱私保護的需求。
2. 教育領域：研究 AIGC 在個性化學習、教學材料設計及教師輔助中的應用效果，特別是技術如何影響教育公平性和學生的學習成果。
3. 企業管理與市場行銷：分析 AIGC 技術在提升企業決策效率、精準行銷以及供應鏈管理中的角色，進一步探討企業內部對技術接受的文化與結構影響。跨領域的拓展研究不僅有助於驗證本研究模型的普適性，也能揭示技術在不同應用場景中的特殊挑戰和創新價值。

貳、關注技術長期影響與倫理挑戰

AIGC 技術的長期影響尚需深入研究，尤其是技術帶來的倫理挑戰和社會影響。未來研究應聚焦以下幾個方面：

1. 技術與勞動力市場：研究 AIGC 在特定行業中對工作角色的重塑，包括對勞動者技能需求的變化，以及可能引發的失業或工作轉型問題。
2. 數據隱私與安全性：深入探討 AIGC 技術在處理敏感數據時可能引發的隱私洩漏和數據濫用風險，並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與政策框架。
3. 技術的社會公平性：分析技術應用是否會加劇數位鴻溝或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探索如何設計更加公平與包容的技術應用策略。
4. 生成內容的倫理審查：研究 AIGC 生成的內容（如文本或圖像）在政策、法律和倫理層面的影響，特別是在虛假資訊或偏見生成方面的風險控制。技術的發展不僅需要創新，更需要考慮對社會的長期責任與價值導向。這些議題的探討將為技術應用的規範化與可持續性提供重要依據。

參、深挖技術接受與使用行為的心理動態

技術接受行為背後的心理動態是理解使用者行為的重要切入點。本研究整合 TAM 與 TPB 模型，解釋了技術特性與社會壓力對行為意圖的影響，但心理層面的複雜性值得進一步挖掘。未來研究可重點關注以下方向：

1. 技術焦慮與抗拒心理：探索使用者在面對技術更新或操作複雜性時的焦慮來源，以及如何通過設計更友好的技術介面和學習支持來減輕這種心理壓力。
2. 心理韌性與適應能力：研究使用者在高壓情境中對技術學習與適應的策略，尤其是不同背景群體（如不同年齡、數位能力）的適應行為差異。
3. 技術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分析技術使用是否會提升使用者對工作的滿意度及成就感，並探討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如技術依賴或角色衝突）。

這些心理層面的研究不僅能豐富技術接受理論，還能為技術設計與應用策略提供人性化的建議。

肆、促進跨文化與國際比較研究

技術接受行為受文化、政策與社會環境的深刻影響，未來研究應積極促進跨

文化與國際比較，從而揭示技術採用的多樣性與普適性。

文化因素的影響：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技術接受行為差異，例如西方與東方文化在技術信任與使用態度上的異同。

政策環境的比較：研究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數位政策與法規如何影響 AIGC 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例如歐盟的數據保護法規(GDPR)對技術採用的影響。

技術普及與數位鴻溝：探索技術在經濟發展水準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普及情況，以及如何通過政策設計縮小數位鴻溝。

通過跨文化與國際比較，未來研究可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技術接受行為的共性與特殊性，為國際間的技術合作提供科學支持。

伍、發展決策支持工具與動態模型

基於本研究的整合模型，未來研究可探索如何將理論成果轉化為實用工具，幫助決策者更好地應對技術推廣中的挑戰。

1. 開發實用性工具：設計基於 TAM 與 TPB 的決策支持工具，用於評估不同情境下技術推廣的潛力與風險。

2. 構建動態模型：引入時間序列數據，建立能夠捕捉技術應用過程中變量動態關係的模型，特別是在技術升級與外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提供更加靈活的分析框架。

3. 強化模型的人工智慧應用：將研究模型與 AI 演算法結合，用於預測技術採用行為並優化政策決策。

這些實用工具與動態模型的開發將進一步加強技術接受研究的實踐價值，並為技術設計與應用提供更加精準的支持。

總之，AIGC 技術的應用不僅代表了一場技術革命，更是一次社會與人類行為的深刻變革。未來研究應繼續關注技術應用的多層面影響，通過跨領域、跨文化與實踐導向的研究，不斷豐富理論內涵，提升技術的社會價值與應用成效。

參考文獻

- Alexopoulos, C., Rizun, N., & Matheus, R. (2023). Gender differences and technostress vis-a-vis Open Government Data (OGD) adoption and usage. Available at SSR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580806
- Ajzen, I. (1985).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Action control (pp. 11-39).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https://doi.org/10.1007/978-3-642-69746-3_2
-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 179-211. [https://doi.org/10.1016/0749-5978\(91\)90020-T](https://doi.org/10.1016/0749-5978(91)90020-T)
- Armitage, C. J., & Conner, M. (2001).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A meta-analy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4), 471-499.
<https://doi.org/10.1348/014466601164939>
- Baker, S. A., Morrison, D. M., & Carter, W. B. (1996). Using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to understand the decision to use condoms in an STD clinic population.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23(4), 478-490. <https://doi.org/10.1177/109019819602300411>
- Brooks, S., Longstreet, P., & Califf, C. (2017). Social media induced technostress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et addiction: A distraction-conflict theory perspective. *AIS Transactions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9(2), 99-122. <https://doi.org/10.17705/1thci.00009>
- Brod, C. (1984). Technostress: The human cost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Addison-Wesley.
- Camarena, L., & Fusi, F. (2022). Always connected: Technology use increases technostress among public manager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2750740211050387>
- Cua, F. C., & Garrett, T. C. (2009).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model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pp. 268-282). IGI Global. <https://www.igi-global.com/chapter/diffusion-innovations-theory/35834>
- Dearing, J. W., & Cox, J. G. (2018).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Health Affairs*, 37(2), 183-190. <https://doi.org/10.1377/hlthaff.2017.1104>

De Vries, H., Tummers, L., & Bekkers, V. (2018). The diffusion and adoption of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s: A meta-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Perspectives on Publ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1(3), 159-176. <https://doi.org/10.1093/ppmgov/gvx003>

Fishbein, M., & Ajzen, I.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Addison-Wesley.

Godin, G., & Kok, G. (1996).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review of its applications to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11(2), 87-98. <https://doi.org/10.4278/0890-1171-11.2.87>

Goodfellow, I., Pouget-Abadie, J., Mirza, M., Xu, B., Warde-Farley, D., Ozair, S., ... & Bengio, Y. (2014).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7, 2672-2680. <https://doi.org/10.48550/arXiv.1406.2661>

Hillmer, U. (2009). Technology acceptance in mechatronics: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Springer.

Holden, R. J., & Karsh, B.-T. (2010).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in health care. *Journal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43(1), 159-172. <https://doi.org/10.1016/j.jbi.2009.07.002>

Kaiser, F. G., Hübner, G., & Bogner, F. X. (2005). Contrast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with the value-belief-norm model in explaining conserva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5(10), 2150-2170.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2005.tb02213.x>

Koletar, C. M. (2024). A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pproach to the Acceptance of Negative Evaluation Results.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Lee, Y., Lee, J., & Lee, Z. (2001). The effect of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ICIS 2001 Proceedings. Retrieved from <https://aisel.aisnet.org/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38&context=icis2001>

Lee, Y., Lee, J., & Lee, Z. (2006). Social influence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behavior: self-identity theory perspective. ACM SIGMIS Database: The DATABASE for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37(2-3), 60-75. <https://doi.org/10.1145/1161345.1161355>

Maier, C. (2014). Technostres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fis.uni-bamberg.de/entities/publication/1fd28281-0ea6-40e6-845c-cc7260002e1a/details>

Montano, D. E., & Kasprzyk, D. (2015).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he integrated behavioral model. In Health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95-124). Jossey-Bass.

Minishi-Majanja, M. K., & Kiplang'at, J. (2005).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71(3), 211-224. <https://journals.co.za/doi/abs/10.10520/EJC61208>

Putra, R. D., & Samopa, F. (2018).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eptance of Surabaya e-government service us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3: a case study of E-Lampid. In Mathematics, Informatics,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ISEIC) (pp. 1-6). Atlantis Press. <https://www.atlantis-press.com/proceedings/miseic-18/25905023>

Rogers, E. M. (200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Free Press.

Saraswaty, A. R., & Pusparini, E. S. (2023). The influence of autonomy, competence, relatedness, and technostress on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broadcasting institutions in Indonesia. *Jurnal Manajemen Pemerintahan*. <https://ejournal.ipdn.ac.id/JTP/article/view/3106>

Setiyani, L., Effendy, F., & Slamet, A. A. (2021). Using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3 (TAM 3) at selected private technical high school: google drive storage in e-learning. *Utamax: Journal of Ultimate Research and Trends in Education*, 3(1), 1-10.
<https://journal.unilak.ac.id/index.php/UTAMAX/article/view/6746>

Shu, Q., Tu, Q., & Wang, K. (2011). The impact of computer self-efficacy and technology dependence on computer-related technostress: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7(10), 923-939. <https://doi.org/10.1080/10447318.2011.555313>

Tarafdar, M., Tu, Q., & Ragu-Nathan, B. S. (2007). The impact of technostress on role stres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4(1), 301-328.
<https://doi.org/10.2753/MIS0742-1222240109>

Teo, T. (2011). Factors influencing teachers' intention to use technology: Model development and test. *Computers & Education*, 57(4), 2432-2440. <https://doi.org/10.1016/j.compedu.2011.06.008>

Thomas, E., & Rogers, B. E. M. (1998).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and work-site AIDS program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3(1), 17-43. <https://doi.org/10.1080/108107398127481>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Brooks/Cole.

Vaswani, A., Shazeer, N., Parmar, N., Uszkoreit, J., Jones, L., Gomez, A. N., ... & Polosukhin, I. (2017).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In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Vol. 30). <https://doi.org/10.48550/arXiv.1706.03762>

Venkatesh, V., & Bala, H. (2008).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3 and a research agenda on interventions. *Decision Sciences*, 39(2), 273-315. <https://doi.org/10.1111/j.1540-5915.2008.00192.x>

Venkatesh, V., & Davis, F. D. (2000).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 *Management Science*, 46(2), 186-204. <https://doi.org/10.1287/mnsc.46.2.186.11926>

Venkatesh, V., & Zhang, X. (2010).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S. vs. China.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13(1), 5-27. <https://doi.org/10.1080/1097198X.2010.10856507>

Wu, P. H., & Lin, C. P. (2016). Learning to foresee the effects of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and need for social approval on technology brand loyalty.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11, 1-12.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16.06.011>

Zainun, N. F. H., Johari, J., & Adnan, Z. (2020). Technostress and commitment to chang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900692.2019.1672180>

A brief history of generative AI. (2024). DATA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ataversity.net/a-brief-history-of-generative-ai/>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generative AI: From its origins to today and beyond. (2024). ResearchGat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79219460_A_Comprehensive_Review_of_Generative_AI_-From_its_Origins_to_Today_and_Beyond

A Primer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3). MDP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dpi.com/2227-7102/14/2/17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erative AI risks in the public sector. (2024). ACM Digital Library.

Retrieved from <https://dl.acm.org/doi/fullHtml/10.1145/3657054.3657125>

Generative AI. (2023). ResearchGat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70653602_Generative_AI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4). ScienceDirec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24000468>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etaverse era. (2023). ScienceDirec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7241323000198>

Preliminary evidence of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in health care. (2024).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993141/>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d.). MIS Quarterly, 13(3), 319-340. <https://doi.org/10.2307/249008>

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AI (GenAI) on practices, policies and public sector. (2024). Tandfon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494820.2023.2253861>

Unveiling the evolution of generative AI (GAI):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view. (2024).

Journal of the Evolution of AI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jesit.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43067-024-00145-1>

Goodfellow, I., Pouget-Abadie, J., Mirza, M., Xu, B., Warde-Farley, D., Ozair, S., ... & Bengio, Y.

(2014).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7, 2672-

2680. <https://doi.org/10.48550/arXiv.1406.2661>

Vaswani, A., Shazeer, N., Parmar, N., Uszkoreit, J., Jones, L., Gomez, A. N., ... & Polosukhin, I.

(2017).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In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Vol. 30).

<https://doi.org/10.48550/arXiv.1706.03762>

附錄一：立法院從業人員 AIGC 觀點分析問卷

您好，

我是來自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蔣濤（指導教授：姚蘊慧博士）。誠摯邀請您參加一項有關生成式人工智慧（AIGC）在臺灣公共治理中的研究。此研究的目標是深入瞭解國會人員對於 AIGC 技術的看法和使用意願。

若您曾擔任或現任立法委員、立法委員助理，請您協助填寫一份簡短的匿名調查問卷。問卷將詢問您對 AIGC 技術的態度和相關經驗。

這份問卷將完全匿名，不會收集您的任何個人身份資訊。收集的數據將用於幫助我們理解立法院從業人員對 AIGC 的看法，並為未來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本研究已通過中國文化大學學術倫理審查委員會的評估與批准。填寫本問卷約需 5 分鐘。

為了感謝您的協助，我們將在問卷最後提供一套價值 NT\$1500 的 AI 課程「AI 人工智慧應用實操課程」的下載鏈接。

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聯繫我：蔣濤，郵箱：A7105218@ulive.pccu.edu.tw。

第一部分：

您目前或曾擔任以下身份？（單選題）

- 立法委員
- 立法委員助理
- 以上皆非(若選擇「以上皆非」，請停止作答，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參與。)

您是否有使用過 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工具的經驗或具有想要使用的意願？

是 否(若選擇「否」，請停止作答，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參與。)

第二部分：個人背景資料

您的性別是？（單選題）

男 女

您的出生年次是？（單選題）

民國 53 年及以前 民國 54 年至民國 63 年 民國 64 年至民國 73 年
民國 74 年至民國 83 年 民國 84 年至民國 93 年

您的最高學歷（含目前就讀及肄業）：（單選題）

高中職及以下 專科/二技 大學/四技 碩士 博士

您在擔任立法委員或立法委員助理時的黨籍是？（單選題）

民主進步黨 中國國民黨 臺灣民眾黨 時代力量 臺灣基進 無黨團結聯盟 親民黨 新黨 民主聯盟 無黨籍

您在立法院的工作年資為（含兼職）？（單選題）

0-4 年 4-8 年 8-12 年 13 年以上

您的最高學歷所屬學群是？（單選題）

資訊學群 工程學群 數理化學群 醫藥衛生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 生物資源學群 地球與環境學群 建築與設計學群 藝術學群 社會與心理學群 大眾傳播學群 外語學群 文史哲學群 教育學群 法政學群 管理學群 財經學群 遊憩與運動學群 無（高中職以下請選此選項）

第三部分：AIGC 技術使用狀況

您對於 AIGC 工具的瞭解程度：（單選題）

完全不瞭解 不太瞭解 一般 瞭解 非常瞭解

您使用 AIGC 工具的主要原因是什麼？（複選題）

提高工作效率 簡化資料分析 提供創意靈感 減少重複性工作 提升與選民互動的質量 其他_____

您在使用 AIGC 工具時，遇到的主要困難是什麼？（複選題）

技術操作複雜 缺乏技術支持 學習成本高 高級功能需付費 沒有困難 其他_____

您最近一年的 AIGC 工具使用頻率：（單選題）

從未 偶爾 每週一次 每天一次 每天多次

您每次使用 AIGC 工具的使用時間（大概）為：（單選題）

少於 30 分鐘 30 分鐘至 1 小時 1 至 2 小時 2 至 3 小時 超過 3 小

時

您在每個月平均為使用 AIGC 工具所花費的金額約為（台幣）：（單選題）

- 只使用免費功能 少於 500 元 500 至 1000 元 1000 至 2000 元 2000 至 3000 元 超過 3000 元

您是否會為 AIGC 工具購買硬體設備（例如 TPU、GPU、AI 電腦）？（單選題）

TPU (Tensor Processing Unit) : 專門設計用於加速機器學習任務的硬體。

GPU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 用於加速圖形處理和計算密集型任務的硬體。

AI 電腦：專門配置用於運行人工智慧應用的電腦。

- 會 不會

您較常使用的 AI 生成工具為：（複選題）

- ChatGPT Claude Gemini llama 豆包 MidJourney DALL·E 3 Imagine Stable Diffusion(Flux) AIVA Suno Pica AI Runway Vidu HeyGen Vidnoz AI Synthesia 雅婷文字轉語音 TTSMaker Luma AI Meshy 其他

您最常將 AIGC 工具用於：（單選題）

- 文字撰寫 繪圖美術 影音製作 其他
-

到目前為止您曾經參與過 AIGC 相關訓練課程（包含線上課程及線下課程）的累計時間約為：（單選題）

- 從未參與 少於 10 小時 10 至 20 小時 20 至 30 小時 30 至 40 小時 超過 40 小時

到目前為止您曾經參與過 AIGC 相關訓練課程的累計花費約為（台幣）：（單選題）

- 從未參與 只參與免費課程 少於 1000 元 1000 至 3000 元 3000 至 5000 元 5000 至 10000 元 超過 10000 元

您使用 AIGC 相關工具用於哪些立法院工作內容：（複選題）

- 政策研究 會議記錄 資料整理 預算審查 文宣製作 選民服務 其他

第四部分：使用態度與意願

*以下的題目請「勾選」一個最符合自己的答案，只能選一個答案喔。

	完全同意	大致同意	稍微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我覺得使用 AIGC 工具能幫我有效地解決問題。					
我覺得使用 AIGC 工具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我覺得 AIGC 工具是容易學習的。					
我覺得學習使用 AIGC 工具需要投入大量時間。					
我覺得學習使用 AIGC 工具需要專業知識。					
其他立委辦公室已使用 AIGC 工具，會提高我使用 AIGC 工具的意願。					
我的上級鼓勵我使用 AIGC 工具。					
我願意持續使用 AIGC 工具。					
我願意精進使用 AIGC 工具的能力。					
我願意參加 AIGC 工具的培訓課程。					
遇到問題時，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					
未來我會優先選擇 AIGC 工具來解決問題。					
我會推薦他人使用 AIGC 工具。					
AIGC 工具更新發展太快，讓我備感壓力。。					
我覺得 AIGC 工具的操作介面複雜，讓我感到壓力。。					
我常需用私人時間學習新的 AIGC 工具知識。。					
AIGC 工具的發展可能會威脅到我未來的工作。。					
AIGC 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讓我備感壓力。。					

同儕會使用 AIGC 工具，讓我感到有競爭的威脅。。				
AIGC 工具會導致社會資源分配更加不均。。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某些職業的消失。。				
AIGC 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大眾感到疏離。。				
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個資外洩。。				
AIGC 工具可能有漏洞，導致工作秘密外洩。				
AIGC 工具可能有智慧財產權遭到侵害的問題。				
我擔心 AIGC 工具所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準確，且有誤導使用者之虞。				
AIGC 工具可能包含虛假資訊，左右輿論的方向。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你的協助！】



附錄二：訪談大綱

一、對 AIGC 技術的看法

1. 您對 AIGC 技術的整體看法是什麼？
 - 您認為 AIGC 技術在公共治理中有什麼潛力和挑戰？
 - 您覺得 AIGC 技術在您的工作中能夠發揮哪些作用？
2. 您在工作中使用過哪些 AIGC 技術？
 - 您是如何得知這些技術的？
 - 您在使用這些技術時的主要目的和期望是什麼？
3. 您在使用 AIGC 技術時遇到了哪些挑戰和困難？
 - 技術操作方面的困難
 - 技術支持和培訓方面的不足
 - 其他方面的挑戰

4. 您是如何解決這些挑戰和困難的？
 - 是否有獲得技術支持或培訓？
 - 是否有同事或上級的幫助？
5. 您覺得 AIGC 技術在實際應用中有哪些不足之處？
 - 技術本身的限制
 - 使用過程中的問題

三、對未來應用的期望

6. 您對 AIGC 技術在未來公共治理中的應用有什麼期望？
 - 您認為應該如何改進 AIGC 技術，以更好地支持您的工作？
 - 您覺得政府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推動 AIGC 技術的應用？
7. 您對 AIGC 技術的未來發展有什麼建議？
 - 技術改進方面的建議
 - 政策支持方面的建議

四、其他相關問題

8. 您覺得在使用 AIGC 技術時，是否感受到來自同事或上級的壓力？

- 這些壓力對您的技術接受行為有什麼影響？
9. 您是否參加過任何與 AIGC 技術相關的培訓課程？
- 這些培訓對您的技術使用有什麼幫助？
10. 您覺得 AIGC 技術對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滿意度有什麼影響？
- 是否有提高工作效率？
 - 是否有增加工作壓力？



附錄三：研究同意書

您好！

我是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蔣濤，目前正在進行一份由姚蘊慧博士指導的研究論文「AIGC（AIGC）在臺灣公共治理中的角色：

立法委員與立法委員助理的觀點分析」。在此十分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的進行，並且分享您寶貴的經驗。

為了確保您的隱私和權益，以及研究過程的正確性與嚴謹性，希望您仔細閱讀下列研究過程中的各項事宜，若無異議則請於下方同意處簽名。謝謝！

1. 研究者確保研究參與者在本研究的自願性和自主性，並且在充分告知其權利義務後才進行研究。
2. 研究者確保訪談進行地點的隱私及安全。
3. 研究所得的資料內容僅供論文分析使用，絕不外洩。研究的結果將以論文發表，同時確保研究參與者的身份無法由文字內容得知。
4. 倘若於研究進行過程有任何不適的狀況，研究參與者有權利要求隨時終止訪談或是退出研究。
5. 研究參與者願意接受至少一次的面對面訪談，必要時，願意進行第二次的追蹤訪談，以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和正確性。
6. 研究參與者願意接受訪談過程全程錄音，錄音內容將於研究結束之後銷毀。
7. 對於研究過程有任何疑慮，研究參與者可以隨時提出以共同解決。

研究參與者同意並願意協助配合上列各項事宜。

請問：研究完成後，您是否需要一份研究報告？（請圈選） 是 / 否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一份由研究參與者持有，一份由研究者持有，以保障您的權益。

研究參與者簽名：_____

研究者蔣濤同意並願意恪守各項研究倫理。

研究者簽名：_____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本研究將因您的參與而更豐富其內容及意義！